

中共大连党史丛书(十)

苏联红军在旅大



大连市史志办公室 编



《苏联红军在旅大》

主 审 单文俊

主 编 王佩平 孙宝运

副主编 关恒喜 夏振铎

前 言

在大连的历史进程中，曾有过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使大连不仅在中国现代革命斗争史中具有独特地位，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这就是苏联红军在旅大地区军管和驻防的10年。

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签订《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8月9日，苏联百万红军对日本关东军发起总攻击。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订了关于中国大连、旅顺口和长春铁路等协定。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8月22日，苏联红军先后进驻旅顺、大连。旅大地区从此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40余年的殖民统治，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苏联红军在旅大地区历时10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为界，前后分为军管和驻防两个阶段。这10年，恰逢中国解放战争、建国初期和抗美援朝战争之时，中苏两国、两国人民、两国军队及中共与苏共、国民党与苏共、中共与国民党等方方面面的恩恩怨怨、是非曲直，各种矛盾繁纷复杂，纵横交错，构成了这一时期的独特旋律，上演了一台极富特色极其生动的活剧。

《苏联红军在旅大》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及当事人的回忆材料，把苏军在旅大的历史尽可能详实完整地奉献于读者面前。今天，原苏联虽已解体，但把历史上发生的这一段史实整理出来，相信对于希望了解这一历史的人们及史学工作者是不无益处的。同时，也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大连解放50周年的实际举措。

作为一部资料汇编,收录的各篇资料所反映的观点、看法不尽相同,相信读者在通读这些资料后,会通过自己的分析得出正确结论的。由于事隔四五十年,苏军撤离时又把有关资料带走或销毁,故资料搜集颇难;加之我们水平有限,编辑工作难免有缺点和不足,敬请广大读者和史学工作者予以补正。

大连市史志办公室

1995年1月

苏联红军在旅大

印刷：东北财经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5

印数：1—2000 字数：300千字

书号：大新出内字第95010号

封面设计：李居昌 责任校对：史研

1995年1月印刷

工本费：平 15.80元

精 28.00元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部分 综 述

苏联红军进驻旅大的十年..... (1)

第二部分 回忆录

旅大八年 韩 光(35)

中共大连党组织与驻连苏军关系 刘顺元(76)

我所了解的苏军 柳运光(79)

日本投降后苏军在大连的情况 唐韵超(85)

解放战争初期的大连公安工作 赵杰 王华(89)

处理与苏军当局关系的几个原则..... 王其人(103)

旅顺解放初期与苏军关系的回顾..... 王世明(111)

苏军进驻大连初期的党派活动情况..... 朱秀春(117)

随苏军进入大连的两个月..... 董崇彬(120)

我与苏军的交往..... 曲英敏(122)

留在普兰店的记忆..... 王福如(124)

苏军撤离旅大的情况..... 鲜 明(130)

苏军从旅顺口地区撤退的情况..... 董希真(134)

《新生时报》的十八个半月..... 洛 鹏(136)

忆旅顺《民众报》..... 沈西牧(149)

《关东日报》始末..... 任凤林(153)

越过大兴安岭..... 柳德尼科夫(158)

解放的使命..... 博伊科(164)

第三部分 专 题

苏军在旅顺的十年..... (191)

苏军进驻金县的情况..... (208)

苏军进驻新金地区始末·····	(216)
东北抗联工作组配合苏军接管旅大·····	(223)
粉碎国民党妄图接收旅大的阴谋·····	(228)
中苏两国人民团结友好的桥梁·····	(242)

第四部分 文献、报刊资料

三大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	(255)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附件·····	(256)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	(262)
关于大连之协定·····	(265)
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及附件·····	(267)
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 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	(270)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273)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	(275)
巴申与杜平谈话纪要·····	(278)
关于刘顺元、唐韵超两同志撤退问题的报告·····	(281)
关东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	(284)
江华给韩光的信·····	(287)
洛甫在东北局组织部召开的旅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288)
伍修权在东北局组织部召开的旅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291)
关于联共与中共同志在完成巩固关东苏联海军军事根据地 共同任务中的工作关系问题的几点意见·····	(292)
韩光、袁牧化与巴申同志、安特罗波夫同志谈话记录·····	(300)
关于三年来中苏关系的总结报告·····	(307)
巩固的友谊无敌的力量·····	(311)
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	(315)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与苏联政府 的谈判的中苏公报·····	(320)

关于大力开展中苏友好月工作的指示·····	(321)
庆祝苏军建军三十五周年·····	(323)
周总理率领慰问苏军代表团到达旅大举行 庆祝苏联建军节慰问苏军大会·····	(326)
周总理在庆祝苏联建军三十五周年慰问 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大会上的讲话·····	(329)
巩固中苏友好合作关系全力协同苏军巩固旅顺口海军根据 地·····	(333)
中苏关于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 退并将该根据地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支配的联合 公报·····	(335)
在旅大市各界人民欢送驻旅顺口地区苏军回国大会上郭述 申同志的讲话·····	(336)
在旅大市各界人民欢送驻旅顺口地区苏军回国大会上苏军 代表的讲话·····	(339)
中苏关于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 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 公报·····	(343)
中共旅大市委关于欢送苏军回国活动的报告·····	(344)
苏军阻挠国军登陆·····	(346)
国民党大连市党部的报告书·····	(349)
苏联阻碍接收旅大漠视中苏条约义务·····	(352)

第五部分 大事记

苏军进驻旅大十年大事记·····	(357)
------------------	-------

第六部分 附录

苏联移交中国的企业财产清单·····	(381)
纪念塔简介·····	(383)

苏军管辖区域略图·····	(385)
旅顺海军根据地范围示意图·····	(386)
后记·····	(387)

第一部分

综 述

苏联红军进驻旅大的十年

一、苏军进驻旅大的背景

(一)雅尔塔会议上的秘密协定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苏联将德国军队驱逐出自己的国境,随后又相继击溃了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境内的德国法西斯军队,于9月间进入德国境内作战,给德军以沉重的打击。远东的情况,则与欧洲有所不同。要彻底消灭在远东的日军,特别是盘踞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当时,苏联和日本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了苏日和平条约,苏对太平洋战争的态度是严守中立。鉴于这种情况,美国的战略意图就是千方百计诱使苏联在打败德国后出兵远东参战。为使苏联出兵,美国总统罗斯福和他的助手们对苏联进行了各种试探。经过一系列的谈判,终于在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背着中国,正式签订了《雅尔塔协定》。

《雅尔塔协定》规定: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的2个月或3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①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②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惠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出路之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之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惠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③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三国首脑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

须在日本被击溃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联方面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

从“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可以看出,苏联的目的是为维护本国的安全和远东的权益。通过对大连港、旅顺军港和中东铁路的控制权,使中国东北与外蒙古、南库页岛群岛、千岛群岛联接起来,构成一道安全屏障以警惕美国的扩张。作为交换条件,苏联承认美国在中国(东北除外)的主导地位;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其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美国则可以通过雅尔塔协定,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减少美国在远东战场的牺牲,把苏联的势力范围局限在东北,迫使苏联承认在东北实行所谓门户开放政策,依靠其经济实力与苏联在东北竞争,以便战后独占日本和远东,取得对中国的控制权。

雅尔塔会议,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讨论和决定有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问题,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一种表现,它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二)苏联出兵东北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1945年4月15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向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滕尚武宣布:苏联声明1941年4月13日签订的“苏日和平条约”无效。当时,日本在中国东北驻有精锐部队关东军24个师团、11个独立旅团,大约75万人。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取得了德国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接着开始了对日作战的准备。7月底,苏联已作好对日作战准备的有150万军队,29000多门大炮和迫击炮,5000多辆坦克和自动推进炮,近5000架作战飞机。太平洋舰队和阿穆尔河红旗舰队的舰艇也进入了战备状态。8月8日,莫洛托夫召见佐滕尚武,宣布从8月9日起,苏联政府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1945年8月9日零时,苏联百万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三个方面越过中苏边界进入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总攻

击。苏军自8月9日对日作战以后,在中国人民及抗日联军和八路军的配合下,仅用一周的时间,就一举打垮了日本侵略者赖以抵抗的主要力量——关东军。经过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长期奋勇抗日,同盟国协同作战,加之苏联出兵东北,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至此,苏军控制了中国东北全境。

早在1945年5月28日,为了促使中苏条约的签订,美国政府曾派特使霍普金斯和驻苏大使哈里曼与斯大林就有关中国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中斯大林重申,苏联政府准备同中国政府对话,希望能在7月1日以前和蒋介石在莫斯科商谈签约问题。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受命向蒋介石递交了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机密备忘录《关于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协定纲要的说明》,并附有《雅尔塔协定》密约的全文。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派宋子文率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于6月30日到莫斯科进行中苏谈判。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订了关于大连、旅顺口和长春铁路等协定,以及外蒙古问题的换文。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同时签订的其它协定规定:保证中苏两国互相尊重主权及互不干涉彼此的内政。苏联重申中国对于东北诸省的主权。苏联允诺将从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资上援助国民党政府。中国同意:在战败日本后,如果外蒙在公民投票证实有独立的愿望,将承认对外蒙古之独立;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并由中国管理该港,该港设备的一半,免费供苏联使用;中长铁路在中国主权下中苏共同经营;旅顺口地区作为苏联海军根据地,限中苏两国军舰及商船使用。

旅顺口苏联海军根据地区域之境界,《关于旅顺口之协定》之附件规定:“自辽东半岛西岸猴山岛湾以南之地点起,向东方面经过石河站及邹家咀子至该半岛东岸,东西划为一线,此线以南为本地区陆路之界线,但大连市除外”。“辽东半岛区域西方水面,在下

列横线以南各岛归入本地区,此横线系自北纬 39°,东经 124°49' 点起,至北纬 39°20',东经 121°31' 之点止,将两点连成一线以后,转向东北普兰店方向,至其以南之陆路界线之起点。辽东半岛地区东方水面,在下列曲线以南各岛归入本地区,此曲线自陆上界线终点起,向东经过北纬 39°20',东经 123°8' 之点后,转向东南至北纬 39°,东经 123°16' 之地点为止。”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同时签订的其它协定,期限为 30 年。

(三)苏军进驻旅大地区

1945 年 8 月 22 日,苏军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进驻旅大地区(外交上称旅顺口地区)。

8 月 22 日,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副司令伊凡诺夫中将率 250 名空降兵在旅顺口土城子机场着陆,并就任旅顺警备区司令。日军驻旅顺守备司令官小林海军中将向苏军投降,驻旅顺日军武装遂被苏军解除。同日,雅曼诺夫少将也率 250 名空降兵在大连周水子机场着陆,并就任大连警备区司令官(后由高字洛夫中将接替)。当天下午,一批乘火车的苏军抵达金县石河驿。

8 月 24 日,苏联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的首批坦克部队抵达旅大地区。同时,苏联太平洋舰队空降兵机队在旅顺口降落。8 月底,苏军进驻旅大地区的兵力约 1 万余人。随同苏军抵达旅大的有 40 年代初过境到苏联整训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战士。其中有佩带苏军中尉军衔的董崇彬、少尉季喜林和刘玉泉等。董、季、刘来旅大后,分别被苏军当局任命为大连沙河口、西岗、甘井子 3 个区的苏军警备司令部副司令。随同苏军来旅大的还有中共中央派往苏联学习佩带苏军少校军衔的刘亚楼。

9 月 1 日,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 39 集团军司令柳德尼科夫上将率司令部作战组飞抵旅顺。9 月 6 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远东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麦列茨科夫元帅、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空军元帅诺维科夫和胡佳科夫、炮兵

元帅契斯佳科夫,以及其他将领到达旅顺口,并视察了旅顺口海军基地。9月28日,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部分军舰开入旅顺口,齐帕诺维奇海军少将任旅顺口海军基地司令官。

8月22日苏军进驻旅大,饱受日本帝国主义40多年殖民统治的旅大人民,纷纷走上街头,欢迎和感谢苏军解放了旅大。

二、苏军军管旅大的五年(1945年8月22日—1950年2月13日)

(一)苏军进驻初期旅大的政治形势

社会秩序混乱,人民惶恐不安。苏军进驻旅大后,首先接受日军投降并解除日军的武装,把少将军衔以上的日军战犯集中看押,并忙于各处布防,安营设岗,对旅大地区实行军事管制。地方的治安暂由日伪警察维持。此时,旅大地区交通受阻,商行关闭,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盗匪四起,枪声不断。1945年9月5日至9月22日,仅大连市内被抢劫的就有粮厂、煤场、木材厂、酱油公司、青果会社、油脂会社、山林、仓库、码头、飞机场等19处和24家居民住户。例如:9月5日,三春町永银行各精米所均被抢劫;9月7日,亚细亚涂料厂被抢,行抢人约千人,苏军开枪射击,打死20多人;9月12日,石道街附近防空洞中有106名日本学生持刀、枪,残杀中国人3名。

日伪残余拼凑“维持会”,妄图控制旅大政权。1945年8月18日,大连伪商会会长张本政和大地主兼资本家邵慎亭等人,成立了“大连地方自卫委员会”。苏军进驻旅大的第二天,张本政等急忙拜见大连苏军警备区司令官,以协助苏军维持地方治安的名义,得到苏军的许可,并领到部分枪支。(“自卫会”很快改为“大连地方治安维持会”。)8月24日,旅顺伪商会会长刘德智,召集旅顺商会临时董事长及豪绅、地主等地方头面人物磋商,成立了“旅顺地方治安维持会”。9月26日,伪金州商会会长曹世科组织一伙日伪残余分子,成立了“金州民众临时维持会”。此时,旅大地区的政权被“维持

会”所掌握。这些“维持会”的头头，过去罪恶累累，民愤极大，这时又借混乱之机，夺取政权，残害百姓。

国民党建立大连市党部，加紧扩大发展组织。1945年9月初，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罗大愚，派汪渔洋来大连任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书记。汪渔洋到大连后，立即求见苏军大连警备司令官，要求在大连建立市党部。苏军当局表示同意后，汪渔洋加紧在全市建立分党部，委任区分党部书记，发展国民党党员。9月10日，公开挂出国民党大连市党部的牌子（国民党大连市党部成立不久，苏军当局发现他们进行反苏宣传，收集军事情报，于10月下旬以非法组织将其取缔）。9月21日，罗大愚又指定刘启华到金县建立国民党县党部。9月25日，国民党金县党部成立。该党部成立后，迅速在“维持会”中发展伪官吏、劣绅、伪警察入党，操纵“维持会”进行颂蒋盼蒋宣传。9月22日，刘启华到旅顺组织国民党旅顺区党部，任郭弘历、刘铭志为执行委员。

反动会道门进行拥美蒋、反苏共的宣传。苏军进驻旅大初期，各种反动会道门大肆活动。九宫道以“神鬼天机”、“大难临头”等谣言欺骗群众。一贯道大连帮坛主胜德宝哄骗道徒说：“苏联是寅癸水，中央军是戊己土，日本是丙丁火，美国是庚申金，真金不怕火炼，所以美国打败了日本”。“旅大已成为水湾，四面已被戊己土包围，里面净是些鱼鳖虾蟹（诬指苏联红军）”。在一贯道《快快看》小册子中宣传“赤猴法轮一转，中国魔王来大乱”等反苏反共言论。

共产党人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协助苏军稳定旅大局势。苏军进驻旅大的第二天，中共大连“抗盟”分会总支委员会的张世兰、张寿山等共产党员，连夜赶写欢迎苏联红军，庆祝解放等标语，贴遍大连市各交通要道。8月26日又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决定组织武装，配合苏军维持社会秩序。此时，中共胶东大连支部的共产党员左友文、赵恩光等人，也领导工人武装队伍，与维持会和冒充八路军的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具有光荣传统的大连工人阶级迅速开

始组织工会活动。9月2日,由在日本侵占旅大期间与党失去组织关系的原大连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唐韵超等人发起,召开52个大型厂矿工人代表会议,成立了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后改称为大连职工总会。在大连职工总会的领导下,发展会员2万多人,并组成700多人的护厂队,有效地维护了各厂区的秩序。苏军当局对大连职工总会的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发放500万元救济金,帮助工人解决口粮问题。9月7日,中共胶东区委派出的长山列岛工委书记郭壮带领14名武装战士组成小分队抵达旅顺。郭壮等人以旅顺劳苦群众成立的“民众联合会”为掩护,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当时,虽然共产党人积极开展革命活动,领导各群众组织协助苏军维持社会秩序,但由于尚未建立起统一的中共旅大党组织领导机关,仍控制不了整个旅大地区的局势。

(二)苏军支持中共旅大党组织建立党政警群机构

1945年10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韩光到大连会见苏军大连警备司令官高字洛夫中将,交涉有关中共山东部队乘船到东北,路过大连请给予方便等事宜。同时,韩光与高字洛夫还就中共尽快派干部到旅大、建立市委市政府等问题,进行了交谈。高字洛夫提出要派市委书记,派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公安总局长、教育局长、财政局长、民政局长、广播电台台长和报社主编,至于其它各局先派副职,但实权可以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1945年10月12日,韩光乘高字洛夫中将派的军用飞机返回沈阳后,立即向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彭真等做了汇报。东北局领导认为大连形势很好,要抓住有利时机,尽快搭起大连市党政警群领导机构的架子,迅速开展工作。当即决定任命韩光为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并由韩光带领一批干部来大连组建旅大党政警群机构。10月中旬,在苏军当局的支持下,旅大地区统一的中共领导机关——中共大连市委成立。根据当时的复杂形势,中共大连市委暂不公开。

11月7日,大连警察总局(后改为大连市公安局)正式成立。局长由中共中央东北局选派的赵东斌担任,苏军大连警备司令部司令高字洛夫中将亲自签发了委任状。韩光兼任公安局政委,对外以训练处主任身份公开活动。11月8日,大连市政府宣告成立。苏方考虑对外斗争的需要,经莫斯科批准,由苏军当局任命大资本家迟子祥为市长,副市长由中共大连市委推荐的以职工总会代表面目出现的陈云涛担任。大连市政府成立后,旅大地区的“维持会”遂告解散。

在组建市政府、市公安局前后,中共大连市委还派干部组建了市“中苏友好协会”、“妇女建国会”、“青年联合会”,并加强了先期组建的“大连职工总会”等群众组织。在搭起党政警群机构架子之后,中共大连市委又将大批干部派到县、区和各机关、学校、电台、报社、企业担任领导职务。从此,旅大地区变成由苏军军管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特殊解放区。

(三)苏军配合中共旅大党组织粉碎国民党妄图接收旅大的阴谋

苏军进驻旅大后,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图谋染指旅大。1945年10月13日,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同苏军当局会谈,提出国民党政府决定海上船运军队在大连港登陆,到东北接防。苏军当局明确表示:大连为自由商港,中国军队不能由大连港登陆。10月17日,熊式辉再次与苏军当局会晤要求在大连设立航空站,空运军队到东北接防。苏军当局予以拒绝。

海上登陆不成,国民党政府又试图派官员来大连接收。国民党政府早在9月任命的大连市长沈怡,拟定于1946年2月初到大连走马上任。为了对付国民党接收大连的阴谋,中共大连市委与苏军当局商定,把大连市的区域缩小,成立大连县,以便万一交出大连行政权时,尽量减少损失。1946年1月30日,在甘井子区召开大会,宣告大连县政府正式成立。这时,国民党政府接收大员沈怡等

人，闻讯大连有 8000 多人组成的武装纠察队，多次请求苏军在安全上予以保证，但都被苏军当局拒绝。因此，沈怡不敢轻举妄动，接收大连之图谋遂告破产。

接收大连失败，国民党政府于 1947 年 5 月中旬通知苏军，准备 6 月初派“视察团”来大连。国民党“视察团”来大连，意在寻找外交借口，要求派军队插足大连；并携带大批在东北已停止流通、仅旅大地区使用的苏军军用货币，企图冲击旅大市场。

为了粉碎国民党的“视察”阴谋，苏军通知中共旅大地委准备“迎接”事宜：对在旅大地区通用的苏军军用货币要贴上印花加盖印章，五天内限额兑换完，逾期一律作废；“视察团”来后不作任何群众性的表示；在宣传上，一切反美、反蒋、反“视察团”的事件不准发生等。中共大连市委通过对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冷静分析，认为这次反“视察”的斗争，在形式上是苏军与中国国民政府的一次外事较量，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为争夺旅大地区进行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因此决定：对“视察团”采取“拖延、孤立、留难、限制、监视”的办法和“不冷不热”、“明争暗斗”的策略；制止未加盖印章的苏军货币流入市场，保护旅大地区金融经济稳定；整顿市容，布置交通岗，不发生请愿示威事件；调拨库存粮食投放市场，压低粮食价格；报纸上不刊登反美、反蒋、反“视察团”的文章。

6 月 3 日，国民党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率“视察团”一行 12 人，乘长治号军舰抵达旅顺港。中共旅大地委与苏军当局密切配合，抽调 170 多人组成工作班子，负责“接待”工作。“视察团”在旅大地区“视察”10 天，仅参观了旅顺博物馆、大连港、铁道工厂、大连船渠厂等处。在中共大连市委的周密部署和巧妙安排下“视察团”一无所获，他们带来的苏军军用货币一张也未用上，其插足大连的阴谋彻底破产，于 6 月 12 日灰溜溜地离开了旅大。

(四)苏军默许中共旅大党组织把旅大建成隐蔽的后方基地

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各解放区军民奋勇抗击,急需大量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区发出指示:要尽快抽调干部到大连来采购与转运军需物资和组织军工生产。来大连的各解放区干部,在中共旅大党组织的帮助和苏军的支持下,采购了大批医疗器材、医药、被服和军火,源源不断地运往各解放区。与此同时,中共旅大地委(1946年7月,中共大连市委改为中共旅大地委)还从苏军手中接管了大连钢铁厂和大连化学厂,组建兵工厂生产军火。苏军大连警备司令官不时地提醒中共旅大地委:你们要加点小心,要做得聪明些。

市公安局成立后,中共旅大党组织从各解放区来旅大的干部和指战员中,选调大批人员充实市、县、区公安局。与此同时,消除了反动的旧警察。经过这番改造,市公安局及所属的武装警察部队,实际上已变成穿警服的党的军队。这支队伍不断扩充,先后有13400余人调往前线,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当时,在中共旅大党组织的请求下,苏军还在武器、弹药方面对武警给予了很多支持和帮助。

解放战争3年中,中共旅大党组织在苏军的暗中帮助下,输送兵员3万余人;做军鞋236万余双,做军服300万套;提供大批药品的医疗设备,连续分批组织医疗队上前线;仅建新公司生产炮弹就达50万余发,引信80余万枚,弹体中碳钢3000吨,无烟火药450吨,迫击炮1430门,以及其它军工产品,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当时,旅大地区名义上是苏联海军基地,实际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物资供应基地、军工生产基地、兵员基地、军事转运站和可靠的后方根据地。

1946年冬,国民党军队进犯到瓦房店、普兰店一带,因石河驿以南驻有苏军,再不敢贸然侵犯。而东北人民解放军背靠苏军防

区,无后顾之忧。国民党军队曾几次向石河驿以北,普兰店,貔子窝以南的解放军根据地进攻,有时向解放军根据地炮击,苏军应解放军的请求,以猛烈的炮火予以还击。国民党军队的炮弹有时打到苏军岗哨防线以里时,苏军便提出严重抗议。为此,国民党军队向苏军提出抗议,指责苏军违反中苏条约规定,袒护中共部队。苏军对此置之不理。当解放军伤员需要撤到旅大地区医疗时,苏军便给予支援和方便。

1946年至1947年间,中共山东解放区多次派遣部队和地方干部,秘密从旅大海域登陆,在苏军的默许和帮助下,安全地到达东北解放战争前线。

(五)苏军援助中共旅大党组织战胜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发展生产,安定民生

苏军进驻旅大初期,由于日本人开办的工厂企业纷纷关闭,大批工人失业,旅大的社会经济处于停顿和混乱的严峻状态。特别是1946年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11月间国民党军队推进到金县石河驿以北地区,对旅大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旅大地区的粮食、燃料、工业原料等来源被切断,造成4万余人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人民要靠吃野菜和豆饼坯才能果腹。直到1948年,旅大地区仍处于美蒋海陆两方面的军事封锁之中。

为了粉碎国民党对旅大地区的经济封锁,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1947年初,中共旅大地委做出了《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决定》。9月,韩光代表中共旅大地委作的《关东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报告中,提出了“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工作方针。当时,中共旅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紧缩机构,减少开支,派大批干部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组织生产。金县、旅顺和大连市郊的农民,响应党的号召,深耕细作,颗粒归仓,使粮食产量逐年增高,到1948年底,达20.8万吨,基本解决了全旅大地区人民的口粮需要。

期间,苏军为援助中共旅大党组织战胜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做

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从符拉迪沃斯克通过海路,经过北朝鲜港口,向大连提供粮食、植物油、食糖、罐头和蔬菜;运抵大连的粮食在苏军民政部门的协助下,由人民政府以固定的价格分售给旅大人民;中共旅大党组织派人从北满采购 7 万吨粮食、2 万吨煤,但难以解决运输问题,苏军及时给予具体的帮助;苏军为了帮助政府多开辟一些生产门路,把缴获日本的轮船送交旅顺市政府,从事水上运输,往返于旅顺和烟台之间;此外,苏军还派士兵押送食盐去外地换粮食等等。

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1947 年初,苏军当局与中共旅大党组织商定成立中苏合营企业。同年 4 月,中苏双方签署了议定书。议定书规定,中苏合营企业的股金,中方占 51%,苏方占 49%,盈利按股金比例分成。中苏合营企业主要有以下四个公司:

中苏合营造船公司,经营大连造船厂。当时,全厂有 3000 多名工人,年修造船能力为 30 万吨,中方无生产任务给它。苏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毁坏的大批船只,正需要修理。此外,苏联为了发展沿海渔业,还需要建造大批 500—600 吨位的拖船。这样,苏方运进钢材,中方采取来料加工的办法,为苏联修船造船。

中苏合营石油公司,经营甘井子石油加工厂,年加工原油能力 8 万吨。苏方运进原油,加工出的汽油、柴油,苏军就地利用,副产品沥青,由地方修路和建筑使用。

中苏合营远东电业公司,包括的工厂除几个发电厂外,还经营金属机械等 30 多个大中型工厂。发电厂供应全地区用电,其它各厂生产的产品有水泥、平板玻璃、麻袋、玻璃器皿、陶瓷制品、搪瓷制品、各种罐头、糖果和豆油等等。这些产品一部分满足旅大市场,一部分销往苏联。

中苏合营盐业公司,经营大连、旅顺、金县的几个大盐场。合营前,这些盐场基本上处于停产状态,盐工一度靠政府救济生活。合营后,盐的产量较高,盐工盐民个个喜上眉梢。

四个中苏合营企业开工后,数以万计的工人生活得到了保障。中苏合营企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旅大地区工业的复苏,市场、贸易和经济也随之活跃起来。

到1949年,中共旅大党组织领导广大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并在苏军的援助下,基本解决了旅大人民的温饱问题,物价平均降低了40%,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六)苏军创办的中文报纸《实话报》

苏军驻旅大地区总指挥部,为了介绍苏联的各方面情况,反映旅大地区的民主建设,促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于1946年8月14日,创办了中文报纸《实话报》(该报历时5年,于1951年8月底终刊)。

《实话报》的新闻报道方针是:为了避免同国民党政府外交上的麻烦,1948年以前,很少报道中国解放战争消息,对于中共正面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文章一般不用,在必需报道时亦持谨慎小心的态度。1948年以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报纸开始更多地刊登新华社的电稿,但在选用时仍有删节,用词也很斟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则不加删节地选用新华社电稿。如1948年11月3日报纸上,用“解放沈阳城”5个大字作标题,刊载了新华社沈阳前线2日急电,报道:“东北野战军今天完全攻克沈阳,东北全境已庆获解放”的消息。

宣传苏联是《实话报》的主要任务,所占的篇幅比较多,报道也比较全面和系统。例如:系统介绍苏联革命和建设经验方面的文章,有《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讲座》、《苏联生产管理的基本原则》连载等。介绍马列主义理论的文章在报纸中占的分量也很大,通常是采用系统的通俗的连载、讲座、专论等形式。

在国际时事方面,着重宣传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揭露新战争的危險。例如: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都是在报纸的显著地位全文刊登,同时配发有关社论。对世界各国和中国人

民争取和平的斗争也注意报道。例如：详细地报道了1949年4月召开的全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各国代表为保卫和平而斗争的情况。1949年5月9日，在显著地位刊登中共旅大区党委第一书记韩光的文章《拥护世界和平运动》。

宣传中苏友好也是《实话报》的一项重要内容。1947年8月14日，即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2周年时，《实话报》用一个整版篇幅，发表社论及有关文章。社论中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当时在全国掀起反苏反共浪潮，指出这是企图转移人民对国内形势的注意，并想把内战扩大到旅大地区，破坏旅大地区人民的和平生活。1949年7月在北平中南海举行的中苏友好协会筹委会成立大会，该报也曾作了显著的报道，并发表了社论《中苏人民友谊之生长和巩固》。

《实话报》地方版虽然篇幅有限，但对旅大地区的民主建设、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劳动人民翻身作主人的情况，也及时地作了简要的报道。

（七）苏军处理同中共旅大党组织关系的基本政策

苏军军管旅大的5年，处理同中共旅大党组织关系的基本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苏军受《雅尔塔协定》的约束，需要照顾《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所承担的义务，在形式上对中共旅大党组织的工作进行干涉、限制和监督；另一方面在客观允许的情况下，对中共旅大党组织的工作尽力支持，帮助共产党在旅大地区发展力量，掌握政权。

苏军进驻旅大的前4年，旅大地区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都要由苏军过问、审定，包括市级政权的主要领导人的安排都要经过苏军同意。对土改问题控制很严，有的地方召开斗争地主的群众大会，苏军直接出面干涉。而旅大苏军警备司令部所实行的各项重大措施，都是由莫斯科决定的。因此，苏军要求中共旅大党组织作某些事，只能服从和执行，一般不能问为什么，不准拖延，更不准更改

或搁置不办。例如：苏军军用货币贴帖盖章这样关系百姓利益的大事，本来是一件好事，但苏军事先没有做出解释和说明，就强令执行。

苏军对旅大的宣传工作监督很严，特别对电台和报纸尤为关注。苏军新闻检查官每天进行严格的审查，凡他们不同意发的稿件，命令立即撤换下来。有的稿件个别地方苏军认为不妥，他们还亲自动笔修改。总的要求：宣传上要以地方自治面貌出现，不得暴露在旅大有共产党的存在和骂国民党蒋介石的文字出现。当时，由于电台和报社多是从解放区来的干部，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行径深恶痛绝，对新华社发出的解放战争前线的胜利以及中共中央谴责、揭露蒋介石的阴谋的文章，总想在报纸上、广播中一字不漏地发表出去。这样做的结果，引起苏军当局的强烈不满，一经发现，立即责令把发售出去的报纸全部收回销毁。

苏军在旅大军管的5年中，虽受《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但他们还是尽力支持中共旅大党组织的工作。同时，在处理与中共旅大党组织的关系中，注意改正自身的错误，维护中苏之间的同志友谊。

苏军进驻旅大初期，旅大人民在欢迎苏军的同时，对其中少数士兵酗酒闹事，甚至强奸妇女等违纪现象极为反感。当时，中共旅大党组织曾多次向苏军当局提出批评。苏军当局对此极为重视，采取认真破案、严惩不法军人、整顿军纪和从国内调部队换防等一系列措施，到1946年下半年，苏军纪律明显好转。

1948年至1949年末，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美蒋反动派在中国的势力已经日落西山，苏军需要考虑外交上的影响越来越小，因而对中共旅大党组织的工作给予了更积极的支持。

1948年11月，中共旅大地委决定将当时在旅大地区通用的苏军军用币改为由关东银行发行的地方性新货币，取得了苏军的谅解和支持。1949年2月28日，中共旅大区党委（1949年2月，旅

大地委改为中共旅大区党委)向苏军通报:将旅大党组织向全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公开。苏军立即向远东军区司令部做了汇报,3月初回复赞同。4月1日,中共旅大区党委召开全地区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与全市人民公开见面。苏军应邀派了6名中校、2名少校列席了大会。4月,中共旅大区党委对以迟子祥为主席的关东公署提出改组意见,苏军当局对此表示同意。于是,4月27日,召开了旅大地区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将迟子祥等人从政权中清洗出去。8月2日,中共旅大区党委决定,当年冬在全旅大地区实行土地调剂,苏军也未干涉。

(八)中共旅大党组织处理同苏军关系的政策与原则

苏联出兵东北进驻旅大后,东北问题成为国内外不同势力斗争的一个焦点。1945年11月,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东北问题已引起中、苏、美的外交纠纷,全世界的注目”,“因我党我军在东北之发展,蒋军不能顺利进入东北,顺利接收东北政权,美方已向苏联发动外交攻势,中苏外交发生了危机,这是一个世界性斗争,必须首先取得主动地位,在外交上站稳脚步”。因此,必须“使苏联在履行中苏条约上,毫无困难之处。这是击破美蒋外交攻势,打退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阴谋的必要条件。”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对中共旅大党组织也作出指示:旅大是苏军军事管制地区,中共在大连的工作,对外政策上发言权很小。对内政策上也要和苏军充分协商,取得谅解。因此,既要放手开展工作,又要照顾苏联外交方面的影响,便于他们在外交上说话,不授美蒋以柄。总之,要注意大连的特殊情况,注意政策和策略。

苏军进驻旅大并实行军管,这是旅大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特点。中共旅大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精神,从实际出发,在工作中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方式:

①在减租减息、反奸清算斗争中,斗争方式不采取戴高帽游街等做法。苏军进驻初期,群众在马路或场院公开斗地主,苏军怕美

蒋特务或外国记者拍照，宣传出去，说苏军违背中苏条约，支持共产党斗地主。因而，出面干涉，甚至派兵包围会场，鸣枪制止。为不授美蒋以柄，斗争会改在室内进行，苏军再不干涉了。

②人民警察着特制警服，戴警衔。旅大公安机关建立初期，人民警察没有统一着装。由于旅大地区的特殊性，公安机关既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又是维护地方治安的人民警察。为了隐蔽武警是共产党的武装部队，突出地方的“自治性”，明确地方人民警察与社会各层人员的区别，有利于工作和同苏军联系方便，中共旅大党组织决定：自1946年5月1日起，人民警察按警衔着装。

③中共旅大党组织和各解放区来大连经营的支前军工和“党产”企业以民间“公司”、“商行”面貌出现。当时，旅大地区的企业都采取公司经营办法，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党政有明确分工。

④刑事案件按法律程序处理。当时，其它解放区对于刑事案件，通常开个群众大会就解决了。而旅大是公安、司法、检察机关联合协作办案，按法律程序处理。

⑤共产党干部都以“灰色”的面貌出现。共产党的干部进城后，改变解放区的着装，西服革履，礼帽长衫，粗布衣裤的军装不见了。

⑥宣传上以地方自治的面貌出现，不授美蒋以柄。

中共旅大党组织在特殊的环境里所采取的这些工作方式，是根据中共与苏军双方均能接受的原则，也充分考到苏联政府一旦允许国民党接收旅大政权，能有利于同国民党周旋。至于中共旅大党组织内部的思想 and 组织建设、工作方法与作风，则完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其它解放区一样。

中共旅大党组织在处理同苏军关系中，还坚持这样几条原则：①对苏军某些人员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不一味容忍迁就，而以同志式的态度，提出严肃认真的批评。②地方党政领导与苏军当局在高层次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出现不同意见及时交涉。③认清共同利益所在，求大同存小异。④注意在实践中向苏军方面学习。

中共旅大党组织由于坚持这些原则,虽然同苏军交往中有时发生一些分歧和争执,但最终都较圆满地得到了解决。

(九)中苏友好协会的主要活动

早在1945年9月,“大连地方治安维持会”为蒙骗苏军,打起中苏友好的旗帜,在其提议下,成立了“大连中苏友好委员会”。同年11月,中共大连市委、市政府成立后,解散了“维持会”,中苏友好委员会便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并于11月中旬,改名为“大连中苏友好协会”。其宗旨是: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出发点,由各方人士来协助巩固中苏人民的友谊;由各方把苏联和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互相介绍给对方;以宣传巩固世界和平及远东和平为基础,动员一切力量巩固中苏两国永久和平及友好。1945年底,会员达3500多人。

1946年初,中共大连市委为加强中苏友好协会的领导工作,派中共大连铁路局党委书记陈瑞光到中苏友好协会任副会长兼党组书记,主持工作。1947年4月10日,中共旅大地委做出《关于加强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的决定》,指出促进中苏友好,是旅大党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党应将中苏友好协会工作,视为实现这一重要政治任务的主要方式之一。4月25日,旅大地区中苏友好协会的统一组织——“关东中苏友好协会”宣布成立。从中苏友好协会的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期间,中苏友好协会积极宣传中苏两国人民加强友好合作的重大意义,在全市各行业中先后建立831个分支会,发展会员22万余人,为促进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中苏同志间的友好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46年4月,中苏友好协会出版了第一本月刊杂志《中苏知识》,它以交流中苏文化为宗旨,促进中苏友谊为目的,在广大群众中颇受欢迎。

1946年5月,借纪念苏联红军战胜德国法西斯一周年之际,中苏友好协会首次举办了为期半月的苏联红军军事艺术照片展

览。

1946年夏,中苏友好协会组织了中苏友好文化交流活动周。中苏双方均派了由文化艺术界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交流活动。苏联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音乐和歌舞节目,还展出了许多名贵的油画和各种艺术品,使旅大人民从中进一步了解了苏联。东北文工团演出的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大型歌剧《白毛女》,现代话剧《雷雨》、《日出》及流行于解放区的秧歌剧等,吸引了广大进步青年。

1947年8月,为配合“8.15”、“8.22”等重大纪念活动,中共旅大地委发出了开展“回忆运动”的指示。22日这一天,市政府广场上(今大连市人民广场),无数的群众和秧歌队象一条条小溪,汇成了人的海洋。中苏友好协会和民主青年联合会组织的文艺宣传队,演出了活报剧《大翻身》把纪念活动推向高潮。

据1949年9月统计,中苏友好协会成立4年来,共举办图片展览183次,参观人数34万人次;放映电影716部,观众达208万人次;组织报告会2243次,听众115万人次;办识字班58期,参加学习人数2万余人。

三、苏军驻防旅大的五年(1950年2月14日—1955年5月26日)

(一)苏军取消军事管制和撤军回国的背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政府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新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950年2月14日,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正式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

《协定》规定:“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上述设备前的时期,中苏两国政府派出同等数目的军事代表组

织中苏联合的军事委员会,双方按期轮流担任主席,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在苏军撤退前,旅顺口地区的苏军驻扎范围,照现存的界线不变”;“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

从此,苏军根据《协定》规定,解除了对旅大地区的军事管制。除军事事务外,一切由旅大地方政府做主,苏军与中共旅大党组织和睦相处,出现了友好共事的新局面。

1951年1月,苏方将在大连代管或租用的财产(除大连铁路局、大连造船厂和大连铁道工厂外),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其中有25个工厂、2个发电厂、8个水电站,还有大连港、渔业公司、百货公司、电影院、剧院和海员俱乐部等。

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9月16日,发表了会谈公报,并公布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报》和《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换文》指出,为了保障远东和世界和平,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的期限予以延长。

1952年12月31日,中苏两国政府发表关于苏联政府将中国长春铁路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告,并在哈尔滨举行公告签署仪式。中长铁路的中苏共管于当日结束,大连铁路局和大连铁道工厂也同时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结束。1954年9月29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发表《关于中苏会谈的公报》。《公报》公布了双方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各项

问题的联合宣言、关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问题的联合公报等协约。联合公报规定，苏联军队将于 1955 年 5 月 31 日前，撤出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给中国政府。公报发表后，苏方将大连造船厂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至此，旅大地区的所有苏管或中苏共管的企业全部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中苏组成联合军事委员会共管旅顺口地区的军事

苏军在旅大地区驻防的 5 年中，根据中苏两国政府的有关协定规定，仍分别驻扎在旅顺、金州、长海等地区。驻守在旅大地区的苏军有：陆军—39 集团军，辖直属工兵团、通信团和加农炮兵旅；近卫步兵第 5 军及所属炮兵旅、高炮团、火箭炮团、近卫 17 师、19 师、机械化师；第 25 机炮师。空军—第 55 歼敌机军及所属 3 个歼击机师、1 个侦察大队和 1 个对空勤务团。海军—太平洋舰队红海军旅顺口基地及所属 1 个水鱼雷机师、岸防司令部、潜艇基地、快艇总队、水警总队、高射炮兵团、水上飞机大队、抢险救生大队、海道测量区和海军修船厂。炮兵—加农炮兵 33 师、突破炮兵师、防坦克歼击炮兵旅和高射炮兵 14 师。驻守在旅大地区的苏军陆、海、空、炮各兵种部队，约 30 万人。

1951 年 3 月 24 日，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大连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苏联军事代表团主席别洛博罗多夫上将及全体苏联军事代表团成员；中国军事代表团主席肖劲光、副主席贺晋年及全体中国军事代表团成员。应邀参加会议的有：苏联军事代表团随员斯维尼英中校、阿布拉莫夫少校；中共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旅大市长韩光。按照中苏两国政府的协定，别洛博罗多夫上将担任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第一年工作的主席。

本次会议主要商讨了以下几个问题：①审议确定旅顺口区域内苏联军事指挥部与中国地方当局相互关系问题。②规定苏联和中国公民与军人以及外国籍人进入旅顺口区域的手续和由这个区域出境的手续。③确定旅顺口区域和海军根据地海上和陆上的境

界。④规定民用飞机和军用飞机在旅顺口区域境内飞行的管制办法。⑤制定苏联、中国及其它国家之非军用船舶在海军根据地领水境界内航行手续以及中国军用船只进入海军根据地领水的手续。⑥制定在旅顺口区域内苏联军人和公民与当地中国居民之间所发生问题的公民法权问题的手续。本次会议还研究了其它军事事宜。从此，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务由中苏双方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管理。

（三）苏军帮助中国海军培训潜水艇部队

为了建设新中国的潜水艇部队，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主席致电斯大林：“由于中国所处的军事政治形势，为应付可能发生的紧张情况和巩固国防，我们已制定中国海军3年建设规划，须向你请求武器装备方面的援助。望提供作战训练用之小型潜艇2艘，并希望来华之潜艇配备1艘的全套艇员，以便有效地帮助训练，待完成任务后返回苏联。”1951年2月7日，苏联同意于1951年至1953年期间，在旅顺口为中国培训4艘潜艇艇员。1951年于旅顺口先拨出两艘潜水艇供培训中国艇员用，训练完毕再移交给中国。

1951年4月20日至5月初，由傅继泽、李克明等275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潜水艇学习队，先后到达苏联红海军太平洋舰队驻旅顺口潜水艇分队学习。1951年5月14日，旅顺中国海军潜水艇学习队正式开训，苏军指派10名教官和2艘潜艇艇员负责学习队教育和训练。

开训后，学习队的指战员处处尊重苏军，团结友好，虚心学习，刻苦训练。苏军也积极热情地从各方面传授经验。开始因语言不通，限制了双方的感情交流。后来，通过双方举办联欢会、座谈会、友谊竞赛等活动，在一起出航，一同操炮的过程中，逐渐密切了两军同志之间关系，加深了两军官兵的友谊。出海时，苏军艇员给学习队学员穿工作服，并站在前面挡风。学习队学员归航后，主动帮助苏军艇员保养潜艇。早晨见面时，互相敬礼，主动握手问好；晚上

休息时,互相问候。学习队学员碰伤休养时,苏军教官携带水果进行慰问。学习队学员联名赠给苏军教官纪念册,正面写着“苏军同志:我们保证将你们教给的技术,永远巩固住,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经过2年多时间的学习和训练,学习队学员在苏军的帮助下,很快地掌握了潜艇航行和作战的技能。

中国党政军领导人非常关怀旅顺潜艇学习队的学习情况。周恩来总理于1952年秋和1953年2月,两次来旅顺口看望中国潜艇学习队学员和慰问苏军教官、艇员,先后视察了“秀克”艇和G-121艇。1953年春,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元帅视察了学习队2号艇。同年,彭德怀副总司令视察了1号艇。

1954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独立潜水艇大队,旅顺学习队的全体艇员,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海军潜水艇部队的开拓者。

(四)苏军加强与旅大人民的团结友谊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促进了中苏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苏军为保卫新中国和世界和平事业在旅大地区站岗,在旅大人民心中引起了巨大的回响,全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习苏联,宣传苏联,向苏军学习的群众运动。

与此同时,苏军政治部对苏军军官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为中国人民站岗的宣传教育。苏军在旅大驻防的5年中,广大苏联官兵为人民群众做好事的模范事迹不断涌现,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等诸方面,都给予旅大人民以巨大的帮助。

苏军专家在中苏合营企业中,帮助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掌握绘图、设计、焊接等技术;在李索夫的培养下,新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女火车司机。

苏军在驻防的广阔农村和海岛上,与当地农民、渔民友好相处,亲如一家。春耕时节,苏军拨出战马,帮助农民往地里送粪、耕地;夏天天旱时,苏军派出军车运水上山,帮助农民浇灌禾苗;秋收

时,苏军官兵和农民一起收割庄稼;农民买了拖拉机不会开,苏军战士手把手地传授拖拉机的操作技术;农民办畜牧场,苏军赠送良种乳牛,派人传授饲养经验;渔民生病、受伤,苏军军医亲自上门诊治。在山村,在海岛,到处都留下了中苏军民深厚友谊的感人事迹。

苏军在旅大地区驻防,与文化、卫生、艺术界工作者也有着深厚的友谊。苏军创办的中苏医院,不仅以精湛的技术和共产主义人道精神为旅大人民服务,同时,对旅大地区的中国医务人员来说,也是一所大学校。这里的苏联军医经常为中国医务人员讲授巴甫洛夫学说,传授苏联的医疗技术。苏军歌舞团经常与旅大文艺工作者同台表演,相互交流艺术。苏军为了帮助旅大地区人民提高文化生活水平,赠送许多电影放映设备。苏军创办的《实话报》向旅大人民传播了通俗的马列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苏军驻守旅大,为保卫中国和世界和平事业站岗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动着中国艺术家,激发他们进行创作。艺术家卢鸿教授雕塑的苏军战士铜像,高高竖立在苏军烈士纪念塔上,放出夺目的艺术光彩。

苏军将士热爱旅大人民,经常请中国群众和儿童去军营参观、联欢。中国儿童常找苏军叔叔,听战士们讲卫国战争故事和学唱苏联歌曲,双方结成了纯洁的友谊。

(五)苏中军队交接防务

1955年1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兵团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从朝鲜东海岸回国,担任接收苏军在旅大地区的防务。1月10日,三兵团先遣人员由副司令曾绍山率领到达大连。不久,三兵团陆续进驻旅大地区,并恢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的番号。2月至5月期间,中共中央军委又调铁道公安部队、沈阳市公安总队和公安11师,并从全国海军和空军部队抽调10多个连队和4个培训团,陆续进驻旅顺口,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旅顺口基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接防部队进驻旅大地区后,为保证顺利、按时接收和担负起旅大地区的防务,迅速地开展了向苏军学习的活动。2月中旬,接防部队在苏军的协助下,举办了由15000多人参加的200多个训练班,主要从技术上培训指挥员、参谋、军械、政工、坦克、通信、防空、工兵、防化和后勤等有关人员。

2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组成“接收旅大防卫区委员会”,肖劲光为主任,邓华、甘泗其、刘亚楼、曾绍山、郭述申为副主任,邱创成、刘丰等为委员。

2月16日,中苏接交联合委员会举行会谈,通过《苏军自辽东半岛撤离与中国军队进驻的计划》、《防务移交与中苏军队同驻期间保持备战实施的计划》和《技术装备交接计划》。在交接过程中,为预防突然事件发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和苏联红军39集团军共同拟定《中苏两国军队共同作战方案》。方案规定:4月16日零时前,中苏军队统由苏军指挥;4月16日零时后到苏军撤离止,该地区防务统由中国军队负责,中苏军队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指挥。

中苏双方接交防务工作,从2月20日起到4月15日结束。1955年4月15日13时,中苏双方举行交接签字仪式。中方代表签字的是三兵团副司令曾绍山,海军旅顺口基地司令员罗华生,空军三军军长刘丰;苏方代表签字的是39集团军司令什维佐夫,海军基地司令古德利切夫,空军55军参谋长切德利克。4月16日零时后,一切防务交由中方负责。

接收军事设施与装备工作,在3月7日到5月15日期间进行,至5月16日全部完成。接收的装备有:陆军——各种大炮1113门;坦克(自行火炮)357辆。空军——各种飞机328架。海军——依尔28水鱼雷艇39艘和其它舰艇19艘;岸炮66门;高射炮122门;鱼雷80条;水雷332个;各种炮弹235万发;炸弹2624吨;各种车辆1684辆;雷达35部;油料22000吨,以上为有偿设

备,由中方付出人民币 9.4 亿元。交接的无偿设备主要有:营房 151 万平方米;机场 9 个;另有基地所属的仓库、医院、修理所等,约值人民币 4 亿元。

5 月 24 日下午,中苏联合交接委员会在旅顺苏军司令部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中苏双方有:邓华、刘亚楼、曾绍山和什维佐夫、图兰达也夫、库德良乐夫。中苏双方签署了交接证书。至此,中苏接交防务工作全部结束。

(六)旅大军民热烈欢送苏军回国

苏军进驻旅大十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世界的和平事业作出了贡献。当苏军即将回国时,旅大人民通过各种形式的送别活动,表达对苏军的感激和友谊之情。

1955 年 2 月 22 日,以彭德怀为团长,宋庆龄、贺龙、郭沫若、聂荣臻为副团长的大型慰问苏军代表团抵达大连。当日下午,在人民文化俱乐部隆重举行慰问苏军大会,彭德怀为苏军高级将领佩戴“中苏友谊章”。

2 月 23 日,在旅顺举行了“中苏友谊塔”奠基典礼。彭德怀率领慰问团全体成员及旅大地区党政军负责人和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苏联驻大连总领事别良诺夫及驻旅大地区苏军高级将领参加了奠基典礼(中苏友谊塔是国务院决定在旅顺兴建的,目的是为了感谢苏军驻旅顺口地区十年对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所做出的伟大贡献,纪念苏军驻旅顺口地区部队和中国居民间的深厚情谊。1956 年 10 月,中苏友谊塔落成)。

3 月 27 日,苏军与旅顺人民在白玉山营造了“中苏友谊林”,它象征旅大人民和苏军相处 10 年结成的友谊将世世代代相传,万古长青。

5 月 7 日,旅大人民募捐时币 7 亿元重新修建的苏军烈士纪念塔在大连市落成。一座高达 39 米庄严雄伟的苏军烈士纪念塔,耸立在斯大林广场上(现人民广场),苏联红军那威武高大的形象,

将永远留在旅大人民的心中。

从2月至5月末,旅大人民与苏军开展的座谈、联欢、慰问、送别、会餐和互赠纪念品等友谊活动接连不断。在送别的日子,中苏双方军民都依依不舍,用最美好的语言表达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旅大地区的妇女,纷纷绣制各种精巧的手帕、枕罩、荷包等礼品,赠送苏军家属。中苏两国小朋友更是难舍难分,中国小朋友听说同院、同校的苏联小伙伴就要跟爸爸妈妈返回祖国时,立即跑回家里把最好的玩具、最喜欢的食品送给苏联小朋友,表达依依惜别的纯真感情。

苏军从3月1日开始,分别从驻地陆续撤出回国。苏军每走一批,都由接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当地人民群众送行。金州地区苏军从3月初分三批撤离。每次撤离前,金州城军民都举行送别大会,都组织数以千计的军民到车站为苏军送行。4月16日,旅顺举行了各界人民欢送驻旅顺苏军回国大会。会后,还组织了19次站台欢送苏军活动。5月8日,旅大各界代表10万多人,在斯大林广场举行盛大的欢送苏军回国大会。旅大市党政领导人和苏军代表分别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共旅大市委(1950年10月,中共旅大区委改为中共旅大市委)第一书记郭述申在讲话中说,苏军进驻旅大十年中,无论任何时候,都向旅大人民伸出友谊之手,这种伟大友谊帮助,旅大人民将永志不忘。

5月26日,驻旅顺口地区苏军指挥部的高级将领和指挥部全体人员,从旅顺启程回国。旅大各界代表2万多人,在大连火车站前广场举行热烈的欢送大会。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陪送苏军最后一批人员到石河驿车站。至此,进驻旅大地区的苏联红军全部撤离回国。

四、苏军进驻旅大十年的历史意义

有利于中国和远东的和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国际形势出现了新格局。在德、意、日、法西斯被打败,英、法等国军事

实力被削弱的情况下,只有美、苏两大强国可能在远东发挥“主导作用”。美国想称霸世界,当时的战略意图是要控制亚洲。而要控制亚洲,必先控制中国。在战前,美国与日本争夺中国和远东。在战后,美国企图取代日本的地位,主宰中国,掌握远东。就苏联方面看,中国的东北与苏联的远东利益(包括远东和平、苏联东部边境的安全和某些权益)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苏联红军进驻旅大后,以国内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遏制了美国向中国东北的扩张,使美国独霸远东的计划化成泡影。由于苏联几十万红军驻守旅大,以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坚持人民民主,保卫世界和平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这就使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和远东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革命斗争,有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后盾。

为旅大解放区的建立、巩固与发展作出了贡献。1945年8月22日,苏联红军进驻旅大,标志着近半个世纪旅大人民被帝国主义者奴役的终结,标志着旅大这块被宰割的中国领土重新回到祖国怀抱。苏军进驻旅大后,出现了复杂的斗争形势:反映在国际上是美苏之争,反映在国内是国共之争。美国的政策是扶蒋反共遏制苏联。苏联的政策是疏远共产党,中立国民党,遏制美国。国民党的方针是联美反苏反共,反共时中立苏联,反苏时牵连上共产党。在三国四方的复杂斗争中,苏联虽然有《雅尔塔协定》的约束,但由于与中国共产党同属一个性质的党,同唱一支国际歌,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因此只要客观条件允许,苏联还是尽力帮助中国共产党。苏军进驻旅大后,支持中国共产党在旅大建立党政警群机构,帮助中共旅大党组织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和军事争夺,为旅大解放区的建立与巩固作出了贡献。当时,中共旅大党组织在管理大城市、政权建设、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教育等方面还缺乏经验,苏军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旅大名义上是中苏条约规定的租借地,实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军支持的特殊的

解放区，中共和国民党争夺东北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

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正是国共双方争夺东北的紧急关头，对国民党来说，掌握东北的主动权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从大连登陆。苏军几次拒绝国民党通过大连运兵东北，有力地阻止了美蒋军队抢占东北，为中共部队先于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实现“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旅大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与山东半岛遥遥相对，是联结山东与东北的“踏脚石”。有旅大做跳板，解放军山东和东北部队，不会腹背受敌，且可遥相呼应，联成一片。当时，解放军尚未建立空军和海军，苏军驻守旅大，对解放军起了屏障作用。解放战争期间，苏军积极配合中共旅大党组织发展以支援前线为前提的旅大经济，并暗中支持解放军在大连从事军工生产，装备大批“武警”开赴前线。这就在东北战场造成了不利于“蒋”而利于“共”的形势：一方面堵住了辽东半岛南端，使美蒋军队既不能由此运兵东北，后来又不能由此退兵溃逃，配合了解放军“关门打狗”的作战方针；另一方面中共得以充分利用旅大工业基础和交通运输便利条件，建立一块稳定的战略后方基地，对东北、华北和华东战场进行源源不断的支援。

增强了新中国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之初，整个社会千疮百孔，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国内反动残余势力仍负隅顽抗，国际上帝国主义重新侵略的危险依然存在。旅顺口地区在历史上是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东北的桥头堡，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在当时的形势下，苏联红军继续驻守旅顺口地区，对于制止和打击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略阴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共同防止了帝国主义的重新侵略，特别是当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台湾，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新中国安全的时候，苏联驻旅顺口空军直接参加抗美援朝战斗，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斗争。苏军驻守旅大期间，帮

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培训大批技术人员。撤离时,留下大批武器、弹药和各种军事装备设施。撤离后,留下40名军事顾问,继续指导解放军掌握和使用各种武器与装备。苏军进驻旅大十年,对旅顺口海军基地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建。1955年,苏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交接防务时,这个基地以现代化炮兵、空军和海军装备起来,成为当时黄海海岸上的坚固堡垒。

促进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苏军进驻旅大十年,对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沟通两国人民之间的思想感情,促进中苏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合作,融洽中苏两党同志关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苏联红军进驻旅大十年,在中国和世界革命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夏振铎 整理)

第二部分

回 忆 录

旅大八年(摘录)

韩 光

初进大连,与苏军高字洛夫中将的友好会见

经过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长期奋勇抗争,加之苏联出兵东北,1945年“8.15”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8月22日,苏军空降旅顺、大连,地面部队随后进驻。从此,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旅大40年的罪恶历史。根据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的《雅尔塔协定》和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旅顺口地区为苏军海军基地,旅大由苏军管制,大连战后设自由市,大连港为自由港,大连之行政权属于中国。这样,旅大人民重归于祖国的怀抱。

抗日战争后期,我在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主持常务工作。1945年9月下旬,奉中央指示,我从晋察冀边区经张家口进入东北到沈阳。10月初的一天,东北局彭真同志派我去大连同苏军当局办一次交涉。因为这时我华东解放区部队遵照中央指示向东北进军中,许多从胶东渡海到辽宁庄河一带登陆的小帆船常常被风刮到旅顺或大连。旅大这时由苏军管制,规定任何军队不得进入,一经发现,一律缴械扣留审查。当然,如果确信是我们的人,还是放行的,但这样就延误了进军的时间。我到大连,就是解决这个急迫的问题。

为工作方便,东北局给我配一名东北抗日联军的孙振山同志随我去大连,他身着苏军军装,带着苏军少尉军衔。为什么抗联战

士着苏军军装呢？这有个历史情况：在东北抗战后期，东北驻扎着百多万日伪军队，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日寇一方面对我抗日游击区及其周围广阔地带实行坚壁清野、归大屯，以及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同时，不断出动大量军队，对抗日部队进行篦梳式反复穿梭“围剿”。我抗联战士在没有丝毫外援、难以立足的情况下，为保存力量，退入苏联境内整训。后来编为教导旅，即编为苏军第八十八特别旅，由周保中同志指挥。苏军进军东北，该旅分成50多个小组配合苏军接管东北各地大中城市，起了很好的作用。

10月上旬的一天，我同这位抗联军官搭乘南去的苏军运兵平板列车，到了大连。我们什么也没带，两手空空，步行到苏军司令部驻地“大和旅馆”（现中山广场大连宾馆）。因为这位抗联军官是苏军少尉身份，我们很顺利地通过了门卫。一位苏军中校把我们引到二楼正中会客室。当知道我是东北局派来的，苏军司令官高字洛夫中将先在会客室里等我会见。这是一位热情友好的军人。当他问明我的来意后，便说，这个事情好办，立即派人处理这个问题，并指示了具体办法。不夸张地说，只三五分钟，问题就解决了。果然以后我们的部队来了，如果是在白天，或者携带武器，他们则暂时“扣留”一下，晚上就还枪送人。

事情办完，我们又谈起我党接管大连的有关问题。高字洛夫劈头就问：“你们要不要大连？”我一愣，马上说：“怎么不要，我们还要解放全中国呢！”他说：“既然要，为什么还不派人来？你们再不来，将来国民党就会把你们脖子卡住！”对于他的这种友好态度，我高兴地笑着说：“我这不是来了吗！”他说：“既然是这样，那就希望你尽快派个市委书记来，把市委成立起来，市政府也要成立起来，你们派个副市长。”我说：“我们要派个市长。”他说：“市长已由莫斯科决定了，是本地一个商人。”为什么这个市长要由莫斯科决定，而且用大商人呢？后来经他们说明，这是苏联出于外交上的需要而采取的一个策略。如果我们的人当市长，就会给美蒋以口实，攻击苏联

破坏条约,将大连行政权交给了中国共产党,从而造成外交上的被动。而用本地大商人当市长,既不影响我们控制大连政权,又堵住美蒋的嘴。高字洛夫象是看出了我的心思,补充说:“一个商人当市长并不妨碍你们的工作,你们有副市长,再派个秘书长和公安总局长,实权还是在你们手里。”我一想,有道理,便问:“还要些什么人?”他说:“教育局、民政局都很重要,应由你们派局长。广播电台、报纸是宣传舆论工具,要牢牢掌握,你们派个台长和报纸的主笔。”谈到这里,我发现他没有提管经济方面的人选,便问:“为什么没有提到财政局长?”他说:“财政、工业、商业、银行的正职已从本地工商界人士中选了,你们选派副职一样掌握实权。”我再没说什么,便表示:“好,我回东北局马上汇报!”

事情谈完后,高字洛夫说:“这里有唐韵超、张洛书、朱秀春等,说是你们的老同志,你认识否?”我说:“认识张洛书。如果唐韵超就是唐宏经,我也认识。朱秀春则不知其人。”高字洛夫当即通电话一问,回说,正是唐宏经。又问我是否要见他们。我说3人都见。高字洛夫立即指定一军官为我安排好会见唐韵超等人的地点与时间。高字洛夫又说:“这里还有几位你们东北抗联的同志,你是否也见一见?”我说那当然要见了。他又拿起电话。不一会儿,一位华籍苏军中尉走进来,原来都是抗联时期的战友,一见格外亲切,我激动地说:“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总算有头了!”他自我介绍说,他叫董崇斌,是奉周保中将军的命令于9月中旬带6位抗联同志来大连协助苏军工作的。他们中有3位军官,分别任大连市各区的警备副司令。董任沙河口区副司令,少尉刘玉泉、季喜林分别任甘井子区和西岗区副司令。其他几个战士分别任各司令部的副官。董介绍情况后,高字洛夫将军命令董负责安排我的食宿,并保障安全。董崇斌把我安排在沙河口区警备司令部(现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区分局)住下,对我在大连的活动提供不少方便。

在董崇斌同志的协助下,我抓紧时间会见了几位抗联同志和

其他方面的同志。首先见到了唐宏经同志。我们是老相识，早在30年代满洲省委时期在一起工作过。故人相见格外亲切、激动。他向我汇报了这一段时间生活和“8.22”后组织大连职工总会的工作情况。我对他这段组织大连工运工作给予了肯定。希望他们继续这样干下去。同时，也会见了张洛书和朱秀春同志。

其次见到了从胶东区党委派来大连做地下工作的左友文和张寿山等同志。他们在苏军解放大连后，随即分别组织各有数百名的革命武装队伍，与当地反动势力作斗争。这部分武装，后来为我公安局输送了一大批警员，有的转入了辽南解放军部队。左友文同志当时曾要求把他们领导的党组织公开。根据当时形势，我认为还是隐蔽一段时间为好，过早公开，万一大连被国民党接收，就暴露了，一旦“红”起来，再“白”就不容易了。地下党的同志们很好，马上表示同意，继续默默地为党工作。

此外，我还会见了白全武等十几名思想进步的知识青年。

为了尽快使我回东北局汇报，高字洛夫将军专为我和陪同者派了两架小教练机（每架只能坐一人）。我迅速地返回沈阳。

1945年10月12日，我回到沈阳后，立即向彭真等领导同志汇报了大连之行的情况。他们认为大连的形势很好。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打开局面，当即决定我为大连市委书记，带一批干部返回大连。彭真同志指示，要抢形势，尽快搭起大连市党政警群领导机构的架子，迅速开展工作，并要伍修权和肖华同志从已到达沈阳的山东来的干部中优先选派一些干部去大连。

重到大连，受命“抢形势、搭架子”， 我党实际执政而暂不公开

10月中旬，我重返大连，第一步工作就是按照东北局的指示“抢形势”，“搭架子”，首先组成大连市解放后第一届市委。

在第一次来连会见的房间里，高字洛夫将军又会见了。他打开临街的阳台房门，把我引到阳台上，眼前是一个美丽的广场，就

是现在的中山广场。他指着东北方向说：“国民党市党部已经早来了，我已在那里拨给他们一栋楼（今中山区七一街1号。编者注），他们已公开挂出牌子。你们来了，也拨给你们一栋楼，你们也把牌子挂出来。”边说边指向右前方一栋黄色楼房（今斯大林路2号，航运公安局），并补充说：“你们中国正实行国共合作，在大连你们有条件把这个合作搞得更好。”苏联同志这样做的用意是明显的，他认为这样做既有利于我党，表面上又不偏不倚，国民党也无话可说。我当时觉得此事关系重大，没有立即表示同意。只是答说我们是否公开挂牌，研究以后相告。

这栋黄楼房原是日本人开办的“台湾银行”，已是人去楼空，我们就先住进去，在这里我住有半个多月时间。这一段时间，上级派来的干部陆续到达大连。在我第二次来大连前，即派张致远和沈涛两同志乘坐送我的两架飞机，提前来大连。这时，肖华同志已通知在普兰店的陈云涛同志，即刻来连向我报到。陈云涛是我们内定的副市长人选，原是胶东区党委的情报科长，9月初随胶东区党委吕其恩、邹大鹏率领的“挺进东北先遣支队”在庄河登陆，随后带领一支部队到达普兰店，待机进入大连。

陈云涛到达前后，胶东区党委派来的吕塞、延安中央统战部的王西萍等同志也先后到达。但人手还是不齐，所以，先以大连市党的“工委”名义进行了一段工作。这时，我召集了一次会议，传达了东北局领导同志对开展大连工作的指示，分析了大连的形势，就“抢形势”、“搭架子”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行动的具体步骤。

根据当时大连的形势，我们经过反复的思考、研究，决定市委暂不公开。我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就当时全国形势来说，国共合作是很不牢固的。抗战时期直至如今，华东、华北、西北等地国共磨擦迄未停止。蒋介石时刻想消灭我们。日本投降后不久，我党中央就定下了独占东北的方针，迅速派10万大军挺进东北，并调遣大批干部兼程前来。在大连，国民党虽然先我而入，公开

挂牌活动,但并无什么力量,且受到苏军当局严格限制。我们要独占大连,不能给国民党以立锥之地,不能同他们平起平坐。让他们先处于明处,我们暂处于暗处,抓住实权,打好基础,更有利于对国民党进行有力的斗争。我们将这一决策报请东北局领导批准,又向苏方作了说明。他们表示:相信你们中国共产党会把事情办好的,无论你们怎样做,苏联都站在中国共产党方面。其后的事实也证明,这样做既未影响我们开展工作,又利于用政权手段打击国民党的特务活动。我党通过政府和各人民团体的活动,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迅速建立起来。党组织虽然不公开,但与过去地下党的活动完全不同,实际上是处于执政的半公开状态。随着东北全境解放,经请示东北局批准,1949年4月1日,就正式宣布与群众公开见面了。

11月初,市公安局成立后,市委就搬到了公安局大楼的北侧办公。内部正式使用中共大连市委的名称。〔1945年11月正式建立中共大连市委,下属党组织有大连市内的中山、岭前、西岗、寺儿沟、沙河口5个区委,旅顺市委,金县县委(包括后来由大、小长山岛和海洋等岛屿组成的长海县委)。1946年7月,大连市委改为中共旅大地委,仍由韩光任书记,刘顺元同志任副书记、第二书记。所属党组织除上列者外,又将大连市郊划出一部分组成大连县委。1947年4月成立关东公署时,旅大地委曾一度改称关东地委,旋即恢复原称。1948年7月,东北局决定欧阳钦同志任地委书记,韩光和李一氓分别任第一、第二副书记。1949年2月,东北局决定旅大地委改为中共旅大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不变。同年4月1日旅大区党委及所属党组织公开与群众见面。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共旅大区党委改为中共旅大市委,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其后即改为现在的大连市委。本文中“大连市委”、“旅大地委”、“旅大区党委”等的不同称谓,即由上述沿革变化而来。〕最初委员有:吕塞、陈云涛、赵杰、左友文、张致远、王西萍和于会川(他

曾任中央晋绥分局情报处长)。唐韵超同志,当时还没有恢复组织关系,故没有进市委。但他当时正领导着大连市职工总会的工作,因工作需要,市委开会都请他列席。不久,我即请示彭真同志给他恢复了组织关系,进入市委。

市委的办公处对外称为公安局训练处。当时,我们各解放区的通常作法是书记都兼任武装部队政委,我也兼任了公安系统的政委。对外以训练处主任的身分公开活动。

市委成立后,由东北局派来及其他解放区过路的干部陆续增多,市委各部、各区、县委也相继成立。到1945年底,旅大党组织市、区、县的架子已经全部搭起来,党的各级领导核心逐步形成。

在筹建市委的同时,我即与苏军当局磋商成立市政府的事宜。市长的人选是苏方内定的本地大商人迟子祥。苏军进驻大连后他是地方维持会副会长。副市长的人选我们提议由陈云涛担任,苏方表示同意。10月27日,高字洛夫在“大和旅馆”主持召开中国人各公共团体代表会议,讨论市长、副市长人选问题。维持会的代表邵慎亭、迟子祥,市职工总会的代表唐韵超、陈云涛,此外还有医师公会、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佛教会、商会、山东同乡会代表,共计10余人参加。邵慎亭出面推举迟子祥为市长,唐韵超推举陈云涛为副市长。与会人员以签名的方式通过了市长、副市长人选。10月28日,苏军指挥官高字洛夫中将发布命令,任命“中国籍者迟子祥为大连市长,陈云涛为副市长。”〔旅大地区的行政机构,解放初期曾分别建立了大连市政府、旅顺市政府、金县县政府,上面没有设地区性的政府,实际上统归大连市委通过所属市、县委领导。1947年4月初,旅大地区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成立关东公署,推举迟子祥为主席、刘辛垣(刘顺元,地委副书记)、乔传瑛为副主席。同年夏秋之交,刘顺元同志调离旅大,由韩光兼任公署副主席。1949年4月27日,旅大地区召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将关东公署改为旅大行政公署,批准迟子祥辞职,选举韩光为行政公署主

席,李一氓(地委副书记)、乔传珏为副主席。建国后,旅大行政公署改为旅大市人民政府,韩光任市长,直到1952年底调离旅大。]

11月8日,大连市各界在市政府门前广场上召开大会,庆祝旅大地区第一个民主政府成立,宣布施政纲领。市政府内设秘书处及财政、社会、建设、教育、卫生等5局。下设29科、92股。职员共2651名(其中日籍职员780人,旧职员留用约1500人)。我党派朱秀春任秘书长(他曾是我党六大代表)。几个局也派有我党干部任局长或副局长。

在当时大连的特殊形势下,市公安局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当时的《中苏协定》曾规定战后任何国家的武装力量都不得进入大连市,因而我们成立公安局,不仅是安定社会秩序的当务之急,而且是我们掌握枪杆子同国民党争夺大连的重要手段。苏军当局也明确表示,公安总局长应由我党派人担任。10月中旬,肖华同志推荐原山东军区滨海三分区司令员赵杰同志出任大连市公安总局长。他本是一员战将,打起仗来勇猛顽强,机智果敢,是个合适的人选。10月23日,肖华命赵杰从本溪到大连向市委报到,任公安总局局长。当天下午,我即领他会见高字洛夫将军。高字洛夫当即表示同意赵杰任总局长并签发了委任状。为便于工作,不暴露原来的身份,赵杰改名为赵东斌。

11月7日,大连警察总局成立(11月25日,改称大连市公安总局)。总局的机构设置,对内对外分两种体制。对外赵东斌是总局长,我是总局训练处主任,设保安科、总务科、秘书室。对内按我军领导机构设三大部即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赵东斌任司令员,我任政委。

在筹建总局前后,一大批胶东部队的中下级指挥员及战士,陆续进入大连。他们以爱国军人的身份,被派进各区、县接管警察署,建立起我们的公安分局和警卫队。公安总局所属的武装警察部队,实际上是穿着警服的解放军,也可以说是我军的一支后备队,内部

受辽东军区管辖。这支部队不断扩充,又不断分批、成建制地调往前方,先后达 13400 余人。当时我们请苏军当局补充枪支,他们说,象大连这个城市,维持社会治安的武装警察有两三千人也就够了,何须这样多?我们回答说,这里一则日本法西斯统治多年,残余反动势力活动猖獗,二则现在美蒋特务多方进行破坏活动,还是加强这支力量为好。他们给了不少枪支,对于我们不断扩大警察部队,也就默认下来了。

在组建市委、市政府前后,我们还派一批干部组建了市“中苏友好协会”、“妇女建国会”、“青年联合会”,并加强了先期组建的“大连市职工总会”等群团组织。

在搭起党政警群各级机构架子的前后,又将大批到达的干部派到各机关、学校、电台、报社和各企业、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开展工作。从而实现了东北局提出的先机控制大连战略要地的意图。

同国民党的争夺战,董彦平

“视察团”乘兴而来,碰壁而去

我党虽然控制了大连,但国民党同我党争夺大连的斗争仍在继续,仍很激烈。抗战期间一直躲在峨嵋山上的蒋介石,战后急忙下山四处“摘桃子”,把东北列为“国民革命最重大目标和最迫近的工作”,更没忘记旅大这个“桃子”。如果他们接管了大连政权,就可以断绝我党、我军的华北与东北的通道,同时也为国民党海运部队迅速抢占东北得到一个最好港口。为此,国民党也加紧采取了接收旅大的各种措施。

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任命沈怡为大连市市长。沈即在重庆和上海两地设立大连市政府办事处,筹划接收大连。同月,国民党派汪渔洋进入大连成立市党部,10月15日,因进行反苏活动汪渔洋等6人被苏军当局扣押。国民党又派督导员张振作来大连建立国民党市党部,不久就转入地下活动,并成立“东北行辕辽宁先

遣军第四独立团”。1946年1月，他们在密谋暴动时，被我公安机关一网打尽。

国民党还派员进入大连组织“东北海军陆战队”，派中统、军统特务进入大连窃取情报。美国间谍机关“四十四海外观测队”也多次派特务到大连收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美蒋这些地下阴谋活动，都被我公安机关一一粉碎。

与此同时，在另一条战线上，蒋介石命令其军方与官方，就运送国民党军队进入大连问题，多次同苏联进行谈判。企图利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谈判桌上得到用其它方法得不到的东西。

1945年10月13日至20日，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同苏军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进行了数次谈判。熊式辉提出：中国军队的两个军要海运东北，在大连登陆。马利诺夫斯基予以拒绝。理由是：大连为自由港，运送武装部队至东北各大城市应由两国政府协商决定，中国军队进驻某一地区时需待苏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以后；在此情形下，苏军不可能掩护中国军队前进。

同年10月1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甘乃光照会苏联：国民党第13军将于10月左右乘美国军舰前往大连登陆。苏方立即表示，坚决拒绝国民党的要求，并要国民党对此作出解释。16日，蒋介石电令东北行辕，坚决要求在大连登陆。苏方答复：中国军队在大连登陆，苏方不能同意。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大连为商港，如允许军队登陆就是违犯条约。蒋介石又先后两次亲自会见苏联驻华大使，企图说服苏方在大连问题上做出让步，均没有成功。苏方的强硬态度，使得蒋介石企图用外交谈判来先期占领旅大、进入东北的愿望化为泡影。

在派兵登陆无望的情况下，国民党又提出接收大连行政权。由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制约，苏联政府不便拒绝。1946年1月6日，苏军总司令部复信国民党东北行辕谈判代表、副参谋长董彦平：“已接获大连方面复电，中国政府在大连建立政权，苏联方面无

可阻碍。”1947年3月7日，苏联政府两次向国民党政府提议：“在整个旅大地区应迅速建立适应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协定要求的中国行政。”于是国民党政府经苏军同意，决定派出以董彦平为首的旅大“视察团”，对旅大进行实地考察，为接收旅大打前站。

对于国民党企图接收大连的各种阴谋活动，我们一直密切注视着。1947年4月10日，我代表地委在党内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与我党之对策》的讲话，根据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为国民党可能接收旅大政权，采取了几项对策：一、成立关东公署，统辖大连市、旅顺市、大连县和金县，缩小大连市区的范围，以便万一国民党政府接管了大连行政权时，我们能有更多的回旋余地。二、为适应斗争需要，公安局组织上、思想上、工作上采取相应措施，改穿警服，各级警官佩戴警衔，我公安总局长佩中将衔，以与董彦平相对应。三、与苏军当局商定，对流通于旅大地区的苏军发行的通用货币进行登记、兑换、加贴印花、加盖钢印，以防敌人将其它地区已经停用的苏军货币带进大连，破坏旅大地区金融经济。四、改善工作方法，注重斗争策略，加强关于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宣传教育，宣传按照中苏条约，国民党中央军不可能进驻大连市，避免在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

1947年5月28日，苏军大连警备司令部司令官克章诺夫少将，邀见了我和公安总局局长周光（赵东斌此前已调离大连），通报了6月初国民党视察团将来大连活动，要求我们配合他们“接待”。我们力求由地方政府出面，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已建立的地方民主政权的既成事实。5月29日晨，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对国民党视察团来连的企图和活动作了分析研究，决定采取“拖延、孤立、留难、限制、监视”的对策，并组成由我牵头的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这场斗争。

6月3日，国民党视察团一行，在董彦平的带领下，携带大量

苏军货币以及电台、无线电话、照像机、望远镜、打字机等器材到达旅顺。他们原定划分3个组,安排了视察日程。但他们一开始就不承认旅大的地方民主政府。关东公署针锋相对地指示各单位,没有公署介绍信,对视察团不予接待,拒绝参观。在苏军当局和我公安机关有组织、有计划、有理有节的限制下视察团的计划被打乱了,他们仅参观了旅顺、大连、金县的几个单位,所到之处无不遭到冷遇、拒绝、讥讽及机巧的答问。

他们到金县视察,因无关东公署的介绍信,被金县公安局南站派出所阻在车站,拒绝参观。他们在工厂问工人:“现在造炮弹吗?”工人说:“我们工人不生产炮弹。”他们问警察:“有没有从山东来的八路?”答:“没听说过什么八路。”他们到处觅妓院,购鸦片,结果一无所获,大失所望。

由于视察团带来的大量苏军货币没有贴花盖印,已全成废纸,弄得他们不仅不能给潜伏的特务提供经费,连他们自己也“手无分文”,窘态百出。擦皮鞋,没钱付,气得擦皮鞋的小孩往已擦亮的皮鞋上撒土;派人去关东银行兑换钞票,因没有关东公署许可证被拒绝;就连想吃一点大连的海鲜,也掏不出钱来。这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使视察团内部一片牢骚:“作外交无证明、无钱,不如回去。”“一天三个饱,一个倒,起来看看牌,出去散散步,哈拉绍(俄语:好)!”

国民党视察团在到处碰壁、一无所获的情况下,于6月12日灰溜溜地离开了旅大。随着东北和全国各战场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军败局已定,连逃窜也来不及,“接收”旅大的企图也就完全破灭了。

正确处理学生闹事事件,“搬家运动”

和“分官地运动”,文艺宣传的巨大作用

古语云: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对旅大的争夺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就是对人心的争夺。

由于国民党先我们一步进入大连,到处进行反动宣传,一部分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误认为国民党政府是正统的中央政府,蒋介石是抗战的英雄。对我党的认识犹如一张白纸。因而一些人被拉入了国民党、三青团。有些学校,早晨课桌上还发现辱骂我党和苏联的传单。这种盲目的正统观念与反苏情绪交织在一起,成了当时我们开展工作的一大阻力。因此,市委、市政府从建立之日起,就把争取群众、争夺青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我党我军的一个巩固的后方基地,当做一件大事来抓。今天回忆起来,有以下几件事给我的印象还是很深的。

首先是正确处理了两次学生闹事的事件。1945年11月12日,市政府成立后的第四天,被国民党操纵的“学联”,借纪念孙中山诞辰为由,鼓动学生上街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至大连市政府门前时,他们寻衅闹事,抛石头、扔砖头,殴打执勤警察,并呼喊“打倒市政府”等反动口号。事件发生后,市公安局迅速逮捕了国民党骨干分子、学联负责人郑仁隆等9人。为了稳定局势,安定人心,教育广大青年学生,副市长陈云涛、教育局长张致远先后多次与学生们进行谈话,告戒广大青年千万不要被少数阴谋分子所利用,期望同学们要用自己的热情和智慧造福社会。同时,为加强对知识青年的工作,市委还先后派文化水平较高,从解放区来的干部孔祥林、牟焕奎、江涛(女)、郭超(女)、冯培夫、彭英(女)、于东、孙盛新等同志到男中、女中任校长、教育长,要求他们一方面接管整顿学校,一方面深入了解情况,同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斗争,把大连知识青年争取到我党方面来。

反动势力并没有停止他们的策划和煽动,1946年5月6日,又发生了类似前一年底的事件。这天早晨,学校照例举行周前会。会前,学生们集会在操场上议论纷纷,有些人高声叫嚷:“民主政府把主权出卖给苏联,不让中央军来接收了!”“我们要发扬五四青年的光荣传统,到市政府请愿,要求苏联从旅大撤军!”等等,企图再

次挑起事端。校方当即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市教育局副局长卢正义、男中校长孔祥林在讲话中一方面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一针见血地揭露一小撮坏人企图利用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达到推翻市政府的罪恶目的。为了不使事态扩大，还召开了“大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陈云涛副市长直接同各界对话。在会上，一些国民党极右分子大骂“老毛子杀人、强奸妇女”，“控诉”民主政府“不管人民死活、打内战”，要求释放被捕的“独立团”成员。会场空气十分紧张。面对他们的嚣张气焰，陈云涛的警卫员忍无可忍，掏出手枪要制止反动分子捣乱，当即被陈云涛喝住，并下了他的枪。陈云涛副市长的得当处置，使许多人看到共产党人的政治大度、坦荡胸怀，深受感动，从而改变了态度，孤立了一小撮顽固分子。

再就是用实际措施表明共产党、民主政府是为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人民群众谋利益的。1946年1月，市委召开“关于发动群众斗争”的会议，决定在城乡各地开展反奸清算运动，充分发动群众，揭发控诉敌伪残余分子的罪行，让人民群众充分行使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力。在城市，从遣返回国的日本人手中调剂出几十万平方米住宅，分配给工人和贫民居住；在农村，进行减租减息，分配官地（以前日本统治者强占的农村土地）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两件事，当时被称为“搬家运动”和“分官地运动”。广大人民群众在实实在在的受益中，深深感到人民政府和共产党才是他们的靠山，政治觉悟、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很快地靠拢我党。

还有一件我难以忘怀的事。当时社会上特别是知识青年中，有不少人把初进大城市的我党、政、群干部，看作是从山沟里来的“土包子”，没有文化，因而疏远我们。我们的宣传方式又比较简单，一时收效不大。正巧，1946年3月，沙蒙、王大化、于兰等同志带领的东北文工团来到大连，我就请他们演出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以及《白毛女》、《血泪仇》等一大批文艺节目。大连人民40余年第一次看到歌颂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反映我党领导人民反抗日本帝国

主义、反抗压迫剥削的这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演出，耳目一新，心情无比激动。特别是看了曹禺的《日出》一剧中演员们的精采表演，观众纷纷说：看来共产党不土，八路军不土哇！那些知识青年赞叹地说：共产党真是有文化，有人才，懂艺术。不少青年从此靠拢我党，积极地投入了我党组织的文化宣传活动，参加社会团体。一些爱好文艺的青年男女，纷纷要求并参加了东北文工团，走上了革命道路。我从这件事深切地感到，文艺的宣传教育作用，的确是我党的工作中一个值得特别重视的方面。东北文工团在大连的工作，不只是演出，而且利用广播、短训班、讲座、走访等方式广泛进行文艺启蒙教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们在大连工作虽然仅有半年时间，但他们的显著成绩和影响，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战胜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发展生产，安定民生”，建立我军隐蔽的后方基地

旅大地区的解放，虽然没有经过战火，但是社会经济同样处于严峻的停顿和混乱状态。特别是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后，到11月间，国民党军推进到金县石河驿苏军关卡以北地区，对旅大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旅大的粮食、燃料、工业原料的来源被切断，居民不得不实行公价配粮制。当时有3~5万人经常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中，多数居民要掺吃野菜和豆饼，才能果腹。直到1948年间，旅大还处于美蒋海陆两面的军事封锁之中。

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解决人民吃饭穿衣问题，遵照东北局的指示，旅大地委于1947年初，做出了《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决定》，提出：开展生产运动，应紧紧掌握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的原则，以及“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地吃地，能大即大，能小即小”的口号。除了大力恢复和发展工业、盐业、渔业外，在农村，开展生产运动的第一方向是发展农业生产、多增产粮食，这是保障旅大地区供应最可靠、最基本的办法，也是在旅大农村开展大生产运

动的主攻方向。同年9月,我代表地委所作的《关东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中,提出了“发展生产,安定民生,节衣缩食,投向生产”的工作方针。

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旅大党政机关紧缩机构,减少开支,大批干部和工作人员,到农村和生产第一线组织生产和帮助群众,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广大人民群众在地委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机关、企业的房前屋后,院墙内外,甚至马路边上也种了庄稼。金县、旅顺和大连市郊的农民,响应党的号召,深耕细作,颗粒归仓,使粮食产量逐年增高,到1948年底,粮食产量达20.8万吨,解决了全区年需求量的80%。旅大职工总会也响应地委的号召,开办了“民生贸易合作社”,组织工人,动员工商界人士进行反封锁斗争,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采集粮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地委还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把失业工人及家庭妇女广泛地组织起来,投入到生产中去。如当时的积肥挑粪小组、做鞋小组(给解放军做军鞋)织渔网小组(苏联贸易部门来料加工)等遍及各区坊,为解决就业、吃饭问题开创了一条出路。

民主政府成立后,依靠工人阶级,并得到东北、华东、华北各解放区的大力支援,克服资金、原料、燃料、销路、技术和管理6大难题的困扰,集中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和发展了军工和军需工业,以军工、军需工业为重点,克服重重困难,恢复发展民用工业,如织布、织渔网、制作酱油、硫化氰、火柴、袜子、胶皮鞋、灯泡、搪瓷、玻璃、罐头食品等。与此同时,还采取了中苏合营形式,恢复了一批大企业的生产。这样,当时旅大的工业,就形成了3个主要的部类:第一部类是军工、军需工业,是直接为解放战争服务的,向华东、东北及华北等战场的我军供给弹药及各种军需品,其中最大的企业是“建新公司”,还有“光华电器公司”、“中华医药公司”等等。第二类,即“中苏合营企业”。第三类是“关东实业公司”和“大连水产公司”,

都是市政府主管厅局领导经营的企业。此外,还有两类工业企业,一是纯私营的工业,主要是小机械、铁工厂,它们的数量还是不少的;二是由苏军代管的企业,如港口及其附属设施,水道(自来水)及其水源地、水库以及附属中长铁路的机车车辆工厂等。

下面,首先谈谈支援解放战争前线的军事工业。

旅大地方党委从建立之日起,就遵照东北局的指示,注意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把支援解放战争前线,当作党的首要任务。在3年解放战争中,各地战火纷飞,唯有旅大地区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和平局面。但是,这里绝非偏安一隅的“世外桃源”。党组织与人民在这里的一切活动,同解放战争的进程都是息息相关的。在恢复与发展工业生产中,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军工、军需工业方面,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为支援东北、华东和华北的解放战争,作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贡献。

大连过去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一个基地,工业基础较强,并储有相当数量的军械、弹药、汽油、布匹、医疗药品、医疗器械等军需物资。加之大连的地理位置,可通过海上与日本、朝鲜、香港及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上海、天津等地进行贸易,购销物资。这些也使大连成为拥有支援解放战争的有利物质条件。

当时,除旅大地委集中人力、物力,直接支援前线外,各解放区也相继派干部进入大连,以民办的“公司”、“商行”面貌出现。其中较大的有:东北军区后勤部开办的“福泉号”;辽南地委贸易局开办的“裕大号”;晋察冀中央分局开办的“聚兴商行”;华东局开办的“大华贸易公司”、“东顺昌”、“复丰商行”,并在1947年初成立了华东局财委驻大连工作委员会财贸委员会,将上述3个商号合而为一,定名为“华顺商行”。还有地委办的“党产”——“同利公司”和“亿中行”。这些经贸办事机构通过接收敌产,开办工厂,多方贸易,生产和购办了大批炸药、汽油、布匹、橡胶、无缝钢管、药品和医疗器械等前线急需的物资。并将各解放区的粮食、棉花、土特产品运

到大连销售,解决大连的粮荒,活跃大连经济。旅大地委竭力为他们提供便利,开放绿灯。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各解放区战场的急需,但是,由于开始是分散进行,各自为政,一度搞得很乱,对大连的经济恢复、发展和市场管理,带来许多复杂的问题,使工业生产、经济潜力难于充分利用和发挥。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46年底,旅大地委经东北局批准,设立了财经委员会,对支前工作统一筹划,克服多头经营的弊病。但是,各取所需的情况仍然存在,当时一度出现的“杀鸡取蛋”还是“养鸡生蛋”的议论,就是这样提起的。由于华东、华北等战场我军的需要日增,各地来的同志都千方百计地从市场上和各工厂多搞些物资支援前线。有些同志认为这个地方我们能否站得住,还不能肯定。与其等苏联像对待沈阳、长春、哈尔滨那样,将大连行政权交给国民党,还不如我们早点把物资器械尽多地拿走。也有些同志主要是当地主管经济工作的同志认为,四面八方都来抓物资,会影响大连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影响以后的支前工作,好比是“杀鸡取蛋”,而主张利用大连的工业条件发展生产来支援前线,这就叫“养鸡生蛋”。

事情反映到我们这里,地委领导反复讨论,认为这种争论,实质是对形势如何估计的问题。因此要明确3点:一是要认清形势,坚信苏联当局不会轻易地把旅大地区交给国民党政府,坚信我们能够牢牢掌握旅大这块重要阵地;二是充分利用大连机器设备,发展军工、军需生产,支援解放战争,这是支前工作的根本;三是急前前线之所急,只要前线急需的物资器材,我们就有计划地一律放行。党内思想一致后,大家齐心协力,把劲用在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上,使大连地区作为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更加有效地发挥出支援解放战争的作用。

1947年,东北局、华东局共同决定,利用大连的工业基础,建立军工基地,发展军工生产,支援解放战争。大连的一些大型企业

都是由苏军看管，我多次出面向苏军当局进行交涉，很快接管了以大连化工厂、大连钢厂为主体的一些企业。华东、东北和华北陆续派来大批领导干部和搞军工生产的技术干部。于是，一个由我党创建的大型军工联合企业形成了。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这个企业对外称为“建新公司”。旅大地委对“建新公司”的工作采取3条方针：一是全力支持，全力协助；二是为军工生产尽可能地提供所需各种条件，为产品运往山东（华东）大开绿灯；三是对建新公司的经营和管理给予充分的自主权。地委主要通过党组织和工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鼓励他们在“只干不说”的条件下埋头苦干，放手工作，加快生产的步伐，多出产品。“建新公司”于1947年7月1日成立，总经理是华东局派的朱毅同志；副总经理是东北局派的张珍同志。旅大地委副书记、财委主任李一氓同志兼任“建新公司”政委。经过半年多紧张的研制、试验和生产，到1948年初，即制造出后膛钢质炮弹。解放战争3年里，这个公司共生产炮弹50余万发，引信80余万枚，弹体中碳钢3000吨，无烟火药450吨，还生产了1430门迫击炮及各种军工产品，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当时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在试制和运输炮弹过程中，吴屏周等17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被誉为中国保尔的吴运铎同志，就是在甘井子场地试验炮弹时因伤致残的。由于“建新公司”对华东战场的重要贡献，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同志曾亲笔写信给我，对旅大地委和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副司令员粟裕同志后来谈到大连的军工生产时，曾高度赞扬说：“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

大连的军工生产，在我党我军的军工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我至今清晰地记得，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旅大人民、旅大工人阶级、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为支援前线所表现出的革命激情和奉献精神。我曾在198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辽沈决战》一书中为旅大在解放战争中的支前工作写过一篇专题文章，作了全面叙述，这里

不再备述。(见《辽沈决战》第580页“旅大人民的支前工作”)总之,旅大地区当时作为苏军控制下的一个战略要地和我军一个隐蔽的后方基地,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同其它解放区一样,旅大人民为支援解放战争前线尽了应尽的义务,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全体党员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始终不懈地为支援前线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这是旅大人民的光荣和足以引以自豪的。但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避免给苏方在外交上引起麻烦,我们对支前工作采取只做不说的方针,不作公开宣传,不见诸报刊文字,所以多年来一直鲜为人知。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公开地说了。应该把这一业绩昭告于后人,使之不被埋没,希望他们继承和发扬这种光荣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祖国做出新的贡献。

最早出现的中外合资企业——四个中苏合营公司 是怎样形成和进行经营管理的

“中苏合营企业”,可以说是最早出现的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它是怎样形成和进行经营管理的呢?

1946年中,旅大新的政治、社会秩序开始建立起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大批大中型工厂、企业烟囱都不冒烟,处于停工、停产状态,而工人生活也就难以维持了。当时,我们地委和各级领导干部,为此实在着急,实在伤脑筋。那时,我党在全国尚未取得政权,无暇也无力顾及大连一般工业恢复、发展问题。至于东北、华东、华北等解放区投来的资金,只能用来恢复与发展军工和军需工业。哪有多少钱用以恢复一般工业呢?

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和苏军当局商量,并取得他们的协助,尽快地把大连工业全面恢复生产。这件事,不仅关系大连20万工人的生活出路,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地方民主政权的巩固。

经过多次研究商谈,到1947年初,在一次与苏联驻军总指挥会见时,他们透露,苏联的经济贸易部门正在考虑搞中苏合营的可能性,问我方有何意见。我们地委几个主要领导人认为,这样做在

当时是最好的办法。大部分大中型工厂、企业当时都在苏军手里看管，他们能拿出来双方合营，有苏联政府及其经济部门作后盾，企业定会搞活的。但是，中苏合营企业的具体方案，苏方并未先拿给我们地委研究。1947年三四月间，在蒋介石派董彦平率团“视察”旅大的前夜，刚刚经过大连市和旅顺市、金县、大连县代表会议选举组成旅大地区民主政府——关东公署之后某一天，苏军指挥部由其主要负责人出面，正式邀请关东公署主席迟子祥和副主席刘顺元（地委副书记）商谈成立几个中苏合营公司问题，当即拿出几个合营企业的具体方案和议定书（草案），中方由关东公署主席、副主席代表中国地方政府签字。苏方在议定书上签字的是驻军指挥部的代表，一位少将。

苏方提出合营的有4大企业：（1）中苏合营远东电业公司：所包括的工厂除几个发电厂外，还经营金属机械厂等30多个大中型工厂。（2）中苏合营石油公司：经营甘井子石油加工厂。（3）中苏合营盐业公司：经营大连、旅顺、金县几个大盐场。（4）中苏合营造船公司：经营大连造船厂。

这些公司所包括的工厂和我们直接掌握的军工、军需各厂，都是大连工业的主要部分。这4个中苏合营企业开起工来，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人都有工可做，生活可得到保障了。

为什么选这些厂子组建合营公司呢？很明显，这几类工业，多数厂的原材料可以就地取得，部分可由苏方运进。产品有销路，大部分运往苏联，订户是苏联远东经济贸易部门。还有相当一部分产品，苏军需要，我们地方也需要，有订户就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工业恢复了，市场、贸易活跃起来了，经济就能搞活了。

协议书上规定，这4个合营企业的股金，中方占51%，苏方占49%，盈利按比例分成；合营议定书上还明文规定，合营各工厂、企业，根据地方政府规定的税率，每月按时将税款交到中方银行。实际上也是这样执行的。这些工厂，每月10日前，将上月应交的营业

税、所得税款(有的 10%,有的 15%)如数送交银行。

这 4 个中苏合营公司均设置理事会(董事会)。中方任公司理事长,苏方任公司总经理。开始时,每月开理事会,后来,两月或三月开次理事会,讨论决定有关工厂、企业的大政方针,主要产品、生产指标、财务、利润分配指标等等。初期,经理、厂长一般都由苏方派,我方派副职。后期,我方副职学会了经营管理。我们的干部越来越多地担任了经理、厂长。

地委对中苏合营企业的领导,除通过各理事会的理事长和我方理事外,主要是通过我们派在工厂、企业工作的党员领导干部和党组织进行。主要掌握合资企业的大政方针;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党员干部的教育;决定各公司理事长人选和我方副经理、副厂长人选,并派企业党委书记,领导各厂的党的工作和工会工作。

这类工厂、企业在经营管理上,经理有充分的自主权,可以说我们地委和地方政府是不必操心的。地委会上,常常讨论的是这些工厂、企业的干部配备问题,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及工会工作等问题。

中苏造船公司理事会,我方理事有欧阳钦、衣钦堂、张有萱和我。我是理事长(董事长)。苏方理事有造船公司总经理热尔道夫斯基(海军少将)和公司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及总设计师,全厂当时有 3000 多工人,年修造船能力 30 万吨,我方无生产任务给它。苏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了大批船只,正需要这个厂子为他们修理。此外,苏联为了发展沿海渔业,需要新造大批 500~600 吨的拖船。于是,由苏方运进钢材,我们采取“来料加工”办法,为苏联修船造船。

理事会每年开几次会,每次约用一小时,开得简明扼要。一般都是总经理简单汇报,连翻译时间不过一刻钟,讲讲修船造船生产任务完成情况,存在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哪些事由苏方办,哪些事由中方办……等等。接着,总会计师汇报财务收入多少,支出多少,

每次必讲的是利润多少,应向地方政府纳税多少,已于当月9号或8号送交中方银行了。

理事会每年开一次年终总结会,一般在12月十四五日召开。例如在1949年的一次理事会上,总经理报告当年总结,提出下年计划。他说今年计划已超额提前完成,感谢市委、市政府给予很好的帮助。他说在厂里的中国同志,无论做党的工作或工会工作,或组织生产的车间主任、班组长,他们的工作一般均很出色。接着,他讲明年计划,说生产任务得增长20~30%,苏联将有更多的船只送到大连船厂来修,同时还要新造一批货运和渔用拖船。这样,造船公司明年将比今年日子更好过。他讲完了完成生产任务的主要措施后,转过头来向我说,明年生产任务增长四分之一,需招收培训一批电焊工。造船老法用铆接,费力、费料、费时、周期长,新法则用焊接,好、省、快。希望市政府劳动局帮他录用上百名素质好的青年工人;又将脸转向欧阳钦同志,说这些工人,厂方先要经培训、考核才能录用,希望党委指派一些能做党与工会工作的得力的同志,帮助把培训工作做好。我们立即应允,并采取相应措施满足了这些要求,因为这对于我方进一步解决就业和培养管理工业的干部也是有利的。

造船公司理事会上,各理事基本都是听听总经理和总会计师的汇报,对较重要的决议事项进行表决。关于修造船问题,我方理事一时提不出有份量的建议。当时,新中国的造船业尚未提到日程。可以说,我们还提不出具体需要,也无财力、物力来发展这个造船厂。可是,我国应当有强大的造船工业,只有上海造船厂和大连造船厂以及长江、珠江、松花江若干小型内河船厂是远远不够的。大连人应当在造船业上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是当时旅大市委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因而,在一次理事会议上,我方理事提出一项建议——中苏双方合作扩建大连造船厂。作法是:除了把造船公司每年双方的利润作投资外,两国政府还按商定的比例再加投资。

当我方理事提出这个建议后,苏方理事哑然半晌。后来总经理打破了一时的沉寂。他说,中国同志的建议是好的,这样重大的问题,他一定负责向上级报告。这次会议对这个问题没有进行讨论。可是在下次会议,总经理首先提出这个问题。说他的上级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建议,只是苏联受战争创伤太多、太重,一时无力考虑扩建这个造船厂。他们在若干年内只需要修理大批在战火中毁坏的船只,并造一些拖船打鱼和运货。他接着说,如果中国有造某种船的任务,并有力投资时,苏方愿在技术和人力(指技术人员)上给予帮助。听了苏联总经理的话后,市委决定另选厂址自己干。后来在香炉礁地区选定了厂址,指定工业局长张有萱负责,开始搬石、填海、铺路。一时间,这块场地上搞得轰轰烈烈。但这样大的建设项目,只靠地方那点力量,当然难于搞出什么名堂,加之当时开展“三反”、“五反”,上级派来的检查组不了解实情,加了不少莫须有的罪名,工程被迫停下来。1952年底,我被调到东北财委后,还想支持干这个项目,也没结果。在当时,造船业这样项目,国家不交任务,资金无来路,又无订户,只靠地方是难于干成的。

中苏远电公司,理事长是段子俊。公司经营的厂子很多,除几个电厂为市内供电外,各厂产品有水泥、平板玻璃、麻袋、玻璃器皿、陶瓷制品、搪瓷制品、鱼罐头、水果罐头、高级糖果以及大豆制油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产品部分满足市场,部分销往苏联。

中苏石油公司,理事会理事长是张有萱。公司前身是大连石油七厂。当时,它的年加工能力为8万吨(原油)。苏方运进原油,加工后出的汽油、柴油、苏军就地利用,这样他们也可少运进汽油了。副产品沥青,正好我们地方修路和建筑要用。这个作法,类似现在实行的“三来一补”中的“进料加工”。

中苏合营盐业公司,拥有大批晒盐场。合营之前,基本上都停了产,盐工一度靠救济生活。合营之后,1947年至1950年接连几年“老天开恩”,晒盐季节,日照颇好,盐的产量高。盐工、盐民个个

都喜上眉梢。我们到盐场去看他们，他们不断高呼共产党万岁！中苏友好万岁！目睹那种情景实在感人。

约在1948年春，出现过一个小插曲。一天夜里，我们的商业厅长，突然拨响我的电话，把我从床上叫起。他说一艘苏联运盐船，未向我海关交税，就让我码头工人为他们装船。我问：“你打算怎么办？”他说：“不交税，我不给他们装船，请你批准。”我又问他：“是商船，还是军船？”他肯定回答：“是商船。”我说：“既如此，你可通过码头工会出面，未完关税，可不给装船。”商业厅长照办了。放下商业厅长的电话，我立刻打电话给苏军当局，接电话的是苏军驻大连民政局政治副局长巴申上校。他说待了解一下情况，过5分钟后给我回话。回话时他说：“韩光同志，你办得很对，我已令他们立即交税，请你放心。要知道，商人就是商人，我们的商人也不例外。胡闹，我们就纠正他。”第二天上班，我找来商业厅长一问，他说：“事情解决了，现在正在向船上装盐。”一场小风波过去了。可是，消息传开，又有人说我命令码头工人罢工，不给苏船装盐，破坏中苏友谊。一时间，过往干部传来传去，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问题在党内说清也并不难。同年6月，我主持地委整党会，倾听与会同志们的意见。此事当时已经讲清了，其后无谁再提了。可是2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专案组的人，又搬出这个早已被忘掉的事，想给我罗织一条罪状，说我曾组织罢工，破坏中苏友好，我半晌没有说话。他们又促我交代所谓罪行，实在令人生气。我反问他们：“你们不是要把我打成苏联特务？此刻，似乎又想把我打成反苏分子。这样做，你们不感到不太协调吗？”他们听后，气得面红耳赤，怪我顶撞了他们，骂我是顽固的走资派。这时我想，和他们没什么道理可讲，只好不作声罢了。

1949年底、1950年初毛泽东主席访问了莫斯科。苏联政府决定将大连的中苏合营企业和苏联代管企业，无偿移交我国。周恩来总理指定我为中方谈判的首席代表。我方代表还有衣钦堂、张有萱

等同志。苏方谈判的首席代表是驻大连市总领事巴兰诺夫。谈判进行得很顺利。苏方是和盘端出,交出个大清单:厂名、资产数、设备、产值、利润、工人数等等。我方的原则是:苏方交什么,我们就接什么。苏军继续使用的企业、设备,一时不能交的,我方不必主动要。逐厂谈了两个多月,双方形成了一个交接议定书草稿及附件——移交的工厂、企业清单。然后,我带着议定书草稿及附件清单到北京,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花了一个星期时间,周总理逐项详细看过、问过。然后,他批准可以签字。向周总理汇报时,外交部主管司长也参加了。我回到大连后不久,就正式举行了交接仪式。在双方交接仪式上,苏方首席代表说,苏军进驻大连,从日本人手中接管了大批工厂,也曾用了大量的部队看管。在中国工人合作下,工厂基本未遭破坏。1946年~1947年间,应中国同志要求,已经移交了大连钢铁厂、大连化工厂、大连纺织厂、金州纺织厂,以及几个机械厂。今天,又将中苏合营企业和一部分苏方代管企业移交中国。从此,除了少数苏军留用的企业、设施(如旅顺军港、旅顺修造船厂其它军用设施)外,绝大多数工厂、企业、盐场等,都交了回来。而暂时苏军留用的企业、设施,到1955年苏军撤离时,也都统统交回我国了。

与中苏合营企业移交有关,还发生了一件事,现在可以说是一个笑话。这是1969年~1971年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我靠边站了,被送到工厂劳动,受“四人帮”派的专案组审查。前边已经提到,他们想把我打成苏联特务,至少也想打出个里通外国的罪名。东访西查,翻箱倒柜,找不到任何材料。最后,总算从中苏合营企业移交项目中“挖出”一个可作为里通外国的“罪状”。专案组说,在接交仪式签字时,苏方首席代表曾声明港口附设的海岸电台,苏军当局继续留用,故移交清单上没有列入。说我没有力争要回,是“出让祖国权益的罪行”。由于当时谈判以及移交签字时的具体情节我记不清了,而他们讲的情况我又不能相信。他们三番五次逼我

承认,我就是不承认。急得他们在地上转来转去,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手搓来搓去。看来他们是想打我一顿而后快。我尽可能保持着平静。只讲:毛主席说过,一切结论经过调查研究,请你们调查研究吧。我在工厂劳动期间,他们时常来找我,每次都追问不休,但他们往往都是盛气凌人而来,垂头丧气而去。1973年春节,组织上允许我回家了。同志们纷纷来祝贺我解放了。1974年底,专案组负责人把我找到他们的办公室,说结论有了,没有大错,但仍留了点尾巴,说我在国家科委工作中“有点修正主义性错误”。我问他们海岸电台问题,他们说是误会,说我没有错。好个“有点修正主义性错误”的尾巴!,真令人哭不得,笑不得。

大连解放初期,我们办中苏合营企业的始末,大体如此。

在苏军军管情况下,我党在旅大实行的 特殊政策及处理同苏方关系的原则

苏联红军的进驻,对旅大来说,标志着近半个世纪旅大人民被帝国主义者奴役的终结,标志着旅大这块被宰割的中国领土重新回到祖国怀抱。这是决不可以与1898年沙皇俄国的租借和其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相提并论的。

陈云同志对于苏联出兵东北后的政策,曾作过这样的分析:“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的。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见《陈云文选》(1926-1949年)第221页)。在旅大地区8年工作实践中,我深切地体会到上述分析的正确性。

我受命来大连工作之时,东北局彭真等领导同志曾明确指出:与苏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要认识苏军驻在并对大连实行军

事管制这一实际情况，充分利用这种情况对我有利的方面，放手开展工作。要充分发动和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努力支援前线。工作中，要照顾苏联的外交关系，不使苏联在应付美蒋方面发生额外的困难。在当地实施我党的各项政策，要同苏军当局充分协商，取得相互谅解。工作方法不可照搬其他解放区的模式。当时，我们根据上述指示精神 and 当地实际情况，肯定过“以苏为主”的工作方针。所谓“以苏为主”，主要是我们的各项工作，必须考虑到苏军实行军管的这一特殊环境。在1945—1948年间，旅大地区的防务与外交，货币与银行的管理，报纸与广播的监督与检查，港务、海关、电力、自来水等企业的管理等方面，都是苏军当局直接担当的。而由于彼此在大局上有着共同利益，以苏为主，实际上也就是以我为主。决不象有些人指责的那样，以苏为主，即是以我为奴。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政策和工作方式，也可以说是贯彻执行我党在其他解放区实行的政策的变通形式。这些特殊的政策主要有：

第一，在减租减息、反奸清算斗争中，斗争方式不采取戴高帽游行、罚跪等做法，而把斗争会改在室内进行。开始我们在马路上或场院上斗争地主，苏军就出面干涉。甚至派兵包围会场，鸣枪制止。基层干部有气，反映上来，我们也觉得纳闷。苏军为什么不斗地主？他们怕什么呢？后来苏军当局解释说，他们不是不赞成我们斗地主，而是顾虑美蒋特务或外国记者来照像，宣传出去，说苏联违背中苏条约，支持中国共产党斗地主。后来我们改在室内开斗争大会，他们就不再干涉了。关于实行土地改革，苏方也表示过，应当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命令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以达到消灭封建剥削的目的。1947年冬或1948年初，大连县斗争大地主周子扬，分了他的土地给农民。我出席了斗争大会并讲了话。苏方知道后说，这样做很好。周子扬这个人，在1946年时，曾由苏方提名担任过大连市的银行行长。我们开斗争周子扬大会，并分了他的土地

给农民,事先并未征求苏方意见。可见,不能说苏方是不允许我们在农村搞土改的。到1949年,旅大地区土改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这时,旅大地区地主手里的土地,绝大多数已在前段减租、减息、反奸清算中,被剥夺,分给贫雇农了;封建剥削在农村已大为削弱、而不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了。因此,旅大区党委作出决定,行政公署颁布命令,在全区进行土改,根据旅大的特殊情况,未称土改而称为“土地调剂”。实际上是按照中央颁布的土地法大纲和政策界限来搞的。经过历史检验,那时的土改是成功的。虽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同于其它解放区的方式,但从逐渐削弱以至最后消灭封建剥削的结果来看,则是相同的。至于后来有人把旅大的土改说成是“和平土改”,包庇了大批漏网分子,完全是由“左”的思想而来的曲解,与客观历史实际根本不相符的。

第二,对工厂、渔业、盐业等都采取公司经营办法,包括前已述及的中苏合营公司,普遍实行厂长或经理负责制。党、政分工是明确的,企业的工作职能和范围也是明确的。

第三,人民警察着特制警服,戴警衔。警服既不同于我八路军的军装,更不同于国民党的警服。当时先后担任公安局局长的赵东斌、边章五、周光都戴过中将警衔。为这件事,“文化大革命”期间赵和周还受到审查。说他们自己封自己为中将。调查人员找过我几次。我都证实那不是他们自己搞的,那是组织决定的,是当时在特殊环境中进行斗争的需要,而且便于同苏联军方联系。

第四,充分发挥司法、检察机关作用。当时这与其他各解放区的做法不一样,在其他各解放区,对于刑事案件,通常开个群众大会就解决了。在这里是公安、司法、检察机关,联合协作办案,按法律程序处理。政府一般不出面干涉。

第五,宣传上以地方自治的面貌出现。苏军方面有新闻检查官,对报纸、电台、刊物进行检查,严防有碍苏联外交政策和不利于中苏友好的文字出现。如1947年,一次市政府工作人员给迟子祥

写的讲话稿，出现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口号的字样。苏军主管政治工作的巴申上校曾指出：这样写不好。他说，我不是说迟子祥不应当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但在这里不行。如果被国民党看见，他们就会说迟子祥被中共收买了，造成外交上的麻烦。何况大商人迟子祥也不会真心喊毛主席万岁。当时苏军实行报刊、广播检查，还有另外有利的一面：万一以后国民党在这里公开活动，办什么报纸、杂志，出现反共反人民的言论，就会被禁止，甚至可以封闭它。这种检查随着全国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我党执掌全国政权在望，1948年下半年后，由逐渐放宽乃至完全撤销了。

第六，干部进城后，改变解放区的着装，有的西装革履，有的礼帽长衫，有的穿着警服。抗战时期我们干部粗布衣裤的军装，在这里不见了。总之，在这里工作的干部，都是以“灰色”的面貌出现。象当时说的那样，“西瓜政策”，外绿内红。这样一来，也有人说这里的干部进城后变了，腐化了。穿上西装革履，扎上领带，哪还象革命干部。他不知道如果我们还是一身八路军式打扮，能适应环境开展工作吗？

第七，我们经营的支前军工企业及“党产”均以民间“公司”、“商行”面貌出现。如“建新公司”、“同利公司”、“东顺昌”、“聚兴商行”等等。这些公司都是我党领导的独立经营单位，市委、市政府只给他们提供有利的经营条件，不占用他们任何盈利，不干预他们的业务。

如上所述，我党在大连这个特殊环境里所采取的这些特殊政策，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和中苏双方均能接受的原则办的，也充分考虑到苏联政府万一允许国民党政府接管大连政权的可能，能够有利地同它周旋。至于我们党的思想、组织建设，党内的工作方法与作风，完全是与我们其它解放区一样的。

在处理同苏军当局的关系中，我们坚持这样几条原则：

第一，我地方党政领导与苏军当局在高层次始终保持密切联

系。出现不同意见及时交涉、协商、疏通,改进关系,使我们的政策得以顺畅实施。

由于坚持了这一原则,这一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最终都比较圆满地解决了。如大广场(中山广场)警察局长潘澄宇是日寇统治时期的恶霸工头,有血债,民愤大,解放后乘混乱之机拉起队伍,当上警察分局局长,借机进行敲诈勒索,实属罪大恶极。根据公安总局的意见,市委同意逮捕他,夺回那里的领导权。1945年11月17日下午,公安总局将其逮捕。但苏军保安部门负责人知道后,把我和赵东斌邀到明泽湖边一栋小楼。我俩刚坐下,这位负责人(苏军中校)就质问赵东斌:为什么抓大广场警察局长?你不同苏军打招呼就随便抓这个局长,我就把你抓起来!这时室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当即以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的名义,向他提出抗议说:“据我们掌握的材料,这个人不是好人。总局长对他部下的坏人完全有权捉起来。你说要捉起我们的总局长是错误的。”这时中校的态度缓和下来,我们也未和他多纠缠。第二天,我就向苏军指挥部高字洛夫中将提出此事,高当即表态说:“你们的人还是你们清楚,那个中校胡闹,别听他的!”事情就这样解决了,以后再未发生类似事件。

第二,认清共同利益所在,实行充分合作,分清哪些方面只能以苏为主,哪些应独立自主地开展,要顾全大局,求大同存小异,才不致造成顶牛局面。如迟子祥任市长的问题,开始我也不理解,苏方怎么让这样一个人当市长呢?我们很多同志也一直想不通,经常找我提意见。我们数次向苏方提出换掉此人,苏方都未同意,他们坚持用迟子祥任市长。1948年冬,随着国内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我们再提出撤换迟子祥时,苏方就不管了,并说:“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可见这时苏方已不再需要这块“顶门砖”了。再如土改问题。如果我们不搞变通的做法,硬要坚持采用各解放区的斗争方式,其结果非但土改搞不成,还会同苏方顶起牛来。1947年夏,陈云同志曾对我当面指示说,你们那里,主要是工业,农业是次

要的，土改晚一点搞也没什么。迟子样现在换不换都可以，并不妨碍大局。要紧的是先把党的工作、工会工作做好，把工业、公安、支前工作做好。这真是高屋建瓴，一语中的！

第三，我们干部注意在实践中向苏联同志学习，是很重要的一点。苏联党和人民，革命成功比我们早，斗争经验和管城市的经验都比我们丰富。在大连这种特殊环境中，管理具有现代水平的城市，对于我党干部来说，是个新的课题。我们只有虚心地向苏联同志学习，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工作能力，才能较好地完成党赋予我们的各项任务。

对某些苏联同志的大国主义表现，地委提出系统的批评意见，双方关系得到进一步协调

苏军按中苏条约进驻旅大，有体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面，如与中国人民共同维护远东和平，与我党友好合作，支持我党在这里掌握政权和支援前线，对当地人民生活提供帮助等等。这是主要的方面。但是，不可否认，在实行军管中，他们的人还有大国主义甚至以占领者自居的思想表现。这虽然是次要的方面，我们也不能一味容忍迁就，而以同志式态度和适当方式，向他们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除在日常接触中遇到某些具体问题如此处理外，1948年3月15日，我们经过认真考虑，以中共旅大地委名义向苏联驻军最高负责人别洛博罗多夫上将提出过一份长达6000字的意见书，题为《关于联共与中共同志在完成巩固关东苏联海军军事根据地共同任务中的工作关系问题几点意见》。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这份意见书只在地委领导核心中商讨后发出，未向党内多数同志传达。今天有必要也完全可以公开地说了。

在意见中，我们首先从政治、经济上强调指出，中苏双方在旅大地区有着基本的共同利益，应当不断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关系。在实现巩固苏联海军基地和进行旅大经济建设的共同任务中，双方应更好地相互配合。一方面应维护苏军在旅大人民中的高度威信，

同时也应维护和提高中共党委与地方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中共党组织于1947年的十月会议上,已就双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从自身进行了检查,并努力进一步加强中苏友好密切合作的关系。但苏方对我关系中出现的問題也值得注意。接着,意见书举出若干实例提出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在经济关系上,按双方商定的贸易法规,除苏军方运往苏联本国的物资可免税出口外,其他物资均不能例外。但苏军民政局(驻大连与我党和政府经常联系的机关)一位负责人曾提出,凡是经他们指定的苏方人员签字运出的物资,即使是运往他国的也可免税出口;我方对苏贸易谈判中,苏联外商部门有时不讲信用,并利用军管对关东公署施加压力;苏方虽几次应允交纳苏方在旅大各贸易机关、经营的工厂、企业的税金,但其贸易机关和有些代管企业,仍然迟迟不予偿付。在政治关系上,苏军当局在市、县(区)派驻的代表,对当地各方面工作,时常事无大小都要过问。有时直接出面干涉,发命令,甚至对我方干部指手划脚加以斥责;苏方同志向各地区、部门收集多种统计资料,往往不预先通知准备,突然限期索取,而且头绪甚多,使人应接不暇;关东公署发布的政令,事先虽已经过苏军最高当局认可,但下达市、县后,还得经过当地苏军代表同意才能执行,如此等等。

在指出上述问题后,我们提出,在旅大的经济建设中,对于大量苏联驻军的需要,除依靠苏联国内供给外,当然要发挥驻地经济力量以补不足;但与此同时,中共党委与地方政府,还担负着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任务,并对当地百万人民经济生活的改善负有责任。因此,两者必须兼顾,希望苏联方面能予理解,使双方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利益得到合理解决。关于政治方面的工作关系,由于苏联方面对于在这里实施的政策原则往往说明解释不够,加以我方干部对这一特殊地区和大城市工作缺乏经验,执行中往往思想不通,发生分歧。因此,希望苏联驻军当局提出某项重大的政策时,事先

通过中共地委与关东公署,说明其目的、要求,以便作必要的思想准备。在日常工作联系中,希望苏军当局驻当地各级代表改进工作态度与作风。双方应相互尊重,民主合作,遇事共商,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某些苏联同志对中国同志的斥责、威逼行为必须纠正。在实行军管中,希望苏军当局今后在政策上、原则上多加注意,通过中共地委与地方政府,以及各市、县(区)党、政机关提出意见,解决问题。改变过去分散的、零碎的、事无巨细直接过问干涉的做法。

苏军当局对这份意见书的反应很快,收到后立即由苏军驻大连市民政局负责人巴申上校约我和地委组织部长苏杰、宣传部长袁牧化同志会晤。他恳切地表示,过去双方联系不够密切,尤其是苏联同志未经常主动地找中共地委同志们交换意见,讨论工作,这是不对的。他说:他们应该实行自我批评,也要更多地听取地委同志们的批评,欢迎地委同志向他们提意见。今后应加强相互间联系,不仅是上层同志的联系,还要贯彻到中下层去,因为下面问题发生得最多。他具体提出,会后每月开一次联席会议,及时反映下面的意见,讨论工作,共同解决问题,然后双方分别发指示,使下级保证执行。他还提出,希望中国同志给苏联同志专门讲解中国党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以便工作中,双方能够很好的配合、协调。此外,还对我党支援前线表示明确的支持态度。自那以后,双方关系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由于上述一段交往内容对于了解旅大的中苏关系历史情况较为重要,所以,参照大连档案馆所存的意见书原稿及复写本和与巴申上校会谈记录复写本,在这里作个概略的叙述。

总之,苏军进驻旅大后,与我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关系,经过一个逐步改善与协调的过程。苏军进驻初期,旅大人民在欢迎解放者的同时,对其少数兵士违犯军纪酗酒闹事,有的强奸妇女,很有反感。他们部队的领导,对此不断进行整顿。当时驻军总指挥部政治副指挥(少将)曾向我说:“韩光同志,要了解战争的破坏性是极大

的。它不仅破坏了经济,也破坏了人的思想。我们最后战胜法西斯德国,牺牲了两千多万人。解放波兰时,不得不使用刚俘虏过来的士兵,今天俘虏过来,明天就把他们补进红军上前线。你说,这样怎么能不影响苏军军纪呢!”在旅大驻军中发生违犯军纪的情况主要是1945年冬到1946年上半年一段时间。苏军也注意整饬军纪,改善与当地人民的关系,还帮助农民耕地等。群众对当地驻军的关系一直是比较好的。关于搬机器,巴申上校说:“卫国战争我们受到破坏很大,搬走少部分机器帮助苏联恢复建设,留下的还是大量的。希望中国同志谅解。”据我所知,从大连搬走机器问题,他们并不隐讳。如甘井子发电厂有两台25000千瓦的发电机。他们当面告诉我已搬走了一台。

军事管制是随着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发展而日渐放宽直到解除的。如报纸审查,我们采用新华社的战报及其他电稿日益增多,他们也不再阻止。1948年下半年就撤销了送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中央人民政府与苏联政府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苏军驻大连市民政局随之也撤销了,不再干预当地党政事务。地方政府同苏联驻大连总领事馆有外事上的来往,同驻军有三件事经常要办的。一是,修桥补路。苏军指挥部每年都拨大量水泥、沥青,按照他们提出的设计,筑路、建桥。后来,干脆连飞机场也包给我们去建。所有这些工程,苏方都照付费用(含工资)。二是,旅大地区水泡子多,生长蚊虫,易传染脑炎。苏军卫生部门,每年春都调拨十多吨汽油灭子、灭蚊。三是,苏军后勤部门每年秋都向我商业部门订购大量腌咸了的西红柿。这些事,几年来,双方合作得都很满意。每遇年节,苏军总指挥部别洛博罗多夫上将在招待会上,都举杯表示感谢我们党和政府给他们的帮助。我在旅大工作的八年间,同苏军当局打过许多交道。建国前,主要是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精神,努力搞好与苏军当局的友好合作;建国后,中苏友好处于高潮时期,更要继续遵照中央方针办事。有些重大问题如企业移交等,是直接向周

恩来总理汇报和按总理指示去办的。“文革”中，“造反派”想把我和欧阳钦同志都打成“苏修特务”，完全是对历史的无知或别有用心。今天再来说明这些历史真相，可能对后人还有些参考作用吧。

关于 1947 年“十月会议”和 1948 年“六月会议”

旅大解放初期，外来干部来自延安、华北、华东、东北各解放区。真可谓五湖四海。大家那时正经历着全党工作重点由农村到城市的转变。虽然有农村根据地的工作经验，可对城市工作特别是在苏军军管下这个大城市的特殊环境里如何开展工作，则非常生疏。见解也不尽相同。当时党内同志对旅大地区的形势、特点和党所应采取的方针、政策，有些不同的认识，甚至争议，是难免的事情。这里需要谈谈 1948 年 7 月以前，地委为了统一党内思想认识而召开的两次重要会议，即 1947 年的十月会议和 1948 年的六月会议。

1947 年的十月会议，是有地委全体委员参加，由我主持进行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旅大（当时一度称为关东）地区的形势、特点和党的任务两个问题。会议围绕这两个问题进行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到会同志都畅所欲言。会议结束时，我根据东北局领导同志历次指示的精神，结合两年来实践中的体会和会议上大多数同志的共同看法，作了题为《关东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总结发言。关于形势与特点，我着重说明，这个地区按照中苏条约的规定，苏军长期驻在并实行军事管制，主要是个苏联海军军事基地。在远东国际关系上，是苏联同美国及其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之间斗争的一个焦点。它不仅捍卫着远东和平，而且直接保卫着中国革命，因而建设与巩固这个海军基地，不仅是苏共与苏联人民的任务，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人民的任务。这个地区可以同时成为我党一块隐蔽的后方基地，从这里取得物资与技术的支援，取得人力与干部的补充及休养生息、交通联络等方面的支援。这里的政权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我们的党员、干部虽不公开中共党员面目，但对建

设、巩固这块海军基地和为当地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谋利益,要负起主要工作责任。这一地区由于苏军驻在,全国内战的火焰没有烧到,处于和平环境;但不是偏安的和平,而是处于全国战争包围中的和平。因此,“和平建设”,不应忘掉战争;经济建设应当与周围解放战争的需要密切地结合进行。要“养鸡生蛋”,而不能“杀鸡取蛋”。并要注意解决当地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加强经济工作的计划管理,才能顺利地支援前线。关于党的当前任务,我代表地委提出了“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方针。“发展生产”,必须有重点、有计划,逐步地进行。首先从与东北局交给的支援前线的任务直接相关的钢铁、化工、纺织、电器、制药以及胶鞋、火柴等项工业起步。同时,把其他工业搞上去,包括中苏合营企业。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力争多增产一些粮食,减少向外地求援;“安定民生”,就是尽可能地解决城市 35000 人的就业问题,保证居民的粮食定量供给,稳定物价,逐渐满足群众的日用必需品的供应。此外,关于加强政权工作,加强群众团体和公安部队(实际上是党的武装力量)工作,以及党的宣传工作,也根据当时的形势分别提出了要求。关于支援前线工作,这是旅大地区全党的重点任务,要有计划地、更合理地、更主动地去做,比过去要做得更多。

十月会议起了促进党的团结和统一思想的作用。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在上述一些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识,会议肯定的“发展生产、定安民生”的方针,对旅大经济建设和支援前线工作产生了积极作用。

但是,有些同志对地委的工作仍有不同的看法。这些意见主要是:认为地委没有认识到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与巩固旅大战略要地这三者的统一性;没有把支援前线放在应有的位置;说过分强调了本地区特点,发生了不自觉的、盲目的强调特殊性的某些类似闹独立性的表现;在某些政策问题的处理上,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及群众观点;地委领导民主作风不够,对干部思想教育不够;对某些老

干部,没有很好地吸收他们的经验,学习他们的优点,等等。1948年2月底,地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整风的指示,开始进行整党。至5月,适逢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派伍修权同志来大连检查军工生产工作。地委决定于6月间召开整党大会,请他参加指导。这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十月会议上肯定的基本方针、党的现行政策和地委领导作风等问题,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会议吸收县(区)级以上党员干部参加,并组成包括几位老同志参加的大会主席团主持会议。这次会议上,到会同志各抒己见,气氛热烈,可以说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时,地委有的同志曾向我表示担心,说这样开下去,恐怕不好收场,我的回答是,有些同志既然有意见甚至气不顺,就得让大家讲出来。我们领导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也不能怕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大不了是我们下台让别的同志来干,我们还可以在别的岗位上为党工作嘛。

六月会议上,伍修权同志讲了话,对地委前一时期的工作表示肯定,并对今后如何改进发表了意见。地委与整党大会主席团联席会议通过了一个《地委整党大会关于若干问题的总结》。《总结》肯定地指出,十月会议的总方针,即巩固旅大战略要地,建设我党隐蔽后方,发展生产、安定民生,是正确的;并且指出,地委内部在十月会议前及十月会议上,虽然对某些问题曾经有过不同的认识与不同的意见,但不存在所谓两条路线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内也不存在所谓宗派纠纷与宗派打击。至于地委中个别领导同志因苏军当局提出不宜在旅大继续工作而调走,是1947年六七月间的事,与十月会议毫无关系。《总结》也概括了一些同志对地委的批评意见,包括一些偏激的意见。我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认为,这个《总结》当时实际上采取纪要的写法,肯定了应该肯定的问题,如实地反映了主要的批评意见,是可以的和难得的。因为首先它肯定了地委十月会议的总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在地委内部不存在所谓两

条路线和两条路线斗争；其次，它肯定了党内不存在所谓宗派纠纷与宗派打击。说穿了，主要之点就是个别同志的调离，绝非地委领导上对他们的排挤、打击，这样讲是符合实际的，是很公道的。再次，它指出地委领导（主要的责任在我）发扬民主不够，对干部思想教育不够，没有很好地吸收一些老同志的经验、学习他们的优点等，这一批评也是正确的。以上这几点对于进一步统一党内思想，增强党的团结和改进地委的领导作风，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但是，《总结》中所提到的某些批评意见，例如说地委领导“过分强调本地区特点”，“有某些类似闹独立性的表现”，今天冷静下来回顾历史，很明显，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那时党内许多同志都是从农村根据地出来，解放战争中即使有的同志已转入城市，也都是由我党我军一手经营的中小城市，有些同志对旅大这样一个特殊地区所采取的特殊政策和做法，总觉得没有先例，同其他解放区和新解放城市不一样，看不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因为自己看不惯就不承认这种特殊性，不允许某个地区、某项工作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去办事，不允许有一点变通和创造，不允许有一点新事物，一出现就视为异端从而扣“帽子”，指责为“闹独立性”，这种思想方式和批评意见是不可取的，对实际工作也是不利的。今天指出这点，绝非要去算老帐，完全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罢了。再如说地委缺乏把支援前线放到应有的位置。对这一批评，当时知情的同志就说“不公道”，建议我反驳，我没有那样做，而是采取了“言者无过，闻者足戒”的态度。事实是旅大地方党组织一直是把支援前线当作头等重要的任务来办的。我在本文前面已概略地叙述过。只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一工作是在“只做不说”的情况下进行的，直到数十年后，还鲜为人知。旅大党委当年在东北局的领导和华东、华北派来的同志互相配合下，为支前工作竭尽全力，十月会议提出要“养鸡生蛋”，即努力发展生产，有计划地、更合理地、更主动地支援前线。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

总的来说,六月会议对于改进地委的领导作风,发扬党内民主,是有积极作用的。六月会议后,一部分在旅大工作过或休养过的老同志,到东北局等候另行分配工作。东北局当时正在召开城市工作会议,这些老同志又直接向东北局反映了他们对地委的批评意见。8月间,东北局组织部召集这些老同志和旅大地委参加城工会议的负责同志在一起,开了个旅大干部座谈会。张闻天同志代表东北局在会上就旅大前一段党内争论的问题讲了话,再次肯定了地委1947年十月会议的方针及根据旅大特点实施的一些主要政策是正确的,并指出,东北局对旅大地委在政治上一贯是信任的,他指出“六月会议”上少数同志对地委采取对立攻击的态度是不对的。大家应当在六月会议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继续前进。在此之前,东北局已决定欧阳钦同志来旅大任地委书记,以加强地委的领导;并指定我任第一副书记,主管政府工作,李一氓同志任第二副书记,主管财经和支前工作。

欧阳钦同志来旅大主持地委工作,我从内心里感到高兴。在旅大3年多的时间里,我深感这一地区环境特殊,情况复杂,过往的有经验的老同志也多,我自己理论素养和工作经验不足,很希望能有一位比我强的老同志来担当第一把手,我则甘当副手。我的这种愿望,先后向曾来大连休养的罗荣恒同志,来大连检查工作的肖华、伍修权同志都当面表示过,如今得以实现,于党的工作是有利的,适宜的。欧阳钦同志来旅大后,首先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着手,根据当时中央关于加强国际主义教育的有关决定,针对党内在中苏关系上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观念,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连续向党员干部作了题为《关于国际主义问题》、《关于阶级与党》的报告,对干部中存在的狭隘民族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倾向作了深刻的批判。同时,结合当时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形势,作了《在大发展大胜利中努力前进》的报告。这些报告在广大干部中产生了端正思想、振奋精神的重大作用,至今有些老同志还念念不忘。至此,随

着辽沈战役的巨大胜利,东北全境解放,旅大党的工作顺畅发展,经请示东北局批准,1949年4月1日,旅大各级党的组织公开与群众见面(地委正式改为区党委)。欧阳钦同志代表旅大区党委提出“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发展文化,培养干部”的方针,旅大地区各项工作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中共大连党组织与驻连苏军关系

刘顺元

苏军驻大连是根据苏联与国民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属于军管。苏军进驻大连对我党有好处，条约规定不准中国在大连驻扎军队，国民党军队就进不去。国民党虽然在大连公开挂牌子，但苏军不准他们进政权机关，而让我们掌握政权，组织公安局，这对我党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很有利。如果国民党占领大连，恐怕我党在东北的活动就不那么方便。当然，苏军在大连也给我党造成一些损失，给人民带来一些苦处。他们在大连抢东西，纪律不好。苏军在大连往本国运东西是公开的，他们很懂国际法，每次运东西都举行签字仪式，手续是完备的。当然也看得出，这种签字或手续只是走走过场罢了。有一次，他们把我和迟子祥等人召集到旅顺，为一批准准备运走的物资签字。我们到达旅顺后，苏联人还在起草文件，等了很长时间，将近半夜才翻译成中文，我们就在这个刚形成的文件上签字，然后举行宴会碰杯庆祝。至于纪律不好，我们向苏军司令部反映后他们也管，看待这个问题不要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

我是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大连工作的，由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协定，我不能公开活动，需要装扮成无党派的样子，穿西服，梳油头。虽然不习惯还得这样做，就是邋遢些，总的还说得过去。

在与苏军领导机关人员的接触中，对他们的作风与气势很看不惯。根据军管规定，我们不建军队，不管军事，但政权要我们掌握，我们还有个党权，实际上政权的事主要还是他们管。当时大小

部门都有一个苏军代表,大小事情都要他们同意才能办。一切都是命令式的,他们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也不准有不同意见,否则就挨训斥。政权工作这样还可勉强接受,党的关系他们也插手。我们党委开个会苏军都派人参加,十月会议他们就参加了。我们开会争论得那样激烈,他们都看到了,也听到了。他们完全听得懂,凡是同我们打交道的人都是中国通,政策理论水平不比我们低。这种作法我就看不惯,经常提意见。久了关系就不好处,别扭。这到底算什么关系呢?当时大连有两种态度,即以我为主和以苏为主。有的人认为,大连的一切工作以苏为主,一切依靠苏联,一切服从苏联,就象当年的中东路那样。这种观点对不对?我看提法本身就不科学。这个问题当时意见不一致,恐怕现在也不会一致。其实,苏军对这个问题也忌讳。董彦平来大连之前,苏军急忙统一口径,在政权方面提出四条作为与董彦平交谈的内容:第一,旅大地区政权机关是大连人民要求建立的;第二,政权机关的领导人都是大连知名的中国人;第三,所有领导人都是人民选举出来的;第四,这个机构独立行使权力,不受任何党派领导与支配,也不受苏军领导和干涉。我听到这个调子以后特别吃惊,原来苏军在大连说的做的不齐全一致。

十月会议以后我离开了大连,同时离开的还有边章五和唐韶超。我离开大连后,毛主席、刘少奇跟我谈了话,要我以团结为重,以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为重,以当时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为重,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为重,解决好我在大连一段工作的问题。我听了少奇的意见,认识到我在大连的工作,没有领会中央的政策与策略,看得不远、不深,与苏军没有处理好关系。之后,中央调我去济南任山东省委书记,职务比大连高了。苏联发现我在山东任正职,向中共中央提了意见。少奇对我说了并把我调到中央任副职,到赫鲁晓夫上台后再未对我追究。我的问题不仅党中央和毛主席知道,苏共中央斯大林也知道,他们认为我任正职不利于中

苏友好。

苏军在大连的历史总得写。不论中苏关系怎样发展，一个根本的观点不能丢，即苏军进驻大连，对我党开辟东北根据地以及辽沈战役和全国解放，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大连这个后方的作用，总的方面要充分肯定。

（刘顺元时任中共旅大地委副书记。
本文根据金慈云 1983 年 12 月访问
刘顺元谈话追记整理）

我所了解的苏军

柳运光

1945年9月,我在延安开完七大回到胶东区党委,接到上级的指示,说赶快到东北去接管大城市。还在延安开会的时候,就听说要去东北,所以接到通知思想上是有准备的。我和吕其恩、邹大鹏等人坐船取道去东北。在我们出发之前,吕塞已带领三四十人做为我们队伍的先遣队出发了。但吕塞到旅大去以后没有音信,我们不能再等了,就乘船从烟台出发,在庄河登陆,进岫岩城,到沈阳。后来才知道,吕塞一进大连,就被苏军缴械了。以后他就在大连,担任市工委的领导工作。我们进了庄河以后,陈云涛带四五十人的队伍,进城子坦、貔子窝、普兰店,也到大连去了。

1945年11月,韩光派唐韵超到东北局,唐韵超汇报了大连的工人运动情况,并要求解决他的个人问题。我当时在东北局做政治秘书,经手挑选和分配干部到大连。唐韵超在汇报时,说需要派干部去大连搞工运,东北局就把我派去了。我去之前,彭真嘱咐我,一是要抓工人的工作,二是要抓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于12月份到达大连,在此之前,大连市公安总局、市政府已经成立。

苏军不了解中国的特点,在大连机械地搬用了他们在欧洲的做法。当时国民党的牌子已经挂出去了,苏军让我们也挂出去。我们没同意,牌子挂出去就公开了,对我们很不利。韩光坚持不挂牌子是对的、有功的。苏军对此不理解。在同国民党的斗争中,我们把他们反苏的言论、材料印出来,交到苏军司令部,苏军就把国民党市党部查封了,牌子摘掉了,主要头头也抓起来了。不讲你是什

么党派,就讲你是反苏分子。成立公安局,警察必须是我们的人,清一色的。警察部队有这么几个基础:第一,吕塞带去的那三五十人及以后陆续从胶东来的。第二,陈云涛经貔子窝、城子坦带去的那部分人。还有公安局、工会的力量。工会的工作,旅大的基础不错。1945年11月7日,苏军要召开纪念十月革命节大会。苏军司令部说这次会要开得好,并分别找各个团体谈话,问能组织多少人来开会。中苏友协牌子不响,组织不了多少人;商会的迟子祥,顶多能组织七八百人;唐韵超说,我可以动员20万人。苏军司令官不相信,说瞎扯。因为他们在欧洲召开群众大会,没有多少人参加。结果在召开会议那天,唐韵超真把队伍拉去了,三四万人有了,而且队伍整齐。苏军司令官对唐韵超讲,在旅大地区,我们就承认你这一家工会,别的不承认。这对我们的工作是大有利的。工会还办了报纸,后来成了我们党的机关报。苏军不是听你口头讲得如何,而是看你是否把群众发动起来。工会做出了样子,我们在这方面同苏军的关系就打通了。

韩光曾在莫斯科待过,俄文底子还行,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也能同苏军直接对话。后来马列来了,他给韩光当助手,马列曾是延安俄文学校的学生。苏军对以韩光为首的市委是深信不疑的,关系很好,但也有分歧,就是在某些事情做法上的分歧。当时有的人对旅大的情况不了解。说好象把解放战争给忘了,好象不知道党中央的方针、路线,实际上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一点问题没有,就是变个形式罢了。旅大是苏军军管,凡事不经过苏军不行。但有些事情他们不管,如我们党的活动、办工会训练班等,他们是大力支持的。1946年夏内战爆发以后,我们同苏军司令部出现分歧。苏军司令部要对莫斯科负责,莫斯科同国民党的南京政府有外交关系。苏军如明显表态支持中共旅大组织,国民党就会攻击苏联,说苏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共产党反对政府,这对苏联外交很不利,所以他们极力避免这一点。

分歧是从发动群众问题上开始的。日本投降以后，我们要镇压汉奸、反革命，斗地主恶霸。特别是“红房子”那个地方，老百姓自己起来，斗汉奸、狗腿子。对这样的事怎么办？我们不能阻止，得支持群众，要不我们怎么赢得群众？苏军驻连司令部不让。不光镇压汉奸、恶霸，搞土改，分歧就更大了，苏军坚决不同意。因为一搞土改，倾向就明朗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就会说苏军控制下的大连搞土改。这些，当时我们在思想上很难一下子转过弯来。苏军不同意搞土改还有一个原因，说搞土改一定要减产，因为他们搞集体农庄初期往往减产，以后才能增产。我们说不是这样的，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不是减产是增产。他们不相信我们的道理。总而言之，莫斯科没有这个政策，你就别动，动了就要纠。

在支前问题上，只要不公开搞，苏军便不管。我们生产炮弹，苏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了。有一次我们试验炮弹，“嘭”一声响了，炮弹恰好落到一个苏军军官的房子上，一解释也就完事了。在支前问题上发生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自己内部有矛盾。当时，晋察冀鲁都派人来，东北也派，来的很多，没有计划，没有组织，零打碎敲，问题就出来了。苏军就抓我们的辫子，动不动就把韩光找去，要不就把我找去，说你们又搞什么啦？后来李一氓来大连，统一领导这项工作，问题就解决了。伍修权也是为这个来大连的，开始东北局也不大清楚大连这块地方能起多大作用。伍修权通过听汇报及到大连来看，发现潜力是很大的。

关于苏币贴帖盖章的事，不完全是为了对付董彦平，其中也有苏军套用他们在欧洲经验的一面。他们在德国也碰到希特勒发行的票子不值钱的问题。当时他们发的也是军用票，一发发多了，贴帖盖章以后，币值提高了。董彦平来大连也确实带了很多票子，如果投放到市场，对大连也是很不利。对这件事，我们主要是从群众利益来考虑的，怕换不了群众吃亏。还有一个顾虑，就是票子换了以后必然去抢粮食，我们手里没有粮食，怕把市场搞乱，引起抢

购。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苏军的经验比我们多。他们知道工人手里没有多少票子,票子在谁的手里?还是在投机倒把的买卖人手里,说吃亏,只能是这些人吃亏。苏军事先是做了调查的,票子发多少,每月发多少工资,市面流通的有多少,兑换后会有多少,他们心中是有数的,但未对我们讲。刘顺元被叫到旅顺口开会,我们才知道是什么事,对我们是突然袭击。司令说话了,请苏联专家讲话,专家就讲了手里的统计数字及应采取的措施。当时刘顺元是持怀疑态度的,但苏军一定要这么办,不是讨论的问题,是执行的问题。刘顺元当时讲了这么句话,说是剥夺剥夺者吧!这句话是马克思讲的,意指无产阶级专政。苏军司令说,你那么理解就那么理解好了,反正执行就是了。现在看来,我们的经验不在大城市,比较来说苏军这方面有经验。就拿开斗争会这件事来讲,当时争论很厉害。苏军认为,法院院长是你们的,你们可以设市法院,区里也可以设派出机构。汉奸、恶霸可以经过法院公开惩处,要利用法。我们说没有什么法,日本人的法不能用。苏军说,日本人的法不能用,可用解放区的法,搞成文字的东西,走这个形式不就行了吗?

关于苏军搬运机器。对此应该看得更高一些,更远一些。当时德国的工业比苏联先进得多,苏军搬的结果怎样呢?从今天的角度看,是失败的。在旅大,苏军也搬了一些东西,确实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感情。那个时候,苏军不可能制订一个发展当地生产的方针,他们没有这个眼光。搬机器的做法对苏军对我们是两害的,而不是两利。相反,没有搬机器的厂矿,工作做得很好。如中长铁路,工人情绪稳定,生产正常。有的工厂机器一拆,工人就散了。有的工厂工人组织纠察队,不让苏军搬机器而发生冲突。工人组织起来,说你搬机器就是砸我们的饭碗,一顶,也就顶住了。也有的苏军士兵借搬运机器之机,拆机器卖钱,违法乱纪。苏军往本国运机器这件事,不能笼统地说是狭隘民族利己主义或是帝国主义性质。当时苏联虽是战胜国,国内也是很惨的,他们在欧洲就曾往本国搬运机器设

备,到中国东北也照搬了在欧洲的做法,因此造成很大混乱。但不管怎么说,苏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还是给我们很大支持的。林彪当时讲,我们在东北这个地方做战,好象是坐在太师椅上,背靠苏联的西伯利亚,这面是苏联,那面是蒙古,一个兵不用派。所有的力量,可以用到松花江以南。还有旅大这个钉子,也不必顾虑。内战打得最艰苦的时候,林一山与辽南省委及军分区退到普兰店,其机关、电台、机要人员都进入旅大地区。国民党进到这儿就不敢往前进了。关于苏军的纪律,我曾同在医院治病的苏军司令部领导讲过苏军士兵强奸妇女的事。我把统计的数字和材料拿给他看,他说,我相信这些不会假,可这事我一受理,一汇报,必然枪毙。都是些年轻人,仗打完了,是不是要枪毙?枪毙一个就少一个劳动力,这事不能不严格,但战争刚结束就枪毙好不好?他的话说得很诚恳。

关于刘、唐撤退。唐韵超在工人中呼声很高,工人拥护他,但那些财主、跟日本人有关系的都恨他告他,告到苏军司令部。我们那时有个民生公司,办了个合作社,团结了一些人,从外面买了些粮食进来,当时粮食很缺。唐韵超在那里负责,但不是私人搞。苏军不放心,问我,问韩光,但没有直接提出来一定走。苏军对刘顺元不坚决执行莫斯科的方针有些看法。旅大的干部,是陆续从解放区来的,有从山东来的,有从淮南、淮北、苏北、江苏来的。刘顺元是淮南的党委书记,他在旅大有很大的功劳,千方百计搞生产,为战胜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解决粮食,保证城乡居民生活做了许多工作。对苏军的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苏军上下级之间,下级不同意上级意见或提不同意见是不行的。刘顺元就感到,你们也太不尊重中国人了,有点急,不存在犯了什么很大的原则错误。苏军也得这么讲,他们没说你根本不执行苏军的政策,而是说你执行的不利。我们那时很年轻,有时跟苏军有关人员吵得很凶,但吵完也就完了。有一次,我向巴申下属的两个副司令官介绍说工人生活太苦,你们苏联是否拿点粮食,使工人的生活好一些。我们还把老百姓吃的粮食拿

给他们看,这下把他们惹火了。他们说这是“将军”,威胁! 并说大连的工人劳动态度好,能吃苦,能干活,要发扬这个优点,想办法自己克服困难。说着,就把皮靴脱下来,说:“你看,我连双袜子都没有!”他们是打裹脚布的。他们说,不要看我们外面穿的挺好,其实我们很艰苦。1947年冬,刘顺元、唐韵超和陈云涛都撤出大连,此后,同苏军的关系缓和了。

(柳运光时任旅大职工总会副主席、中共旅大地委副书记等职。本文根据王德录、张宏林整理的柳运光1984年4月的谈话录音稿整理)

日本投降后苏军在大连的情况

唐韵超

1945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苏军进驻了大连。当时我正想利用这一时机和其他失掉关系的同志一道开展工作，正好，朱秀春派人让我马上去大连，说大连有许多老同志正在等我。我草草结束了金州三十里堡的事，动身去了大连。

8月23日，我到了大连，先去朱秀春家，他不在，给“治安维持会”当翻译去了。我又去福兴里找张洛书，进屋一看满屋人，张洛书正在开会。我们一起分析了当前形势，研究了下一步如何开展工作。我说，先把群众组织起来，我们不要等着党的指示，先把工作干起来再说。此后，我们分头联络大厂的工人，组织工会。1945年9月2日，我们在原青年会礼堂召开了大连职工总会成立大会。会议推举出15名工会常务委员，我被选为工会委员长。工会成立后继续发展壮大组织，开展了反奸清算斗争，组织工人纠察队保护工厂等，做了不少工作。

这时的苏军在大连闹得很不象样子，奸淫抢盗什么都干，苏军士兵都带着枪，走到哪里谁也不敢拦挡。工人受害后便到工会讲，我就到驻连苏军警备司令部去，找司令高字洛夫反映情况。我对他说，苏军这样不行，中苏友好，苏军这种行为是不友好的！我们工会的解释工作不好做，你得想办法。他问这种事很多吗？我说要数目很难，我是听到反映的。以后苏军在作风纪律方面抓得紧了，大和旅馆（现在的大连宾馆）前就镇压了一个苏军士兵，埋在广场像前花园里。

苏联后来接管一些企业,造船、铁路、油坊,他们需要的就开工。在这些企业里闹劳资纠纷,苏联人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工人来反映情况,去和苏联人谈,他们当面说得挺好,过后不算数。有这样一件事:铁道工厂苏联领导对工人说,厂仓库里有部分劳动保护用品,准备处理给工人。厂工会即与厂苏联领导协商,最后议定以13万元买下仓库的存货。工会凑足了钱交给苏方,把买来的物品打开一看,竟全是过去用过后上交的旧劳动服,工人不干了,要苏方退钱,苏方就是不给。工会去讲理,他不理你。此类事情经常发生,真不好处理。船渠就好些,有个苏军麻子中校,说话算数,通情达理。

日本投降后,大连的大部分工厂没有遭到破坏,只有两个工厂被破坏了。其中破坏最严重的是机械厂,苏军以所谓检查为名,把大连机械厂中西德制造的机器全部拉走。再一个是大陆烟草公司被抢。烟草公司被抢后,我立即通知所有工厂的工会负责人来开会。会上我说,大陆烟草公司被抢,仅是个开头,如果不刹住,抢风恐怕要蔓延。工厂被抢工人若不关心,那就是说我们不想吃饭了,这是打我们的饭碗。工厂的设备完整将来能开工,若被抢劫一空,恢复生产就是空谈。因此,我提议组织护厂队、纠察队,挑选那些出身好、积极勇敢的工人当护厂队、纠察队队员。后来各厂都报来纠察队人数,大厂300多人,小厂也是四五十人,全市共组织了7000多人。柳运光曾说,我从庄河下船一路上看到工厂被破坏很严重。一些机器设备如电滚什么的都被砸得稀巴烂,什么也没有啦!到沈阳也是一样,兵工厂也是破烂不堪的样子。来到大连一看,工厂完完整整的,保护得真好。1945年10月中旬,韩光来到大连。我把以上情况向他汇报了两个小时,问他是不是做错了?请他批评。韩光当即表示:不错!非常正确!

苏军进驻大连初期,大连市的日本人市长还在,有时还发布布告什么的。苏军警备司令高字洛夫打电话叫我去司令部,到了后,

他问我：“老唐，日本的大连市长你说还要不要”？我说：“不乐意要，我们还敢动吗？”高说：“不乐意要，你们得赶他走！”我说：“我们赶他走，你不要干涉！”回来后，我叫秘书长写一个赶走日本市长的文，报送市委审阅后，我和秘书长到市役所找日本市长，结果日本市长不在家，就告知市役所有关人员转告日本市长明天一定在家等着，有事找他。第二天，我们见着了日本市长，并把文给他看了。我问他在大连当了多少年市长？他说3年。我说还没当够吗？他说不是没当够，是苏军叫我在这儿的。我说，这不是苏联的地方，是中国的地方，应该听中国人的意见。他说，你们不同意我就不当。我说，应该不当，你还有什么资格在这儿？日本国家都保不住了，你一个殖民主义者的头头在这里发号施令，不行的！日本市长点头称是，表示市长不当了。我说，你不应当市长了，苏联司令部命令你在这里执行任务，你可以提出辞呈递交警备司令部。但你不能说我们逼你不当市长，而要说自己没有资格当，什么也执行不通，是个遭罪的市长。事后，他写了一个辞呈给苏军警备司令部。日本市长辞职后，韩光即筹备组织民主政府，苏军也参加了，合法地选举了市长。苏军认为，他们是驻军，地方上的事应由中国人组织政权管理。市长是苏联事先选定好的迟子祥。在会上，我作为工会代表推荐陈云涛为副市长。我说，陈先生有能耐干好地方行政，他也有资格，抗日战争在山东做了不少对人民有益的工作，在大连也呆过多年，是大连中华青年会教员，对大连很熟悉。高字洛夫表示：“好！”就通过了。

1945年底，国民党叫嚷要接收大连，并任命沈怡为大连市长。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到普兰店，并通过电台广播说要接收大连。沈怡住在旅馆里接见从大连跑过去的喽啰，询问了大连的情况。当时苏军告诉国民党，沈怡来大连只准带2000名警察，多了不行。沈怡听了汇报，知道大连市政府已经成立，大连市公安局组织了1万多人的警察队伍，还有7000多人的纠察队，一看不行，带

2000人去是白给啊！于是从普兰店走了，再无音信。当时国民党要接收大连这件事震动很大，在我们党内也引起波动，个别思想不坚定的党员还有吓跑的。为此，市委召开了会议，做了具体安排，把大连县划出去，缩小大连市区的范围，因为苏军和国民党有协定，只准接收大连市。同时，对市委机关的搬迁也做了安排。1947年上半年，国民党要派员视察旅大，当时传说大连人饿得吃树叶子，上吊自杀很多，苏军说可以来看看，国民党派了中将董彦平从海上坐船到旅顺口。董彦平来后，旅顺苏军警备司令部召开欢迎会，请大连干部作陪，迟子祥讲了话。

1947年春，苏联远东军区有位元帅到旅大视察，我冒冒失失地在会上讲了话，引起苏联的不满。我受处分时，高岗给我写了一条：反苏。那不是反苏，我是希望苏营企业负责人说话要算数，别说了不算，影响很坏。我会上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当时咱不懂得对上级领导要毕恭毕敬才行，对元帅有不同意见是不行的。吃这个亏的不少啊！陈瑞光到苏联去，回国前征求他对苏联的看法，这位老兄就说了几句，结果苏联就把他赶回来了，陈瑞光受斥责好窝囊哟！我也是如此。我并不是反对苏联，而是要求苏营工厂对工人讲的事要兑现，别说了不实现，使工人闹情绪不好，对生产没有什么好处，这就不行了，苏联元帅火了！把韩光领走了，会也散了，我就回来了。所谓“反苏”，主要毛病就在这一次。1947年11月，苏军把我和刘顺元等5人赶出大连。先走的有我和刘顺元。刘顺元到通化住下了，我到哈尔滨，筹备第六届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的工作。

（唐韵超 1945年9月当选为大连市职工总会委员长，1946年为地委常委。本文根据其1980年10月谈话录音摘要整理）

解放战争初期的大连公安工作

赵 杰 王 华

受命进大连

1945年8月15日,八路军总部电令:各战区抗日部队,向尚未投降的日本侵略军通牒,限期投降。如敌伪拒绝缴械,即坚决予以消灭。遵照命令,我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三分区,即率主力四团、二十三团和独立团攻克了日照县城之后,正在围攻坡尔(码头)伪军据点。

9月15日,山东军区电令:调我(滨海三分区司令员)随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去东北工作。9月21日在滨海军区驻地——诸城,由肖华同志主持召开同去东北的干部会议,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对抗战胜利后时局的分析和方针,以及军区的决定。9月29日,肖华同志率队,我和爱人王华以及同去东北的其他同志,换上了便服,把武器藏在船舱底下,带着干粮、药品等,从蓬莱县栾家口分别乘两只船,在庄河县登陆,经安东(今丹东)到本溪待命。

十几天后,肖华同志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决定,在通化发出通知,要我和王华同志到大连工作,并派人送来一封信,要我交给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至于具体工作问题,与韩光同志联系。

东北局在给肖华的指示中,首先强调了旅大地区的战略地位,不管将来形势怎样恶劣,我们也要凭借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订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把大连控制在我们手里。

其次,在旅大地区工作,要服从苏联政府对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政策。

第三,到大连要和苏军沟通关系,但对外一律不暴露身份,要改名字。

第四,从地区的特点出发,积极地建党、建军,以建警的名义出现,建立军队。

第五,“搭架子”。把架子搭起来,就是抢形势。把市委、公安局迅速搞起来。

第六,要把大连建设成为支援解放区财力、人力、物力的革命根据地。

根据这些指示精神,10月19日,我和王华同志,还有1名医生、4名警卫员,由本溪起程,到普兰店后见到了辽南党委书记林一山和中央派到东北搞财政工作的周纯轮同志。他们给我们介绍了大连和旅顺的一些有关情况,使我们对旅大地区的大概情形有了间接的了解和思想上的准备。

10月下旬,我们到大连,在“台湾银行”(今斯大林路2号)见到韩光同志。

翌日下午,韩光同志和我去见苏军高字洛夫中将。韩光同志介绍说:“这是我党派来的警察总局长赵杰同志。”并把我的简历作了简短介绍。高字洛夫也说不要公开暴露身份。经协商,把我的名字改为赵东斌。谈话时,我们在延安就相识的刘亚楼同志也在座(佩戴苏军少校军衔),他把由高字洛夫签字的苏军大连警备司令部对大连市警察总局长的委任状交给了我。高字洛夫和我握了握手说:“现在赶快把警察搞好,维持秩序。”刘亚楼同志对我说:“老兄啊,注意,把枪杆子掌握住啊。”回去后,韩光同志和我还有陈云涛等在“台湾银行”开会,首先由韩光同志传达东北局书记彭真同志对大连工作的指示:要求抢形势,搭架子,要维护苏联的外交政策,要积极把党、政、军搞起来,把工会也搞起来。

第二个问题是确定我们的机关设在哪里。经研究决定,总局和市委的机关均设在斯大林广场3号(今大连市公安局)。总局在二

楼南头,市委在二楼北头,警卫人员在一楼,一般工作人员在三楼。

第三个问题,研究各个县、区警察署的人员情况。那时的政治情况很复杂,有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拉起的队伍,还有群众自发组织的队伍,也有敌伪残余分子拉起的队伍。在我们还没有到大连之前,苏军依靠地方治安维持会已组织了警察署,有将近 2000 人的治安队、保安队。

第四个问题,研究抓紧向总局调派干部,以便为开展工作打好基础。

第五个问题,研究确定建立武装,一旦形势发生突变,就依靠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掌握的甘井子警察局为主力部队,并决定总局建立第一警察大队和直辖大队,加强装备,作为机动部队。以后各个分局都建立了中队,他们都是总局的主力部队。不打仗即搞地方治安,打起仗来,就调动参战。方针是先把旅顺、甘井子、沙河口、西岗的警察组织好。对于治安队、保安队中的骨干,好的尽量争取,坏的坚决拿掉。我们派去的干部都先安排副职,一步一步地、一个局一个局地搞好接管。

创建公安总局

大连地区公安领导干部的来源,一是从延安派来的;二是由冀鲁解放区派来的,尤其山东来的多;三是从新四军来的;四是往返各地路过大连的干部,被留下来的。这些干部大多是从东北局、辽东军区派到大连,再由市委派到公安局的。

总局的军事指挥和领导干部的任免统归辽东军区管理。当时肖华同志是司令员兼政委。干部任免权限,营以上干部,县、区、局级以上干部,都是辽东军区决定和任命。连以下和县、区级以下的干部,由总局任免。动员兵员,补充主力,支援前线物资,都由辽东军区支配,作战指挥也属辽东军区。我们公安机关当时就是辽东军区的建制。

党的领导关系归属大连市委,韩光书记兼总局训练处长,对内

即是我们部队的政治委员，也就是特区军分区政治委员。辽东军区对公安局的指示，都要经过市委研究。韩光同志对我们的工作是很支持的，抓警察、建武装、搞枪支弹药、扩军、补充主力、支援前线等，他最积极。他对警察队伍建设很重视，不管是哪里派来的干部，他总是先分配给公安局，然后才调给其他单位。

在行政机构上，我们属于市政府一个局，但是我们和政府还有着一定独立性，

市政府的决定是对的，我们就执行；不对的我们就抵制，不能跟着跑，因为迟子祥是市长，他曾是日伪统治时期的大资本家。

当时大连的情况非常复杂。苏联虽然军管，驻有红军，但国民党和敌伪残余分子都具有一定势力，还有国民党特务，日本侨民也相当多，日本占领40年，殖民统治的痕迹到处可见。我们初到大城市，有许多事情要从头做起，面临着许多困难，只能凭着共产党员的拼劲干劲去解决，既要和苏军搞好关系，又要和地方搞好关系。国民党大连市党部曾公开地挂着牌子。虽然被苏军取缔，但他们转入地下，仍然进行破坏活动。苏联根据和国民党政府订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大连地区既不准共产党军队进入，也不准国民党军队进入。所以，我们虽然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解放区，但是也不能公开。

公安局正式建立的时间是1945年11月7日，地点仍然在现在大连市公安局的所在地。市政府成立时，我去见迟子祥，陈白潜（即陈云涛）也在场，还有一段斗争的故事。迟子祥开始还不想承认我们。他问我是从哪儿来的，我掏出苏军警备司令高字洛夫中将的委任状，比他的高了一头，他的委任状是苏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巴申发的，他自讨一场难堪。

同年11月中旬，成立了大连公安总局党总支，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当时党员只有七八个人。那时韩光同志就住在公安局楼内。韩光同志任书记，王华同志任副书记，总

支没有委员。

机构设置,从公安总局到县、区局,对内基本上都是按八路军的组织形式搞起来的。开始时,总局机关下设秘书室、训练处(内部叫政治部)、保安科(内部叫作战科)、总务科(内部叫后勤部),侦察科、情报科、狱政科设在社会部,也是总局的职能部门,还有第一警察大队和直辖大队,以后又组织了手枪队。周光同志是1946年四五月份来大连的。他先任训练处主任、第二处长,对外是副局长,实际上是政委,管党的工作。因韩光同志是兼政委。

党委是1946年1月成立的,党委书记是宋光。宋光是1月1日到大连的。

成立党委也没有委员,就像红军时期那样,也不选举,由上级党委指定书记。

各个县(市)区公安局和消防局,从1945年10月到12月都基本上被我们接管过来并正式建立起来。至1946年2月以前,又成立了大连县公安局和水上公安局,以后改为港务公安局。

总局当时的体制是比省军区小一点,比分区大一点。各个区、县公安局行使团的权力,中心派出所是连级或排级。当时派到区、县公安局的领导干部,有的是团职干部,有的是老红军。

编制原则是按着八路军的体制,基本上分三大部: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总局的总务处就是后勤部。因为当时的公安局不仅搞治安,还要随时准备打仗。总局的局长开始只有我一个人,不久,于会川同志来任副局长兼社会部长,后来周光、胡忠海等同志先后任副局长。1946年12月,我被调到前线(王华同志1947年7月离开大连),边章五同志来接任总局长,时间不长他也调走了,由周光同志继任总局长。

我们为了准备打仗,把公安总局的几个大队作为机动力量,当时有500人,手枪队还有将近200人,装备很好,有的人是双挂枪。每个区、县公安局还有3个至4个中队,按军队建制配备武装,形

势一旦紧张,就准备死守,到了打仗的时候,一个区、县公安局就是一个团,不打仗时,把队伍扩充起来,准备支援前线。

同苏军当局的关系

苏军对我们组建公安局是大力支持的。我们未到大连之前,苏军维护地方治安,完全靠军队是不行的。他们通过维持会,在大广场、西岗、沙河口、甘井子、寺儿沟、旅顺、金州搞了将近 2000 多人的治安队。

苏军大连警备司令部司令官高字洛夫对我们是很好的。警备司令部 政治部主任巴申,是我们最好的支持者,我们搞武器弹药都经过他。他为什么这么支持呢?据说他一家三代都研究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支援前线的物资他是大力支援的。有一次,我们到大连港用船往前方运枪支弹药,就是通过巴申运走的。那时是斯大林时代,苏联同我们关系是比较友好的。

我们到大连,刚进到金州石河驿岗卡时,苏联士兵听说我们是毛泽东派来的人,他们高兴极了,向我们要毛主席像章我们没有,只好把东北局的介绍信拿出来给他们看。我们经过韩光同志介绍,见到高字洛夫等人时,他们非常高兴,对我们个人的历史也都很感兴趣,如干过什么工作,什么时候参加红军,什么时候入党等等。

当时,苏军当局对我们的要求是:第一,不要搞公开斗争,不搞游行示威,不要公审犯人。第二,不要公开暴露身份。第三,到解放区去,凡通过苏联岗卡要有手续。这些问题我们都作了让步。对于不涉及苏联外交政策方面的事他不管。至于我们搞多少警察,他不作硬性限制。有一次,高字洛夫问我,世界上没有见过哪个国家在一个地区搞这么多警察,你怎么搞 1 万多人?我说,我们又是警察又是军队,是为了配合你们保卫“旅大金”。

当初,苏联军队纪律很坏,苏军政治部向斯大林反映,斯大林下命令,制裁了一些人,以后的纪律不错。他们整顿纪律时,还专门征求我们对每个司令官的意见。高字洛夫曾有命令,在各个区、县

都设有一名司令官,帮助维持地方治安,支持公安局的工作。大连解放初期,甘井子、沙河口和西岗区苏军副司令官就是我们中国人,是东北抗联周保中那个国际旅的人,但是他们佩戴的是苏联军衔。如沙河口的董崇彬是中尉,甘井子的刘玉泉、西岗的季喜林是少尉。

他们虽然是苏联军官,但是听我们指挥。这几个分局就是通过他们接管的。东北局和辽东军区对我们的指示,以及我们对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执行时不经过苏军警备司令部许可是不行的,他们是旅大地区的占领军,处于军管地位。我们对上级的指示和地方的决定经过市委研究以后,有时我和韩光同志同去,有时我一个人去与高字洛夫商量。有时他们还以占领军的身份对我们作指示。我们对苏联人采取的态度是:对的,我们执行;不对的,我们就不执行。有些事,他不像我们抓得那么严,他布置完了也不检查,这就给我们提供了缓冲条件。总之,在与他们相处当中,我们发现有些苏联军官存在大国沙文主义。另外,他们军队的纪律不如我们军队,尽管经过纪律整顿好了一些,但毕竟还有差距。

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

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大连,建设大连,巩固我们的政权,在苏军配合下,使之发展壮大。

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打击少数,争取多数。对敌斗争的主要矛头是对国民党及其地下军,我们连续破获了几批反动组织。

有一件大案。是在1946年1月,我们抄了国民党市党部,先后捕获200多人,其中市党部书记等重要人物就有十几个人,缴获了一些反动传单、文件,还有市党部下属组织和地下军名单。

我们抄了市党部,对国民党的震动很大。为此,国民党邵力子给周恩来同志拍了一封电报,原文是:“获悉大连公安局局长赵东斌,抄了我党市党部,捉了党部书记,请贵党查予释放”。那时候,我们的政策是杀的不多,凡是被杀的人(如潘澄宇、“温痞子”、隋云

封)都是很坏的。

还有一件比较大的事情,曾引起了一场大风波,把苏军在旅顺的元帅都惊动了。那是在1946年四五月间,中山区公安分局没有经过总局的批准就召开公审罪犯的群众大会。苏军说大连发生暴动了。苏军军队和坦克都出来了。苏军当局要把中山分局局长撤职,并押10年班房,还批评我这个总局长没有当好。经刘亚楼同志帮助我们讲话,说明情况后,高字洛夫才免去了要给分局局长的处分。

当时,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公安人员设有两种:一种是身着警服的公开警察,还有一种是“便衣”,即侦察人员。除此,还依靠群众力量,一是工会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协助公安局搞治安;二是建立各种地方群众组织,工会、妇女会、青年会、居民组等,组织群众做安全防范工作,参加维护治安、维持秩序。戒严时,每晚6点,各县、区局都要向总局报告一次当天的社会情况。各派出所设有观察哨,观察每天的动向。除此以外,还有公开和秘密的巡逻。为什么这样?因为那时大连很紧张,暗杀团搞暗杀,要暴动,国民党要来接收,强大的风浪此起彼伏,因此,必须提高警惕,严加防范。

当时在对敌斗争上,我们是做了两手准备的。一手是服从苏联的外交政策,不公开身份,踏踏实实地把政权、警察、工厂都控制在我们手里;第二手是准备打仗,一旦苏军把大连交给国民党,他们的军队或警察来接收,我们就集中力量消灭他们。我们如果在大连地区站不住,我们就在金州、旅顺、甘井子、岭前建立根据地,和他们作斗争,必要时坐镇金县,背靠普兰店。岭前和甘井子群众基础都比较好,甘井子工人集中,岭前一带地形好,我们可以在这里(包括长山岛)打游击,转移到农村去,这样就可以和安东军分区接起来。这些准备都是东北局和辽东军区决策的。当时的决心是不管怎样,就是要用一切手段,稳固地控制旅大这块战略要地,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旅大,一定要发动群众,组织工人,指挥警察,同敌人

作斗争。那时东北局势很紧张,能够保存住旅大,就可以用旅大这块基地支援解放战争。

为了加强对敌的隐蔽斗争,大连市委建立了社会部。它既是市委的一个部门,又归中央、东北社会部领导,象周大鹏就是中央社会部直接派来、住在庄河的。大连社会部部长于会川同志是东北局派来的。社会部的任务是搞锄奸,侦察特务案件,对外搞情报。

创建初期的公安建设

建立警察总局,首先抓的就是改编治安队,接管区、县公安局。上级派来干部,我们就陆续派下去,先是担任副职。我们调派的干部一般都要经过“三关”:第一关是我们内部决定,派去担任什么职务;第二关是和苏军各级警备司令官打招呼,以便搞好关系;最后一关是大连市政府。我们的干部多以冯玉祥、于学忠、东北军或西北军部属的军官面目出现。我和迟子祥讲,我就是于学忠部下的少将旅长——赵东斌。不了解历史情况,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因为这个被打成了反革命,我的一个警卫员因此差一点被整死。

改编治安队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逐渐进行,改编一个区,就巩固好一个区。当时是以甘井子、沙河口、西岗为主力。甘井子警察局的领导权已在我们地下党同志的手中。沙河口、西岗警察署由该区的苏军副司令官董崇彬、季喜林同志掌握,可以直接接管。旅顺警察局已经由郭壮等同志接管。第二个原则是先易后难,能争取的尽量争取,集中力量把坏头头搞掉。大广场和金州治安队的头目最为反动。潘澄宇是恶霸工头;邓德山是伪军官。他们骗取了苏军保卫部门的信任,阳奉阴违,抗拒改编。邓德山是金州苏军警备司令部配合王善兴等同志逮捕的。潘澄宇是苏军配合总局捉的。我们捉了潘澄宇,苏军保卫部门要捉我,把我和韩光找去,质问我们为什么不打招呼就捉人(潘澄宇用金钱美女收买,可能为苏军保卫部门做情报工作),当场要捉我,韩光同志坚定地说:岂有此理!你们不让捉汉奸,还要捉我们总局长。这才弄住他们。后来那

个苏联人到我家赔礼道歉。我们改造的原则是按照党的政策，认真地去争取可以争取的人，对坏蛋坚决处置，最坏的汉奸而又顽固不化的就杀掉他。如总局警察大队的公培堂被改编后，又逃到沈阳，回来搞暗杀，第一个要杀我，第二个杀宋光，第三个是韩光。暗杀还有奖金，我是6万，象王华他们这样的中层干部是3万。逮捕公培堂时还缴获1支“派克笔”手枪。只要愿意接受改造的，我们还是进行教育尽量争取。第三个原则是为了改造警察的成份，我们还通过唐韵超同志，尽量动员产业工人参加警察，扩充新的成份。第四个原则是从更新过的队伍中发展党员。就这样逐渐改编了治安队，建立了人民警察。

到1945年12月，接管改编工作基本结束。各个区、县公安局的领导干部和中队长一级干部都是我们派去的，中队以下的干部都是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他们是新发展的党员。

党员教育，开始由组织科长王华同志负责。我们对党员教育时公开说明我们是共产党八路军，但是对外仍不公开，而公安人员一般都知道我们是八路军共产党。

1947年以前，举办了3期党员训练班，教材都是宋光同志参照过去八路军对战士教育的材料编写的。那时党员训练班授课的人，主要是我、宋光、周光、王华、池精武。

基层党的组织，各县(市)区和总局各部门都建立了分总支或支部，发展组织，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从总的情况看，党员队伍、警察队伍基本上是纯洁的，政治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他们的成份绝大部分是工人、城市贫民。

那时候大家心齐，有任务大家就干。纪律教育抓得也紧，纪律比较严，发扬老八路作风。

1946年9月，我们创办了《人民警察》报，实际上就是机关党报，它出刊比较频，交流工作情况，讲形势，进行政策、纪律教育，宣扬好人好事。它的创刊是市委同意的。它在内部起到了政治、业务

教课书的作用。《人民警察》报在警察中威信是比较高的。

对警察的训练,当时完全是按照人民军队的训练要求,从基本动作到实战演习,每周训练两次。为了准备打仗,我们一方面按军队要求,训练和建设警察队伍,另一方面是组织学习公安业务,即治安、户口、交通管理、刑侦破案等。我们收集了中外警察守则、警察条例、治安管理办法,有苏联的、国民党的、德国的、日本的、英国的,但主要是学习苏联的。中外警察中凡是我們有用的东西,我们都研究参考。

治安管理、清查登记户口、指挥交通等我们都搞了。那时候比如哪家来人了,每天都有报告,旅馆都有专人负责,大商店、公共场所都有警察,都有一套从上到下的管理报告制度。这也是一项业务建设。

业务建设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一定要搞好社会治安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当时除了打击国民党特务破坏以外,苏军在社会上违犯纪律的,我们警察也得配合苏军警备司令部去管。

警察队伍建设。我们是人民警察,它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保护群众利益。虽然当时没有公开暴露我们就是共产党,但是共产党的主张我们是都宣传了。实质上我们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警察,也可以说是不穿八路军服装的八路军。人民警察有严明的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建立警察学校,培养干部。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罗荣恒同志于1946年2月15日去莫斯科治病路过大连,我去看他时,他说,你们在大连,一个是把警察队伍搞起来,这个武装一定要掌握在我们党的绝对领导下,把队伍建设好。我们表面上是“国民警察”,但是实质上是人民警察。第二个,你们要培养警察干部迎接全国解放。他说全国解放后,各大城市要有多少警察呀。我们党领导下的城市搞警察,大连是第一个。他强调要好好总结经验,待全国解放后要从你们这里调警察。他说你们还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

是要培养交通警察干部。

我们建立警察学校,实际上就是根据罗元帅的指示搞起来的。

为了培养干部,增强素质,我们曾办了几期党政、业务训练班。后来觉得零星办训练班解决不了整个警察队伍的训练问题,大约从1946年6月底,我们就准备筹建警察学校。为此向辽东军区提请报告,经批准,8月开始筹备,月底筹建完毕,9月初正式开学,校址在西岗区保健街42号。办学宗旨是培养干部,增强政治、军事、业务素质,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后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准备在大连开办坦克学校,因客观条件限制,没有办成而开办了“汽车学校”,实际上还培养驾驶、修理坦克的技术人员。为了保密,对外称旅大警察学校第四大队。

警察学校培养了很多干部。据我了解,全国解放后,几乎全国都有当时大连的公安干部。还有一部分公安干部调到部队,到军区去了,有的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

保证供给,支援前线

组织生产,发展生产,扩军支前,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重要任务和工作方面。我们的生产由当时总局的总务科(后改总务处)负责。这个总务科的权限比较大,既办商店、公司,还办工厂,象被服厂、皮革厂等。我们的总务科首先是保证警察给养的供应。当时实行的是类同八路军的供给制。警察、干部都没有工资,伙食分大、中、小灶,按规定发警服和棉被。

为了渡过国民党对旅大地区实行经济封锁的难关,总局发动各县、区公安局组织开展农副业生产,开荒种粮、种菜,经营果园,饲养牛、猪,争取粮菜自给。我们实行供给制,基本上是靠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不仅如此,还要节衣缩食,把节余部分支助本地党政部门和支援辽东军区。就连我们接管的博爱医院,不仅为我们警察医疗,还要接收治疗辽东前线下来的伤员。供给辽东军区的物资,

有武器弹药,有被服、医药、电讯器材等不计其数。除了支援辽东军区外,其他解放区也来求援物资,象华东新四军、山东军区也来搞药品、武器等。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肖劲光同志,1946年曾亲自来大连征集支前物资。我们根据市委意见竭尽全力地给予了支援。

我们支援前线,除了物资,在人力上也做了大力支援。除零散派往前线的人员以外,仅1947年5月前,大批扩军支援前线就有三批,共计1.5万多人。可以说,旅大公安机关在支前工作上付出了很大努力,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必须澄清的问题

我们大连地区的警察,为什么当时要戴国民党的帽徽,要穿戴类同国民党的警察服和警衔呢?这个问题很有必要把它交待清楚。

据说原在大连做过公安工作的好多人的档案里,还有这类材料,有的还没有落实政策。这个问题,现在应当澄清。当时要穿戴这一套东西,是苏军大连警备司令官高字洛夫提出来的。高字洛夫说:你们警察这样多,没有标志对内对外都不好打交道,也不方便联系。经大连市委研究确定,东北局批准实行警衔制,分警监、警正、警佐、警长、警士。警察按级佩带警衔,最高警衔是我——少将。戴警衔的时间记得是1946年5月。那么为什么在警衔、警服形式上要取国民党的呢?从历史上讲,一是用这种公开形式,表明地方自治,顺乎国民党政府,不暴露共产党的身份;二是按照苏联同国民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大连地区行政权属中华民国,不允许苏军以外的军队存在,但是可以有警察。所以,我们这样做,类似于国民党警察,不影响苏联的外交活动;三是我们戴警衔,表现得正规。不仅同老百姓有区别,也方便了对外工作,解决了同苏联人办事难的问题。象我戴上个少将警衔,苏军校官见到我就敬礼。到他们那里去,不但给我敬礼,还热情接待。这里要强调的是,当时主要是为了工作才这样做的。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误会

了,错误地认为穿戴了这样的警服、警衔就是国民党。这是不懂历史。要把历史搞清楚。那是我们利用国民党政府和苏联订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来对付国民党的办法,要知道,那时我们还不是执政党,执政的是国民党。

(此稿根据赵杰、王华 1983 年 5 月 20 日、21 日在军委装甲兵机关善后工作小组办公室与大连市公安局公安史编辑室人员两次谈话记录整理,并经本人审阅。)

处理与苏军当局关系的几个原则

王其人

1945年4月至6月,我作为山东代表出席了党的七大。会后不久,日本即宣告无条件投降。8月23日,中共中央抽调部分山东的七大代表和干部、学员组成山东大队赴山东工作。途中,中央电令山东大队即刻改为东北大队,转赴东北开辟工作。11月18日,我们到达沈阳。在沈阳停留的几天,正好大连市委派秘书长王西萍到东北局要干部。经东北局同意,我和东北大队中的30多名同志分到大连工作。

1945年12月初,中共大连市委决定,调我到旅顺市主持市委工作。赴任前,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找我谈话。他指出,苏联政府是根据《雅尔塔协定》派红军进驻旅顺的。1945年8月,国民党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规定旅顺军港租给苏联,旅顺是苏军军事管制区域。苏军最高司令部驻在旅顺。苏军是旅顺领导大连,我们是大连领导旅顺,遇到问题时,你得跑来找我。你在旅顺工作,一定要注意那里是苏军军管的特殊环境和条件,在防务和外交方面,现在是由苏方负责的。市委和市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发展中苏友好关系,巩固这块军事基地,在这个大前提下去开辟各项工作。在实际工作中,要主动地与苏军领导机关加强联系,尊重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在那里工作,凡是苏军当局同意的事就做;反之,就暂缓进行或继续进行磋商,主动地与苏军搞好关系。韩光说,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问题呢?因为这样对我们有利。苏军进驻旅顺是受国际条约制约的,并承担国际义务。目前,

他们和国民党政府建有外交关系，不要因为我们工作上出了问题，让美国和国民党反动派抓住把柄，攻击苏军支持中共，使苏方处于不利的地位。只要我们认清所处的环境和特点，照顾苏军在国际上的影响，就会更有利于我们在那里站住脚，放手发动群众，开辟各项工作，巩固政权。最后，韩光强调：就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小局要服从大局。

我到旅顺后，当时市委还未公开，处在秘密活动状态，但我以中共旅顺市委书记的身份，拜访了苏军驻旅顺警备司令部。司令官斯米尔诺夫亲自接待并和我谈了话。当时负责与市委联系工作的一位少校（此人会讲汉语，学过中国历史，是个中国通，对我很友好）也在场。斯米尔诺夫首先表示欢迎我到旅顺来工作（事前韩光已通知苏军我来旅顺工作），并说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希望今后多加联系，互通情况，共同把工作做好。他还诚恳地说，今后你有事可直接找我，如门卫盘问时，你就告诉他们是市委来的，他们就会让你进来。他指出，今天旅顺市人民有了自己的政府，在工作中应多注意发挥政权的作用。过去在没成立政府的情况下，这么斗、那么斗还可以，现在应充分发挥政权的威力。

司令官在和我谈话中，还进一步提到苏联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说，因此我们的关系，不是苏联共产党和你们中国共产党订的条约，而是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订的条约。你们要善于利用这个条约中有利的条件，做好工作，不能让美国人、国民党政府抓住把柄，抓住辫子，攻击我们，在外交上能让我们过得去，那一切就好办了。

通过与苏军司令官的谈话，感到他非常诚恳、热情，就象老朋友在一起，促膝谈心一样，很自然、融洽。这对我做好工作，处理好与苏军方面的关系，是大有裨益的。

一年多来，我在与苏军相处的过程中，既有友好合作的一面，这是主流；也有对某些问题因看法不同以及工作方式方法上的分

歧,发生过一些争执,但这是非本质的支流问题。通过实践,经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逐步掌握了在特殊环境中做好工作,完成党的任务的原则和策略。

一、既要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要取得苏军的赞同和支持,将二者协调起来,保证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1946年,为了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要求,东北局和大连市委曾多次给旅顺下达扩军的任务,我们考虑在苏军军事管制区域公开扩军,势必给国民党政府以攻击苏军支持中共的口实。当时扩军已成为一个政治上很敏感的问题。为了既能完成党的任务,又不使苏军处于被动地位,取得苏军的赞助,我们以维护地方治安和加强交通管理,需要扩充一支警察队伍的名义,把这个棘手的政治问题变成纯属于地方内政的事务,使反动派无隙可乘。自1945年11月末至1946年10月初,组建地方武装警察达820人,其中战士600多人,送到前线参战的270多人。有一次苏军军官问我:“你们这里有没有解放军?”我说:“没有。”他笑着说:“武装警察不是也起到了解放军的作用嘛!”

二、群众运动是在苏军控制下的军管区内,由我党直接领导下的这块特殊解放区内进行的,必须讲求和运用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方法,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否则会影响与苏军的关系,不利于工作的顺利进行

1946年初,市委为贯彻执行党的七大路线和东北局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反奸清算斗争。最初斗争的形式和方法基本上是照搬解放区的做法,群众发动起来后,出现一些过火现象。苏军方面向我提出,坚决反对召开群众斗争大会。我们没有认真研究苏军不同意的理由,以为苏军不让我们搞群众运动,是干涉我们的内政。我曾向苏军司令官说,蒋介石不让我们老百姓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你们苏军也不让老百姓开会。他作了解释,但我们一时还听不进去,仍坚持老做法,不让在城市斗就到农村去斗,白天不让斗就

在晚间斗。苏军一旦发现我们开斗争会，即向我们提出抗议。

鉴于这种情况，市委多次与苏军司令部交换意见，认识到苏军不是反对我们开展诉苦清算斗争，而是不同意我们公开开斗争大会的做法。他们说，如果这样的斗争大会被美国或蒋介石的特工人员拍了照片去，他们就会利用这些资料攻击苏联将旅大地区交给了中共，那时苏联在外交上将处于难堪的地位。我们理解了苏军的意见，改变了斗争方式方法。注重运用政权的力量，打击敌伪反动势力和地主阶级。采用组织法庭的形式，由原告控诉被告欺压、剥削群众的罪恶行径。大包工头子张积山就是被采取上述做法打倒的，法庭判决并没收了他非法剥削得来的财产。这样做既满足了群众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要求，又取得了苏军的认可。以后各区、村召开公审会时，有时通知苏军，他们很高兴地派员来旁听公审会，消除了误解，增强了中苏友好关系，推动了斗争的深入开展。

三、在支前工作中，既要完成任务，又要使苏军能谅解，充分发挥旅顺这一特殊的、隐蔽的后方基地的作用

苏军当局对我们通过何种形式和方法完成支前任务，是很注意的。旅顺当时经济很落后，支前所需的枪支弹药，唯一出路是从接收日本军用物资中解决。这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处理不好，会被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抓住借口，攻击苏联违反国际条约。因此，苏军对我们支前工作，采取了既不公开赞成，又不公开反对的态度。用他们形象化的语言说，“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你知道我知道就行了”。但他们反对并制止大张旗鼓地公开地往解放区运送枪支弹药。当时从山东解放区来旅顺搞枪支弹药的人，初期很少甚至不考虑苏军的处境和国际上的影响，公开地成批地向解放区运送枪支弹药、被服、医疗器械及药品等。对此，苏军甚为不满，曾严加检查和控制，如发现往外地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即行扣留。为此，我去见苏军司令官，他坦率地说，这些事情你们要做得聪明一点，不要让美国和蒋介石抓住口实就可以了。从这以后向解放区

运支前物资时,均包好放在船舱底层,上边用其它东西伪装盖好。但有时也被苏军检查出来,他们表面上很严厉,佯作禁运之态,经过说明情况,还是让我们运走了。此外,苏军对外运物资加强检查控制,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为了防止物资外流到国民党统治区。

有这样一个情况,苏军每隔一段时间,就在山沟里销毁部分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武器。当时,我很不理解苏军的做法,为什么不给我们支援前方呢?有一次,我向苏军领导人提及此事,他说,销毁的都是破烂货,也是为了加强对外宣传,表明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这是外交斗争的需要。蒋介石大肆宣传,说我们把许多武器就地给了中国共产党,我们这样做就是为了批驳他们的。这时,我才明白了苏军的真实意图。

有一种说法,运给解放区的物资,是我们用酒向看仓库的苏军战士暗中交换的,或者用酒灌醉了士兵,尔后拿走的。这显然是误解或一种歪曲。苏军本着国际主义精神,采取友好态度和适当方式,支援我们或通过互相交换的办法,帮助我们解决解放区缺乏物资的困难,这只能说明我们当时双方合作得很成功。

四、党的宣传工作的开展,一定要从旅顺的特殊情况出发,把宣传党的路线与实行中苏友好政策,巩固和发展中苏友好关系紧密地结合起来

苏军在其军事管制区内,对报纸等宣传形式及其内容严格检查,特别是涉及到国际关系及国民党政府等方面问题,要求我们一定要照顾到苏方的外交政策。以当时实际上是市委机关报《民众报》为例,苏军司令部对这份报纸很重视,由其司令部总政治部派几名新闻检查官专门进行检查。每日出版的报纸都需提前一天打出报样,送交他们检查,凡不同意发表的文稿,即撤换下来,换上新稿,经过他们看过,方可发表。从解放区来的干部,对蒋介石反人民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对新华社发表谴责和揭露国民党反革命阴谋的社论、文章,总想在报纸上一字不漏地发表出去。有时未按苏

军检查过的报样印发,被他们发现后,责令我们立即收回销毁。1946年秋,苏军政治部主任约我谈话,指责《民众报》不听其新闻检查官的意见,并说我们的同志幼稚,不懂策略。当时,我对他们的做法非常不理解,有次我气愤地对他们说,在重庆出版报纸,要经国民党检查,在这里得经过你们检查,再这样我们就要停刊不办了。后来逐渐认识到苏军所以加强对报纸的控制和检查,其目的是怕我们给其造成不利影响,在外交上带来麻烦。

为了不给美、蒋以借口,照顾到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在报纸的各方面宣传报道中,我们十分注意灵活性和策略性,在宣传口径和报道方式上,严格掌握分寸界限。在电稿的处理上,对其中有些可资利用的方面,我们采用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或中央社的电讯稿,主要是刊登新华社的电稿,但将电稿中“蒋介石”、“国民党”字样改为“国民党反动派”。对新华社发表的揭露蒋介石反革命阴谋的社论或文章,我们就印发单页或出小册子,散发到群众中去而不见诸于《民众报》,同样收到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效果。在办报问题上,由于我们注意了灵活性和策略性,再没有发生大的争执。

在召开庆祝“双十节”大会时,就要不要挂毛主席像的问题上,曾和苏军发生争执。他们主张在公开场合只能挂孙中山的像,我们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但在苏联十月革命节时,旅顺中学抬着毛主席像进入会场,苏军说服我们抬回去。学校领导人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准挂毛主席像?苏军解释说,毛泽东在苏联人民中间有崇高的威信,但在这里按照国际条约的规定,除了苏联驻军外,国共两党都不能有公开的地位。你们在这里挂了毛泽东的像,国民党也会提出挂蒋介石的像,到那时问题反而不好处理了。你们不会同意挂蒋介石的像,我们如果同意挂毛泽东像而不同意挂蒋介石像,这也不好办。你们应当理解:不挂毛泽东像是形式,事实上合法的是中国共产党,不合法的是国民党。他们还说,中国有个成语叫“此地无银三

百两”，事实上这里有银子，有共产党。这时，我们的思想完全通了，接受了苏军的意见。

五、在处理与苏军的关系问题上，市委始终坚持在维护中苏友好大局的前提下，从有利于开展工作出发，坚持原则进行斗争也是必要的

回顾我在旅顺与苏军相处的一年多时间，有团结合作很好，顺利完成党的任务的一面（这是主要方面），也有发生争执不愉快的一面（这是次要方面）。发生争执的原因，有我们对苏军所处的特定历史地位和所承担的义务及其施行的特殊政策理解不深，习惯于按老经验办事的缘故，因而引起苏军的不满甚至加以干涉；有的来自苏军中个别领导人以胜利者自居，对地方横加指责；也有的是苏军基层干部和少数人，不尊重中国人的尊严，作出了某些伤害中国民族感情的事情。我们注意了苏军在旅顺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事实，但也不能无原则地迁就，坚持了必要的交涉和斗争。通过斗争，达到更好地团结的目的，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三涧堡石灰窑村召开斗争会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群众起来斗争恶霸地主时，坏人韩某为了挑拨我们与苏军的关系，制造矛盾，破坏群众运动，便向苏军诬告我们是土匪来抢东西的。而苏军驻该区司令官不调查不分析，带领部队当场开枪打伤群众，抓去我们的干部。为此事我与驻旅顺苏军警备副司令进行交涉，郑重地指出他们根据坏人反映的情况，动用军队镇压群众的做法是错误的，不利于中苏友好团结。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我和苏军警备区副司令及侦察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结果证明他们错了。苏军撤销了这个区司令官的职务，并当众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群众对此做法很满意。当苏军离开时，群众自动起来敲锣打鼓热情相送，此情此景很感动人。

苏军进驻旅顺初期，其士兵违犯纪律的事时有发生。有极少数人酗酒闹事，抢群众东西，殴打地方干部，个别人竟开枪打伤、打死

群众,甚至发生强奸妇女等行为,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为了巩固和发展中苏友好关系,我约见了苏军警备司令官,如实地反映苏军中少数人违犯军纪,侵犯群众利益的情况。苏军领导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即承认了错误,表示要采取措施,整顿军纪,严惩败坏军纪的人。

尽管发生上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市委仍从发展中苏友好关系的大局着眼,积极地做好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利用各种形式,宣传中苏友好和团结的重大意义,宣传苏军出兵东北的功绩,宣传苏军支持我们在旅顺顺利地开辟各项工作等事实。同时还反复地向干部、群众解释苏军中做坏事的是极少数人,不能代表苏军的形象,以求取得群众的谅解,搞好中苏团结。

我们在召开庆祝“八·一五”、“八·二二”大会前后,发动群众给苏军送牛羊,慰问苏军官兵。市委、市政府还赠送苏军两块银盾和两面锦旗,使苏军当局深受感动,后来他们将上述赠品送大连展出,教育其官兵珍惜苏中友谊。

苏联红军自1945年8月进驻旅顺至1955年5月全部撤回回国计10年时间,而我在旅顺工作的一年时间,仅是这段历史中的一小段。1946年10月20日,我曾在旅顺市党员、干部会议上,根据中共旅大地委的意见,总结市委与苏军相处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后应坚持的正确原则和工作方法。

(本文根据王其人1986年元月回忆材料整理)

旅顺解放初期与苏军关系的回顾

王世明

1945年8月22日,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副司令伊凡诺夫中将率空降兵进驻旅顺,并就任旅顺警备区司令。从此,被日本殖民统治40余年的旅顺人民获得解放。

苏军进驻旅顺后,立即实行军事管制,稳定社会秩序。首先,对日本设立的市役所置于军管之下,令其维持现状,看守一切文书档案资料不得损坏,听候旅顺市政府接管。每天向警备司令部作汇报,不得擅离职守。伪警所也是如此管制。其次,对地方临时治安维持会也置于军管之下,协助维护地方治安,每日向警备司令部作汇报。期间,苏军还接管没收了日军枪械物资仓库;接管高等法院与监狱,释放政治犯;接管军港船坞工厂、银行、邮局、自来水、博物馆等地方企事业单位。对非军事性的地方企事业单位和监狱等,后来陆续交给市政府。

1945年10月中旬,中共旅顺工作委员会成立,10月末成立了市政府。苏军当局为庆贺市政府的诞生,由驻军司令柳德尼科夫大将出面,举行了由各界人民代表与党政工作人员数百人参加的盛大宴会。年末工委改组为市委,隶属关系由胶东区党委改为大连市委领导。

刚刚获得解放的旅顺,情况很乱。一是城市工商业尚未恢复正常营业,失业工人及社会闲散人员很多,为维持生计,他们以倒卖日本人留下的破旧衣物谋生;由于粮食配给已停止,小商贩往往用酒与苏军士兵换取黑面包糊口;渔民不能出海捕鱼,生活尤其困

苦。二是苏联士兵酗酒闹事,奸淫妇女,抢劫财物,侵害群众利益,使市民既愤恨又惶恐不安。三是自发组织起来的民众联合会与维持会针锋相对的斗争日趋激烈。

—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苏联租借驻军 30 年。这一历史的特殊情况,决定了旅顺地方政治情况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中共旅顺党组织的工作必须照顾苏联驻军利益,不能违背战时军管的方针政策,其活动必须隐蔽。旅顺市政府为地方公开合法的行政机关,与苏军当局直接联系,一般地方行政事务与警备司令部联系解决,重大问题由驻军总部格列果夫大校主管联系解决。1946 年春,驻军总部派一少校杜曼负责与市委联系,了解我党的工作活动情况,向其驻军总部汇报。

苏军的对外宣传方针是中苏友好,要和平,不要战争。苏军进驻旅顺后,即组织群众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有一名中尉专门负责协会工作,提供宣传稿件与宣传车沿大街巡回宣传苏联有关政策及中苏友好。市政府成立后,派干部去中苏友好协会,建立了领导关系。我到旅顺后,听到群众反映,苏军时常销毁武器。为此,我去会见苏军警备司令探询此事。他说,销毁少量废旧武器,是宣传上的需要,目的是向国际上表明苏联战后要和平,不需战争,反对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当我提出请苏方把多余武器给我们以及支援解放战争时,他说,凡是缴获日本、德国的武器全部给你们,但要严守秘密,不能暴露。苏联制造的武器一支不准动。苏军当局的这种态度,为解放区来人搜集武器与战备物资提供了方便。究竟弄走了多少,无从知道。如果守密不严,苏军当局即出面干涉。如 1946 年春,辽东部队一位参谋来旅顺找我,说发现 3 辆废旧坦克维修后可用,让我与苏军联系。我就对苏驻军总部的格列果夫大校说了此事。他说,只要知道坦克在什么地方,不要声张,悄悄拉走就是了。事过两三天后,格列果夫急忙跑来问我坦克拉走了没有?我说不知

道。他说如果尚未拉走就不要拉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你们来的那个人不守密，在大连声张出去，让总部知道了，不准动。大连有美国领事馆，让他们知道就麻烦了。

1947年的一天，苏军警备司令卢柯元科中校跑来找我，说有人弄走了苏军7支冲锋枪，要我立即追回。经调查确有此事，是山东渤海区通过旅顺合作社弄走的。但枪已运走，无法追回，也就算了。还有一次，苏军麦列茨科夫元帅来旅顺发现海港泊有一只装载钢筋的小汽船，即下令不准启运。经市政府查明是胶东解放区弄的钢筋，就准许其运走。钢材是苏军运来修建港口工事的，散放在铁路沿线两旁，无人看管丢失很多。苏军对此类问题采取明来不行，暗地不管的原则，只要不留下把柄为美蒋制造反苏舆论，苏军是一概否认的。

二

苏军当局对我们实行的是友好扶助与监督相结合的方针。友好是基本的，扶助是真诚的，监督是有原则的、严格的。回忆两年多来与苏军的接触，认识到苏军对旅顺的工作极为关怀，支持与扶助是多方面的。在当时的条件下，旅顺地方工作的成败，直接关系到苏联驻军的利益。友好协调，共同建设巩固海军根据地，成为双方客观统一的战略指导思想。期间，旅顺市政建设得以迅速开展，应当说是与苏军的帮助分不开的。

兼顾地方与驻军利益，成为各项工作中的主流。违背这一主流，就会遇到挫折、磨擦和困难。苏军当局对新闻检查很严格，塔斯社新闻必须照登无误，新华社的新闻稿与地方新闻稿须经严格检查方能刊登，不允许有暴露共产党领导与骂国民党蒋介石的文字出现。只要不违背战时军管的方针政策，苏军当局从不干预我们的日常工作。至于“大事小事都是苏军说了算”的言论是不了解苏军军管方针政策的错觉。

关于地方政权的建设问题，必须按照莫斯科决定的时间表如

期实现。如成立市政府,我们觉得条件不成熟,没有准备,太仓促。但在苏军的努力下,促成了市政府的建立。1947年关东公署也是在苏军努力下仓促成立的。在这两项工作中曾发生过分歧意见,对联合各阶层人士组成地方民主政权的性质,原则上我们同意,对主要领导人选我们提出不同意见,经苏军报请莫斯科决定,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1947年6月,国民党东北行辕组成以董彦平为首的视察团来旅顺,其目的是想通过与苏军谈判接收旅大政权,苏军遵照莫斯科的指示作了准备。一是由旅顺市政府发起倡议,召开了旅大地区各界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地区行政统一领导机关,即关东公署。公署机关最初设在旅顺,不久迁往大连。二是进行了币制改革。这件事苏军早有准备。4月间,莫斯科来了一位专家作了一次报告,我应邀参加听了这场报告。报告主要讲战后通货膨胀,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必须进行改革,极力称赞南斯拉夫铁托币改成功的经验,但如何币改与币改时间秘而不宣。当时旅大地区金融情况混乱,苏军从东北撤军后其纸币即在东北停止流通,而旅大地区苏币仍在使用的。因此,大量苏币源源流入旅大,通货膨胀恶性发展,此时此刻进行一次币改完全是正确的。苏军要求币改必须在“视察团”来到之前3日内实现,由于事前公署不甚了解,当苏军把币改办法通知我们时,公署领导感到突然,不明真相。为此事,刘顺元副主席、陈瑞光秘书长来旅顺问我苏军币改的意向。我与苏军政治部联系,巴申上校夜间来我家作了说明,刘、陈一致表示不同意这样的币改。理由是苏军规定,在10元票上粘贴1元小票加盖钢印,10元即贬值为1元,而且每户每人兑换限额30元,工人将吃亏。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不休。最后巴反问刘,你是公署副主席,工资比工人多吧?按你家人口计算是否吃亏?刘不语。巴又说,币改规定是经过调查研究决定的,放心吧!工人不会吃亏,真正吃亏的是投机大商人,大量苏币集中在他们那里。机不可失,势在必行。最后经过

动员,终于如期实现了这次币改。6月3日,“视察团”来旅顺,带来的大量苏军纸币便成为废纸,从而捆住了他们的手脚,粉碎了他们妄图大量投放苏币扰乱市场的阴谋。“视察团”来后的工作,以苏军为主与地方分工协调配合。苏军负责接待与谈判,地方政府负责食宿等,有困难苏军帮助,地方治安由公安局负责。苏军谈判的斗争策略是迫使“视察团”承认地方政府是经民主选举的合法地方政府,此事谈不成其它一切拒绝谈判。苏军也作了让步的准备,必需时交出大连市,并为地委机关在旅顺准备了房子,作了地委机关迁往旅顺的安排。为了应付“视察团”来旅顺,市委、市政府成立统一领导指挥部,在书记与市长领导下,根据地方分工的任务与地委“不冷不热”的指示精神,作了全面动员与工作部署。公安总局局长周光及地委情报部等3人亲临旅顺指导协助工作。通过与苏军的紧密配合,取得了这场斗争的全胜,“视察团”一无所得,无功而返。

三

旅顺地方党政工作与苏军友好相处,是基于双方共同利益的一致性,核心是维护中苏友好。创立这种政治局面,也是来之不易的。语言不通、工作作风与习惯的不同,时常发生误解,闹一些小磨擦,司空见惯,无损大局,互相谅解也就完事了。

苏军进驻初期,士兵酗酒闹事,甚至奸淫妇女,抢劫财物等,种种违纪行为引起群众普遍不满与愤恨,损害了苏军的形象,群众对苏军友好的热情在消退,在干部中也产生不满和消极情绪,坏分子趁机造谣生事,挑拨离间,弄得人心惶恐不安。鉴于问题的严重性,我去会见警备司令,开诚布公地谈论此事。他诚恳地听取了意见,并说正在加强整顿。他还就苏军违纪现象作了以下的解释:第一,部队成份很复杂,为了战争,监狱囚犯、托派分子也被编入部队服役,战场俘虏就地补充部队的减员,这些人中有的还立了功当了干部,但其世界观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第二,部队实行军事首长制,取消了政委制,政治工作削弱了。第三,德国投降后,部队没来得及

整训直接从欧洲战场开进中国对日作战。第四，德军进攻苏联时惨无人道，奸淫掠夺杀害无辜苏联人民，士兵几乎都有被杀害的亲属。当苏军攻进德国时，士兵愤怒的报复行为实难制止。第五，士兵知道中国友好，日本是敌人，但对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分辨不清（如中国人对欧洲人分辨不清一样），侵犯中国人民的利益，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警备司令表示了歉意，并希望谅解。当时无意和他争辩这番解释，归根结底是军纪不严，军风败坏，只求其加强整顿就行。最后，警备司令要求我们警察协助整顿，并允许警察自卫还击。至1946年下半年，苏军从国内调整来新兵换防，其军纪开始明显好转。农村青年男女经常搭乘苏军军用车辆来旅顺，苏军与群众友好相处，人民的恐惧心情逐渐消失。

回顾两年来与苏军的关系，主流是友好的，虽然也发生一些小的波折，实属难免，无碍大局。但苏军纪律不好及其不同意开展反奸清算斗争这二件事，是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不利于大局的。经过双方妥善处理后，中苏友好气氛得以恢复。可是在我们干部思想中，仍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直到1947年东北局作出了“以苏为主”的指示后，领导思想得以明确，中苏友好的大局更为巩固了。作为中共旅顺党组织，在地委领导下必须大力协同苏军建设巩固旅顺这块海军根据地。这是当时国际环境决定的中苏双方的共同利益，是处理中共大连党组织与苏军关系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王世明时任旅顺市市长。本文根据其1987年4月回忆材料整理）

苏军进驻大连初期的党派活动情况

朱秀春

1945年8月22日苏联红军进驻大连后,我即去苏军驻连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雅曼诺夫少将接见了。我首先作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曾是中共和联共党员,后来丢掉了组织关系。经过交谈我们建立了联系。

回家后,得知我堂兄朱杏春受大连伪商会会长张本政、副会长邵尚俭的委托,请我给他们当翻译,晋见苏军驻连警备司令官。于是,我就陪他们又去了苏军警备司令部。雅曼诺夫少将见我又来了很惊奇,我说明来意,并把张、邵二人向他作了介绍,把他们“希望能为苏军做些有益的事”等意思翻译给司令官。司令官表示如果有事必请帮忙。

三四天以后,苏军驻连警备司令部突然戒严,不知是什么原因。又过了三四天,苏军警备司令部开始对外工作,这时我们才知道苏军驻连警备司令官易人。张、邵二人又约请我做翻译陪他们去见苏军新任警备司令官高字洛夫中将。见面后,张、邵提出:“市面很乱,可否成立一个组织,协助苏军维持地方治安?”高字洛夫说:“好!很好!属于军事防务方面由苏军负责维持,属于市内治安能成立组织维持,我们很感谢。”张、邵即请高为这个组织起个名字,高想了一会儿说了一句俄语。当时在座的有两位苏军警备司令部中文翻译,一位是沙皇时代的大连道胜银行行长拉廖夫,另一位是沙皇时代驻外蒙领事希奥尼。我出于尊重征求他们二位怎样把高的话译成中文好。希奥尼说:“译成‘中国人会’。朱先生,你看如何

译好呢？”我说：“译成‘中国人协会’是否好些？”希奥尼说：“还是译成‘中国人会’好，因为大连过去有‘朝鲜人会’，译法相同。”我们出于尊重，同意把组织称为“中国人会”。之后，张、邵即回到伪商会着手组织“中国人会”。

“中国人会”成立不久，国民党派汪渔洋到大连任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书记长。汪来连后即与“中国人会”发生联系，并将该会置于国民党市党部领导之下。张、邵在汪渔洋支配下，决定将“中国人会”改名为“大连地方治安维持会”。张、邵便约我去见高字洛夫中将，建议“中国人会”改为“大连地方治安维持会”，高经过考虑同意了张、邵的意见。

在汪渔洋来大连之后，高字洛夫曾告诉我：“汪渔洋向我们提出成立国民党大连市党部的要求，我们已经同意了。”我立即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唐韵超和张洛书，我们议论，苏军既然同意国民党成立市党部，也应有共产党的组织。于是，我们一起找高字洛夫，提出应让共产党组织首先公开。高说：“苏军和中国共产党无直接关系，同时，大连地区不准任何党派的军队来。我们请示了莫斯科，根据我们和国民党政府的协定，同意先让国民党市党部公开。”国民党大连市党部正式公开后，“大连地方治安维持会”即被其控制。这样，大连地区就出现两个在政治上对立的组织：“大连市总工会筹委会”和“大连地方治安维持会”。国民党和共产党争夺大连地区领导权的斗争就公开化了，且日趋尖锐激烈。

国民党在大连取得合法地位后，其活动很活跃。10月上旬的一天，我因事去治安维持会，结果空无一人，便问看门人。看门人说维持会和国民党市党部的人都在日伪时代的商务会议所开会，我听后即到那里。到了商务会议所，我拉门一看，主持会议的是汪渔洋，作报告的是邵式古。他们见我进来，就让我坐下听会。邵讲的是准备迎接国民党军队到大连，对欢迎仪式、军队给养、驻地等事项均作了安排。我想如果国民党军队来了，共产党怎么办？而且，

国民党军队进驻大连也是违反条约规定的。我借口退席，立即去苏军警备司令部找高字洛夫中将，把情况向他说了。高说：“这是真的吗？”我说：“我就是从那里来的，会议现在还在开着呢！”高当即电话命令苏军保卫部长巴雅根中校马上到司令部。完后对我说：“朱，我知道，马上采取措施。”之后，我又去找张洛书、唐韵超汇报此事，研究对策。后来，苏军将汪渔洋等人全抓起来了。在同国民党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中，我们占了上风。

成立总工会时，我们没有经费。唐韵超说：“我们是不是到‘中国人会’去要钱？”我说：“去！”我们去时，正好赶上召开中苏友协成立会议，我们便参加了会议。我被选为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唐韵超被选为副会长。我们跟“中国人会”要钱，他们说没有钱。其实他们接收日伪财产时发了大财，这是工人的血汗钱，理所应当为工人所有。经过斗争，从“中国人会”要了一笔钱，为开展工会活动筹集了资金。我们建立了总工会和基层工会，形成了一个较为有力的组织系统和领导核心，争取了工人群众，便稳定了大连的局势。我们在同国民党的斗争中站稳了脚跟，为建立民主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韩光来大连，对我们的工作极为满意。说大连的工作搞得这样好，完全出乎预料。韩光第二次来大连，带来了党对大连工作的新指示，从此，大连的工作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

（朱秀春 1945 年是苏军翻译，后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市政府秘书长。本文根据 1982 年 4 月访问朱秀春记录整理）

随苏军进入大连的两个月

董崇彬

1945年8月22日，苏军空降部队进入大连。我则是“八·一五”随苏军在长春空降，然后战线司令部派我去大连。我到大连是9月17日，任沙河口区卫戍司令部第一副司令。

当时日本关东军已经缴械，可是大连市日本警察还没有缴械，苏军还利用他们维持社会秩序。当时大连的社会秩序很乱，国民党势力也钻了进来，挂起了市党部的牌子。我们曾搞掉过他们的市党部，据说后来又挂了起来。那时韩光未来大连，我见到高字洛夫中将官，向他请示能不能搞掉它。他说不行，要按条约办，东北停战半年后，把政权交给国民党政府。并说中共也可以挂牌子。我说，中共没有指示。这些情况苏军士兵并不知道，于是我在9月下旬，带领一个排的苏军包围了国民党市党部，把他们三四十人都搞掉了。

10月初，苏军执勤的值日官告诉我，有一个大资本家找我，并说认识我。我见来人一身商人打扮，并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他拿出冯仲云给我的信，才知是韩光来了，为的是准备进驻大连，前来了解情况。我问来了多少人，韩光说只有他自己。我们谈了一两天，他就走了。走后不久，他介绍陈云涛找我，要我搞一批房子。到10月中旬，韩光就带着一批干部到大连，组成了大连工委。工委成立后，提出筹建警察总局的问题。我向高字洛夫提出并得到他的同意。关于总局局长的人选，韩光、陈云涛、赵东斌提出让我当，我说不行，而且还要脱苏军军装，恐怕苏军不同意。经与高字洛夫商量，他果然不同意。这样便提出由赵东斌任总局长，得到了苏军的同

意。

在我离开大连之前,办了几件事:一是缴了日本警察的武装;二是在苏军同意下,组织了400名工人当警察,交给了赵东斌;三是整掉了警察局里的一些坏人。如西岗警察局的头子是个汉奸,我派苏军士兵把他抓了起来。还有一件事情,当时有个工厂的工人找到我,对我谈了不少八路军的事,我是抗联的,对八路军的事知道不多,但知道他谈的道理是共产党的主张。我对他说,你能不能把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工会。他说没有经费,我当时也没有钱,但没收了不少鸦片,就给他做了活动经费。这个工厂的工会成立以后,组织工人向日本厂主要生活费。日本厂主用金钱、女人收买了沙河口苏军的一个副司令。这个副司令便把二三十名工人抓了起来。

苏军在大连约1个军1万多人,在各个区设有卫戍司令部。苏军驻连警备司令部里设有保卫部,也叫反谍部。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军队内部事务,一方面归所在部队领导,一方面又监视所在部队的行为,权力也是很大的,但一般不管苏军以外的事情。

同我一起随苏军到大连的只有9名中国人,都是原先抗联的战士,到大连以后都在苏军中任职。1945年11月中旬,我们又一起到长春,找苏军总司令部,要求退出苏军军役,自此离开了大连。

(本文系1983年11月葛玉广根据董崇斌谈话整理)

我与苏军的交往

曲英敏

1947年10月至1948年10月,在金州石河驿岗卡子,我和苏军有过接触。

当时在石河驿、杏树屯、华家一线上,驻有苏军的部队。石河驿岗卡子在石河驿和五里台之间,相距不过两公里,检查岗有七八道。从大连到石河驿是中长铁路的一段,归苏军管,过了石河驿,就归国民党政府管。过石河驿岗卡子,铁路、海关、公安局、边防检查站都要检查,而苏军的岗卡子主要是检查证明。当时进出岗的证明有两种:一种是绿色的,一种是红色的。绿色证明只准出,不准回;红色证明往返一次有效。证明一面是汉字,一面是俄文,需由公安和苏联驻军司令部共同签发才有效。石河驿有两个司令部,一是边防,一是城防。城防司令是少校,边防司令是大尉,叫干巴特。我们主要和边防司令部打交道。

建新公司在石河驿有驻在点,通过地方海关和金县检查站好办,通过石河驿关卡就需要翻译。我有两个翻译,一个叫黄香圃,一个叫张崇德,他们俩分别驻石河驿和普兰店。黄翻译没有文化,最早在军阀张宗昌手下当副官。黄口头翻译不错,过岗卡时,主要通过他宣传建新是个什么企业。苏联岗卡子的士兵,讲吃讲喝,我们送他们一些金奖白兰地、通化葡萄酒,送边防司令鸡蛋什么的,关系慢慢就好了,有时没有证明也放行。有时干巴特在只能用一次的证明上签字,写上一个月或半个月有效,岗卡的苏军士兵一看到我们的汽车,手一摆,打个口哨,栏杆一抬,汽车就过去了,从此以后,

我们出岗、进岗可以说是畅通无阻了。

后来，随着解放战争需用物资的增加，用汽车运输已满足不了。我们就商量中长铁路大连铁路局，是否可以把普兰店的东西运过来。最后苏军同意了，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在夜间行动。白天在石河驿把车皮准备好，辽南的车头进岗来拖，晚上把车皮拖出岗。苏军所以要求这样做，是由于苏军和国民党有条约，中长铁路由苏联和国民党共管，出现问题，关系国际信誉，苏联不好解释。起先，我们把车皮晚上送到普兰店，以后又送到鞍山。白天装车，把警戒搞好，火车一到，拖了就走，拂晓就到了石河驿。有一天晚上，我们坐从辽南来的火车，驶到岗卡子，正是上坡，煤也不好，火车吭哧吭哧地往上爬，岗卡子朝车上打了三枪。我们把这事向干巴特反映了以后，干巴特找到岗卡子值班的班长，把他训斥了一顿。岗卡子的班长还找到我们，赔礼道歉。从此以后，火车运输也畅通无阻了。

1948年沈阳解放前夕，我也从石河驿驻在点回来了。在石河驿与苏军接触中，一提我们是毛泽东、朱德的士兵，岗卡子的苏军士兵都竖大拇指，连声说：“哈拉绍”。1948年夏天，伍修权、何长工来大连，过岗卡子时，苏军士兵也不检查，就放行了。建新公司生产的炮弹，要拉到普兰店去试验。过岗卡子时，他们问是什么？我们一比划，他们也知道是炮弹，笑一笑，就放行了。对当时我们从事的解放战争，从干巴特到士兵，是支持的。在支援解放战争的战备物资上，石河驿作为转运站，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留在普兰店的记忆

王福如

我原是胶东军区十四团轮训队的指导员。抗战结束后不久，我们部队奉命来到东北。我们团轮训队与团直属队共 200 人，在皮口登陆后，指挥部命令：轮训队的一个区队由队长王庆山带领去庄河，其余两个区队由我带到瓦房店。到了瓦房店后，部队的番号改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东满军区二纵一支队。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从轮训队中抽调 36 名学员跟随陈云涛去大连工作。我也被调到普兰店工人大队任副政委，其间还兼任一段普兰店区的区长。1945 年底，我带工人大队的文艺宣传队到纵队司令部演出，被留在部队，再没有回普兰店。我在普兰店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回忆那段工作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发展工人大队

1945 年 10 月 17 日，我到达普兰店。普兰店工人大队刚成立不久。大队长兼政委是刘戈（即赵恩光），副大队长是邓进国，参谋是丁杰民，还有一名姓董的翻译。大队部下属 4 个中队，1 所医院，共约 500 余人。

这支队伍的来历，根据当时刘戈的介绍和李彭华的回忆，是他们分别在大连、杏树屯领导周水子苦力工人和杏树屯盐工组织起来的。刘戈本名赵明齐，是山东省莱阳县赵家埠人。1937 年 10 月由左友文、李成仕介绍入党。1939 年 2 月由胶东区党委派遣来大连做地下工作，改名赵洪涛。1942 年 6 月成立中共胶东区大连支部时，左友文任支部书记，他任宣传委员。1942 年冬胶东区党委又

派李彭华来大连。“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天，他们在大连召开支委会，根据当时形势，决定组织工人武装，配合苏军解放大连。派赵洪涛到周水子苦力窝棚发动工人，派李彭华回杏树屯发动盐滩工人。8月23日李在杏树屯组织工人打了日本警察，缴了两支枪，当即组织了八九十人的队伍。赵恩光于9月上旬组织起300余人杀了日本工头，缴了警察局的械，打开了武器库，得枪三四百支，还有轻重机枪、弹药等，当即成立工人大队，赵为大队长。因为他在做地下工作时，和苦力工人拜把兄弟，排行老六，都称他为六哥。组织工人大队后，他借谐音改名为刘戈。

队伍组织起来后，苏军不准住市内，他们移居革镇堡。9月中旬，他得知胶东区党委吕其恩、邹大鹏率的先遣队已到达庄河，便把部队开到清水河，与李彭华队伍会合（此时李不在清水河，他的队伍已由杏树屯移到这里），进行了调整配备，除留1个中队仍驻清水河，余部开到庄河和吕、邹部合编为辽东人民自卫军辽南纵队。10月初奉命进驻普兰店，收缴了保安队的武器，解散了维持会，成立了临时特别区公署。10月10日，他和孙悌清等奉命率部去接收金州，因为事先未与苏军取得联系，战斗打响后，刘戈被苏军扣押，队伍被缴械关押。经过两天的绝食斗争和谈判，双方取得了谅解。最后驻旅大的一位苏军中将跟他谈了话，对这场误会造成的伤亡和损失，表示了歉意。对他未取得联系的鲁莽行动进行了批评。苏方同意把重伤员留下由苏军治疗，损坏的汽车由苏军修理，轻伤和牺牲的同志，同部队一起回普兰店处理。部队从金州回来后，进行了整编，番号改为辽东人民自卫军辽南支队普兰店工人大队。部队派邓进国同志任副大队长。

我到工人大队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武器，扩大部队，补充主力。根据刘戈介绍的情况，我们决定：一、设立扩军机构，在普兰店设招兵处，同时成立扩军组，利用刘戈在大连的关系，招募码头工人入伍；二、利用与苏军达成的协议，由刘戈亲赴金州要求苏军提供武

器。这两项工作进展很顺利，到10月底，共招五六百名新兵，编了4个中队。

我到工人大队不久，东满军区派来丁参谋检查工作，10月底要回去汇报，带走3个中队。于11月初回普兰店，带回军区首长肖华、程世财等6位领导签署的信件，指示我们：一，部队番号改为“东北人民自卫军东满军区工人大队”，编制序列直属军区司令部；二，主要任务是继续扩大武器来源，大量招募新兵补充二纵；三，暂归二纵指挥，一切行动听从二纵命令。上述指示，同时也通知了二纵。

根据军区首长的指示，我们立即将清水河那个中队调来普兰店作了调整，并将4个骨干中队，全副日械化装备，共600余人（每个中队配备92式重机枪1挺、99式轻机枪12挺、掷弹筒4门、99式步马枪100支）送到二纵一支队。此后，在11月下旬和12月中旬，两次又向二纵输送全副武装5个中队共700余人。

从苏军获得的武器也不少。刘戈到金州苏军司令部要求苏军提供武器支援工人大队。苏军答应从缴获日军武器中拨一部分给工人大队。当时仅从石河驿秘密转交给我军的武器有92步兵炮、11年式掷弹筒、92式重机枪、99式轻机枪，还有步枪、手枪等轻式武器共5000多件。还有大批弹药。我们组织10多辆汽车，每晚去石河驿往普兰店运，大约运了个把星期。12月，二纵一支队政治部主任王伟光来普兰店，通过刘戈到大连与苏军一位少将会谈，会谈进行得十分机密。苏方经呈报大本营批准，将关东州内日军武器库中的手枪、步枪、轻重机枪、各种步兵炮，还有32、36马力牵引的加农炮，以及大批弹药等，全部移交给我们。这批武器不仅装备了二、三纵队，而且还有部分经普兰店湾装船运往烟台，装备了胶东的部队。

出任普兰店区区长

在10月底，新金县政府派孙健来普兰店检查工作，决定正式

成立区政府，一再建议让我兼区长。我觉得自己是军人，未做过地方工作，不懂怎么当区长，建议在区里找个地下党员担任。孙健说：正因为你是军人，握有兵权，目前开展工作正需要你这样的“武区长”，区政府由你“挂帅”，具体工作由区里其他人去做，以后有人再换你。大队的领导也都支持他的意见。刘戈说：“形势需要，当仁不让，你不干谁干？”看来他们是经过商量的，我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老孙当即返回皮口。第二天，他带来一张委任状，让我立即上任。大约在11月初，一天上午在区公署开了个会，孙健代表县政府宣布普兰店区政府正式成立，同时宣布了对我的任命，然后，把各部门的临时负责人，逐个向我作了介绍。下午，在马路东面的戏院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庆祝区政府的正式成立。会上，先由孙健代表县政府宣布普兰店区政府正式成立，也宣布了对我的任命，接着我根据县里指示精神发表了就职演说。最后是一位各界群众代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演出京剧《打渔杀家》祝贺。这时，不知由谁告“密”，群众要求我登台伴奏京胡，表示新区长与民同乐。为了不扫大家的兴，硬着头皮上了台，一阵又一阵的掌声，竟把肖桂英的唱词“江水滔滔波浪翻”给淹没了。

我兼任区长期间，一般在下午到政府办公，主要采取办公会议方式，听取工作情况，研究计划要办的事情，特别是以区政府名义发布通知、布告等必经我批准。兼职时间不长，县里就派来新区长。我任职期间，区政府作了这样几件主要工作：

1. 逐步建立了村级政权，并通过基层政权广泛发动群众参军。补充主力的新兵中，当地群众约占四分之一。
2. 出动部队取缔了一切大烟馆和赌场。
3. 查封了全部妓院，关押了少数很坏的老鸽子，烧了卖身契，解放了妓女。
4. 召开了公审大会，镇压了3个民愤极大的汉奸、恶霸，没收了汉奸的全部财产。

5. 保障部队军需和给养的供应。如给路过普兰店向北满挺进的原山东部队一、三师的给养,打开日寇的蛋黄仓库,用蛋黄粉作为携带给养,每人加发1斤白砂糖。

6. 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打击了地痞流氓犯罪活动。

迎接罗荣桓司令员

1945年11月苏联十月革命节刚过完的一天下午,邓进国急跑上楼来跟我们说:“罗荣桓司令员来了,在大门口,快下去迎接!”我们暗想,罗司令员怎么会突然来普兰店呢?后来知得,罗司令员从大连(金州)包租了一辆汽车,化装成客商准备去沈阳。当汽车开到大队部驻地(原日本气象站)大门以南时,罗司令员老远发现一副“热烈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二十八周年!”的大标语,横挂在公路的上空。罗司令员让李作鹏(原山东军区司令部作战处长)下车查问是哪个部队驻在这里。查明情况后,首长决定到大队部了解情况。当我们跑到大门口,李作鹏告诉我们首长在车上,要我们安排个休息的地方。我们上车问候了首长及随员,把罗司令员一行10余人接到大队部。并向首长汇报了所询问的情况。首长对苏军援助大批武器十分重视,指示我们要与苏军搞好关系,继续争取援助。晚饭后,李作鹏来大队部对我们说,首长长途乘汽车去沈阳不安全,能不能跟苏军联系搞个军用列车把首长送到沈阳。我们答应可以,当即让董翻译给苏军警备司令部柯布可夫司令打电话,请他来有要事相商。等他到来,我们把李作鹏交待的任务告诉他以后,他说:“我立即向我的营长报告。”普兰店一带苏军驻有一个连,柯布可夫是中尉,他的连长刚提升营长,营部驻石河驿。第二天一早柯布可夫就来了,他说营长已向金州司令部报告了,答应可以。另外,营长有个请求,罗司令员是中国著名的抗日将领,在苏军中久负盛名,想借此难逢之机谒见首长一下,不知可否?我答应立即向首长报告。我们一同用过早饭,刘戈同志在大队部陪他,我去报

告首长。罗司令员表示欢迎。我转告他后，他一蹦一跳的跑了。下午三点多钟，柯布可夫陪同营长来到大队部。刘戈和我一起陪同他们去谒见罗司令员。他们按照苏军规定的程序，一进门脱帽放在左手上端着，正步走向罗司令员，罗司令员亲切地迎上前来同他握手。他向司令员行了鞠躬礼，与罗司令员握手问好，立正站在一旁，然后柯布可夫像营长一样礼毕后，立正站在营长下边。罗司令员通过翻译说：“同志们请坐。”那位营长却说：“在将军面前，我们不能坐下。”罗司令员亲切地说：“都是自家的同志嘛，不必客气，坐下来好说话。”营长又说：“将军没有坐下，我们怎敢坐下。”罗司令员哈哈大笑说：“好，好，好，大家一起都坐下”。我们坐下后，秘书给我们每人送来一杯茶，还有糖果、香烟，他们只是连声称谢，却不动手。还是罗司令员的谈话，缓和了这个拘束的场面。罗司令员像拉家常一样，从苏德战争讲到对日宣战，出兵东北；从我军挺进东北，谈到苏联对我国革命的援助，并一再向斯大林同志致谢，向苏军致谢，向驻旅大地区的将领以及柯布可夫致谢。他们听后，十分感动。营长说，我一定把罗司令员的谈话报告给上级。并表示，护送将军去沈阳的任务由他们担任，绝对保证安全。第三天傍晚由金州开来一列军用列车，中间挂一节客车厢。那位营长和柯布可夫站在站台上，车站由苏军戒严，把罗司令员一行送上了车，由苏军一位少尉率领一个班守卫在车厢两头，一直护送到沈阳。

苏军撤离旅大的情况

鲜 明

一、苏军进驻旅大的情况

1945年8月进驻大连、旅顺的苏军部队是远东后贝加尔方面军。这支部队及外蒙古骑兵部队从赤峰直接插入辽西，指向沈阳，而后南下旅大。其中有三十五、三十九集团军和坦克第六集团军，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是伊凡诺夫中将。

苏军在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各大城市，到1946年4月末，除旅大外，苏军从东北其它地方全部撤离。苏军撤离后，国民党军队就打到四平。我军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松花江以南全部被国民党军队占领。

实践证明，苏军在旅大对中国革命是很有利的。一是国民党没有进来，使大连成为支援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再是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空军参加抗美援朝战斗就是利用旅大的空军基地。在朝鲜战争中苏军也牺牲了不少人，在旅顺水师营有苏军烈士墓，上面刻有牺牲的烈士名单。

二、解放军接防旅大的经过

1955年初（春节前），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兵团领导机关接到上级命令，从朝鲜东海岸撤回回国。回国的任务是：进驻旅大，接收苏军防务，保卫旅大。1955年10月，三兵团改为旅大警备区。

三兵团司令员是许世友，副司令员曾绍山。我当时是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为了回国进驻旅大接防，三兵团组织了先遣部队。许司令员回国派到南京部队，由曾绍山副司令员带着我和另外几个

人组成的先遣队，乘飞机到大连。我们到大连的时间是1月10日，住在现在的大连宾馆。曾绍山在大连会见了郭述申、宋黎、于谷莺、厉男等。我们与旅大党组织接上头以后，又回到沈阳，通知三兵团撤退回国分两个梯队进行。第一梯队由政治部主任李震带领，于1月14日到旅大；第二梯队由参谋长张蕴玉带领，于1月17日到旅大。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兵团到旅大后，便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兵团。兵团主要负责人是副司令员曾绍山、政治部主任李震、参谋长张蕴玉。

三兵团到旅大后与苏军举行第一次会议，经中苏双方商定组成交换联合委员会。中方主任是肖劲光（海军司令员），副主任有邓华（东北军区司令员）、曾绍山等，我当时是接收委员会中方对外联络秘书。具体接收苏军三十九集团军的防务由邓华出面，苏方代表是莫斯科派来的苏军装备部部长。联合接收委员会在机构、人员、人数上都是对等的，苏方是什么军衔，中方就配相等的干部。

在联合接收委员会下面，中方还建立了兵团接收委员会、空军接收委员会、海军基地接收委员会。三兵团接收委员会主任是曾绍山，副主任邱创成、安东，还有12位委员。空军接收委员会主任是何振亚（沈阳空军司令），副主任刘丰（军长）。海军接收委员会主任是周希汉（海军副司令），副主任宋景华（基地政委）、邵振（四纵队参谋长）。

三、接收苏军防务的情况

1955年2月20日，中苏双方在旅顺开始陆、海、空全面接交防务工作，到4月15日接交完毕。4月16日零时起，苏军驻旅顺海军根据地的一切防务全部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时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担负起旅顺防务的全部指挥权。

交接中，我们接收苏军交给的装备有：各种火炮1319门，坦克338辆，工程兵用各种机械59部，电台、雷达等通讯导航设施173台（部），各种汽车1659辆，各种型号飞机410架，各种舰艇53艘，

鱼雷 108 条。苏军原打算把其所有用不上的武器装备“一锅端”交给我们，我们未同意，而是有选择的接收，因为其中不少是破烂货。如缴获德国的坦克，实际上是一堆废铁。还有 4 架飞不动的飞机，苏军硬要我们接收过来，我们则坚持不要，最后便送给我们了。

苏联远东后贝加尔三十九集团军辖 3 个警卫师、1 个独立机炮师、1 个预备炮兵师、1 个反坦克师、1 个火箭炮师、1 个高射炮兵师、1 个加榴炮兵师、1 个独立炮兵十九团、1 个空五十五军、1 个海军舰队（海参崴舰队的一部分）、1 个鱼雷机师，还有通讯团、工兵团和直属分队等，共计 11 万余人。为完成接防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四面八方调来大批部队。陆军有六十四军，司令员唐吉安，副司令员吴佩爵，参谋长王亚。该军辖 4 个师，还有炮兵七师、十一师、三十一师、六十一师及工兵第七团、通讯二团，对空防务二六六团、公安二十一师、机械化师、机炮师等。海军则是陆军改行的，编了 1 个海上航空第五军及快艇纵队和海军基地。司令员是罗华生。空军有空三军，军长刘丰，政委粟再山。

在接收时，三兵团统帅机关原本只有作战处、机要处、通讯处和军务处等，而苏军则有 11 个处，即作战、情报、军训、机要、通讯、军务、装甲、工程兵、防化防空、管理处和办公室。我方为了对口接收，从四面八方调干部，也组建了 11 个处。以上这些机关和单位接收了苏军的防务后，便担当起保卫旅大的任务。

四、苏军撤走的情况

从 1955 年 3 月 1 日开始，驻旅大苏军就陆续往本国撤退，到 5 月 26 日全部撤完。共计开出 506 次列车、15180 多个车厢，分别从旅顺、大连、夏家河子、金县、石河、三十里堡等火车站开出。苏军每撤退一批，都由中方的接防指挥官对口送行。自旅大撤退的苏军，还带走 10 余名中国女青年，他们与苏军下级军官结了婚。

在苏军撤退期间，旅顺苏军烈士纪念塔建成并举行落成典礼。该塔建筑雄伟，其顶端装饰是从莫斯科运来的。在大连市政府前广

场和火车站前广场还分别召开了欢送苏军回国的群众大会。至于中苏双方相互设宴招待答谢,互赠礼品的事则很多,气氛热烈、友好。至5月末苏军全部撤退后,根据双方交接委员会达成的协议,苏军留下40名顾问,顾问团长是苏三十九集团军参谋长图兰达也夫少将。顾问团的任务是帮助解放军训练干部,掌握和运用各种武器。顾问团于1955年底全部撤出。

(本文根据鲜明1984年2月谈话记录整理)

苏军从旅顺口地区撤退的情况

董希真

1955年初,从朝鲜撤回回国的志愿军三兵团,直接开到旅顺口与苏军接防。当时苏军驻旅顺口的部队是三十九集团军,司令什维佐夫,参谋长图兰达也夫。三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参谋长张蕴玉。

为了对口交接,中方抽调一批部队干部到旅顺口,充实三兵团。我原是在华北军区司令部工作,1955年3月末调来旅大,任三兵团军务处处长。中苏双方成立了接交委员会,曾绍山参加了这个委员会。我们各处负责人,每天都到苏军司令部大楼,同对口处交谈,实际是学习他们的管理方法和经验。

三兵团辖陆军1个军,5个炮兵师,1个机械化师,1个雷达团,1个工兵团。机械化师司令员吴忠,参谋长张怀瑞。该师辖8个团,武器装备相当强。第一机炮师师长刘德才,该师辖4个炮团,配有各种火炮。

苏军在撤退时,将所有武器装备都作价卖给我们。如打德国的坦克和大炮,本来都已淘汰,也作了价,而且价格很高。苏军军官家庭生活用的大件物品,在撤退前也都拍卖了。1955年5月下旬,苏军最后一批撤退时,在大连火车站前广场举行了欢送大会,曾绍山陪送到石河驿。

苏军撤退后,还留下一批顾问,顾问团长是苏军驻旅顺部队参谋长图兰达也夫,还有防化、工兵、坦克等方面的专家,其任务是指导我辽东半岛军事演习。1955年11月,建国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一次大规模抗登陆战役示范演习在大连的庄河地区举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亲临旅大观看演习,期间,刘少奇、邓小平还视察了旅顺口驻军。演习结束后,苏联顾问团便撤走了。

《新生时报》的十八个半月

洛 鹏

一、接收《泰东日报》

《泰东日报》创刊于1908年。从它诞生之日起即控制在日本人手里。在近40年的时间里，作为日本殖民主义者的舆论工具，它起到了欺骗人民、麻痹人民的反动作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在大连这块殖民地，日本军警仍然耀武扬威。当时大连唯一的一张中文报纸《泰东日报》，亦照旧控制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手里，继续进行反动宣传。他们扣压通讯社发布的裕仁召开“御前会议”接受投降的新闻；干涉报社中国员工悬挂中国国旗；少数头目私分金库现金等等。直到8月22日，苏联红军根据国际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规定进驻旅大，《泰东日报》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才被赶跑。中国员工抓住他们盗走金库现金的违法行为，团结起来斗争了社长、取缔役、编辑局长等头目，并追回了被盗现金，作为“遣散费”分给全体职工。

日本人被逐出报社，《泰东日报》继续出版。但编辑大权又落到了少数中国上层分子手中。当时苏军虽已实行军管，但市面很乱，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汉奸张本政等人组织了治安维持会，国民党市党部也公开挂出牌子。报社的杨华亭、刘士忱、张兴五等上层人物很快就同他们挂上了钩，国民党市党部书记长汪渔洋还专门到报社会见了他们。报纸内容换汤不换药，按照汪渔洋的意图，公开发表国民党市党部“成立宣言”和“蒋委员长万岁”、“国民党万

岁”等反动口号,登载有反苏反共内容的文艺作品,就连国民党政府任命大连市长的名单也在报上出现了。杨华亭、刘士忱等人还组织了“管理委员会”,他们为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保护好设备财产,等待国民党中央军来“接收”。管委会还决定派一个名叫李生源的到长春“联系接收”事宜。

与此同时,他们还策划出版《文化报》,因苏军不同意才未得逞。另据公安局档案资料记载,国民党大连市党部已从《泰东日报》物色好人选准备筹办市党部机关报“国民日报”。在这种情况下,苏军于当年10月上旬勒令《泰东日报》停刊,并同意由民主政府接收,创办市政府机关报。

二、创办《新生时报》

政府教育局长张致远(党内为中共市委委员)在苏军少校李必新(苏籍华人)陪同下,于1945年10月下旬接收了《泰东日报》。陈云涛(副市长)、张致远向市委书记韩光同志建议立即创办市政府机关报,经市委批准后即着手筹备。起初定名为《新生日报》,意即旅大人民获得了新生。征求迟子祥(大商人,莫斯科内定为大连市长)意见,他提议改为《新生时报》。其实出的就是日报,没必要改为时报,但为尊重市长起见,市委同意定名为《新生时报》。

报纸于1945年10月30日正式创刊,编辑部仍为《泰东日报》的原班人马。教育局长张致远兼任《新生时报》社长,大政方针由他同苏方协商确定,具体编辑业务由副社长杨华亭负责。原《泰东日报》“编辑人”刘士忱仍主管编辑工作。

旧人办新报,还是老一套。虽然报纸的主要内容由张致远、李必新审查,但对一般稿件就由杨、刘编排了。他们在创刊后第三号报纸上就搞了小动作。11月3日出版的报纸头题消息是发表市政府施政纲要,记者在新闻导语中特别写上“正副市长、各局局长在迟市长经营之商号监部通益泰祥拟定市施政纲要”。敌对分子早就清楚政权是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他们抓住这个借口,掀起反对民主

政府的浪潮。11月12日，借纪念孙中山诞辰之机，煽动不明真相的学生上街游行，呼喊反对大烟鬼（迟子祥吸毒）政府的口号，殴打人民警察。他们蛊惑说，“在大烟鬼家里制订的施政纲领，会是什么好东西。”刘士忱在报纸言论中则把内战写成“内乱”（张致远审查报纸大样时才纠正过来）。版面安排将重要时事新闻故意压低，用一段题放在报屁股上。言论中笼统反对内战，不讲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刘士忱天天跑国民党市党部，还在治安维持会担任了职务。他无心办报，他是编辑部负责人，但在11月间却背着组织同一个伪巡捕私奔长春，准备找国民党汇报情况，联系“接收”。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在某些材料中，将《泰东日报》在苏军进驻初期一段时间内所进行的反苏反共宣传，都算在《新生时报》的帐上，这是不对的。《泰东日报》被勒令停刊约在1945年10月上旬，那段时间报纸掌握在杨华亭、刘士忱等人手中，他们听从国民党市党部的旨意。《新生时报》创刊以后，就由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领导（通过教育局长张致远），不可能让反共文章见报。

三、市委加派干部

在这种情况下，不加派干部是不行了。因为创刊当时全报社只有我一个人是共产党员，而国民党员却有十几个人（后来才知道的）。我是个新党员，组织上又决定要长期隐蔽，不能暴露身份，所以在编辑部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一周之后，市委以政府名义，派胶东干部姜毅同志到报社主持编辑部工作。姜到报社后，首先解决了时事电稿稿源问题，从公安局找来两台美制短波收音机，夜间抄收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记录新闻。重要的地方新闻也要事先由他审定。11月下旬又加派市委宣传部的李莲同志（延安干部）到报社主持编辑部工作（姜毅同志不久又被派去接收广播电台）。李莲同志到报社后，编辑大权才逐步掌握在我们手中，报上开始编发有倾向性的稿件。11月24日以《内战责任究竟谁属？》为题，发表两条对比的新闻，一条为中央社

重庆电，内容是傅作义致电毛泽东，指责八路军强占了地盘；一条为新华社延安电，内容是新华社奉命发表声明，用具体事实证明是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发动了一连串进攻。并严正声明：中国人民坚决需要和平，不容再发动内战，但中国人民也知道怎样制止内战，保卫和平。

《新生时报》是政府机关报，苏军的命令和市政府的决定都要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施政纲要和政府工作报告等要全文登载。李莲到报社后，除继续发表政策法规方面的文件外，针对当时群众中的盲目“正统”观念，组织发表了有针对性的宣传材料。11月底以“读者来论”形式刊登时事论文《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政论性文章，主要根据《新民主主义论》精神，阐述对未来新中国各个领域的方针政策。该文在报上连载3天，深入浅出，说理透彻，深受青年读者欢迎。

接着，从12月初开始，又以《九·一八以来国内风云录》为题，发表“史实连载”。编者在引言中说：“过去由于日寇的新闻封锁政策和汉奸的反宣传，我辽东同胞对于祖国国事变迁的历史真象所知极少，所以今日面对新的现实，往往感到难于理解”，“为帮助读者认识史实，且有助于目前澄清思想，明辨时局，特此连载‘九·一八’以来的国内变迁情况，名之曰‘国内风云录’，以应读者需要。”该文从1931年开始，用大事记形式，按编年史写法，将政局大事简明扼要地向读者披露，连载近一个月。这个“风云录”实际上就是当时在老解放区流传甚广的小册子《从九·一八到七·七》改头换面后转载的。

市委为进一步加强报社领导力量，于1946年2月派杜鸿业同志到《新生时报》主持工作。考虑到当时报社的具体情况，市委决定让《人民呼声》报在2月27日一版就此专发一条新闻：“本市《新生时报》社长张致远氏，因担任市政府教育局局长之职，事务繁杂，忙不开交，为使张局长专心教育事业，特由山东召请杜鸿业先生就任该

报社社长,现已正式就任。”

杜鸿业同志是抗战初期入党的老党员,山东省广饶县人。抗战期间曾担任过《渤海日报》社秘书长兼总编辑,新闻工作经验丰富。他到报社后,整顿了机构,清理了队伍,加强了思想工作,狠抓了组织纪律。编辑部门成立了编辑科(科长王丙炎)、通联科(科长洛鹏);后期又成立了编辑部(部长陈润斋),行政管理部门成立了经理部(部长韩冈矿),秘书处(主任刘心一),厂部(厂长李长春)。根据干部队伍的具体情况,对《泰东日报》时期的老人,愿继续工作者,表示欢迎,并量才使用。如杨华亭继续担任副社长,负责行政管理;王丙炎主编副刊;韩建堂主编时事版;周静庵主编地方版。对不想留在报社,另有高就者,则热忱欢送。如老记者张兴五,因政见不同,找个借口向杜社长辞职,杜鸿业同志不仅接受他的辞呈,还在泰华楼设便宴欢送。老编辑周静庵、郭瑞堂等于1946年春相继提出辞职,均获批准。对个别工作质量不高,适应不了工作要求的中青年记者,则予以调动或精简。

四、进行报纸改革

市委充实了报社的领导力量,特别是杜鸿业同志到职以后,报纸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考虑到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根据苏军司令部的要求,有些稿件处理,在策略上要灵活一些,但党的基本原则不能含糊。选择稿件要配合斗争需要,尽量少用中性标题。在报纸上明确提出争和平,反独裁,反内战的口号,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揭露本地反动分子的挑衅活动。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大力报道政权建设、恢复生产、安定民生、生产自救,以及反奸清算、搬家运动等新闻。

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反动派即不断制造磨擦,挑起内战。从1945年11月下旬开始,《新生时报》就陆续发表了全国各界人民反对内战保卫和平的报道。11月23日一版头条发表重庆各界名流500多人举行反内战大会的消息,第一次在《新生时报》上

出现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字样。11月28日的一版头条又发了新华社晋绥电，揭露阎锡山与日寇合作屠杀中国人民的报道。1945年12月2日一版发表朱德总司令就中共对东北问题答美国记者问（新华社电），针对蒋介石要经过大连等地向东北运兵的阴谋严正指出：“国民党在解放区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一切经过解放区的运兵，应该经过协议，以免发生冲突”，“在全国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以前，成立地方性的民主联合政府，应该得到合法地位。”12月7日发表了许景宋（许广平）斥国民党挑拨内战的行径，大标题是：

对日抗战中望风而逃
攻击同胞却非常勇敢

1946年5月以来，内战逐步升级，《新生时报》处理电稿的标题态度更加明朗。5月4日发表塔斯社重庆电讯，报道周恩来报告东北局势。标题为：

东北内战如不停止将发展到全国内战
同日又发表了中共中央发言人谈话，标题为：
如不立即制止挑战行动
内战责任完全国民党负

7月17日，报上发表了新华社报道的抗日救国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先生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殒命的新闻，标题是：

国民党统治集团加紧法西斯恐怖（肩题）
李公朴惨遭特务暗杀（主题）
恐怖手段吓不倒和平民主人民的前进（副题）
至此，《新生时报》的政治态度已十分鲜明了。

对国民经济的恢复与整顿，市府成立后即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新生时报》亦及时予以充分报道。1945年12月6日，市府召开工厂复兴恳谈会，邀请各厂厂主协商复工问题，陈云涛副市长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报纸进行了详细报道。翌日又报道了市府召开

日人工厂厂主会议,商讨工厂复工事宜的消息。社会局长向日人发表政府对日本侨民之施政纲要,然后论及复工问题。指出:军阀财阀以及援助侵略战争之财产一律没收。对于善良而且爱好和平的一般日人财产,不但不没收,更予以保障。同时期待中日合作,允许日人对中国工厂投资。这两次会议,分别明确地向本国和日本的厂主阐明了政府的具体政策,通过新闻媒介报道以后,对恢复生产,安定民生起了良好作用。

随着形势变化,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报纸的版面相应作了调整。1946年5月以前,每天出两个版,一版为要闻(以地方新闻为主),二版为时事电稿。6月1日以后,改出四个版,加强了时事宣传,一版为地方(包括要闻),二版为国内,三版为国际,四版为副刊。这种版面安排一直继续到1946年底。

1947年元旦,根据市委(地委)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部署,报纸的版面又作了新的调整。本报编辑部在《迎接1947年如何改进我们的报纸》文章中提出:今后我们的总方针,仍然是继续努力和发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坚持反对独裁,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独立早日到来。从元旦起更新报纸版面,仍为四版,但增加地方新闻比例,占四分之三(包括副刊),国内外消息占四分之一。就是:一版为本市消息,二版为国内外消息综合版,三版则专门报道与介绍本市的工商业发展情况及一般通讯。四版仍为副刊,但今后要少登转载文章,在内容上则以短小精悍为主,并加重一些轻松趣味的东西。

五、《新生副刊》

《新生时报》从创刊时起,就注意办好报纸的副刊。1945年12月中旬开辟了“文化特辑”专栏,1946年6月改出四版以后,每天都出一个整版综合性的“新生副刊”,内容包括文艺、创作、散文、诗歌和报告文学、杂文等等。四版还开辟了“戏剧周刊”、“妇女生活”、“习作园地”等专页。除固定副刊外,逢文学艺术界名人诞辰忌日之

机,经常出版专辑。1946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10周年时出了专刊,发表诗人陈陇《向鲁迅先生学习》及卢正义《英雄的气息》和其它纪念文章,并刊登木刻《高尔基与鲁迅》。1947年元月杰出戏剧演员王大化不幸逝世时,不仅发表新华社电讯、本报评论,还出了纪念专页。

1946年春,东北文工团来大连演出,轰动全市。报纸从6月2日起专设“戏剧周刊”,由东北文工团主编,共出13期,8月23日向大连市各界朋友告别。东北文工团离连后,“戏剧周刊”由陈陇负责主编,继续与读者见面。

1946年6月7日起,“文化特辑”改为“新生副刊”时,编者在发刊词中指出,现在基于文化之需要更加迫切,副刊之增设更有必要。7月初,“新生副刊”开始发表由社长杜鸿业撰写的政论性杂文(署名鳗言),从7月2日到20日共发7篇,以《光复后的平津》为总题,分题揭露国民党大员在日寇投降后到过去的沦陷区劫收财宝、强占房产、以“伪”为名原封接收种种伪而不伪的东西,中饱私囊,大发接收财的丑恶嘴脸。杜文之后,从7月下旬始,大连广播电台台长康敏庄同志(署名谢青),在“立此存照”栏中,连载时事杂文,用犀利笔锋,鞭挞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行径。

副刊联系与团结了一批有名望的作家和青年文学爱好者,稿件来源充足,内容丰富。当时在大连的作家阿英、方冰、李定坤(东方),诗人陈陇和戏剧家沙蒙、王大化、颜一烟等都不断给副刊撰稿。

谈到副刊,就不能不提到副刊主编王丙炎(冰言)先生。王丙炎在“五四运动”前夕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1939年考入大连《泰东日报》任校对,直至1945年8月日寇投降。在旧社会,他就是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深恶痛绝。他曾在《泰东日报》上发表过长篇小说《钱》,主题思想是诅咒金钱的罪恶,说明有钱的人只会利用金钱作恶,只会抽大烟,玩小老婆。他主编《新生时报》副刊以后,不仅积极联系作者队伍,组织编辑文艺

作品,而且亲自动手创作文艺作品,配合政治斗争,教育广大读者。解放初期就在《新生时报》上发表短篇讽刺小说《裕仁哭祖庙》。这是依据日寇投降当时被《泰东日报》编辑局长(日人)扣下未发的日本通讯社一篇新闻电稿创作出来的,用辛辣笔法描写了日本天皇及其重臣们在讨论是否接受无条件投降的“御前会议”上种种丑态。发表后,有的亲日分子告诫他“这是大逆不道”,王丙炎则一笑置之。1946年12月19日,王丙炎又推出长篇小说《刑事》,署名冰言,在“新生副刊”连载100多回,到1947年5月16日,因《新生时报》终刊而中断。作者在预告中宣布,“写《刑事》的主旨也就是在暴露刑事、腿子们的原形,揭发他们罪恶的真相。预定字数在十万言以上。”

在当时汉奸走狗尚未彻底肃清的情况下,王丙炎敢写这样题材的小说,并将小说主人公的名字都用了些谐音字,如屠载之(兔崽子)、汪伯高(王八羔)、邵天良(少天良)、齐寿利(禽兽类)等等,实在要有很大的勇气。这也充分表现出这位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对那些丧尽天良的民族败类无比仇恨的心情。

六、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新生时报》与当时大连的另两家报纸《人民呼声》报(1946年6月改为《大连日报》)、《实话报》均不同,《人民呼声报》是党报(当时党不公开,以总工会名义发表),编辑部成员全部是青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实话报》是苏军驻旅大地区指挥部的机关报,中层以上正职干部均为苏联军官,中国编辑、记者多数也是市委调派的。而《新生时报》是在原《泰东日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编辑部的全班人员都是《泰东日报》过来的,情况相当复杂。据《大连公安史选编》记载:“他们(指国民党员)有的打入我内部,窃据要职,掌握武装。据当时统计,他们已打入我内部的175人。其中有……新生报社5人,邮电局5人,广播局十二人……”。后来得知,《新生时报》创刊当时,国民党员至少有10名,而我党只有一名

新党员。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市委仍然牢牢掌握着报纸的出版大权，每天报纸大样在送苏军司令部审查同时，也要经市委审查。报社无党员通信员，不能直接将报纸大样送市委审查，就通过张致远同志审查每天的大样，遇重要稿件由张致远同志与韩光同志或市委宣传部负责同志联系。重要事件发生后，如1945年11月12日，国民党反动分子借纪念孙中山诞辰80周年之机，煽动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到大街上闹事，对这次事件的整个报道，都是由张致远同志以教育局长名义，直接向报社编辑布置的。11月14日报纸一版发表纪念孙中山80诞辰的专论，着重提出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二版发表陈云涛副市长在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讲话，提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打倒汉奸，杀灭走狗”的口号。同时指出，“近有以国民党名义于街头贴不满意中苏友好条约与反对市政府的标语，这些无知分子，并没有当国民党员的资格。”

二版同时还发表了孙中山诞辰学生闹事消息及教育局长张致远的讲话。张指出：学生与青年教师要认清自己应走的道路，勿被少数阴谋家欺骗。11月15日在一版头条又发表了市府于13日发出的告全市学生青年书。标题为：市府告全市学生青年书，切勿为奸徒所利用，学界诸君须用冷静头脑辨明是非，对盲动的青年学生采取宽大政策，概不追究。通过宣传教育和及时有力措施，这次学潮很快平息下去。

对报社内部的一些情况，起初由我在每天下班后去市委宣传部向李莲同志汇报。姜毅同志到报社工作后，我们俩一起去汇报。我们写的涉及到党的重要政策稿件，都是事先送李莲同志审阅，她修改定稿后再交给我们向编辑部发稿。这些工作程序杨华亭、刘士忱等人是不得而知的。如有个伪满时期小有名气的作家石军，日本投降后跑到大连，通过刘士忱混进报社，9月间在刘士忱控制的《泰东日报》上化名“苏枫”，连续发表数篇“炉边随笔”（散文），以文

艺笔法发泄对解放后大连社会的不满情绪,煽动人民反苏反共。在《新生时报》创刊后,1946年1月13日,刘士忱还将苏枫的“炉边随笔”第三篇《严冬与我》在“文风”专页上刊登出来。这篇散文,名为写严冬,写自然现象,实则写时局,写解放后的大连。“北风凛冽,天气严寒,……挣扎着生存的我们,刻刻感到它的淫威是峻烈严苛而可惧的。”“煤荒,吃粮暴涨,使你束手于煤粮之间,唏嘘叹息。”“防寒衣帽既单薄又缺欠抗寒的蛮勇,我算露出败北的羸弱劲儿了。”“到职务室,屋子虽宽大,‘纳凉’有余而‘取暖’不足。”“晚间回下处,有炕不通烟,通烟未必有薪柴,卧在炕头,如横躺于尸身般阴凉。”“睡不着,辗转被褥间,想一些不会兑现的幻想,……最低让我今冬别冻死,来年开春,搭乘轮船,到南洋当华侨。”这哪里是什么写天气,明明是在骂大街!这位据说得过“大东亚文学奖”的作家先生,对刚从日寇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滨城大连,该有何等的反感啊!又使他多么的不舒服呀!他甚至下决心要去南洋当“白华”了。我根据李莲同志的建议,写了篇杂文揭他的老底,驳他的谬论。他叫“炉边随笔”,我叫“炕沿随笔”,他化名“苏枫”,我署名“洪流”。稿子交李莲审阅修改后,找人誊清(因我不能暴露身份,怕被认出笔迹),通过邮局寄到编辑部。刘士忱接到稿件,不仅不发表,反而直接交给石军,石军从此以后再未到编辑部来(“炕沿随笔”1946年春发表在于乐主编的综合性刊物《新地》创刊号上)。

杜鸿业同志到报社后,他所写的重要稿件(如社论等),都派我直接到新华街送给韩光同志审阅。韩光等党政领导同志逢重大节日,经常给报纸题词,通过新闻媒介向广大群众发出号召。1947年元旦的题词是:“一九四七年是旅大人民开展生产运动之年,大家一齐动手,参加生产,展开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生产运动。”

《新生时报》党支部是1946年10月成立的,杜鸿业同志兼任支部书记。因为李莲同志在1946年初就调回市委宣传部任宣传科副科长,报社只有杜鸿业和我两名党员,按党章规定不能成立党支

部。陈润斋同志于1946年10月到报社后有了3名党员，才成立了党支部。到终刊前党员已有10多名。《新生时报》老知识分子多，党支部很注意对他们的团结教育工作。在政治上、工作上一视同仁，团结共事；在生活上，关怀照顾他们，尽量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王丙炎写小说《刑事》，无情地揭露了汉奸、特务在日本统治时期犯下的种种法西斯罪行，受到各界读者欢迎，同时也引起了民族败类的恐慌和仇视，他们给报社打匿名电话写恐吓信，威胁作者“要小心自己的脑袋”。小说才登到30回，时值1947年春节前后，王丙炎在夜间因煤烟中毒，又遭水烫，卧床多日，致使连载小说中断。杜社长不明详情，担心他是否被匿名信吓住，不敢写了？派我到王家探望，同时代表他表示慰问。我见王先生右手严重烫伤，实在不能握笔。谈话中他主动提出《刑事》续稿问题，怨自己没多写些续稿。我劝他不要着急，报上已经发了启事，告诉读者因作者患病，续稿未到，相信读者是会谅解的。我试探着提起匿名信事，王丙炎淡淡一笑说：“我不怕！揭露那些坏蛋丧尽天良的罪行，是我的义务，就是豁出性命我也要继续写下去！何况现在是民主政府，我谅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王丙炎在旧社会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杜社长苦口婆心地劝他戒了烟。他老伴逝世后，报社又帮助他妥善地处理了丧事，这些都使这位老知识分子感激不尽。他后来在一份书面材料中说：“到1946年春天，杜鸿业同志来任《新生时报》社长，我开始和共产党人接触起来。起初我觉得他是很粗鲁的，不大愿意和他接近。后来逐渐地觉得他直率、诚恳，而且有相当高的工作能力，我佩服起他来，也亲近起他来，和他谈话的时间就比较多。就在这年秋天，他说服动员我到医院去戒烟，并给了我以很好的照顾。从这一事情开始我感到这个‘上司’和旧时代的‘上司’有所不同，他不是威胁、申斥，而是治病救人，使我对共产党人，对新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王丙炎起初在报上发表的作品，多是对反对

派的暴露和揭发,后来逐渐的又改为对新社会、新事物的歌颂,这一转变,是他写作中一个新的转折点。1948年冬,他离开新闻单位到政府工作以来,仍继续从事文艺创作,陆续在《文艺报》、《民主青年》等报刊上发表。从这位老知识分子身上,我们看到了党的统战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威力。不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是勤勤恳恳地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51年底他在一份材料中郑重写道:准备条件,争取做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哪管到六十岁以至七十岁也不放下这个奋斗目标。遗憾的是,他未能活到成为共产党员,早在“文革”之前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新生时报》的十八个半月,是极不平静的。在这550多天里,它经历了尖锐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是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新生时报》党组织克服了有人消极怠工,有人辞职不干,有人逃跑,有人投奔国统区等重重困难,一步一步总结经验,打开局面,在党的领导下,完成所担负的宣传报道任务。

1947年5月16日,根据上级决定,在报上刊出启事,宣布终刊,与旅顺《民众报》合并,改出关东公署机关报——《关东日报》。

忆旅顺《民众报》

沈西牧

1945年8月，旅顺口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获得解放以后，曾出版过一种报纸，名为《民众报》。它创刊于1945年11月23日，历时近一年半，于1947年5月10日终刊。之后它与大连《新生时报》合并，出版关东公署的机关报《关东日报》。

1945年8月22日，苏联红军进驻旅顺口，9月初，中共山东北海地委派长山列岛特区区委书记兼武装大队政委郭壮和地工干部王泽民、王世明等同志来到旅顺，在苏军的支持下开始了新政权的建设工作。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苏军领导督促我方尽快出版报纸。王泽民同志于9月下旬回胶东要了20名干部（当时旅顺口党的工作系胶东区党委领导）。我是这次被派往旅顺干部中的一员。

派我到旅顺的任务就是创办报纸。在我之先，殷杰同志已开始筹办印刷厂、招收工人等工作。我到后即着手报纸的编辑出版方面的筹备工作。

11月23日，旅顺《民众报》创刊号出版了。

《民众报》创刊之初，编辑部工作人员很少，除我之外还有当地几个女学生，其中有邓莲香、王淑范、王静懿等同志。她们都是中学生，文化水平不太高，主要是协助我抄抄稿子、整整材料。《民众报》开始每3日出4开2版，11月中旬邵默夏、茹光际、任巩等同志自胶东调来后，报社工作人员逐渐增多，报纸改出2日刊，1946年上半年又改为4开4版，出日刊。发行份数由最初千余份，迅速增加近万份。

报社当时的组织机构分两部分，一是编辑部，一是印刷厂。行政事务工作设总务科，隋志恩任科长。殷杰同志最初是社长，主要负责行政事务和印刷厂的工作。我是编辑部长，负责报纸出版的编辑、采访等工作。邵默夏同志到后建立通联科，他任通联科长。1946年上半年杨希萍同志从胶东来旅顺任市委宣传部长，兼任《民众报》社长，我和殷杰同志任副社长，日常工作主要是我们俩人负责。1946年下半年新四军干部梁山、钱坤同志调报社工作，梁山同志任编辑部长，殷杰同志调离报社，自此后整个工作由我主持。

报社当时工作人员总计约50名左右，编辑部20余人，印刷厂和行政事务人员30名。印刷厂是没收“农业进步社”全部设备和旅顺监狱的一部分印刷机建立起来的。

报纸的新闻稿，开始是每日派专人到《大连日报》（始称《人民呼声》报）社取（交通员叫孙德基）。1946年，报社建起了电台，有了电台后，电讯新闻稿全靠自己收录。电台工作人员有五六人，其中有4个日本人，负责收译电讯稿件和机务工作（我们当时技术上掌握不了）。他们这几个人当时表现都不错，1947年报纸终刊后都回国去了。

旅顺当时的情况是，历史上曾先后遭受沙皇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解放后苏军根据国际协定进驻旅顺口，实行军事管制。当时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外交关系，可是旅大地区实际上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为了不让国民党插足又不引起麻烦，斗争策略必须讲究，所以表面上保持一个没有任何党派地区，因此我们党不公开面目，而以实行民主政治的形式开展工作。

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我们办报的方针和指导思想是，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充分利用苏军驻守的有利条件，以实行人民民主政治为目的，策略地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鼓舞群众积极参加民主革命的政治斗争。同时揭露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罪恶面目及

其发动内战的阴谋，宣传反奸清算斗争，提高群众阶级觉悟，跟着共产党，翻身闹革命。

1946年国民党疯狂发动内战，形势发展关系到整个中国的命运。解放战争的进展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当时有些人对国民党存有幻想，特别是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和我军撤退延安的情况，对当地群众的心理影响很大。根据这种情况，我们的报纸在宣传报道上突出抓战局变化和重大胜利消息的报道，鼓舞斗志，提高大家的胜利信心。除了在报上发表新华社的重要文稿、大字号登载胜利消息外，还及时印发号外等。

旅大地区当时由于遭受国民党封锁，群众生活十分困难。报纸在这方面除了宣传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外，重点宣传典型，传播经验，鼓舞群众的生产热情。这对于推动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民众报》实质是旅顺市委的机关报，但是对外出刊的名义是由“旅顺民众联合会”主办的。在宣传口径上严格掌握分寸，不照搬关内解放军那一套。最突出的表现是对电讯稿的处理，我们不单纯发表新华社的文稿，有些可资利用的东西，我们也采用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和中央社的电讯稿。但主要还是刊登新华社的电稿，不过电稿中的某些文字要另作处理，如“蒋介石”以“×××”代之。为避免版面上新华社字样太多，有时也删去电头，而以地名代之，如“晋察电”、“重庆电”、“太行电”等。

这样的灵活性和策略性的运用，开始时我们的思想不是很痛快接受的。特别是我，刚从解放区来，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行径深恶痛绝，每当收到新华社发出的解放战争前线的胜利消息以及党中央谴责、揭露蒋介石阴谋，鼓舞全国人民斗志，令人欢欣鼓舞的文章时，总想在报纸上一字不改地发表出去。我们确实就曾经多次这样做了，因此引起苏军领导的很大不满，为此曾3次责令我们把发售出去的报纸全部收回销毁。

由于这种事不断发生及报纸发表文章时的其它问题,1946年冬的一天,苏联驻军政治部主任(上校),把当时地委书记韩光同志从大连请到旅顺,他亲自到报社来,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我。由刘亚楼同志(他当时是苏军少校,化名王松)作翻译,旅顺市委书记王其人同志也在场。他们都正面给我一些开导,从大局着眼讲明道理。这次谈话对我帮助很大,认识提高了,思想也通了。此后处理稿件比较谨慎,再未发生类似问题。

当时苏军政治机关对报纸抓得很严。每日出版的报纸,都要在头一天成版打出大样,交苏军派来的专人逐字审阅。他不同意发表的文稿,当即撤掉,换上的新稿件,经他看过认可才能发,有的稿件他还亲自动笔修改。

《关东日报》始末

任凤林

《关东日报》是旅大地区政权机关——关东公署的机关报。创刊于1947年5月20日，1949年3月31日终刊。

1945年8月大连解放后，市人民政府接收日系中文报纸《泰东日报》，于10月30日出版了市政府机关报《新生时报》。1946年夏，国民党在全国重新挑起了内战，并企图将内战烽火引向旅大。国民党政府委任了旅顺和大连两市市长，准备“接收”旅大，企图变旅大地区为国统区。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可在大连行使行政权，国民党利用这个条款，向大连派来“视察团”。针对当时形势，我党采取的方针是：团结全区人民，建立“实行政治经济的民主，对抗四大家族统治的统一战线”，要以服从苏方外交政策为主，积极争取好的可能，保证胜利成果，还要准备在坏的形势下，做秘密、隐蔽的斗争。为此，1947年4月初，旅大地区人民代表大会在旅顺举行，决定撤销过渡性行政机构——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宣布成立了旅大地区统一的合法政府关东公署。为适应形势需要，大连《新生时报》与旅顺《民众报》合并，出版了关东公署机关报《关东日报》。

当时，旅大地区除有苏联驻军司令部办的《实话报》（中文报纸）外，由我党办的市级报纸有两家，即以市总工会名义办的党的机关报《大连日报》（1949年4月1日以前党不公开）和关东公署机关报《关东日报》。中共旅大地委为《关东日报》确定的任务是：“公布政府的政策法令，宣传解释政策”，“经常反映政权建设情

况”，也要把“介绍与宣传苏联与世界和平民主各种活动及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解放运动作为头等重要任务”。《关东日报》的发刊词中，在阐明关东公署立场和施政纲领后指出：“我们将基于自身的权利和义务，按照共同的意志来管理和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的民主事业和生活”。表达了旅大地区人民建设和平民主繁荣的新旅大，反对国民党当局“接收”阴谋的决心和信心，接着又严正申明本报是“代表人民说话，坚持广大人民利益的人民大众的报纸”，“热烈地期待着本地区一百五十万父老兄弟，对自己的报纸负起责任”。

在近两年的时间里(22个月零10天)，《关东日报》始终根据关东公署“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总目标，积极宣传报道了旅大地区人民处在周围战争环境和国民党“封锁”的情况下，冲破种种困难，发展生产，打下牢固的民主建设基础的情况；宣传报道了公署各项政策法规的贯彻执行情况；反映了各界群众生活逐步改善和他们的民主呼声。如：为了防止东北各地已被禁止流通的苏军用币流入我市，粉碎国民党破坏我区经济的阴谋，在苏军当局统一部署下，进行流通币登记盖印工作的报道；旅大地区1948年经济计划大纲的报道；全区实行统一薪资制度与标准的报道；工农业生产战线上的增产、创模、竞赛运动的报道，等等。这些报道对旅大地区的生产发展和政权建设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指导作用。与此同时，该报还采用关东通讯社提供的电讯稿，用一定篇幅突出宣传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报道了国统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的解放运动，对提高广大人民觉悟，破除盲目正统观念均起了较好作用。

鉴于苏军的驻在和实行军管，该报坚持以服从苏方外交政策为主的方针，不给国民党以把柄，在宣传报道上采取了一些灵活的方式和策略，在本质上仍坚持了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报道旅大地区政权建设成就时，有的就选用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的提法。如在报道搬家运动时就强调了这是中山先生民生主义具体

工作之一。在时事形势宣传上,对我党中央领导人和新华社的重要文章,均不在报纸上直接利用,而采取出加页或增刊形式发表,随报纸附送读者。如:毛主席给《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纪念十月革命 31 周年所写的论文《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和新华社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 年新年献词)、新华社记者评蒋介石“求和”声明等,均用加页形式发表。对时事电稿,除大量选用关东通讯社消息外,还适当选用了新华社、中央社、塔斯社的电稿。解放军进驻北平的消息,就是先用塔斯社电稿,发表在 1949 年 1 月 28 日第一版上,比新华社电稿早见报 4 天。为了避免给苏方外交造成被动,对新华社电稿中有些用词也加以改写或删除。“国民政府”改为“南京政府”,“国民党统治区”改为“南京政府统治区”,“国民党军”改为“政府军”,“蒋介石”改为“漏三字”,等等。

该报在及时刊登一些报道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建设成就以及揭露美国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消息同时,还转载或撰写多篇文章,不间断地宣传了世界各国人民和平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

《关东日报》的读者对象,重点是各级政府、学校、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为满足他们的需要,特开辟了“学联园地”、“关东教师”、“文教通讯”、“艺潮”等栏目。这些栏目分别由中学学联、师联、新教育学会、社教工作团等有关部门主编,颇受读者欢迎。

该报在贯彻全党办报方针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一是经常召开通讯员会议征求意见,讨论改进通联工作,并在报纸上发消息;二是经常在报纸上公布当前采访报道提纲,指导通讯员开展工作;三是在报纸上开辟“通讯业务”专栏(每半月一期),刊登辅导讲话,交流写作经验;四是建立了特约记者、特约通讯员、基本通讯员等不同层次的宣传报道骨干队伍。

该报创刊初期为对开 4 版日刊(有时出对开二版)。1947 年 7

月 20 日起改为对开 2 版。同年 9 月 1 日起,因社址搬至旅顺,各方面条件限制,改为 4 开 4 版隔日刊。同年 12 月 1 日起又改为对开 2 版日刊(有时出 4 版)至 1949 年 3 月底终刊。

该报社址几经变迁。创刊初期在大连市松山街 5 号(现劳动公园西门外,畅通街 3 号);1947 年 8 月搬迁到关东公署所在地旅顺,社址在旅顺博爱街 5 号;同年 12 月迁回大连,暂时在中山区智仁街办公(现市中医院对面山上);1948 年 1 月底搬到中山区民生街 55 号(解放前协和饭店大楼),印刷厂在新生街 67 号。

《关东日报》的发行份数,创刊初期是 17 000 份,1947 年六七月份上升到 25 400 份;搬迁旅顺后,下降到 13 000 份,1948 年初开始回升,5 月份上升到 18 000 份,终刊前已达 20 000 份。向外赠阅及与各解放区交换的报纸约 2000 份。

《关东日报》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来自大连《新生时报》和旅顺《民众报》,一部分来自《大连日报》。以后又从学校陆续分配来一批青年学生。全报社采编人员约四五十人。江清风(旅大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关东公署教育厅副厅长)兼任社长,段洛逸任副社长(主持日常工作),1948 年 9 月段洛逸调离后,陈颖任代理社长,直到《关东日报》终刊。

该报组织机构分为 3 大部:编辑部、采访部、经理部。

编辑部由陈颖兼任部长,商白苇任副部长,1948 年商调离后,林针、赵青远任副部长;采访部初期由陈润斋任部长,陈调离后,由梁山任部长,岳民任副部长。先后担任编辑和采访、通联科长及资料室主任的科级干部有邵默夏、洛鹏、徐敏、钱坤等同志。

曾在该报编采部门工作的人员先后有:王坚、王长美(王军)、王静懿(女)、王联甲、白雁(赵承玺),白莹(女)、文安禄、申生、李允之、李子青、迟敏、刘辛、任巩、周化南、周枫林(女)、高建新、王丙炎、韩建堂、张星华(女)、于振涵、周岷源、钟宝亮、杨伟(女)、袁玉蕙(女)、施瑾(女)、陈野菲(女)、郝墨林、唐原中、鲁晨、徐振武、孙

锋(女)、赵承作、何英、周福山、刘平、孙宝琦等。

经理部的人员主要有：杨华亭(经理)、韩冈矿(副经理)、刘心一(秘书主任)、李长春(印刷厂厂长)、于永志(副厂长)、佟治国(发行科科长)、曲国祥(广告科科长)、于福堂(总务科科长)、陈毓凤(会计科副科长)。各科室工作人员还有：李广平、刘风华、崔纯凤、李凤五、魏景芳(女)、杨玉未、吕永春、范永嘉等。印刷厂工人近百人，印刷设备较齐全，有一台轮转机，有铅字铸造机，有制锌版设备，除印报外还对外营业。

报社有中共党支部(不公开)划分为两个小组，党员 20 多名。先后担任支部书记的有刘心一、梁山、魏景芳等同志。当时，在老解放区来的党员领导干部带动和影响下，绝大部分党员在斗争形势复杂、生活较艰苦的环境里，较好地发挥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报社机关内形成了党风端正、廉洁奉公、团结协作的好风气。编辑部门干部集体住宿，星期天放假回家，大家都能自觉遵守纪律，按时返回报社。党员组织生活比较健全，按时召开党小组会，相互谈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因当时党仍处于秘密状态，生活会都在下班后进行。在整党活动中，大家都能按组织要求，向党忠诚地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和个人家庭、历史情况，请组织和同志们帮助。有的新党员把自己在形势险峻时的思想活动，都原原本本地写进思想汇报中。报社对职工要求也很严格，认真执行纪律。有一年轻记者(革命干部子弟)，采访作风不深入，生活作风不正派，搞假报道，经济手续不清，屡教不改。报社便召开全体干部大会，主要领导宣布处理决定，并登报声明予以辞退，使干部、工人普遍受到教育。

1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全国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共旅大区党委决定于1949年4月1日公开党的各级组织，《大连日报》与《关东日报》停刊，另出区党委机关报《旅大人民日报》。1949年3月31日《大连日报》与《关东日报》同时发表联合启事，宣布自4月1日停刊。

越过大兴安岭(摘录)

柳德尼科夫

……我所在的第39集团军参谋部作战小组,在南下途中曾在奉天(沈阳)逗留了几个小时。大街上站满了人。在欢乐的中国人群中,我们还遇到一批以一个将军为首的美军战俘,他们是被我军所释放的。到处都能听到欢呼声、充满热情感激的话语。但是,苏联人民从未忘记,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八年抗战中,英雄的中国人民表现出了怎样的献身精神。我们还想到了其他民族在抗击远东侵略者的艰苦斗争中所作出的贡献。

我们作战小组曾在辽阳稍事停留,而我则与军委会委员博伊科少将和炮兵司令员博扎诺夫中将乘轨道车来到营口;这时,第113蒂尔西特步兵军的先头支队已进入那里。我们参观了市容,视察了军事设施,与部队指挥员举行了座谈。大家的共同心情用这样一句话表达了出来:“瞧!这次战争快要结束了!”一个联络官找到了我,并递交了一份无线电报:速返辽阳——速回军参谋部。

这是1945年8月的最后一天。

这一天,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命令39军,以两个步兵军和一个机械化军及其配属部队的兵力,在新的部署地区集结。我读出了39军参谋部作战小组即日即应开赴的目的地,这就是——旅顺口。

后贝加尔方面军副司令员伊万诺夫中将是旅顺口的第一任苏军警备司令官。伊万诺夫将军与别洛杰德少校指挥的空降兵从奉天起飞。空降兵于8月22日在旅顺口以北八公里处空降。随后,

水兵、坦克兵开赴那里，而我集团军部队则开始在辽东半岛集结。

苏联武装力量在击溃日本侵略者以后，解放了中国东北，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在旅顺口，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向我解释了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根据苏联和中国的条约（即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译者注），39军留驻租借地区，并归属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指挥。

在与其他苏联军队相脱离的情况下，在由于日本占领而产生的困难条件下，在和平来临只有几天的特殊形势下，我们投身去完成我们所肩负的新的任务。

在击溃日本军国主义以后，苏联军队在中国东北所处的环境极为特殊。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蒋介石在全中国展开了发动内战的大规模的准备工作。在辽东半岛，在我们进入那里的时候，党组织刚刚开始组建。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一系列卑劣的反苏挑衅。例如，在奉天，国民党25师的醉兵亵渎苏军坦克兵纪念碑，捣毁苏军墓地；那里安葬着在从日本占领者手中解放中国东北的八月战役中阵亡的将士。

国民党在得到美国政府的大量军事援助以后，开始了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苏联军队则忠实于国际主义义务，给予中国革命力量以竭尽全力可能的支持和帮助。由于这种帮助，中国东北的分散的中共军队能够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投入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逼这支军队。艰苦的鏖战开始了。

我想起了在旅顺口与东北中共军队军委委员肖劲光的会见。他来这里是为了向我们通报前线的危急状况，并请求予以帮助。这时，国民党军队已进驻奉天，占领四平和长春，企图强渡松花江。在东南满，国民党进攻临江，企图切断解放军的根据地与北朝鲜的联系；在南满则进抵我们的租借地区的北界。

在我们的会谈中，肖劲光说：

“现在，国民党准备进攻哈尔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与旅顺口和大连的联系将被切断。为了抵御敌人，我们有足够的兵力，但不足的是武器。”

在这里应当说，中共军队这时与国民党作战当然不是赤手空拳的。在击溃关东军以后，关东军的所有武器和弹药，均被苏军司令部移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而战利品又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在会见时，肖劲光请我们把苏军在朝鲜缴获的战利品转交给东北解放军，而在朝鲜的日军并不属于关东军的建制。这一要求被呈报给了我们的司令部（即苏联滨海军区司令部，这时39军归该军区指挥——译者注）。滨海军区参谋部的代表迅速飞往平壤。几天以后，他向苏联元帅梅列茨科夫（时任苏联滨海军区司令员——译者注）作出汇报：从北朝鲜向中国边境发出了两列车的武器，以供中共军队使用。

还有一个解放军的使者——参谋长刘亚楼很快来到了旅顺口。他抱怨说，缴获的日本飞机难以使用。

“马达不转，因为活塞环磨坏了，请予帮助！”刘亚楼对我们说。

活塞环磨损得很厉害，以至于专家们都拒绝予以修复。新的活塞环我们没有，但帮助中国同志是应当的。于是，我们当时决定，在修理我们的坦克的修理间里，组织生产配合缴获的飞机的活塞环。我们的战士完成了这项工作。不久以后，刘亚楼从旅顺口带走了一大批新的活塞环。

当时，中国的交通处于完全瘫痪的状态。中国长春铁路（中长铁路）被国民党切断了。同时，抗击蒋介石军队的军事行动的成败，取决于能否把解放军迅速转移到集结地区。这支军队迫切需要铁路运输，特别是机车。我们得到了滨海军区司令部的命令：从旅顺口出发，穿过对马海峡，向朝鲜的清津港运送20辆干线货运机车，以供解放军使用（以后这些机车从朝鲜调运到东北，运送到中共军队活动的地区）。

执行这项命令曾是异常困难的：在旅顺口没有用于把机车装上军舰的机械。不得不使用还在1904~1905年保卫旅顺口时（即日俄战争时期——译者注）建造的唯一的一座旧吊车，并用槽形梁予以加固。我们的士兵沿着码头的尽头铺设了一条铁路支线。风险是很大的，人们竭尽全力，昼夜工作，但我们还是完成了这项任务。

有必要回忆一下大连的工矿企业是如何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例如，在大型船厂“大连船渠”（即今大连造船厂——译者注），曾为解放军建造并修理过舰船。

苏军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事例不胜枚举。苏军司令部不仅要用武器、弹药和军械帮助解放军，而且还要对付国民党和竭力支持蒋介石的美帝国主义的阴谋。

美国第7舰队的舰只不断地从青岛向黄海西岸游弋。我们的海防部队密切监视着这些“演习”。1945年10月底，大连的苏军警备司令部通过无线电台收到一份电报，内称美军分舰队要求允许进入大连港，以便与我们举行极为重要的会谈。旅顺口海军基地司令员齐帕诺维奇海军少将向这支不速之客发出命令：“勿入港口，分舰队着令横向停泊大山岛。”

美军分舰队被迫停泊在外锚地。美军分舰队司令的代表扛着海军大尉的肩章，乘坐摩托艇来见大连警备司令官科兹洛夫（旧译高字洛夫——译者注）中将。他有一个俄罗斯人的姓氏——谢尔巴科夫，并操着一口俄语。谢尔巴科夫以分舰队司令塞特尔海军中将的名义，要求允许分舰队进入港口。

科兹洛夫将军就此向我作了汇报。在听取了他的报告以后，我立即与苏联元帅梅列茨科夫取得了联系，并向他通报了局势。我很快就向科兹洛夫中将转达了明确的指示：不得与美军分舰队司令的代表举行任何会谈，亲自出海去见美国海军中将，在弄清其进入大连港的意图以后，建议他们立即离开我们的水域。

科兹洛夫及其译员一起来到一艘美军巡洋舰。在通常的互致问候以后，塞特尔海军中将通知科兹洛夫中将，分舰队正在执行美国第7舰队司令的命令。根据这项命令，他应在这一连接南满铁路的港口地区进行实地勘察，因为这是中国东北南部唯一一座可以停泊大型船舶的港口。这样就能把蒋介石的军队迅速调往这一地区的腹地。美利坚合众国第7舰队根据蒋介石本人的“坚决要求”，应从上海地区转运几个集团军的部队。

“这是不可能的。”科兹洛夫将军断然声明。“该港属于租借地区，根据条约由苏中混合委员会管理。没有得到该委员会对美军分舰队进入大连港的批准，而这项批准本身就要求两国政府取得协议。可是，有国际航海公约在，根据公约，塞特尔海军中将的义务将自己的分舰队撤到离岸20海里以外。此后才能向我的司令员汇报会谈结果。”

“我执行我们司令部的命令。”塞特尔海军中将厉声厉色地说。

“我也正是如此。”科兹洛夫中将同样严厉地回答道。

塞特尔继续纠缠，科兹洛夫不得不提醒美国海军中将注意我们的海防部队。我们的海防部队了解自己的任务，并出色地胜任这项任务。

在这之后，科兹洛夫中将离开巡洋舰。美军分舰队不得不滚了回去。

可是，挑衅还在继续。我记得，我们的空防阵地曾发出警报：50架美军飞机朝旅顺口方向飞来。这群飞机很快就出现在该市上空，其中的几架还进行了超低空飞行。

根据苏军司令部的命令，我们的飞机腾空而起。其中的一架歼击机把美军飞行员逼到了水面，大概使这个不速之客感觉到了，旅顺口的上空是一片令人胆战心惊的天空。

我们通过无线电台呼叫我们的这些旧盟友：

“如何解释美国空军的行径？”

得到的回答是：

“美利坚合众国空军向旅顺口的俄国人致敬。”

我们断然要求不要重复类似的“致敬”。

还可以举出其他的事实，以证明美帝国主义试图把中国东北变成自己的战略基地的企图。不难想象，对世界——首先是对中国人民来说，美帝国主义的类似行动包含着怎样的危险性。

由于苏联的帮助，194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向蒋介石的军队展开了决定性的军事行动。解放军的兵团可以大胆地进行作战，而不必担心蒋介石通过大连港运送必要的后备力量。旅顺口地区的苏联军队以其所处的战略地位，保证了解放军进行辽沈战役。作为这次战役的结果，中国东北的国民党军队被完全击溃了。

（柳德尼科夫，原苏联上将，苏共党员，苏联英雄。1917年参加苏联红军，历任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员等职。1945年9月1日率领苏联第39集团军进驻大连。本文摘自柳德尼科夫的长篇回忆录《越过大兴安岭》中有关苏联39军进驻大连前后的部分。 周凤啸译）

解放的使命(摘录)

博伊科

根据 1945 年 8 月 14 日的苏中条约,第 39 集团军(司令员柳德尼科夫上将、军委会委员博伊科中将)部队部署在海军基地旅顺口地区。1945 年 9 月 1 日夜间,39 军军委会和指挥机关的大部分抵达旅顺口。

一大早,当我们刚从车厢里出来,一个担任苏军大连警备司令官职务的上校就被介绍给我们的司令员。他说,他是根据中国公共团体的请求而来的;中国人主张在大连和邻近地区组建政府机构。他们请求于 9 月 2 日的适当时间在旅顺口安排与苏军指挥人员的会见。对于这种会见我们尚无准备。军参谋部还设在车厢里。此外,我们认为在大连进行这种会见更为合适,这样一下就能与所有的公共团体会谈。会见被安排在 9 月 3 日 11 点……

在出发到大连以前,我和柳德尼科夫决定再次仔细研究确定我们在辽东半岛南部的地位和任务的条约和协定。

1945 年 8 月 14 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民国友好同盟条约》,奠定了苏联和中国人民友好睦邻关系、在对日作战中以及战后军事援助的基础。在《关于旅顺口之协定》中,规定了苏军与中方的相互关系、苏军的任务和驻防区。

这项协定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条 “中华民国政府同意,两缔约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

第二条 “前条所开海军根据地区域之正确界限,应依所附之

说明及地图之规定……”

第四条 “上开海军根据地之防护，中国政府委托苏联政府办理之……”

第五条 “该区域内之民事行政属于中国。中国政府对于主要民政人员之委派，将顾及苏联在该区域内之利益。”

协定附图所示的海军基地的界限与关东半岛的界限完全吻合。其北部边界通过旅顺口以北 120 公里处的石河驿。此外，所有分布在毗邻半岛水域的岛屿均属协定地区。

苏中条约就其目的、内容和精神而言，完全符合双方的利益。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它开辟了在反对日本占领者的斗争中全面合作的道路。

条约规定了双方不与日本谈判、不签订单独媾和条约和在一方受到攻击时彼此给予援助的义务。

在 1945 年 8 月离开莫斯科之际，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以国民党政府的名义声明：“我无以言喻地高兴和欢欣鼓舞。因为在这里，一方面我参与奠定了远东持久和平的基础；另一方面我看到了最后一个侵略国的彻底溃败。在离开莫斯科之际，我谨热烈地祝愿我们的伟大邻居——苏联及其人民前途无限光明和幸福。”（《真理报》，1945 年 8 月 16 日）

条约为苏联提供了在远东执行其解放的使命的可能性，为中国民主力量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它帮助中国人民捍卫了自己的民族独立。

……柳德尼科夫、科兹洛夫（旧译高字洛夫——译者注）和我于 9 月 3 日 11 点以前到达大连。人们已在等待我们。在一个比较小的大厅里，聚集着大约 100 人。这是该市实业界的代表——商人、城市知识分子和一大批市工会的人员。还在街上我们就被告知，没有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会见，因为在大连完全没有共产党人（当时大连有党组织和党员活动——译者注）。

我们被介绍给聚集在这里的人们。柳德尼科夫向公共团体的代表祝贺他们从日本占领者手中获得解放，并祝愿他们在自由、独立的中国的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

大厅里爆发出阵阵掌声。我们受到热烈欢迎；人们感谢红军和苏联人民把他们从沉重和屈辱的日本占领下解放出来。谈到日本占领的沉重年代，许多人眼里噙着泪水。随后，我们被请到一个单独房间里，以便听取关于大连和关东半岛形势的专门报告。

房间里悬挂着蒋介石和斯大林的画像、标有许多各色箭头的巨幅大比例地图。这里聚集着 25~30 个中国人。作为领导人，一个姓迟（译音）的商人被介绍给我们。一开始，他就提出了我们也感兴趣的问题：关于组建中国地方行政机关的问题。

“根据条约，”迟说，“中国地方机构应由国民党政府组建。公共团体的领导已就在大连筹备成立地方机构事宜通电政府，冀盼全权代表莅临，俾能迅速解决此项问题。”

“我们得知，”他继续说，“通电已经政府收悉。但对我们的请求却未予答复。与此同时，形势——特别是在大连——却很复杂，并且日趋恶化。海港和铁路上的情况尤为突出。城市随便进出。由不明身份的人组成的武装团伙对居民的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存在着抢劫和土匪活动。我们恳请贵军首长，”他强调说，“解决下列刻不容缓的问题：首先，大大加强城市的警备工作，责成警备当局全面负责维持市内秩序。现已不起作用的警察机构应置于市警备司令官的监督之下。其次，在中国行政机关成立以前，保留日本人的管理机构，令其负责交通、供电和供水工作。日本行政机关的活动也应置于警备司令官的监督之下。我们保证全力协助警备当局，并从中国居民中挑选为此所需的积极分子……”

随后，迟走到大地图跟前，显得对复杂的形势了如指掌，继续说，“大连，”他强调说，“是一座大城市。目前，市内居住着大约一百万人。许多工人和市民沿关东半岛东海头居住，并有大量人口居住

在西海头中部。居民的饮食约 60% 是鱼类。主要的捕鱼业集中在关东湾。这里有丰富的鱼类储量和高品位的鱼类。市内的蔬菜和食品供应也主要来自这一地区。

“因此，我们向首长提出认真的请求——考虑这些情况，并使苏军的部署能使关东的统一不受破坏。在大连以北地区，有许多日本兵营和仓库，经过修理以后可供苏军使用。”

最后一个请求——在协定地区以外大约 8~10 公里的范围内部署军队——无法得到满足。柳德尼科夫答称，我军无权在石河驿以北进行部署。中国人的其他请求则将予以考虑……

我们热情地感谢了所有参加会见的人，他们作了对我们颇有裨益的通报。我们答应尽快研究所提出的问题。

所有这些除了 39 军军委会谁也无法解决的问题迅速得到解决。在返回的路上，我和柳德尼科夫预先讨论了这些问题，并于当天由军委会作出以下决定：

——在中国行政机构成立以前，在大连的所有行政和管理职能，由日本关东州厅长官在苏军警备司令官的领导下继续执行；广泛吸收中国积极分子进入各部、局，以取得工作经验。

——任命 39 军副司令员科兹洛夫中将为大连市警备司令官。

——任命 39 军参谋部谍报处处长沃洛申上校为旅顺市警备司令官。

第二天，所任命的警备司令官及其副手即行赴任，与中国积极分子——特别是工会人员合作，履行自己的职责。

在关东执行防务的 39 军军委会，面临着在半岛上恢复正常生活的大量的和责任重大的任务。中国人民的极端贫困，他们完全无权的地位，低下的文化水平，居民几乎全是文盲——这就是日本统治者在其身后留下的烂摊子。

毫无疑问，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提高中国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向他们伸出友谊和援助之手。

首先,我们需要研究关东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及其经济和其他触及我们的问题。

我们从人口统计资料开始。在苏军到来以前,这里居住着 120 万人。但是,由于这一地区的大门是敞开的,所以居民的数量每天都在变化。到 1946 年 10 月中旬,中国自治机构确定居民已达 150 万人。其中大约 100 万人居住在大连地区,而在市内约为 70 万。

居民如此显著的增加,源于日本人从满洲腹地和中国人从毗邻辽东半岛的黄海诸岛的涌入。

当然,居民的大部分是中国人。但在日本占领的漫长岁月中,许多日本人——大约 29 万——移居到满洲,特别是关东半岛。其他居民有朝鲜人(7000)和俄罗斯人(1000 多一点)。

从社会成份来看,居民的构成如下:农民——35 万以上,工人——约 30 万,职员和商人——约 18 万。工人、职员和商人主要居住在大连市内。

大连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建城。在这里建城得益于大连在关东半岛东岸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其大小海湾。大连是一座不冻港,是在经济上与东西方许多国家有联系的东方大港之一。

大连与满洲的其他大城市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风貌。它的建筑风格,特别是在中心地区,是纯欧洲式的。银行、商社和其他机关的建筑使人想到西方的影响。别墅、旅馆、饭店反映了上流社会的风情。

街道笔直、宽广。巨大的广场,处处的绿茵。邻近的港口里停泊着无数商船,有小型船只,也有远洋船舶。

大连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它的夜景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霓虹灯在夜幕下的中心街道上闪烁,把商店的橱窗映得五颜六色;远处闪着停泊在锚地上的舰船的灯光。

与此同时,这是一座对比鲜明的城市。在市中心,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在郊区,穷人住的简陋茅屋密密麻麻。

在大连，总共只有一个受过航海教育的中国籍领航员。日本人所以把他留在这个职务上，只是因为他有很高的专业技术水平；而且对于这样一座诸岛环抱的巨大港口来说，简直就没有人能代替他。在关东如同在整个满洲一样，工程技术人员以及高级专业技术工人的职务只由日本人担当。因此，在火车司机及其助手中间，我们没有遇到一个中国人。与此同时，干粗活的工人只由中国人充当，尽管他们许多人有很高的手艺。同样的工作，日本人赚的工资比中国人高二~三倍。

在我们苏联专家的领导下，在大连创办了第一批旨在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和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培训班和夜校。中国工人对此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他们白天工作，夜间学习。这样的学习运动在大连和关东半岛的其他城市广泛展开。

我举这样一个事例。由 39 军政工机关用中文出版的《实话报》的主编西季赫梅诺夫中校在那些日子里写道：

“三个中国姑娘——田桂英、李桂英和王宝红，在苏联专家雷索夫的帮助下，掌握了火车司机的专业技术。为此，在火车站前广场举行了集会。集会以后，姑娘车组驾驶火车出了第一趟车。人们密集地排列在铁路两旁，热烈欢送中国人民的光荣儿女。在火车经停的每个车站，人们向姑娘们献花，紧紧地握着她们的手，高呼铿锵有力的口号，向她们致敬。

“三个中国姑娘掌握了火车司机的专业技术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中国。她们的劳动功绩成了对全体中国妇女的号召——积极地、大胆地掌握技术。”

这样的例子很多，这些事例使中国人——特别是青年工人感到欢欣鼓舞。

关东半岛上的农民过得很苦。只有 5% 的人被认为是富裕的，而约 40% 的人是贫雇农。日本人在的时候，他们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例如，殖民当局禁止农民自种大米和小麦。只允许种高粱和

小米——两种粗粒作物。

关东的土地是砂屑泥质、致密碎屑土质。最难种植粮食作物和蔬菜的土地在旅顺口地区。环顾全市，举目望去，到处都是光秃秃的石山头。即使要在山坡上开出很小的一块地、一段田和一条崎岖的小路，也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而要获得说得过去的收成，需要大量的有机和矿物化肥。农业的主要牵引工具是驴、骡、马，很少见到水牛。土地的耕作工具还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上：犁、镐、锄。

中国人民是非常勤劳的人民。到处都能看到他们起早贪黑地在自己的地里忙碌。生活迫使他们在日常需要方面十分节俭。农民通常是有经验的渔民。从事捕鱼业遭到日本人的严厉限制：他们不许中国渔民出远海。

关于日本统治时期的凄惨生活，有一次一个叫林明山（译音）的农民对我们讲道：

“爹给俺留下 9 亩地，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地；一张犁，一把锄，还有一头骡子。两个小子长大了，俺就和他们一起从石头缝里又抠出 6 亩地；还租了当地地主的几亩地。在俺的地上没休没息地干活，一天就是 18 个点。1944 年打了 1200 斤苞米、小米和高粱。可是，‘小鼻子’简直就是骑在俺们的脖子上，不让俺们安生。警察拎着帐簿来了，就给俺们每口人留下 30 斤。八口人就是 240 斤，连一斤也没有骡子和鸡鸭的。其余的 960 斤俺们得交给日本人。不交可不行啊，代价太高啦：罚款、殴打和逮捕。年年都是这样。给俺们中国人规定了 33 条禁令，每条都得记牢靠了。不让的事太多啦，太多啦；”林明山这样讲完了他的话，“而最主要的——就是不让你象个人那样生活。”

在这些禁令中有这样几条：中国人无权买玻璃给阴暗、潮湿和寒冷的房子镶窗户，无权给家人买衣服和鞋。一年一次凭证供应男人一双胶鞋。妇女和儿童连这也无权奢望。所有的人都穿着破烂衫，披着草蓑，赤着脚。商业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林明山讲到，他

的一个邻居一次因家里办喜事而“盛装”上街。可是“小鼻子”一发现他这一身打扮，立刻就把“罪犯”投入石河子军警局。在那里审问他从哪里买的这身衣服；结果“肇事者”——卖衣服的人和老板遭到逮捕。中国人不能吃大米，他们只能吃高粱、小米和苞米。禁止读报，甚至禁止搞一切民间喜庆活动，禁止迎新年……在枪毙的威胁下，禁止从自己的村子移居到其他村落。

在红军到来以前，农民根本没有医疗保障。此外，他们也害怕求医。

随着我军的到来，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俺们现在一条禁令也没有啦，俺们自由啦。”林明山说。他请我们的军官到他的房子里去。那里明亮、干净。窗户上镶着玻璃，炉膛里响着劈材的噼啪声。这个农民请我们的军官吃用筷子包的饺子，喝热茶……

我们到处都感受到了中国居民对红军战士所表现出的真挚热情。我们的关系简单而明了。中国人民看到，我们向他们伸出了友谊之手，给他们带来了和平和安宁。我们没有也不试图指点中国人应该怎样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在与工会积极分子的最初几次会见中，我们说过，我们可以帮助恢复经济，培养干部，发展教育，传授自己的经验。这条路线我们在实践中也是予以遵循的。

在我军到来以前，在关东半岛上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苏军进入以前大连有党组织和党员活动——译者注）。但是，在1945年9月的最初几天，他们已经开始出现在旅顺口和大连。这些半岛上的第一批共产党员成了工会的组织者。

工会组织在关东发展很快，并且从最初几天起就不仅是最具群众性而且是最具影响力的组织。到10月15日，仅在大连已有约5万名在总工会领导下的工会会员。在整个关东，工会也是如此迅猛发展。到1946年底，工会会员超过19万人，其中12万在大连。这是一支行政机关和其他组织都要予以考虑的力量。

1937年入党的中共党员唐韵超被选为总工会委员长。我们得

知,这是一个有经验的领导人,出色的组织者,积极的共产党员。

1945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决定,加强党在大连和整个关东的影响;在大连成立地委。地委书记是韩光,他于10月上半月来到大连。韩光是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

关东的党组织迅速发展起来。还在大连、旅顺和金州的党组织正式成立以前,已有490多人被吸收加入党员的行列。党组织的组建过程也是如此迅速。在11月上半月成立了下列党组织:大连地(市)委、旅顺市委、金州县委。

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决定,他们在关东的所有工作应当秘密进行。但是,有关他们活动的传闻很快就传播开来,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生活提出了严肃而迫切的任务。其中最重要的是:刻不容缓地组建地方自治机构,在居民中进行宣传和解释工作。问题在于,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还在组建的时候,国民党的反动势力已攫取了主动权,并公开地或较为隐蔽地进行反对组建工会和自治机构的鼓动工作。

根据韩光的坚决要求,39军军委会和政治局听取了他的关于近期拟定工作的通报。整个来看,问题的提出是正确的,尽管具有过于一般化的性质。在这之前,我们对关东的形势已有相当详尽的了解,因此我们有向中国同志提出的建议。我们谈了具体的情况。韩光及其同行的同志为此而向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随后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意见交换。

我们与中共党组织的联系是系统性的,并且无疑是有益的。党组织对整个生活的影响增强起来。党员的队伍明显地得到了补充(1946年6月关东党组织有约4000人)。中共的大批组织建在乡、区,建在最重要的企业和机关。这就促进了我们与居民的关系的发展;这种关系日益巩固,并且结出果实。在我们进驻关东的所有年月里,这种关系就是如此。如果有时发生一些误解,那么在这种和睦的相互关系下,这些误解很快就会消除。

中国居民和日本居民之间的关系极度紧张。日本人无法无天，不尊重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压抑他们的人格尊严，这些现象不久以前在这里还是那样强烈，自然也就产生了报应。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建立中国行政机关的公共团体以及工会，都向我们提出把日本居民置于红军监护之下的请求。根据这种形势和许多其他情况，提出了迅速组建中国自治机构的问题。

*

*

*

1945年10月中旬，关东半岛的日本行政机关已不工作，而中国行政机关尚未建立。因此，在关东半岛——特别是在大连，形成了紧张的形势。所有的行政管理问题，均由公共团体的积极分子缓慢而又迟疑不决地加以解决。由于居民的大量涌入，市内出现了一团糟的局面。发生了偷盗甚至抢劫的事件。中国人、日本人甚至警察都向我们抱怨，请求我们恢复市内秩序。

主张建立中国行政机关的公共团体几次找到蒋介石政府，并等待其代表前来解决组建民政机关的刻不容缓的问题。但是，蒋介石政府却表现出毫无兴趣的态度。当时，我们没有找到答案，来解释对象履行条约义务这样重大的问题采取这种冷漠态度的原因。需要时间才能搞得清楚，问题并不在于不感兴趣，而是在于一项得到美国代表赞同的有预谋的政策。这项政策的宗旨是要引起混乱，为蒋介石和美国的军队进入关东半岛创造条件。因此，问题就是如此：在关东——特别是在大连，形势越是复杂和恶化，越是有利于蒋介石和美国人。

公共团体在工会的积极支持下，在组建中国行政机构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和有益的工作。在这方面，两个观点最为客观和成熟的团体——“维持会”和“总工会”在大连展开了十分尖锐的斗争。最大的和最有影响的组织，一开始是由最反动的商业资产阶级分子组成并得到警察力量支持的“维持会”。它是国民党右派力量的化

身(这个组织的许多成员以前曾与日本人相勾结)。但是,这个组织的威信逐渐跌落,人们亲眼目睹了它的瓦解。“总工会”一开始并非如此人多势广。会内联合了进步的商业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和社会贤达人士以及产业工人。“总工会”和工会分会成为在组建中国行政机关时可以依靠的主要力量。在该市工会和社会各界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会议上,选举产生了自治机构。

必须指出,39军军委会当时曾得到了关东和大连的中共党委、工会委员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坚决要求:把地方政权移交给人民选举的中国行政机构。

1945年10月22日,军委会在扩大会议上研究了关于关东半岛以及大连、旅顺、金州的民政机关的问题。

军委会在其决议中指出,中国行政机构是在工会和社会组织的人员广泛的会议上,在工人、职员、农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积极参与下选举产生的。其中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参加。军委会建议尽快将关东半岛的全部权力移交给中国行政机构。各市警备司令官奉命在向中国自治机构移交所有行政大楼、财产和资金时提供必要的帮助。

军委会决定为自治机构培训来自中国社会积极分子的干部,首先是国民教育、卫生、公共事业和警察干部。为了培训公共事业干部,建议启用日本工程技术人员。

1945年底,在大连开始出版三份中国报纸。此外,在39军政治处的领导下,1946年初在大连开始发行我们的中文报纸《实话报》。西季赫梅诺夫中校被任命为报纸主编。

在军委会的决议中还写道,在中国国民政府的代表到来以前,关东的行政机构在苏军警备司令官的监督下执行其职能。39军政治处被委托来研究有关的工作安排,组织在中国居民中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8周年以及中国行政机构开始活动事宜。

军委会的决定得到了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十分满意的接受;

而向中国行政机关移交管理权的工作，也是在全体居民的高度组织性和政治热情下进行的。

关东和大连的中国行政机构正式就职仪式安排在 1945 年 11 月 7 日 12 点。

在市内的大广场及其邻近的街道上，在这一时刻来临之际，聚集了达 7 万人之多的民众。在原日本关东州厅大楼（即今大连市人民政府大楼——译者注）前，矗立着高高的观礼台。从观礼台上可以一览广场和密集的人群。我的眼前，红旗如海。

在大会开始时，充满深情谢意的话语献给了苏联人民及其给中国东北带来自由和独立的军队。与会者以暴风雨般的欢呼来响应这些话语。许多人走上阳台，爬到房顶甚至树上。第一个讲话的是大连市长、原地方商人迟子祥（迟子祥后因特务罪而于 1951 年被处决——译者注）。他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他的讲话：“我们盼望已久的时刻来到了，中国人民的荣誉得到了恢复，我们大连获得了解放。”

随后，迟子祥宣布了中国地方机构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政治行动纲领，并以自治机构的名义宣誓——忠实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所有的发言者都一致地支持中国行政机关领导机构的代表及其行动纲领。同样一致地否决了“维持会”的纲领。

*

*

*

……工会和党组织的领导通知我们，关东居民积极筹备庆祝十月革命 28 周年的活动。来自黄海毗邻诸岛和海军基地以北的辽东半岛若干地区的代表团很快来到关东。各代表团手持红旗，乘坐舢板或列队步行，有组织地到达。

11 月 6 日和 7 日，在旅顺口、大连和许多其他居民点，举行了隆重的大会、集会和游行。中国地方社会各界的许多代表——共产党人、工会和中苏友协地方分会积极分子，积极地参加了隆重的活

动。中国居民的积极性异常高涨；妇女也第一次积极参加进来，而在此前她们还极不愿意显示其社会地位。

在旅顺市内的中心广场上，在地方自治机构、工会和中苏友协代表的领导下，11月7日举行了集会。广场上挤满了人。人们站满了邻近的街道，许多人爬到树上。每次讲话之后便传来了震耳欲聋的“万岁！”声。集会以后，举行了成千上万人的游行。同样的庆祝活动也在大连举行。

在这些节庆的日子里，苏联大剧院代表团抵达关东。他们在旅顺口和大连进行了演出。他们举办的音乐会以及39军歌舞团和业余团体的表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演员们多次被喊出来“再来一个”。

在这些日子里，社会组织迅猛发展。例如，中苏友协在1946年1月1日约有11000人，仅用一年时间就增加到25000人。

在这期间，青年民主联盟从5600人增加到30000人。妇联在1947年1月1日为45000人。仅用一年时间就增加了3倍。

1945年11月下半月，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来到大连。对于地方政权来说，他的来访是出乎意料的。

蒋经国听取了市长迟子祥关于地方自治机构选举的报告，声明他赞同地方政权选举的程序和法律。根据他的讲话，他们可以认为蒋介石确认地方机构的组成。

整个来看，关东半岛的经济和政治活动，得以恢复的大连与亚洲国家的贸易关系，给蒋经国留下强烈的印象。他参观了市中心、港口和主要的商业中心。他对市长和警备司令部的陪同官表示，对市内的整洁和秩序感到满意。“如果这种秩序也存在于中国的其他城市，”蒋经国说，“那么我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巨大成就。”

在他访问期间，并非没有发生一件不愉快的小事。蒋经国表示了参观渔港的愿望。整个来看，情况是这样的：他在市内参观时发现，通往这一地区的街道被封锁了，那里还布置了岗哨。插着中国

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的汽车驶近拦路横杆。但是，站在拦路横杆旁的苏军警备司令部的哨兵和自治机构的警察并没有升起拦路横杆。

蒋经国面含愠色走下汽车。市长道歉起来：他忘记了，由于渔港内霍乱初起，所以在这里设置了防疫线。

说话间，警备司令部的陪同官领来一个苏联女医生。她向蒋经国介绍说，她是负责放行点工作的医生。对蒋经国提出的能否通过渔港的问题作出了否定的答复。蒋经国坚持自己的要求。女医生建议注射霍乱疫苗。蒋经国及其同行的迟子祥市长表示同意，随后一行人穿过渔港而去；自然在那里也没有发现任何神秘的东西。

以后的几天，蒋经国是在他的别墅里度过的。他接见了国民党地方组织的领导，并针对他们的所有抱怨答称，应当学习象市长和苏联医生那样工作。

*

*

*

解放以前，关东的中国居民几乎人人都不识字。在这一地区，总共有 30 所初级小学。这些小学大多数只有一个教师教书。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院校实际上是不允许中国人进入的。我从与中国记者的谈话中了解到了中国人本身是怎样评价日本占领时期的教育状况的；我是通过我们的报纸主编西季赫梅诺夫中校的介绍而与这个记者相识的。

“我在日本占领者统治时期，生在大连，长在大连。”中国记者讲道，“我亲眼目睹并亲身体会到了殖民主义的残暴政策。我曾在中学读过书，那里禁止使用中文。所有课程均用日语进行。我们得称自己是关东州民，而不是中国人。要我们相信，中国对我们来说是象英吉利和法兰西那样的域外大国。强迫我们详细研究日本的而不是中国的地理和历史。往中国学生的脑子里灌输这样的思想，即他们脚下的土地、他们吃的东西和他们本身——所有这些都是

属于大日本帝国的……”

1945~1946年间,中国地方机构在苏联专家、苏联学校的教师和受过师范教育的我军军官的帮助下,得以解决有关国民教育的一系列十分重要的问题。

1947年1月1日以前,在关东开展了全民免费初级教育。成立了23所中学,244所初级小学和七年制学校,其中有100所是成人夜校。在学校里有94000名学生受教育,工作着2500名教师。约有1000名教师在专业培训班和师范讲习所进行培训和再培训;其中的师范讲习所是在大连建立的三所速成高等学校之一。

同时,创办了一系列旨在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班。主要的师资力量是经过专业培训的我军军官。应该说,这样的军官在我军部队中,特别是在飞行员、水兵、炮兵和坦克兵中间还是相当多的。其中一些人我们得以把他们从各自的本职岗位上撤下来,安排到培训班的经常性工作上去;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教学活动是一种追加性的工作。为了同样的目的,广泛利用了从苏联派到苏中合营股份制企业工作的专家。

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培训是高度强化进行的,并且采取了最为多样化的方式:讲习所和各种培训班相结合;固定地点和速成方法相结合;课堂和工作地点相结合;直接在车间里进行。

最初,这些问题由39军政工机构和警备司令部管理,但逐渐转由中国行政机关、党委和工会领导。

我记得在“五·一”节前夕,中共党委书记韩光在同志式的会谈中,向39军军委会和政治局畅谈了全民普及教育的进程。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在关东,在日本人统治时期,没有一个用中文培养的的大学生;而在此次会谈以前已有约3500人在大学里受教育。还要组建两所学院,并使大学生人数达到7000人。全部教育普及到了250000多人——换句话说,这一地区的居民几乎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受教育。中国人以巨大的热情、难能可贵的毅力和坚韧不拔

的精神投入学习。

我清楚地记得在关东湾渔村一所妇女普及教育夜校里的一堂课。1946年秋，我们不得不经常到海军基地北界附近地区。一次，当地的中苏友协分会邀请我们去访问一所夜校。在亚速海边的渔民中间度过自己童年的柳德尼科夫决定到一个渔村去，在那里参观一所男生学校。我则来到一所女生学校。

班级里有各种年龄的妇女在学习，其中有的年龄已经相当大了。她们穿着节日的盛装，发型经过仔细打扮。她们的认真表情与我们在村子里遇到的其他妇女大不相同。每个妇女的面前都摊着几本封面相当粗糙的书。

“学生当中谁的学习成绩最好呢？”我问。全班一起指向坐在第一张桌子的那个中国妇女。

我请她们打开与我们39军番号相同的第39页书，并大声朗读这页书。书打开以后，妇女们开始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这页书正是盖达尔的中篇小说《帖木儿和他的伙伴们》的开篇。学生们给我留下了触及心灵的印象。那个年轻的中国妇女读得很有表现力。我觉得，我似乎也能听懂她的话而无需翻译了。她的女友们跟着她认真地读了起来。你可真该亲眼看到教室里的反应和那个中国妇女脸上的真正的幸福表情啊。

*

*

*

大连、旅顺、金州和其他城市的新的中国行政机关，在社会政治组织的积极支持下，开始越来越有效地和有组织地实施在关东恢复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措施。港口、交通、大多数工业企业、学校均已恢复工作。私营企业家的活动显著活跃，当地商人的商业活动及其与外部市场的联系得到改善。关东半岛居民的政治热情明显高涨。

但是，关东半岛也还是经历了明显的经济困难，特别是从国民

党发动内战开始。当时几乎完全停止了原料和食品从东北其他地区的输入。中国行政机构对这些问题予以极大重视。中国自治机构管理的商业机构在1946年6月和7月运入大量食品,并开始对食品的分配实行定额,但用这些食品来完全满足居民的需要是不可能的。为此要求我们予以帮助。

为了改善工人、职员和部分农村居民的食品供应,苏联外贸机构恢复从苏联滨海地区供应粮食、植物油、罐头和食糖。供货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但主要是通过北朝鲜港口——进行。中国人民充满感激之情接受我们的帮助。食品由工会、妇联、共青团组织分配,他们对于多子女、低收入和残疾人家庭予以照顾。

从1946年8月14日起,在大连、旅顺、金州和关东的其他许多居民点都举行了集会,庆祝苏中条约签订一周年。所有的中国报纸以及我们的报纸《实话报》都发表了纪念这个日子的材料。

在有许多工人、职员和农民参加的集会上,再次热情感谢苏联人民带来的解放。与此同时,严厉地谴责蒋介石发动的内战。一些发言者抨击美国支援蒋介石打内战。

例如,在“大连船渠”(即今大连造船厂——译者注),修理车间一个叫徐长秀(译音)的钳工在集会上说:“一年过去了,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感谢红军和伟大的斯大林。没有他们,我们就一事无成。现在我们都懂得这个道理,甚至是小孩子。但是,有人不喜欢我们的胜利。有人根本不想让我国人民获得真正的自由。正是那些几百年来吸我们血的地主、厂主和军阀才不想这样。难怪他们和美国人一唱一和。我国人民就是为自己而工作,他们就不舒服。我国人民要象一个人一样站起来,反抗压迫者。”

数千名工人以暴风雨般的欢呼来响应徐长秀的讲话,并以愤怒的语言谴责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政策……

*

*

*

击溃关东军和完全解放满洲，在中国掀起了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东北成了这一运动的中心。

民族解放运动也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国中心地区高涨起来。

中国共产党及时地抓住了这些有利条件，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解放军部队在随后展开的国内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到 1945 年底，松花江以北的满洲地区一半在中共军队的控制下。此前，在沈阳地区组建了达 10 万人的军队。组建军队的工作还在满洲的其他工业区进行。同时，国民革命军八路军的部队和新四军的纵队从华中地区开赴满洲，并在向北进军途中招兵扩编。

苏联忠实于自己的义务，于 1946 年 5 月从满洲撤走自己的军队。根据 1945 年 8 月 14 日的条约，红军部队仅在关东半岛留驻。在进驻满洲期间，我军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尊敬。举行了充满中国居民对苏联友好感情和态度的盛大游行，隆重欢送苏联军队。

我们作为解放者而来，并载誉离开满洲。我们清楚地表明，在击溃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后，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无需外来干预，应能解决自己国家的战后建设问题。

中共领导认为，必须加强国共两党的合作，吸收社会人士，在民主的基础上，解决中国重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总设想，还在 1945 年 8 月 25 日发表的中共宣言（即中共中央《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译者注）中就已得到体现。

在中国民主解放运动迅猛发展的条件下，蒋介石政府无法拒绝与中共就国家重建的问题举行谈判。由于害怕暴露自己的反动的、反人民的计划，国民党政府同意就中共提出的大纲进行谈判。蒋介石集团把这些谈判当作准备和发动内战的巧妙幌子。内战的

准备很早就已开始，并大规模和高速度地展开，以便能在苏军撤离以后，立即在满洲部署必要的兵力。

在国内战争展开之初，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有 430 万人。从 1945 年 11 月到 1946 年春，在美国军舰和空军的直接援助和支持下，蒋介石得以向南满调遣和集中 50 多万军队，从而使国民党军队具有数倍于解放军部队的优势。

在国共代表谈判期间，蒋介石的部队几次进攻中共的部队。美国继续公开武装国民党。1945 年 11 月 8 日，美国军舰在山海关卸下 200 多辆坦克。也是在这几天，在天津东南的大沽卸下大量坦克和重武器。尽管 1945 年 10 月 10 日发表了国共两党关于保障国内和平的正式公报——《国共代表会谈纪要》。

苏联尽一切可能来预防中国的内战。举行了包括高层在内的苏、美、英三国代表会议，发表了必须制止中国的军事行动的声明；但是美、英代表口头上赞成停火，而实际上却在点燃战火。

1946 年 2 月，满洲的形势极为复杂。国民党政府宣布，不承认当地的人民民主机构，并在各个战场上向解放军部队发动强大的攻势。3 月，向满洲调遣了巨大的兵力，占领了中国长春铁路沿线的要地。

到 1946 年 5 月，在南满集中了国民党的 10 个装备精良的集团军。在相当短的时间里，他们得以占领沈阳、长春和吉林。只是在通往哈尔滨的要冲，解放军部队才挡住了国民党。

同时，包括八个师在内的国民党军队，在辽东半岛方向上向解放军第 8 纵队的小股部队实施打击，切断了他们与关东半岛的联系。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苏联 39 军司令部被迫采取对策。向国民党军队派出了我们的代表沃洛申上校和一批军官。在向关东方向进攻的国民党集团军的参谋部里，他会见了该军司令。在地图上标出了国民党军队不应越过的界限。向国民党的指挥人员作出声

明,在该界限以内的地区处于我军炮兵的火力范围内,因而可能产生危险的后果。该军司令并不十分情愿地对此表示同意,并在以后对于此项协议予以严格遵守。我们以此得以安慰居民,并实现我们对中国行政机构的承诺——考虑他们在关东以北8~10公里地区内的利益。以后,这一地区得到解放军第8纵队的积极利用。

在击溃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后不久,美国把中国东北变成反苏和反对中国革命的军事基地的计划,就开始相当清楚地勾画出来。为此目的,他们不仅竭力要向满洲调遣国民党军队,而且调遣美国军队。辽东半岛南部的苏联军队成了他们的绊脚石。

众所周知,还在战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指令其海军将领在俄国人进入以前占领大连港。1945年9~12月,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采取各种步骤,提出让国民党军队在大连港登陆的要求,以便进而把他们沿铁路线调往满洲腹地。我们自然拒绝了他们的这一要求。首先,这与8月14日的苏中条约相抵触,条约规定大连港仅供商船使用;其次,说的是调遣国民党军队,而提出要求的却是美国代表。

例如,1945年10月底,在旅顺口曾收到了美国第7舰队分舰队司令塞特尔海军中将的一份无线电报,要求允许国民党军队在大连港登陆。对我们来说,这样的电报是出乎意料的。要求是美国将军提出来的,而军队却是国民党的!这就意味着中国军队应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下进行登陆……

我们在军委会交换了意见,并由39军司令员对这一要求作出了否定的答复。

但是,塞特尔海军中将集中其军舰于大连港外锚地的一个小岛——大山岛附近,并坚持要得到允许美国军舰进入大连港的命令。只是在再次遭到拒绝以后,在分舰队司令得到警告——苏军司令部不能保证其军舰在大连港外锚地的安全——以后,分舰队才驶离这一地区。

从1946年春开始,我们与地方自治机构、与中共中央东北局任命的书记韩光和中共中央东北局军委委员肖劲光的联系,愈加经常化和实务化。这种关系具有真诚的特点。这使我们能够正确地互相理解,并由此而得出符合形势的结论。

在1946年春的一次这样的会见中,肖劲光在韩光的参加下,非常详细地——在我们看来也是最为客观地向军委会通报了中共军队的状况。“武器和弹药的情况是如此的困难,”他说,“以至于如果我们得不到必要的帮助,要在抗击美式武装的国民党军队的斗争中坚持下去,那将是不可能的。”他以中共中央东北局和解放军司令部的名义,请苏军司令部把缴获的日本武器移交给他们。

我们把这一要求呈报给军区(即苏联滨海军区——译者注)军委会,并重申了我们的观点,即可以把我们掌握的缴获的日本武器(达50车厢)移交给解放军。最后,得到了正式的批准。

向解放军部队移交缴获的武器的工作决定立即开始。我们转告肖劲光,一周以后,大约15车厢的武器将集中在大孤山半岛(大连以北15公里处)。这个半岛南面和北面的海湾非常适合停靠近海船只。移交武器的工作直接委托给了经验丰富的军官们——谍报处处长沃洛申上校及其主管政工的副处长波茨尼亚科夫中校。他们成功地胜任了这项任务。

夜里,中国同志把所有移交给他们的武器——直到最后一颗子弹全都装到驳船、帆船和渔船上,而在黎明前秘密抵达目的地。晚上,我们得知,移交的武器已经分发给了解放军的部队。

1946年6月底,肖劲光和韩光来到旅顺口。此前,在大孤山半岛为解放军准备了新的一批武器和弹药;这批武器和弹药同样也及时地移交给了中国同志。解放军司令部热烈地感谢了我们的帮助。

一次,韩光请我们帮助活动在山东半岛的解放军部队。国民党军队集中了强大的兵力,在美国的积极援助下,重创了解放军部

队，切断了他们与沿海的联系。他们开始重新集结兵力，准备彻底击溃解放军部队。

在解决这一复杂的问题时，我们决定去找中国私营商人。39军后勤处这时与一个当时不愿暴露自己的商人保持密切联系。我们称之为“H商人”。我们知道，他的商号遍及一系列亚洲国家。他能买到任何商品，并能运到任何合适的地点。只要求告诉他品名和数量。他在自己商号的便笺上通知我们货物的价格和运费。

根据我们的要求，“H商人”租赁了美国船“自由”号。船上装着小麦、高粱和小米，而主要的则是武器和弹药。在商定的期限以前，货物被运到山东沿岸的指定地点。这件事用了不到5天的时间。这对解放军来说是个了不起的“礼品”。

韩光很快就来到我们这里，并告诉我们一些详情。国民党司令部虽然得知解放军部队的艰难处境，但却来不及准备好自己的部队以发动决定性的进攻。同时，解放军司令部在装备了自己最精良的部队以后，给了国民党以突然的打击。

结果，国民党的进攻被粉碎了，俘虏了大量国民党士兵，缴获了美式武器和弹药。所有这些使解放军司令部得以充分装备自己的部队，并进而给了敌人以沉痛的打击。

1946年8月底，肖劲光和韩光专程来到旅顺口，以便再次感谢军委会的帮助，并向柳德尼科夫和我面交纪念礼品——金表。在附于礼品的便笺上写道：

“博伊科中将同志：

为了感谢您对中国革命关心和帮助，并纪念东北各省解放一周年，谨以东北民主联军的名义赠送金表留念。

此致

敬礼

肖劲光

1946年8月24日”

我珍藏着这份文件和手表。对我来说，便笺和手表是中国和苏联人民睦邻友好关系的象征。

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毕生的事业》一书中写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得到大量缴获的武器备品。仅我们的两个方面军就从原关东军手中缴获并移交给解放军的代表 3700 门火炮、迫击炮和榴弹炮，600 辆坦克，861 架飞机，约 1200 挺机枪，近 680 座各类军火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军舰。稍后又转交了大批苏联武器。苏军司令部关心使所有的武器处于正常状态并适于作战用途。我记得，曾向我报告过，解放军的代表表达了对苏联及其武装力量的感激之情；它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重要的先决条件。”

在国内战争的进程中，产生了最为出乎意料的问题。我只着重谈谈其中的一个。一次，肖劲光以东北地方机构和解放军军委的名义，请我们向他们移交中长铁路大连段的一部分机车。梅列茨科夫（时任苏联滨海军区司令员——译者注）元帅命令尽快研究从海路调运机车的可能性。

这里说的是，解放军部队在从满洲腹地向北撤退时，不可能顾及铁路机车，从而陷入最困难的境地。哈尔滨机务段的机车，绝大部分已经损坏，极难运送部队和物资。使用来自苏联的机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众所周知，苏联铁路轨宽 1524mm，当时满洲铁路轨宽几乎要窄 90mm。我们本身也不能沿中国长春铁路调运机车，因为整个满洲腹地都掌握在国民党军队手中。向北满调运机车，只能通过海路。同时，我们得到通知，所需的舰船已派往旅顺口。对我们来说，剩下就只有一件事了——尽快组织装运机车。

大连机务段有一百多辆完全修复的机车。机务段里有手艺高强的中国工人，他们无需日本工人的帮助就能及时修复机车，并使之处于理想状态。

39 军军委会决定，组成在军械处处长季莫申科上校领导下的

专门委员会。由 39 军和海军基地最优秀的工程师组成工程师专门小组，他们被委托来用一周的时间研究这一问题。

季莫申科上校很快就向司令部作出汇报，认为在海上装运机车原则上是可行的。为此，需要沿海边铺设一条 2 公里以上的铁路支线，起于火车站而迄于东海湾畔的固定吊车，并穿过把旅顺口分为旧城和新城的龙河。铁路通过的部分桥梁需要重建。通往海边的道路在二~三天内夜间关闭。

准备工作按预定计划进行。大家都懂得任务的重要性。这时，起货吊车引起了一些大问题。它的起重量怎样？它能经得住机车的重量吗？吊车还是 1904 年建造的。它的主立柱是用几根紧紧加固的桅杆制成的。吊车处于修复状态，但却没有任何技术资料。我们找到一个年龄相当大的中国人，他以前曾在这座吊车上工作过。他说，吊车的起重量是 100 吨。当时，他还用俄语重复道“СТО”（即俄语的“一百”——译者注）；并且看得出来，为了使人正确地理解他的意思，他又把两个巴掌翻了十下。这可是从何说起啊。机车不带煤水车就重达 108 吨。出于明显的安全考虑，只能去测试吊车。

工程师小组在三天的时间里对吊车进行了测试，把机车吊到各种高度。在这之后，专门用于运送机车的舰船装上了这批物资。结果，在 1946 年间向东北满调运了 30 辆机车，1947 年又调运了 20 辆。

苏联的兄弟援助配合了满洲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这一根据地成了中国革命的军事战略基地，并在中国革命的胜利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在满洲大地上，开始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决定性歼灭战，使他们从此再也无法恢复元气了。

在东北，集中了解放军的主力部队，其兵力到 1948 年 11 月增加到 300 万人。组织良好和装备精良的解放军兵团展开了强大的攻势，并于 1948 年底以前完全解放了东北。他们继续进攻，于 1949 年 1 月解放了天津和北京。1949 年 4 月解放了南京，5 月解

放了上海。在以后的几天，解放了西安、武汉、青岛、广州以及华中和华南的其他城市和地区。被击溃的国民党军队的残余逃窜到了台湾。

1949年10月，中国革命胜利了。中国人民取得了盼望已久的胜利。

（博伊科，原苏联退役中将，苏共党员，苏联英雄。1929年参加苏联红军，历任师政委、集团军军委会委员等职。1945年9月1日随苏联第39集团军进驻旅大。本文为博伊科的长篇回忆录《解放的使命》中有关苏联39军进驻旅大以后的部分。 周风啸译）

第三部分

专 题

苏军在旅顺的十年

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1945年8月22日，苏联红军进驻旅顺、大连，对旅大地区实行军事管制。

8月22日，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副司令伊凡诺夫中将率250名空降兵在旅顺土城子机场着陆，并就任旅顺警备区司令。日军驻旅顺守备司令小林海军中将，向伊凡诺夫中将投降，交出指挥刀，驻旅顺日军武装遂被解除。从此，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40余年的旅顺人民获得解放。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热烈欢迎苏军，感谢苏军解放旅顺。

8月24日，苏联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首批坦克开进旅顺，苏联太平洋舰队空降兵机队在旅顺降落。8月25日，苏联红军在旅顺升起苏联海军军旗。到8月底，苏军进驻旅大地区的兵力约1个军，计1万余人。9月1日，苏后贝加尔方面军39集团军司令柳德尼科夫上将率司令部作战组飞抵旅顺，几天后，集团军司令部抵旅顺。

9月6日，苏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远东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麦列茨科夫元帅、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空军主帅诺维科夫、空军元帅胡佳科夫、炮兵元帅契斯佳科夫，以及其他将领到达旅顺，视察了旅顺口。

9月28日，苏军太平洋舰队部分军舰开进旅顺口。齐帕诺维奇海军少将任基地司令。苏驻军在旅大地区最高领导机关是39集团军司令部，设在旅顺。苏驻军在旅顺市内外均设警备司令部，在大连、金州也设置了警备司令部。从此，苏驻军把旅顺口作为海

军基地，对其实行军事管制。

一、苏军进驻初期旅顺的社会政治情况

苏军进驻旅顺后，即将日伪时期的市役所（伪市政府）置于军管之下，令其维持现状，看守一切文书档案资料，不得损坏，听候接管，每天向警备司令作汇报。苏驻军接管了法院和监狱，释放了政治犯；还接管了军港船坞厂、银行、邮局、自来水、博物馆等地方企事业。

刚解放的旅顺政治情况复杂，社会秩序混乱。敌伪汉奸、刑事腿子等改头换面，打着各种旗号公开活动。国民党地下特务乘机而起，大肆鼓吹正统观念，造谣惑众。各种反动会道门到处造谣撞骗。社会上行抢军用物资风行。加之苏军纪律松弛，违纪现象时有发生，引起群众的不满，人们惶恐不安。旅顺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8月17日，旅顺伪商会会长刘德智，出面召集伪商会临时董事长、豪绅、地主及地方头面人物开会，商定成立“旅顺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简称旅顺维持会），刘德智为会长。维持会的核心和骨干成员大都是日伪时期的工头、刑事腿子，他们妄图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8月24日，刘德智去见苏军司令官，以“协助苏军维持地方治安”的名义得到苏军的承认。

9月初，家住旅顺的国民党金县县党部书记长刘启华，回到家乡组建国民党旅顺区党部。经过筹划组织，9月下旬，召开国民党旅顺区党部成立大会，刘启华兼任旅顺区党部书记长，刘铭志、郭弘历任执委。9月22日，刘启华策划改组了旅顺维持会，推出陈国立、郭弘历为维持会的正、副委员长，内设总务、财政、宣传、治安等部。汉奸伪警长吴执中为治安部的头子。改组后的维持会已在国民党旅顺区党部的控制之下，区党部以维持会作掩护，以“精通三民主义为最高标准”，公开大量发展国民党党员，企图一旦时机成熟，配合国民党军队接收旅顺。维持会打着维持地方治

安的幌子，到处封路设岗，攫取日伪遗留财产，敲诈勒索民财。

在这期间，“一心药铺”先生张心斋（原中共山东省寿光县委书记，后脱党）秘密串连一些劳苦群众，于8月下旬，在旅顺上沟成立了“旅顺民众联合会”（简称旅顺民联会），张心斋为会长，迟进寻为副会长。

民联会和维持会两大派系，各自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经常发生冲突。民联会同维持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9月7日，中共胶东区委派出的长山列岛工委书记兼武装大队政委郭壮和干部王泽民，带领由14名武装战士组成的小分队抵达旅顺。开始，苏军怀疑他们是汪精卫的散兵，将郭壮等扣留审查。由于语言不通等障碍，郭壮等采取“唱歌闹狱”（即唱《国际歌》和《十月革命歌》，来证明自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队伍）等办法，取得了苏军的信任。苏军确认小分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后，便要求小分队留在旅顺工作。

9月22日，中共胶东区委派往辽西开展工作的王世明、姜文阁等53人，因其所乘船与领船失掉联系，漂流到旅顺，经与苏军司令部联系，苏军给补充了给养后，诚恳要求他们中的一些人留下工作。经研究，王世明、姜文阁、于亮、苏菲、孙明斋、单文华等8人被留在旅顺工作。其余人员继续西进。苏军把郭壮、王泽民等来旅顺的情况向王世明等做了介绍，并引荐他们见了面。这两批人员暂住群众家里，伙食由苏军负责供给。两批人员接上头后，立即深入群众开展工作。郭壮、王泽民等在群众的帮助下，与民联会会长张心斋取得了联系。9月底，在郭壮、王泽民的参与领导下，整顿了民联会组织，张心斋任会长，王泽民任副会长。整顿后的民联会的宗旨是：组织旅顺广大民众，加强民众团结，解除民众痛苦，改善民众经济政治生活，提高民众觉悟，建设自由、民主、幸福、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新东北、新旅顺。从此，旅顺民众联合会迅速发展壮大。共产党以民联会为掩护，积极地开

展工作。国民党旅顺区党部和维持会中的反动分子预感到这是对他们的极大威胁，便更加把进攻矛头指向了民联会。他们攻击民联会是“非法组织”、“破坏了治安”，并在苏军面前诬告郭壮等人是“从山东来的伪军、假八路”，企图借苏军之手取缔民联会。同时，他们加紧训练队伍，企图抢在民联会之前，由维持会独自组建警察局，公开挂牌，把枪杆子抓到手，妄图把他们的反动势力维持到国民党军队到来。

面对这种情况，郭壮、王泽民等一边放手发动群众，继续壮大民联会的力量，一边抓紧建立武装队伍。郭壮、王泽民同张心斋等商议后，从民联会会员中挑选 200 余名青壮年，组建了青年自卫队，李茂德任队长，下设 3 个中队。9 月 27 日，在苏军的支持下，召开了民联会正式成立大会。全市城乡民联会会员及其亲属 2000 多人参加了大会，这是共产党在旅顺组织的第一个大型群众集会。郭壮在大会上讲话，揭露了国民党旅顺区党部及维持会中反动分子欺压人民群众的罪恶勾当，宣传革命主张，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会后，群众列队游行，高呼“打倒汉奸走狗”等口号。这次大会，壮大了民联会的声威，显示了青年自卫队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区党部和维持会的反动气焰，同时，也使共产党更加牢固地植根于民众之中。

9 月末，苏军提出建立旅顺警察局。苏军为了照顾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决定由民联会和维持会双方共同出人，合建警察局。苏军旅顺警备司令找郭壮协商，指定让维持会治安部头子吴执中任旅顺警察局局长，郭壮任督察长，并要民联会推选一人任副局长。郭壮推荐李茂德任副局长。嗣后，由民联会青年自卫队出 200 人，维持会治安部出 300 人，组建旅顺警察局。旅顺警察局既是地方治安管理机构，又是地方武装。围绕争夺警察局领导权和枪杆子问题，民联会同国民党旅顺区党部及维持会中的反动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吴执中提出拟定警察局编制机构

时，郭壮抢先提出特务科、司法科、督察室、特务队和市外5个区中队，由民联会的青年自卫队担任；其他科室及市内派出所等由维持会治安部人员充任。为此双方发生争执，郭壮据理相争，吴执中勉强同意。这样，共产党就掌握了特务、司法、督察等科室的领导权，同时又掌握了特务队和5个区中队，并派由胶东来的干部担任领导职务，从而控制了城市和农村的广大地区。警察局成立后，苏军开始配发枪支。当苏军给警察局发枪时，郭壮恰不在家，结果150支长枪全部发到原治安部人员手中。郭壮得知后，趁吴执中不在时，便以督察长名义，命令立即将枪支弹药交局检查、登记，在短时间内把枪、弹全部收上来。随后这些枪弹便被发到由共产党掌握的特务队手里了。吴执中一伙对此虽十分恼火，但却束手无策。

这一时期，旅顺虽然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共产党领导机关，但党的活动，党的工作已经开始，并很快打开了局面。

二、苏联驻军与旅顺共产党组织的关系

从1945年8月22日苏军进驻旅顺，至1955年5月31日苏军从旅顺全部撤退，共计10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分线，这10年可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5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年两个阶段。前5年，即1945年8月22日至1949年末，根据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旅顺口是苏联海军根据地，苏驻军对旅顺实行军事管制。后5年，即1950年2月14日至1955年5月3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规定，旅顺口为苏联海军根据地，苏军解除对旅顺的军事管制，旅顺的行政权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掌管。

苏联驻军旅顺和对旅顺实行军管，这是旅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一时期，旅顺地方党组织所实施的政策，都是与这个特点分不开的。苏军对旅顺实行军管，对旅顺地方党组织的

活动有不少限制和干涉，但他们的基本政策是支持共产党在这里发展力量，掌握政权，配合他们巩固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苏驻军与旅顺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共事中是友好相处的，与旅顺人民的友谊是真诚的。期间虽然也发生过争执和矛盾，但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1945年10月，在苏联驻军的支持下，建立了中共旅顺市工作委员会和旅顺市人民政府。

1945年10月上旬，王泽民回胶东区向区党委请示汇报工作。经胶东区党委研究，决定组建中共旅顺市工作委员会（简称旅顺工委），调胶东区北海地委城工部副部长吴善昌任工委书记，于亮、郭壮为委员。随吴善昌一同来旅顺工作的还有沈西牧等一批干部。这批干部乘船在双岛湾登陆后，经苏军审查，确认是共产党向旅顺派来的干部，当即表示欢迎。至此，中共旅顺市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组织上隶属胶东区党委北海地委领导。根据工作需要，不久又增加王世明、王泽民为工委委员。旅顺工委成立不久，旅顺市职工会、农民联合会和民主青年联合会等组织也相继成立。旅顺工委成立后，为了不给苏联在外交上带来麻烦，没有公开活动，仍以民联会等群众组织为掩护，隐蔽地开展工作。由于胶东区党委不断地派干部来旅顺，同时得到苏军的信任和支持，所以工委在旅顺的工作开展的很顺利，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同月，苏驻军建议成立旅顺市人民政府。当时，苏驻军总部提出，旅顺市人民政府由当地上层人士任市长，共产党员可以任副职。旅顺工委则力争正职，向苏驻军提出，正职由我们担任，才有利开展工作。苏驻军总部经请示莫斯科，同意旅顺市人民政府由共产党方面任正职。10月下旬的一天，苏军驻旅顺警备司令出面召集民联会和维持会双方代表开会，对市政府的组织机构、人选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工委委员王世明任市长，陈国立任副市长。当日晚，苏军驻旅顺警备司令官举行宴会，表示祝贺，还

赠给市政府一辆旧卧车。又经过一段时间筹备，于11月25日，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旅顺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市长王世明宣布8项施政方针。从此，旅顺人民有了自己的人民民主政府。市政府成立后，接管了市役所，划定了行政区，宣布维持会解散。苏驻军把银行、邮政、自来水等市政企业，以及旅顺监狱等交市政府管理。市政府为公开的合法机关，与苏军当局直接联系，一般的地方行政事务与旅顺警备司令部联系，重大问题与苏军总部联系。

市政府正式成立前，10月25日，为了粉碎吴执中等反动分子妄图对郭壮及民联会骨干进行袭击和暗杀的阴谋活动，郭壮执行市长王世明的命令，逮捕了警察局长吴执中等反动分子，同时宣布将警察局改为公安局，郭壮任局长，李茂德任副局长。嗣后，郭壮向苏驻军保卫机关负责人报告了吴执中的4大罪状：第一，他是伪满警察局长，过去作恶多端，犯有严重罪行；第二，他反苏，破坏中苏友好；第三，他仗势欺压群众，私收烟税；第四，他吸鸦片，生活腐化。特别强调了吴反苏这一条。苏军表示郭壮干得对。公安局建立后，进行整顿并改组内部机构，使公安局完全成为人民的武装。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苏驻军领导督促我方尽快出版报纸。经过胶东区派来的干部殷杰、沈西牧等积极筹办，11月23日，旅顺《民众报》创刊号出版。对外出刊的名义是由民联会主办，实际上是旅顺工委的机关报。

1945年12月，旅顺工委隶属中共大连市委领导，同时改称为中共旅顺市委员会。中共大连市委派从延安来的王其人到旅顺任市委书记，调吴善昌去大连工作。王其人来旅顺前，大连市委书记韩光找其谈话，强调了旅顺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要求在工作中同苏驻军搞好关系。王其人到旅顺后，以市委书记的身份拜访了苏军驻旅顺警备司令斯米尔诺夫，斯米尔诺夫表示欢迎王其人来旅顺工作（事前韩光已通知苏军王其人来旅顺工作），并希望今后

加强联系，互通情况，共同把工作做好。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全面进攻，对旅大地区实行封锁，旅顺生产、生活所需物资运不进来，工商业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群众生活用品奇缺，大批人员失业，生活十分困难，特别是吃粮问题尤为突出。面对这种情况，中共旅顺市委决定，“以大力开展生产运动，恢复工商业，安定民生，为目前一切工作的总方针”。同时，争取苏联驻军的支援。在苏驻军的帮助下，一些工厂迅速恢复生产，还成立了贸易公司、水产渔业公司、小型制鞋厂和被服厂等。为了多开辟一些生产门路，苏驻军海军把缴获日本的一艘轮船送交市政府，从事水上运输，往返于旅顺、烟台之间。为了解决粮食问题，苏驻军派士兵押运食盐去外地换粮食，还从苏联国内调运粮食和蔬菜救急，帮助旅顺人民渡过最困难的一年。为恢复中小学文化教育，苏军占用的校舍，一经交涉，即全部退还。当时人民群众缺医少药，苏驻军派出军医协助，建立了旅顺地方医院。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要求，东北局和大连市委曾多次给旅顺下达扩军的任务。当时扩军是一个政治敏感性很强的问题，考虑到在苏军军管区域，公开给人民解放军扩军，势必给国民党政府攻击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提供口实。为此，中共旅顺市委以维护地方治安和加强交通管理，扩充警察队伍的方法，来完成扩军任务，达到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目的。苏军对通过扩警而扩军的作法采取了默许态度。

在解放战争中，旅顺发挥了其特殊的隐蔽的后方基地的作用，在扩军及支援解放区军用物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支援前线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与苏驻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苏驻军司令部对宣传工作极为关注，对当时的《民众报》尤为重视，他们派了几名新闻检查官，专职进行检查，十分严格。凡他们不同意发表的文稿，当即撤换下来。有的稿件他们还亲自动

笔修改。总的要求是，不得有暴露在旅顺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骂国民党蒋介石的文字出现。办报人员多是从解放区来的，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行径深恶痛绝，对新华社发出的解放战争前线的胜利消息以及党中央谴责和揭露蒋介石阴谋的社论文章，总想在《民众报》上一字不改地发表出去。这样做的结果，引起苏军领导很大的不满，为此，曾三次责令报社把发售出去的报纸全部收回销毁。1946年冬的一天，苏驻军政治部主任约旅大地委（此时，大连市委已改为地委）书记韩光，旅顺市委书记王其人一起到报社，对报社总编提出严厉批评。以后，报社为不给苏在外交上带来麻烦，在宣传报道上采取一些灵活的方式和策略，既坚持了党的方针政策，起到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又照顾到苏联外交政策上的需要。此后再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1947年6月，中共旅顺市委在中共旅大地委领导下，与苏驻军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视察团在旅顺的阴谋活动，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国民党视察团到来之前，苏联驻军当局提前向旅顺市委通报了视察团要来旅顺的消息。中共旅顺市委根据旅大地委的部署，与苏驻军商定了“接待”视察团工作的部署和要求，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如为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完成对苏军军用币贴帖、加盖印章、公安局作出周密部署等。6月3日，国民党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率领的视察团，乘军舰抵达旅顺港。苏驻军出面接待视察团。视察团在旅顺期间，曾多次与苏军举行谈判，董彦平提出接收大连的要求，苏军则坚持要以视察团首先承认地方现政府为前提条件，否则拒绝谈其他事项。视察团要求参观工厂、学校，苏军答复：“这是你们中国人自己的事，你们自己去协商”。视察团到处碰壁，一再遭到冷遇，在旅顺只参观了旅顺博物馆。由于视察团带来的大批没有贴花盖印的苏军货币全部作废，使他们吃饭、洗衣等各项费用都无法解决。视察团最后无可奈何地给旅顺市人民政府写了一个欠

条，于6月12日一无所获地离开了旅顺。

苏联在旅顺、大连驻军，不仅在太平洋地区具有战略意义，对我国的解放战争也具有战略意义，它使国民党反动派不能从海上进军东北，而旅大地地区则成为隐蔽的后方基地。

中共旅大地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 and 旅大地地区的实际情况，肯定了“以苏为主”的工作方针。但也有些干部对此认识不足，在一些工作中完全照搬老解放区的作法，引起苏军的不满。最突出的是反奸清算运动。

1946年初，中共旅顺市委贯彻执行东北局和旅大地委的指示，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斗争。最初的斗争形式基本上是照搬老解放区斗地主的办法，苏驻军反对这样做。对召开群众斗争大会，他们有时公开出面干涉，驱散开会的群众，甚至扣押主持会议的人。从而引起干部、群众的气愤，认为苏军是压制“农运”，干涉我们内政。鉴于上述情况，市委领导多次与苏军司令部交换意见，逐渐弄明白苏军不是反对反奸清算，而是不同意开斗争大会的作法。他们说如果这样的斗争大会，被美、蒋的特工人员拍了照片，就会利用这些资料攻击苏联把旅顺交给了共产党，使苏联在外交上处于被动地位。他们认为，有了政府之后，应由政府法办，不应开群众斗争大会。此后，便改变了斗争的方式方法，运用政权的力量打击敌伪反动势力和地主阶级，采用组织法庭的形式，由原告控诉被告欺压剥削群众的罪行。大包工头子张积山就是由法庭判决并没收了他非法剥削来的财产。这样做既达到了发动群众，反奸除霸的目的，又取得了苏军的谅解和支持。以后各村召开公审大会，通知苏军后，他们就高兴地派员参加。

中共旅顺市委在与苏军共处中，有团结合作很好的一面，也有发生争执和不愉快的一面。其原因有的是由于我们对苏军所处的特定的历史地位、所承担的义务，以及他们所实行的政策理解不深，习惯于按老经验办事，因而引起苏军不满，甚至严加干涉。

有的是双方的误会，也有的来自苏军个别领导人，以胜利者自居，横加指责，不尊重中国人的尊严，作出某些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也有的是由于坏人的破坏，有意制造矛盾。市委在坚持维护中苏友好大局的前提下，从有利于开展工作出发，既照顾苏方外交上的需要，同时也坚持原则，进行必要的交涉和斗争，以达到更好的团结，推动工作的开展。有一次，三涧区石灰窑村群众斗争恶霸地主时，有坏人欺骗苏军是土匪来抢东西，而苏军驻区司令官不调查分析，便带部队当场开枪打伤群众，还抓走主持会议的干部。为此事，市委书记王其人同旅顺苏军司令部交涉，郑重地指出，苏军根据坏人提供的情况，动用军队镇压群众的做法是错误的，不利于中苏友好团结。为了弄清真相，王其人与苏军副司令到现场进行调查，结果证明是他们错了。他们当众作了检讨，承认错误，并撤了这个区的苏军司令官的职，群众感到满意。

苏军进驻初期，个别苏军士兵和下级军官纪律不好，常有违纪侵犯群众利益的恶劣行为，造成极坏的影响，在群众中引起不满情绪。为此，市委书记王其人约见苏军司令官，如实反映苏军中少数人违犯军纪，侵犯群众利益和群众不满情绪等情况，引起苏军领导人的重视。此后，苏军采取了整顿军纪、惩办严重违纪犯罪者、从国内调部队换防等一系列措施。到1946年下半年，苏军军纪开始明显好转。

为了搞好同苏驻军的关系，中共旅顺市委认真贯彻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积极做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市委利用各种形式宣传中苏友好和团结对于建设新旅顺及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重大意义，宣传苏联出兵东北，在中国人民配合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迅速解放东北全境及苏军支持我们在旅顺开辟各项工作等事实，同时反复向干部群众解释，苏军中做坏事的只是极少数人，不能因个别人的行为，怀疑苏军的政策，使群众理解、谅解苏军。

1946年10月20日，市委书记王其人在全市党员、干部会议

上，总结了市委与苏军相处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并根据上级的要求，提出了今后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工作方法。

1947年，中共旅顺市委根据中共旅大地委的部署，在全市党内外干部中进行了有关旅大形势与特点的教育，组织干部学习地委书记韩光在地委执委会议上作的《关东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总结报告，使干部对旅顺是党领导的苏军军管的特殊根据地的特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市委根据在中苏关系上“以苏为主”的方针，着重进行了自我检讨，以求密切合作，肩负起共同的任务。10月15日，市委向地委写了检查报告。经过耐心的工作和努力，市委与苏军关系不断改善。在此以后，市委和苏军政治部一直保持经常接触和互通情况的关系。市委主动将各个时期的工作部署、安排及党、团、群众组织建设和活动等情况，通报给苏军政治部，苏军也指定专人同市委保持工作联系。由于加强了彼此间的联系和合作，因而减少了误会，增加了相互间的理解和支持。

1948年8月，中共旅顺市委根据地委的部署，在纪念“八·一五”、“八·二二”、“九·三”3个节日期间，采取报告会、座谈会、文艺演出、美术展览等多种形式，在全市范围内广泛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开展拥苏活动。市委还发动群众给苏军送牛、羊，慰问苏军官兵。市委、市政府还赠送给苏军两块银盾和两面锦旗，使苏军深受感动，地方与苏军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苏军把地方送的两块银盾和两面锦旗送到大连展出，最后送到莫斯科保存。在每年的苏联红军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纪念日时，市委都采取各种形式开展拥苏教育。有时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亲自主持大会、作报告，也请苏驻军官员作报告。此外，市委还组织开展“中苏友谊月”、“向苏联学习”等活动，以改善和加强双方之间的关系。

随着东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需要照顾不给苏方在外交上带来麻烦的事减少，中苏关系也更加密切融洽，苏军对市委、

市政府的工作也给予了更多、更积极的支持。

1949年2月14日，为纪念苏联红军解放旅顺，中共旅顺市委决定在白玉山东侧广场修建纪念塔。此塔5月17日破土动工，9月8日建成，塔高11.9米，占地面积207平方米。

1949年4月1日，根据上级党委的决定，经苏方同意，旅顺党组织同旅大党组织同时公开。4月1日至3日，中共旅大区党委在大连召开全区党的活动分子大会，旅顺市派出37名党员代表参加了大会。从此，旅顺党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接着，苏军解除了对旅顺的军事管制。除军事外，一切由地方做主，要求外交上的照顾已不复存在，出现了友好共事的新局面。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根据协定规定，苏军于1952年底前从旅顺撤退，并移交一切代管或租用之财产。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根据形势的变化，1952年8月，中苏双方议定，苏军撤退的期限予以延长。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结束。1954年10月12日，中苏在北京会谈并发表关于苏军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双方议定，苏军撤退移交工作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

三、中苏军队接交防务

为实施1954年10月12日中苏联合公报的规定，1955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兵团奉中央军委命令，从朝鲜东海岸回国，接收苏军在旅顺口地区的防务。三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率先遣队先期到达大连，与旅大市党政主要领导人见了面。尔后，三兵团分两批先后从朝鲜撤出。志愿军三兵团回到旅大后，改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三兵团。

根据中苏联合公报精神，中苏双方共同组成了中苏接交联合委员会，负责交接事宜。联合委员会的双方在机构、人员上都是对等的。中方主任委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副主任委员是东北军区司令员邓华。苏方主任委员是从莫斯科来的苏军装备部部长，副主任委员是苏军驻旅顺口地区司令官什维佐夫上将。

在联合委员会下面，中方建立兵团接收委员会、空军接收委员会、海军接收委员会。兵团接收委员会主任是三兵团副司令曾绍山，空军接收委员会主任是沈阳军区司令员何振亚，海军接收委员会主任是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

中苏接交联合委员会成立后，召开会议，双方通过了《苏军自辽东半岛撤离与中国军队进驻计划》、《防务移交与中苏军队同驻期间保持备战实施的计划》及《技术装备交接计划》。

1955年2月中旬，中苏双方开始接防工作。为使接收防务、装备工作顺利进行，在苏军协助下，中方举办训练班，主要从技术上培训指挥员、参谋、政工、军械、坦克、通信、防空、工兵、防化和后勤等有关人员。接交工作对口进行，至4月15日，中苏双方接交防务工作结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的旅顺口基地机关和战斗部队，接收了苏军旅顺口海军基地及其所属部队。

在交接中，为预防突然事件发生，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兵团和苏军三十九集团军共同拟定了《中苏两国军队共同作战方案》，方案规定：4月16日零时前，辽东半岛南部地区的防务由苏军负责，中苏军队，由苏军统一指挥；4月16日零时后至苏军撤离止，该地区防务由中国军队负责，中苏军队，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兵团指挥。

1955年4月15日13时，中苏双方在旅顺苏军司令部举行接交签字仪式。中方代表签字的是三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海军旅

顺口基地司令员罗华生，空三军军长刘丰。苏方代表签字的是苏军三十九集团军司令什维佐夫，海军基地司令古德利切夫，空五十五军参谋长切德利克。4月16日零时，一切防务由中方负责。

接收军事设施与装备工作，在3月7日至4月15日进行，少部分延至5月，5月16日全部完成。接收的主要有：各种大炮、坦克、炮弹、炸弹、雷达、车辆、飞机、舰艇、鱼雷及油料等，以上为有偿设备，由中方付出人民币93561万元。交还的无偿设备主要有：营房151万平方米、机场9个，另有基地所属的仓库、医院、修理所等，约值人民币4亿元。

根据中苏双方的协议，苏军撤离后将留下40名苏军顾问，帮助中方训练干部，以便掌握和使用各种武器。

5月24日，以邓华上将为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和以什维佐夫上将为首的苏军代表团举行签署“交接证书”仪式。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兵团接管苏军第三十九集团军防务工作全部结束。三兵团领导机关设在旅顺，1956年后转到大连。

四、欢送苏军回国

苏军撤离前，中苏双方进行了各种友谊活动。旅顺市成立了中苏友谊活动办公室，具体领导全市的各项友谊活动。在全市广泛开展了拥苏和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思想教育。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进一步增强了中苏两国人民的感情，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增强了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信心。

1955年2月23日，在旅顺举行了“中苏友谊塔”奠基典礼。中苏友谊塔是国务院决定在旅顺兴建的，是为了感谢苏军驻旅顺期间对保卫远东与世界和平所做出的伟大贡献，为了纪念苏军驻旅顺口地区部队和中国居民间的深厚情谊。由团长彭德怀、副团长宋庆龄、贺龙、郭沫若、聂荣臻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代表团参加了奠基典礼。旅大市党政负责人也参

加了奠基典礼。苏方参加典礼的有：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驻旅顺口地区苏军代表、苏联驻大连总领事别良诺夫等。奠基典礼在“莫斯科——北京”乐曲声中结束。翌年10月，中苏友谊塔落成。1957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7周年时，举行了落成典礼。1955年3月，为纪念苏联红军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保卫远东和平的伟大胜利，旅顺又动工兴建了“胜利纪念塔”。同年6月完工，9月3日举行了“胜利纪念塔”揭幕典礼。

从1955年2月初至5月末，全市共举行42次中苏联欢会。在此期间，苏军报告员向全市人民群众作了158场“苏军——解放者的军队”的报告，同时苏军还为旅顺人民演出12场歌舞，放映92场电影。中苏双方互赠各种纪念品和锦旗，共同举行庆祝和纪念重大节日活动，共同进行友谊植树。3月27日，苏军与旅顺人民在白玉山营造了“中苏友谊林”，它象征旅顺人民和苏军相处10年结成的友谊将世代相传，万古长青。

驻旅顺口地区苏军从旅顺撤离时，旅顺人民和人民解放军部队热情欢送。中苏双方共叙友谊，洒泪话别。4月16日，在文化馆门前，举行了“旅顺市各界人民欢送驻旅顺口地区苏军回国大会”。会上，旅顺市委书记兼市长林沛致欢送词，苏军回国部队代表致告别词，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和苏军海军政治部主任也在会上讲了话。中苏双方在会上互赠锦旗。欢送大会仪式结束后，进行了将近30分钟联欢活动。4月27日、29日，还分别在旅顺中学体育场和旅顺市第五中学（现62中学）体育场举行两次欢送苏军回国大会。这3次欢送大会规模盛大，气氛热烈。此外，在旅顺、龙头、长岭子火车站等，共组织19次站台欢送苏军活动。

5月26日，驻旅顺口地区苏军指挥部的高级将领和指挥部全体人员，从旅顺启程回国。旅大市各界代表2万多人在大连火车站站前广场举行热烈的欢送大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旅大部队司令员曾绍山陪送到石河驿车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甘泗淇和旅大市副市长于谷莺陪送到中国国境。至此，驻旅顺口地区的苏军及其家属，共计 11 万余人全部撤毕。

（董希政 整理）

苏军驻金县的情况

一、苏军进驻金县及布防情况

1945年8月22日，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首批空降兵于周水子及旅顺机场着陆。中午，南下火车来的苏军抵达石河驿，下车的苏军灰头土脸，看不清面孔，下车后马上挖窖设岗，士兵进驻三菱工厂。接着大批人马由北而来，午后两点多钟，坦克兵开进金州城，接收了日伪金州警察署、民政署及其它重要部门，大部分中小学校都住上了苏军，在四处城门布岗设哨。午后四点多钟，后续部队进驻金县各地，公路沿线全是苏军军车和士兵，一连二三天都有大批苏军进驻，迅速控制了日军要地，日军势力一扫而光。9月中旬又有大批苏军进驻。

金州城设苏军陆军总司令部，北至石河，东至杏树屯，其中驻登沙河、华家屯、亮甲店、三十里、二十里、后石、老虎山、葫芦套等地苏军，统归金州苏军总部领导。驻沿海一带的大连湾、董家沟、满家滩、正明寺、大李家等地苏军，属夏家河子苏军海防司令部管辖。驻地不同，兵种也各异，亮甲店驻机械化师；大房身驻坦克团；登沙河、华家屯、三十里、董家沟驻炮兵团；石河、正明寺、老虎山驻炮兵营；金州城外驻炮兵团和步兵团；老爷庙机场还有空军场站和飞行团，空军司令是个少将。从上述情况估算，金县驻有苏军约2万人，据缴获的国民党情报资料所载，初期进驻金县的苏军约6000人。

苏军总部设在金州南站原“金州民政署”（现沈后干休所俱乐部），最高司令官是彼兹五谷里中将，主要任务是担任金州地区的对外防御工作。总部下设两个司令部，一是保卫司令部，在南站

原日本宪兵司令部（现 213 医院营房），司令官是西达连科中校，负责类似宪兵有关任务，后撤消由警备司令部代管；一是警备司令部，在原金州金融组合（现金州区工商银行南站分理处），司令官是格连科中校，主要负责地方行政工作，有 4 名工作人员轮流值班，一个班士兵执勤。各区设区警备司令部，工作人员少则 2 人，多则 5 人，地方上的一些重大事情都要向苏军请示报告，苏军不同意，就不能办，因为金县为苏军军管。

二、苏军进驻后的金县形势

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金县城乡一片欢腾，到处呈现出喜人景象。对苏军的到来，解除日本武装，老百姓是很欢迎的。苏军初来纪律还好，一般不侵犯中国人，专打日本鬼子和穿黄皮衣服的。就在这时，代表反动势力和敌伪爪牙的一些人物，粉墨登场，打着拥苏的招牌，趁日伪政权垮台，苏军初来不了解情况，社会秩序紊乱之机，骗取苏军信任，窃取地方各种权力。如以伪金州会会长曹世科为首的在苏军同意下，8 月 26 日在伪金州会（现博物馆）的楼上，正式成立“金州民众临时维持会”；尔后，兵痞邓德山伙同“陈司令”（本名陈立中，伪满专卖组合支部长），冒充朱德八路军工作者，骗得苏军同意，于 9 月 13 日与维持会自卫团合并，成立金县维持会保安大队，邓任大队长；国民党也乘虚而入，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罗庆春派刘启华于 9 月 21 日至金州，25 日成立国民党金县县党部，刘任书记长，操纵了维持会。他们狼狈为奸，进行了一系列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把金县搞得天昏地暗。加之后来苏军纪律不好，更加剧了社会动荡。据说调来旅大的苏军大部分是从德国撤回的，成分不纯，缺乏整顿，酗酒闹事、强奸妇女、掠夺财物、持枪杀人，屡有发生。老百姓不满地说：“走了小鼻子，来了大鼻子。”

三、苏军与中共金县党组织的关系

苏军与中共金县党组织的关系，总的来讲是友好的。由于各

个时期情况不同，表现的形式也各异。前期，从“8·22”苏军进驻至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对中共的支持是不公开的，而且对有碍苏联外交一些问题又是严格限制的。原因是苏联有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束缚，特别是它急于谋求一个和平恢复时期，担心得罪美国再引起新的世界大战。因此，苏军军管期间，中共党员不能公开身份，只能以进步人士或民主人士出现，苏军全权负责，一切以苏为主，办什么事都要向他们报告，在他们允许下才能去做。所以符合他们要求的就支持，不符合的就加以限制干涉。中共金县党组织在此情况下，对上要遵循党的总方针、总政策，对下要体现民情，解决群众疾苦。怎样把以苏为主和贯彻党的政策协调起来，确系一件很难处理的问题。因此不少干部在工作中往往与苏军产生磨擦。后期，由于东北全境解放，国民党节节败退，苏军与中共的关系由秘密转向公开，新中国一成立，两国立即建立外交关系，除军事外，一切由中共作主，要求外交上的照顾不复存在，出现了友好共事新阶段。现主要记述前期的一些情况：

首要的是苏军协助中共安排干部，发展革命力量，夺取公安大权，建立地方政府，从根本上扭转了金县的混乱局面。

根据《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旅大在苏军军管期间，不允许有任何党派活动，更不准有任何党派领导的军队。苏军却默许中共向旅大派干部、建警（实际上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建政。中共于1945年10月中旬派干部来金县但为时已晚。维持会成立了，公安局成立了。去和苏军交涉，苏军说你们来晚了，我们都已加委了。现在你们来这一讲，我们知道上当受骗了，但又不能随便撤，现在还有个‘沙油子’（即工会），你们是不是先成立工会，发动群众再夺权，到那时就合法了。在苏军支持下，中共金县党组织派一部分干部进入公安局及其保安大队，发展进步力量，分化瓦解敌人，一旦时机成熟，夺取武装大权；派一部分干部深入工厂，

发动工人组建职工会，通过合法斗争，解散维持会，组建县政府。经过短时间的的工作，11月11日，县职工会成立了（国民党此时已转入地下）；不久又组建了县委（对外称金县各界人民联合会）；12月7日由苏军出面逮捕了保安大队长邓德山及其亲信，改组了保安队和公安局；12月16日解散维持会成立县政府。从此，金县的警、政大权完全掌握在中共手里，金县开始成为由苏军军管中共施政的特殊解放区。

此外，在一些紧要问题上苏军也尽量给以帮助。如建立职工会初期金纺成立纠察队，缺乏枪支弹药，向苏军求援，得到了支持。建政初期，地方上消防能力差，既无消防设备，又不懂消防技术。苏军警备司令部派一名军官带一个班战士和两台消防车，帮助训练人员。苏军自备伙食，与消防战士住在一起，时间近3年，1948年冬才撤离。

还有有些事，苏军表面干涉，暗中支持。如1946年冬，国民党侵占大片辽南解放区，辽南大批干部撤到岗里，有些人员身着军装，牵着战马在各村活动，登沙河区一个苏军军官找区委书记，叫把身着军装牵着战马的八路军抓起来。区委书记说：“哪有共产党抓八路军的，不但不能抓，还得支持帮助。”他说：“不行，国民党和美国特务要照像啊！”区委书记说：“我可以向军队干部说一说，换上便衣行不行呢？”他连声说：“可以！可以！”区委书记为撤进岗里的干部找苏军军官办理出进岗通行证，苏军军官反问道：“没有证件的人进来没有？”区委书记说：“进来了。”又问：“没有证件，出去了没有？”区委书记说：“出去了。”他说：“既然如此，你还要证件干什么！”他的意思是在文字上不要授人以柄。

苏军对中共的意见，一般是尊重的。1946年，群众对苏军纪律意见很大，斯大林知道后，立即指示，不准欺侮中国人，对中国人不友好的要法律制裁，并对首批进驻的苏军实行换防，调回本国，下半年苏军纪律开始好转。这年春，马桥子司令官，大尉

古道夫，外号叫“红胡子”，欺压中国人，派官差，叫中国人烧水、劈柴、扫雪，态度很粗暴，有时还打人，群众意见很大。苏军警备司令部立即把他调离。这年苏军开车肇事较多，提出后，他们就采取措施，派战士在南门外站岗，和交警并肩指挥。1947年6月12日，国民党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带十几个人坐火车巡视路过金州，苏军警备司令官瑟夫琴科到车站进行礼仪性的欢迎。董下车后要求到苏军司令部坐一坐，苏军司令官按中共金县县委的意见拒绝了。董到二十里堡车站想到北山上去看看，也同样遭到拒绝，董一气之下返回了。

苏军对中苏双方发生的问题，处理的也比较合情合理。如1946年秋，苏一军官醉酒放枪打死县保安队中队长王文亭，报案后，苏军警备司令部立即查究，把他送回本国法办。同年11月，城里派出所副所长张志元查夜，遇一苏军军官到东街小店买酒，张帮助叫开了门，买了酒。苏军官表示谢意，伸手和张“拿果拇”（握手），不幸将张手上已拉线的手榴弹触响了，两人同归于尽。事发后，苏军司令部认为是误伤，各自处理善后。1947年秋某日，苏士兵看电影散场，路过水源地工会果园，部分士兵偷摘苹果，被看园的民主联军伤员用手榴弹炸死两个，重伤两个。苏军司令部认为，偷人家东西，是不守纪律的，死就死了吧，未做任何追究。

苏军为群众也做了不少好事，特别是国民党对旅大经济封锁期间，苏军从国内运粮支援地方，用军马帮老百姓春耕，为群众免费治病等，事例很多。

苏军与中共的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意见相左的地方也不少，经常发生磨擦，最突出的是1945年冬至1947年冬的两年中，苏军干涉由中共金县县委领导开展的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群众运动。1946年二三月，反奸清算刚开始，群众斗争汉奸恶霸，戴纸帽，游街示众，苏军不明白怎么回事，在后边跟着看热闹，不加干涉。可是4月就不行了，开始出面干涉。他们认为这里是军管，这样搞

法，把地方搞乱了，莫洛托夫在巴黎和会上不好讲话。此后斗争会只能悄悄地开，苏军不知道也就不加干涉。被斗争对象知道苏军这种态度，就悄悄给苏军报信，苏军就出面干涉。一次在三里村旁的沙滩上，准备开斗争大会，群众来了很多，正要开会，来了几个苏军，把桌子掀掉，纸帽也砸了，群众被驱散。董家沟搞得最厉害，苏军把工作队队长捉起来送县委，并责令查处。地主、汉奸这些家伙，神通广大，打通与苏军地方司令官的关系，求得保护。在城市增资运动中也有这种情况。斗争群众痛恨的汉奸把头，苏军不让。第一任县委书记关星甫说：“一方讲友好，一方闹得凶，有许多事情他把你手脚都捆起来了，不许你大闹天宫。上级叫发动群众，反奸清算，他说不行，说开三国会议斯大林不好讲话。”反奸清算就这样告吹了。

第二任县委书记陈少景来后，1946年7月旅大地委又确定了“继续反奸清算，开展减租运动，相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针。陈和苏军交涉，不以减租减息名义，而以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名义，苏军同意了。在亮甲店搞试点，苏军司令部给工作队员发了证，并给该区司令官下了令。但颁发减租法令中有两点（即退1945年的租金和押金）苏军不了解。苏军发现后向上报告，要撤县委书记的职。运动因而又告停。1947年七八月又搞查租运动，有些区又走上了变相土改的道路，三十里堡区梅家村斗争会很厉害。苏军成天找县委书记，要关押区干部，并对地主说，不管是陈少景，还是李建东，都可以叫他们滚蛋，还向旅大地委提出了意见，韩光书记召开了土地会议，下令减租暂停。因为再搞下去会和苏军搞不好关系。

金县的干部，对苏军的这一作法很不理解，加之日常的强迫命令和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实在令人难忍。于是在干部中普遍产生了不满情绪，甚至反苏情绪。有的说苏军压制“农运”，是地主路线，是干涉中国内政；有的把苏军搬走工厂机器、纪律不好

等都翻弄出来了，说不是友好行为，是侵略，和小鼻子一样；有的不愿受窝囊气，借故出走。如从山东来的刘家店区区长王立志，借回家探亲之机，转回原地工作。

老百姓原来就对苏军违纪现象有反感，管苏军叫“老毛子”，由于干部情绪的影响，就更不尊重苏军了，甚至变“招”熊苏军：以坐公共汽车为例，苏军虽几次要求车站用俄文标明发车时间、地点、票价，均未被理采；售票员卖票先卖中国人后卖苏联人；车上只给中国抱小孩妇女让座，把抱小孩的苏联妇女堵在车门口站着。苏军理发、做衣服、坐马车一般都比中国人贵一两倍。下饭馆不但价高而且趁苏军士兵醉酒往桌子上添空盘空酒瓶，多熊钱。就是国营商店节日商品优惠，也不优惠苏军。建筑合作社给苏军修仓库，以烂木顶新木，白粉代白油，并偷水泥 1000 多袋。水道工人也想“招”熊苏军，把苏军住宅水门闭死，找修就要钱。有的居民请苏军士兵喝酒，叫士兵从营房往外偷东西，从中渔利。八里果园曾两三次打偷苹果的苏联士兵，扯碎衣服，撕掉领章，捆绑送至派出所。在群众中，类似这样的事例经常发生。

1947 年 12 月，县委鉴于干部、群众对苏军不友好的种种迹象，根据地委书记韩光 10 月关于《关东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决定召开一次扩大干部会议，重点讨论解决对苏军的认识问题。县委深知这一思想问题的解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下决心把会议时间开的长一点，并请示地委派人参加帮助解决。

会议从 12 月 8 日开至 21 日，参加扩大会议的对象，有县级干部、区委书记和区委干事，县机关相当于区级干部及部分的村支部书记，共 120 人。会议首先传达了韩光的报告，然后分组讨论，联系个人思想谈看法。会议着重解决“以谁为主、苏军性质、土地问题及苏军搬走机器与违纪”等问题的认识。通过讨论，在上述问题上统一了认识。有的干部说：“我们思想上糊涂了两年，也苦闷了两年，现在思想舒畅了，工作也知道怎么搞了。”干部们

和苏军改善关系的自觉性增强了。

此后，中共金县县委抓了开展向苏联学习活动，在全民中开展了广泛的拥苏教育。群众逐渐明确了苏军的本质及驻军旅大的意义，认识到没有苏军的解放，旅大绝不会有今天的好日子，根本不是“走了小鼻子，来了大鼻子。”此后，再也不叫“老毛子”而称“老大哥”了。过去存在的一些不友好情况基本得到了改善。

随着东北全境的解放，苏军在旅大的政策也开始松动，中共的活动由过去的隐蔽到1949年4月走向公开，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宣告了旅大军管解除。

四、友好的撤军，热烈的欢送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双方商定苏军于1952年底以前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移交一切代管或租用的财产。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撤退时间推迟，朝战结束后，双方共同议定，1955年5月底完成撤军。金县苏军从3月5日起分3批撤离，至中下旬撤退完毕。

撤离前一天，中苏双方分别在三十里堡、金州城举行了欢送和告别大会。双方首长和代表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互赠锦旗。每次撤离，中方都组织有各界代表参加的3000至5000人的欢送大会，并进入站台送行，沿途三十里、石河车站也组织群众到站台送行。每次送行场面都极为欢畅热烈，“莫斯科——北京”的歌声此起彼伏，握手拥抱、依依惜别的情景，笔墨难以表述。

（傅万杰 整理）

苏军进驻新金地区始末

一、苏军进驻普兰店和貔子窝地区

苏军按照 1945 年 8 月 14 日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关于旅顺口之协定》的规定，于 8 月 22 日派出空降部队进驻了旅顺、大连，解除了日本守备队的武装，并在大连、旅顺分别设立了警备司令部，对旅大地区实行军事管制。8 月 24 日，苏军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的首批部队到达普兰店。从早晨开始，许多坦克、装甲车、炮车、汽车满载着击败日本关东军的苏联红军，路过普兰店向大连方向驶去。居民从四面八方涌上街头，向苏军招手致意，欢迎苏联红军。

在苏军首批部队路过普兰店驶往大连的同时，一辆军车开到伪普兰店警察署门前，一名军官带着许多士兵进屋缴了日本警察的武装。与此同时，接收了普兰店民政署及其它重要部门，被解除武装的日本警察，象被霜打的草，往日的“大和魂”、“武士道”精神一点儿也不见了。一辆从貔子窝方向开过来的小汽车，走到丰荣街（现久寿街）小桥上被苏军截住，车上的日本警察，因没向苏军投降，被苏军当场击毙，同车来的一个巡捕举起双手，高喊着：“我是中国人！”才幸免于死，开着汽车逃回去了。

苏军解除普兰店日本警察武装后，留下少部分部队驻扎在普兰店，成立了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是柯布可夫中尉，驻在原平安街日本人松崎的住宅。

苏军在进驻普兰店的同时，也进驻了石河驿、貔子窝、城子坦等地。后续部队陆续进驻了三十里堡、亮甲店、登沙河、土城子、华家、杏树屯等地，并在这些地区进行布防。

二、苏军在普兰店地区设防布哨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关于旅顺口之协定》附件规定：“海军根据地区域境界，自辽东半岛西岸猴山岛（后三道）湾以南之地点起，向东方面经过石河驿及邹家咀子至半岛东岸，东西划为一线，此线以南为本地区陆路之界线。”《协定》规定之辽东半岛区域西方水面：“北纬 39°正，东经 120°49′之点起，至北纬 39°20′，东经 120°31′之点止，将两点连为一线以后，转向东北普兰店方向，至其以南之陆路界线之起点。辽东半岛地区东方水面，在下列曲线以南各岛归于本地区。此曲线系自陆上界线终点起，向东经过北纬 39°20′，东经 123°08′之点后，转向东南至北纬 39°正，东经 123°16′之点为止。”苏军进驻普兰店以后，按照上述规定陆续在石河驿至邹家咀子一线陆界线以北一华里处的山包土岭设上岗哨，以后又把岗哨向里缩回到规定的界线附近。到 1946 年 1 月，苏军在下列村屯设过岗卡：石河驿、五里台西财山、汤家沟南山、张屯至后塔岭之间、前塔岭、范屯南山、虫王庙、冯店子南、土城子六股道北、小王屯南、山咀北、姚屯南、小陈屯南、袁屯南山、小张家沟东南、邢屯南山、粉皮墙庙、姜屯南山、上排南山、陈家楼与刘家店之间，上曲家沟南山、肖屯南、管家炉南河沟、于山咀南、李家屯北、前孙屯东沟沿、邹家咀子等。岗哨是用木板建的岗楼，有的是在山包上挖条壕沟，上面盖上木板压上土，也有的是设流动哨。苏军在交通要道和重点岗驻有一个排或一个班的兵力，其它岗哨只有两三个士兵把守。在石河驿、土城子、车家屯、卧龙、杏树屯等地各驻有一个营或一个连的兵力，均归金州苏军总部领导。苏军岗哨除石河驿、刘家店为开放卡，准许车辆行人通行外，其它岗哨一般是不准通行的。进出石河驿、刘家店两岗哨，必须持有苏军警备司令部发的通行证，或由大连派来接应人员迎进送出。

1946 年 3 月上旬，新金县根据安东省委的通知，将苏军岗里

的登沙河（包括杏树屯）、亮甲店、三十里堡等三个区移交金县领导。

三、苏军与地方党、政的关系

苏军进驻后，尽管当时苏联当局因有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的约束，对中共地方党、政的活动虽有所干涉和限制，但总的方面说来还是比较友好的，是尽量支持和帮助的。主要表现：

第一，协助人民自卫军在新金地区接收伪地方维持会、保安队，建立民主政权。苏军来后，普兰店、貔子窝地区的人民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40年的血腥统治，获得解放。但是，解放当时的普兰店、貔子窝地区，社会秩序混乱，政治情况复杂，在人民政权建立之前，日伪汉奸、敌伪残余分子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在普兰店、貔子窝等地组织了地方治安维持会、保安队。他们打着协助苏联军队维持治安的旗号，得到苏军的支持，以维持会的名义和形式，实行反动统治，欺压人民，并且明里暗里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妄图等待国民党政府派员接收。

1945年9月中旬，陈云涛、李光率领辽东人民自卫军，在苏军的支持下，接收了城子坦、貔子窝维持会，解散了保安队。为适应新的革命形势，决定在日伪统治的貔子窝、普兰店两个民政署的区域内，置新金县建制。9月25日建立了新金县政府。10月4日，为接管普兰店维持会，建立区政府，新金县县长陈云涛派两名代表到普兰店，以辽东人民自卫军的名义与普兰店地方维持会谈判接管事宜，但普兰店地方维持会会长薛慧堂，保安队队长陈光甫拒绝人民自卫军接管。副会长孙君福召开紧急会议，动员反击。他诬蔑辽东人民自卫军是“土匪”，动员保安队和维持会的所有人员参加反击。10月5日，他们在普兰店的北街设下埋伏，准备伏击人民自卫军。人民自卫军为了避免发生武装冲突，没有直接开进普兰店，而是从长山寺绕道去华家，在华家会见苏军警备司令官，让他们协助进普兰店。这位司令官听了陈云涛的介绍，得

知陈云涛所率领的辽东人民自卫军是真正抗日的八路军，普兰店保安队是冒充八路的。即表示愿意派出代表与普兰店苏军警备司令部联系，但也提出要双方协商，不要发生武装冲突。傍晚人民自卫军车队出发时，华家苏军派出一名军官坐吉普车在前面带路，直达普兰店。到普兰店后，经他们直接与普兰店苏军联系，同意人民自卫军进普兰店，并要双方派出对等代表谈判。人民自卫军的代表有陈云涛、李光、刘戈、孙梯清等，维持会的代表有维持会正副会长，保安队正副队长。谈判地点在维持会的大楼里。双方经过三个多小时的争论，达成协议：解散维持会，成立普兰店特别区公署；对苏军的物资供应由新成立的特别区公署负责；保安队把武器交出来，服从人民自卫军改编。在苏军的协助下，人民自卫军一枪没放，就接管了普兰店。

第二，苏军对中共地方党组织实行的政策，一般是不加干涉的。但因苏军对岗里几个区实行军管，中共往那里派干部，或在那里推行重大政策时，必须与那里的苏军取得联系，他们同意后才能实施。如建政初期，新金县政府向杏树屯、登沙河、亮甲店区派干部，都是与当地苏军司令部协商后才派进的，但不能以中共的面目出现。只能以区长或农民联合会会长的名义去工作。原杏树屯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王湘说：“1945年11月底，新金县委派我去杏树屯区任职。我和县委书记赵筹还有一名翻译先到杏树屯去找苏军联系，一个值班的军官告诉我们，杏树屯归登沙河苏军管，需登沙河警备司令部同意才能来。我们又去登沙河找苏军联系，他们同意了，我才去工作的。”

苏军对岗里几个区实行军管，中共地方党组织在那里执行各项政策，必须注意照顾那里的地区特点，采取一些灵活的方式和策略。如1946年初，开始反奸清算，新金县岗外地区已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而岗里几个区一开始就遭到苏军的干涉，为照顾苏联外交方面的影响，不授美蒋以柄。在斗争方式上，各区不开

斗争大会，把斗争会改在室内进行，避免引起苏方的干涉。亮甲店区群众清算罪大恶极的伪会长巴纯卿时，就是在小范围斗争后，送到县城貔子窝开公审大会处决的。这些做法虽与岗外几个区不同，但也达到了发动群众，除奸反霸的目的。

第三，苏军对中共是不公开的支持。苏军对地方政府的意见，一般是尊重的，也是积极改进的。苏军进入普兰店之初，群众对苏军的纪律不好，意见很大。1945年10月，人民自卫军的一名家属从山东过海来普兰店，在大街上被两名苏联士兵一直撵到工人大队部才被堵回去。当时的普兰店区长、工人大队部副政委王福如就此事会见普兰店苏军警备司令柯布可夫，告诉他“你的部下纪律太坏了，在大街上撵中国妇女，老百姓对此意见很大，望能严肃查办！”这位司令虚心接受了地方政府的意见，很快就查出这两个士兵并把他俩押进水牢里。这位司令还向王福如表示了歉意。以后，苏军的纪律逐渐好转了。

苏军应人民自卫军要求秘密提供武器装备。1945年10月，辽东人民自卫军普兰店工人大队成立后，因武器不足，当时的大队长刘戈（赵恩光）亲自赴金州苏军司令部要求苏军提供武器支援工人大队。苏军答应从缴获的日军武器中拨一部分给工人大队。据统计当时仅从石河驿秘密转交人民自卫军的武器有九二式步兵炮、掷弹筒、轻重机枪、步枪、手枪等5000多件。还有大批弹药。12月，四纵队一支队政治部主任王伟光来普兰店，通过刘戈到大连与苏军一位少将会谈，又获得大批武器装备。这些武器不仅装备了四纵队，而且还有部分经普兰店湾装船运往烟台、装备了胶东部队。

国民党进攻辽南后，普兰店以南根据地成为辽南中共党政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坚强堡垒和重要阵地。石河驿一线以南驻有苏军，国民党军队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人民自卫军在岗哨以外则有所依托，无后顾之忧。国民党军队侵占普兰店以后，曾几次向

石河驿以北，普兰店、貔子窝以南的根据地进攻，他们的枪炮子弹直接打到苏军岗哨以里，苏军提出严重抗议。后来，国民党怕在外交上引起麻烦，便采取会商向苏军提出交涉，抗议苏军违犯条约袒护共产党军队，国民党1947年2月2日《和平日报》报道：“普兰店中苏会商，我向苏提出六要点”。国民党提出，他的军队“有权清剿”普兰店、貔子窝以南之“匪军”，“今未前往”，是怕与苏军误会；要求苏军歼灭石河驿以北至普兰店、貔子窝以南之“匪军”；要求苏军保证“匪军”不利用旅大协定为补给基地等。苏军对国民党这些要求置之不理。相反，当国民党军队向根据地里打炮时，苏军应人民自卫军的要求，曾几次秘密地予以还击，惩罚了国民党军队进攻的气焰。

苏联红军进驻新金地区也有消极方面的，如：（一）苏军进入东北之初，有些士兵纪律太差，强奸妇女、酗酒闹事，掠夺民财，引起当地一些群众的强烈不满，说：“打跑了小鼻子，来了大鼻子”。这虽是个别士兵的所为，但它有损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二）对地方党组织有误解、不信任，甚至干扰。1945年11月，新金县委在苏军岗里的杏树屯、登沙河、亮甲店区建政，苏军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制约，对此作了许多限制，除不准公开用共产党名义，不准公开发动群众反奸清算外，办什么事都要向他们报告，在他们允许下才能去做。（三）运走敌产，为后来恢复经济造成困难。日本帝国主义为剥削中国人民，在貔子窝、普兰店等地开办了一些工厂企业，日本投降后，这些工厂企业理应交还中国人民，但是苏联将它作为战利品，将所有能拆卸运走的机器设备器材，都运走了，甚至连学校里的钢琴、邮电局的自动电话交换台也拆走了。国民党反动派借此掀起反共反苏高潮，当然是别有用心，但是做为社会主义的苏联，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

四、苏军奉命撤出新金地区

1946年3月12日，苏军撤出沈阳，国民党军队进入沈阳。3

月 27 日，中共同国民党达成了《东北停战协定》，然而，国民党根本不执行协定。国民党军队为了打开辽南海上运输线，继续分兵向鞍山、海城、大石桥、营口方向进攻。5 月 3 日，东北苏军撤退完毕（大连除外）。在这种形势下，苏军决定将留在新金县普兰店、貔子窝两地的苏军撤回岗里。6 月初的一天，苏军金州警备司令部一位中校来普兰店会见了普兰店区委书记吕锦业。他说：“普兰店苏军司令部得撤，普兰店是岗边外围第一个较大城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国民党侵占了以后，除了海上以外，地下工作要争取主动。”他要求普兰店区能给予协助，共同在普兰店布置地下工作，找一名完全可靠的人潜伏在普兰店，搜集情报，并希望能与金州警备司令部取得联系，同时规定了联络地点、方法等。这次会见后，苏军在新金地区除洼店水源地留少部兵力驻守外，其余全部撤回岗里。

（于宝祥 整理）

东北抗联大连工作组 配合苏军接管旅大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战争迅速推进。当时在苏联编为八十八国际旅的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们激动万分，等待着斯大林给他们下达重返祖国，打击日本侵略军的命令。8月22日，苏联红军经由东北进驻旅大。按照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抗日联军分四批从苏联乘飞机到达中国东北。其中八十八旅旅长周保中，带第三批于9月8日飞抵长春。鉴于日本已投降，东北抗日联军遂改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周保中在长春召集还穿着苏军服装的中尉董崇彬、少尉刘玉泉、季喜林等7人（一说9人）谈话，决定由董崇彬负责，组成大连工作组。并提出五点要求：1. 到大连工作，立场要坚定，防止敌人用金钱和美人计收买；2. 要做好党的宣传工作，宣传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的方针政策；3. 要注意发现党的地下组织，支持他们的工作；4. 迎接八路军，做好与苏军之间的搭桥工作；5. 要主动取得市委领导，多向市委汇报工作。

1945年9月16日（一说12日）抗联大连工作组抵连。第二天到大连苏军警备司令部报到。司令部任命董崇彬为沙河口区苏军司令部副司令，王福、李绍刚为副官；任刘玉泉为甘井子区苏军司令部副司令，于庆兰为副官；任季喜林为西岗区苏军司令部副司令，董金山为副官。工作组成员分别到各区司令部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一、解除日本警察武装、解散“杂牌军”、打击国民党大连市党部

抗战胜利初期，统治旅大地区的日伪政权分崩离析，治安形势非常混乱。各色人物出于各自的利益纷纷登场，建武装、拉山头、抢地盘、争物资，搞得大连乌烟瘴气。当时的大连除留守的日伪警察外，在大广场、寺儿沟一带，有张本政的大连中国人会、汪渔洋的国民党大连市党部和徐吉庆、王立本、蔡显蛟等人组织的“杂牌军”；在新起屯、青云街、桃源街一带，有伪分区长王老九等纠集地痞成立的所谓“八路军”；在香炉礁，有伪工头骆福海和刘金祥等人纠合的队伍；在甘井子，有日伪警察署司法联络员王宝发和冷镇北等人组织的“八路军”；在沙河口，有崔中敏的“八路”等。他们打着维护社会治安的旗号，勒索民财，危害百姓，为非作歹。如甘井子的王宝发纠合 100 多人，盘踞在甘井子浴池、大烟馆里，控制着老甘井子地面，曾阴谋暗害中共抗盟会三连指导员李继先。

东北抗联大连工作组抵达大连后，即着手在沙河口、甘井子和西岗地区协助苏军采取措施解决各种非法武装，将借口协助维持社会秩序进行破坏活动的日本警察的武器弹药全部收缴起来。至 10 月末工作基本结束，苏军押走了少将以上的日本战犯，解散了日本警察。在沙河口，董崇彬于 9 月 21 日，带领苏军解散了崔中敏等组织的假八路，9 月底对维持会（前身为大连中国人会）的队伍进行了改编。10 月 5 日，苏军以进行反苏反共宣传的名义传讯了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书记汪渔洋等 6 人，扣押在大连苏军警备司令部，后遣回长春。其下属骨干 20 余人，由苏军监狱转沙河口警察局看押，董崇彬电话通知刘玉泉，用车拉到甘井子大坝处决了，迫使国民党由公开转入地下。经过强有力的整顿，到 11 月，大连的治安形势有了好转，交通恢复，商行开业，工厂开始恢复生产，社会秩序转入正规。

二、配合接管、成立甘井子、沙河口、西岗警察局

1945 年 8 月 18 日，大连伪商会会长、大汉奸张本政，伪商会

副会长邵慎亭等人，与日本关东州厅长官今吉敏男互相勾结，打着“协力当局维持治安并谋民生”的幌子，成立了大连地方自卫委员会，企图乘抗战胜利之机，混水摸鱼，把持地方权力。苏军进驻旅大后，自卫会改名“大连中国人会”，加快了攫取权力的步伐。9月，中国人会将伪工头骆福海派到甘井子警察署，委任为副署长；指派家礼头子苏省三进驻小岗子日伪警察署（今西岗公安分局）。数日间，地方警察大权先后落入“大连中国人会”的手中。

1945年9月28日，刘玉泉带领苏军战士在甘井子三道沟巡逻时，与驻扎该地的大连抗盟会（由中共胶东区委领导）四连战士相遇，遂与指导员邴玉田取得了联系。刘玉泉约定连队负责人去甘井子警察署洽谈。次日，抗盟会派三连指导员李继先和邴玉田前往甘井子苏军司令部接洽关系。经过交谈，刘确信这支武装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当即决定由抗盟会派干部、战士进驻甘井子警察署。9月30日，李继先、邴玉田等28人第一批进驻了甘井子警察署，一部分以宣传员的名义分驻各派出所，另一部分编入治安队。10月1日，刘玉泉主持召开了治安队员及进驻的抗盟会武装人员大会，宣布由李继先任甘井子警察局局长兼治安大队长，同时宣布免去原警察署副署长骆福海的一切职务。甘井子警察局从大连中国人会手中转到了中共抗盟会的手里。

1945年9月21日，沙河口区董崇彬在带领苏军解散“杂牌军”的过程中，收编8人做为苏军沙河口司令部的便衣，自己亲自领导，交给他们侦察一般案件、搜集社会情报的任务。以后，又在沙河口电车公司招收了200多工人，在机车厂招收了一批年轻人，组成沙河口治安大队，由抗联干部王福兼大队长、李绍刚负责政治工作，董崇彬担任总管。治安大队承担站岗放哨，维持社会治安的任务，是人民警察机关的雏形。10月中旬，治安大队又从社会上招收了140余人扩充队伍，治安大队发展成一定的规模。10月下旬，中共辽东军区派来秦淑云、金路清等10余名营、连、

排干部到沙河口，在沙河口苏军司令部和董崇彬的支持下，收编了治安大队组建沙河口警察局，秦淑云任局长，金路清任副局长。

1945年10月下旬，西岗区苏军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季喜林，以“协助”警察署长苏省三工作的名义，将由胶东来的中共干部姜彬义、宋子官等安排到西岗警察署。10月25日，西岗区苏军司令部以勾结土匪、勒索敲诈、私藏枪支、偷匿军用品等罪名将苏省三逮捕。随后，季喜林出面召集苏省三的部下开会，公布苏的罪状，宣布由姜彬义任西岗警察局长。至此，大连中国人会企图通过攫取武装，以把持地方权力的阴谋，在抗联大连工作组的辛勤努力下彻底破产。甘井子、沙河口、西岗人民武装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在大连地区最终掌握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迎接韩光来大连，建立民主政权

1945年10月初的一天，一位头戴礼帽，身穿大褂的人来到沙河口苏军司令部，用俄语问苏联值班员：“这里有个董司令吗？”值班员警惕地问：“你怎么认识他？”来说：“我们是朋友。”值班员进里屋向董崇彬报告：“有个资产阶级大老板来找你。”董心想，来大连时间不长，还没有和资产阶级打过交道，怎么会有大老板来呢？便对值班员说：“叫他进来。”来人进屋便问：“董司令在吗？”“你怎么认识他？”董反问，来说：“曾在一起工作过”。董说：“我就是”，来人便拿出抗联负责人之一冯仲云给董的信。原来此人便是东北局派来大连工作的韩光。韩光原来在抗联工作过，1935年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后去延安工作。“八·一五”后组织指派他到东北工作。战友相见，分外高兴，两人谈了一天一夜，董崇彬向韩光介绍了大连的情况。第二天韩光坐董安排的军用飞机飞回沈阳，向东北局领导汇报了大连的情况，东北局书记彭真在对韩光的指示中强调：首先把大连的政权拿到手，把公安局拿到手里。一周后，韩光带领三四十名干部来到大连，着手组建市委、市政府和公安总局，并经大连苏军司令部高字洛夫中将同意，任陈

云涛为副市长，赵东斌为公安总局局长。市政府、公安总局成立后，抗联大连工作小组逐渐把物资、被服、仓库、部队交出来，1945年11月15日撤回长春。

四、按照斯大林《红军守则》监督和检查红军纪律

苏联红军进驻旅大初期，纪律很差，奸污妇女、强抢民财等事情几乎每天都有发生。沙河口苏军司令部副司令董崇彬有一次坐车外出办事，遇到一个苏军中校军官，正要强奸一名妇女，董叫苏军士兵前去制止，那个中校军官不听，董便下车去劝阻，中校军官还是不听，董崇彬便命令士兵把中校军官的枪缴下，绑了起来关押到沙河口苏军司令部。甘井子苏军司令部副司令刘玉泉，有一次发现一个苏联空军上尉和一个少尉轮奸一名中国少女，阻止不听，便鸣枪警告。空军上尉掏出枪把子弹上膛，刘玉泉先发制人开枪射击，当场把空军上尉打死。因为死者是个苏联战斗英雄，苏联内务部到现场勘查，检查他枪膛里确有一颗子弹，以此证明刘玉泉是被迫还击，打死勿论。当时，在大和旅馆的院内，就枪毙了三四个违犯军纪的少将，对校级以下军官则就地正法。

东北抗联大连工作小组，在大连工作期间曾有过失误，1945年9月的一天早晨，苏军受张本政操纵的“中国人会”蒙骗，包围了当时抗盟会驻地——王家沟净水池。董崇彬在场当翻译。苏军司令官对董崇彬说：“你向他们讲，队伍解散，人员都回家，不准扰乱社会秩序，哪个是头目拉出来枪毙。”由于董当时年轻，又是刚到大连，不熟悉情况，一时分辨不清，于是就问：“谁是负责人？”张世兰站出来说：“我是”，苏军司令官即命令苏军士兵开枪把张世兰打死。直到1957年董崇彬才知道是误伤了自己的同志，对此，他至今仍深感痛心。

（张国萍 惠兆伦 整理）

粉碎国民党妄图接收旅大的阴谋

一、政治背景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开创的旅大革命根据地，因其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较好的经济基础和重要的地理条件，在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国民党认为如果苏联同意国军进驻旅大地区，则可以断绝中共在山东与东北间的一条联络路线。所以大连一地，在战略上比哈尔滨更为重要。为此，国民党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为依据，积极推行“控制华北，抢占东北”的战略方针，加紧勾结美国，实行武力夺取东北。同时，先行宣布各行政区官员的任命，极力从舆论上、行动上进行接收旅大的准备活动。

1945年9月，国民政府任命沈怡为大连市市长。沈怡即在重庆和上海两地设立了大连市政府办事处，筹划接收大连的工作。

10月12日，国民政府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外交部东北特派员蒋经国、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莫德惠等40余人抵达长春，与先行到达的国民政府代表团团长、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会合。次日，在长春与苏军代表举行首次会谈。苏方以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为首。熊式辉提出，他来“办理东北政治经济的收复事宜，希望得到苏联盟军的善意帮助”，并提出四项磋商要点，除要求苏方协助国民政府建立政权、接收日本及伪满的工业机构及设备、空运少量部队至沈阳、长春外，其第三项要点是：“我方决定在海上用船运军队到东北接防，请指示适宜登陆地点，并予协助。又，我方拟船运军队在大连港登陆，请

将该港口现状见告。”马林诺夫斯基对此答称：“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大连港为自由港，中国军队不能由大连港登陆”，拒绝了国民党方面的要求。

10月17日，熊式辉在第二次会谈中又一次提出：“中国军队两个军由海上船运至东北，可于本年11月初旬在大连港登陆；另两个军经山海关陆路开来东北”。并且提出：“中国方面拟先派员视察东北各主要城市，如大连、哈尔滨等地之现状，俾作接收前必要之准备。”马林诺夫斯基表示：“中国军队进驻某一地区时，须待苏军自该地区全部撤退之后。在此种情况下，苏军不可能掩护中国军队前进。”对于行政接收问题，则答称“须请示莫斯科”。

国民政府代表与苏军驻东北最高当局的谈判，连连碰壁。10月21日，熊式辉飞往重庆，请示解决在大连登陆问题，于26日熊又飞返长春。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外交部与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也多次就大连问题进行交涉。

苏联坚持大连问题不是任何方式的外交途径所能改变的主张，国民政府企图依靠美国海军的帮助，从大连登陆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迫使国民党军队不得不从秦皇岛强行登陆。经过激烈的战斗后，才缓慢地沿着山海关、锦州等陆路进入东北。延缓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进度，为共产党进军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赢得了时间。

由于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制约，苏联对国民政府一再要接收大连地方行政权的要求又不便拒绝。1946年1月6日，苏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特罗增科中将在给董彦平复信中称：“已接获大连方面的复电，中国政府在大连建立政权，苏联方面可无阻碍。”第二天在双方会谈中，董彦平提出：“大连接收经准贵方复函可无阻碍，我方接收人员即将前往大连，请贵方派定联络官，并完成其它必要之手续，俾早出发。”1月18日，蒋经国与沈怡飞抵长春，准备进入大连。1月29日，董彦平在第九次会谈中，又提出：“大

连市接收人员拟俟2月2日以后再去，因此时适逢中国旧历新年，官民均在休假期间，不便推动工作。又据报大连市现有武装工人纠察队8000人，是否可无顾虑？闻沈阳至大连各小车站，沿途均有八路军登车检查，此种现象实非正常，请设法纠正。”并向苏军提出请求：“派相当兵力护送前往，如遇非法检查，即可由苏军出面制止。”特罗增科一再表示：“无权将部队开过沈阳、鞍山以南，苏军只为协助中国建立政权，而非参加中国之内战。”双方就“安全”问题会谈多次，未能达成协议。国民政府则未敢自行派人前往大连。到1946年3月7日，董在与特罗增科的第十三次会谈中，还想借运输联合救济总署物资为由，提出使用大连港的要求，特罗增科则以大连港非属管辖范围为由，拒绝答复。然而国民政府急待接收大连的企图一直未曾放弃。直至1947年1月3日，“美国照会苏联，提出大连应由中国管理，开放国际贸易，恢复中国长春铁路交通。”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宣传工具也四处谣传：在沈阳已设立了“大连市政府”，准备了警察3000人，任命了大连、旅顺两市市长等。1947年3月7日，苏联政府再次同国民政府提议：“在整个旅大地区应迅速建立适应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协定要求的中国行政”。

于是，国民政府以为大连即时可以到手，一时紧张万分，各接收单位都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筹划着怎样勿失良机。经苏军当局同意，国民政府派出以董彦平为首的旅大视察团进行实地考察。

二、应急对策

中共旅大地委一直严密注视着国民党企图接收大连的各种阴谋活动，采取了一系列的相应措施。1947年4月10日，地委书记韩光在党内县团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与我党之对策》的重要讲话，全面分析了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为防止国民政府接收大连行政权，提出了重要措施。地委根据《中苏友

好同盟条约》和地委不宜公开活动的现状，认为：（1）国民党有可能带一部分警察进入大连；（2）大连的警察力量也有可能完全退出；（3）拖下去，谈不成的可能性也不小；（4）国民党委派市长及几个行政人员进入大连；（5）国民政府军队进入大连则不可能。最坏的前途：（1）交出警察权，警察完全退出；（2）市长以下行政人员均让出；（3）开港、通车。就是说，大连市政权可能换上“四大家族”的统治或“四大家族”占优势的统治。其特点：特务横行，官僚资本垄断经济（私人工商业破产）；美货倾销（民族工商业破产）；贪污成性，文化独占。其结果将是人民群众遭受打击、摧残，地痞、流氓、敌伪残余分子重新抬头；革命队伍中的一部分人情绪下降，悲观、动摇、逃跑、叛变。

为使大连不落入国民党手中，地委的指导思想是：“团结全体人民，在干部中应更明确确立，建立实行政治经济的民主，对抗‘四大家族’统治的统一战线的思想。”

为此，采取了如下措施：

1. 1947年4月，旅大金行政联合办事处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地方民主政府——关东公署，并成立大连市政府。公署统辖大连市、旅顺市、大连县和金县，缩小大连市区范围，以便万一交出大连市行政权时，尽量减少损失。苏联政府对此特派梅列兹果夫元帅飞抵旅顺，对公署人选的组成，提出“三三”制的配备方案，即由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各个阶层（包括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为避免政府名称与其它解放区民主政府相似，经过协商决定命名为关东公署。原旅大金行政联合办事处的机构即告结束。关东公署成为旅大地区正式行政机关。

2. 牢牢掌握警察队伍。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关东公安总局和社会部从组织上、思想上、工作上采取了相应的措施。1947年4月3日，旅大公安总局改称为关东公安总局。于1947年5月4日，成立大连市公安局，管辖寺儿沟、中山、岭前、西岗、沙河

口、消防、水上7个公安（分）局。并且加强了铁路公安局的领导力量，以便一旦出现“开港通车”的局面时，好同国民党继续进行斗争。

为适应对视察团的斗争，公安总局改换了警服。将原国民政府陆军式样的制服，一律改成国民政府的警服式样，并按警察性质划分为政警、司法警、治安警、水上警、铁路警、消防警6种类型，以帽箍的颜色及领章为识别标记。5月14日，公安局颁发了关东地区各级警察等级划分的暂行规定，将原先执行的将官、校官、尉官、警长、警士衔，改为简任、荐任、委任、警长、警士的级别。为与国民党旅大视察团团团长董彦平中将级别对等，便于斗争的需要，公安总局局长周光经地委批准，佩戴简任二级警衔（即中将）。

旅大的警察队伍实际上也是军队，为避免给苏联外交活动带来不便，通过警服形式上的变换，以区别于军队。

除此，公安总局加强了市、县、区分局领导干部的配备，对警察队伍又进行了一次清理审查，使队伍更加纯洁巩固，成为一支既管治安、又能进行政治斗争的武装力量。

3. 组织人民群众广泛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国民党军队从进攻东北特别是占领瓦房店、普兰店、庄河等地之后，对旅大地区从陆地到海上，施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为了克服困难，1947年2月，中共旅大地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决定》。要求这一运动“应紧紧掌握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能大即大，能小即小的原则。”全区城乡人民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做军鞋，织渔网，开荒种地。同时民主政府颁布了奖励粮食进口的《暂行办法》，多方组织人力、财力、运力，从华东、东北其它解放区想方设法购运粮食，帮助群众战胜粮荒。地委还于1946年7月7日，作出《关于发展大连住宅调整运动的决定》，领导全市进行三次住宅调整，有效地治理了城市。

4. 建立隐蔽的军事工业基地，尽一切可能全力支援前线。国民党视察团到大连之前，地委经与苏军当局交涉，将炼钢厂、化学厂、汽锅厂等移交给关东公署。这些工厂连同建立的炮弹厂、引信厂，以官、商合股的名义，以经营化工原料、钢铁、机床为掩护，组成建新工业公司，实际上组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大型兵工联合企业。由于采取了隐蔽的、合法的手段和方法，保证了军工生产和支援前线工作的顺利进行。

5. 实行货币登记、兑换，加贴印花。1946年，国民党军队占领沈阳、长春等大中城市后，当时流通在社会上的大量苏军货币已被国民政府法币所代替。唯有旅大地区因由苏军军事管制仍在继续使用苏军货币。据获悉视察团拟在视察旅大时，携带大量苏军货币，以抢购物资扰乱金融，制造通货膨胀，破坏旅大地区经济。并企图以所谓救济、抚恤之名收买人心。为此，5月中旬，中共旅大地委发出《关于在关东地区实行苏军用票和满票登记盖印的通知》（满票指伪满州国货币），“要求在5月23日至28日，限期完成货币登记及盖印工作。”它不仅有效地制止了其它地区苏军货币的流入，保护了旅大地区金融经济，而且使视察团的政治阴谋彻底破产。他们所带的5000余万元没有加贴印花的苏军货币变成了一堆废纸。

6. 打击特务的破坏活动。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了配合视察团到旅大的视察活动，不断派遣特务进入旅大地区，进行阴谋破坏活动。在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期间，公安机关先后破获国民党各种特务案件24起，消除了隐患，稳定了社会秩序。

另在视察团到达大连前夕，一些反动地主、不法分子也乘机威胁群众，造谣生事。对此，人民公安机关充分发动群众狠狠地予以打击，逮捕了一批图谋闹事的不法分子。

7. 改善工作方法，注重斗争策略。地委认为：“目前在很多工作上不适合我们的政策。”要求“我们的工作要收缩一下，主动地

退一下”。在宣传上，必须向人民群众说明“中央军来不了”，“避免在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报纸在宣传上也应逐渐使‘红’色，变得‘淡’些。”

三、视察与反视察的斗争

1947年5月28日下午，苏军大连警备司令部少将司令官克章诺夫会见地委书记韩光和公安总局局长周光，通告在6月1日前后，国民政府视察团来大连，应立即准备“迎接”。并提出四条意见：

1. 要大量调动警察，整齐守职，维护秩序，社会必须安定，交通要道皆须放岗。

2. 视察团来后不作任何群众性表示，在宣传上，一切反蒋、反美、反视察团的事件不准发生，社会生活保持正常，若无其事。

3. 由苏方担负对视察团的“保护之责。”公安总局要准备一部分人，到视察团食宿处进行工作，绝对不准发生意外。

4. 迎接与招待者，在旅顺有迟子祥、周光、王世明，在大连有徐宪斋、胡俊，苏方由一位上校负责，请周光与之联系。

5月29日晨，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对视察团来连的企图和活动作了分析研究，认为视察团来连拟达到的目的是：

1. 发现共产党武装与解放区的联系和军火生产的情况，寻找外交借口，要求进入军队及大批警察插足旅大。

2. 发现社会秩序混乱、饥饿死亡，以及人民不拥护现政府和警察维持治安不力等事实，以便提出取消现政府与警察。

3. 侦察军政等情况。

4. 与其地下特务组织联系或再撒下“种子”。

会议布置如下任务：

1. 整理市容（主要是清洁），布置交通岗哨，要秩序井然，保证不发生张莘夫事件及请愿示威事件。

2. 在库存中再拨一些粮食，压低粮食价格。

3. 报纸上，不要刊登反美、反蒋、反视察团的宣传文章，不给视察团以任何不必要的刺激与借口，可宣传民主政府善政。

4. 必须在旅馆、港口、街头布置安全、监控工作。

5. 要在视察团参观与私人活动的主要地方，事先做好控制准备工作，并与苏方取得密切联系。

5月31日，地委组成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这场斗争。地委书记韩光，社会部副部长侯静（侯政），情报部部长肖力（冯铨）、副部长吴诚，公安总局局长周光、总局训练处主任宋光，大连市公安局局长胡俊、副局长张志南等为成员。公安总局召开科、股长以上干部会议，分析敌情，布置任务，确定对视察团采取“拖延、孤立、留难、限制、监视”的办法。对参加旅馆接待工作的人员，专门进行思想动员和业务培训。各县、区分局按所辖区域布置任务，增加路警，加强巡查和交通指挥。总局还抽调42名侦察员监视各种政治危险分子的动向。全市严阵以待。

1947年6月3日12时，国民政府旅大视察团乘长治号军舰抵达旅顺港口。进港后，苏军即刻派出快艇封锁海面，加强巡逻警戒。同时黄金山炮台大炮齐鸣，以示“欢迎”。

视察团15时开始登陆，由国民政府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为团长，成员有国民政府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张剑非，中长铁路局副局长王竹亭，大连港口副主任徐祖善，国防部代表叶南、陈思永，视察团秘书长邱南，行辕政治顾问朱新民，国民党大连市政府社会局长兼东北敌伪财产接收委员会大连分会副主任王洽民（旅顺人），副官王源燮、郭中祺及吴文甫，共计12人。携有5000万元苏军货币及电台、无线电话、照像机、望远镜、打字机等。苏军指挥部代表秦琴科少将、关东公署主席迟子祥、旅顺市市长王世明、关东公安总局局长周光等人到旅顺港口迎接视察团。

视察团到达旅顺后，在俄罗斯旅馆（今黄金山海军疗养院）稍事休息，董彦平与政治顾问朱新民召集视察团会议（仅五分钟），

接着即回拜苏军当局（唯王洽民未去）。苏军少将秦琴科通告视察团：“不宜随便外出，恐怕碰上地雷，要出去时由我方引路。”公安总局局长周光提出：“长治号”舰上人员下地，须着军装，不准带照像机。

视察团视察旅大的调查提纲，曾事先交由苏方转莫斯科批准，其具体内容是：（1）旅顺海军根据地执行行政职务之机构及其设施；（2）大连市执行行政职务之机构及其设施；（3）担任维护地方治安之华籍武装；（4）中苏友协、中华青年会、职工总会等团体；（5）各类学校、图书馆、书店、报社；（6）公用事业；（7）金融财政机关及商业；（8）港口；（9）铁路、公路。视察团划分三个组，具体安排视察日程，以实现其预定计划。但在苏军当局和人民公安机关有组织、有计划、有理有节的限制、拖延下，其计划大部分落空，仅参观了旅顺博物馆、大连港、铁道工厂（今机车车辆厂）、船渠（今造船厂）、金县，访问了市政府和美、苏领事馆等处。

视察团在旅大的10天活动，在各种场合的言谈话语中，从不承认地方民主政府，并且到处刺探情报，煽动群众。6月6日，苏军当局举行招待宴会，迟子祥按照旅大地委事先写好的稿子在宴会上说：“大连这个地方沦亡40多年，作为国民党掌权的中国政府，根本没关心过我们这100多万老百姓，现在苏军给我们这个地方解放了，我们老百姓翻了身，成立了自己的地方政府，我这个主席也是民主选举的。”董彦平即席站起来讲道：“维持会长迟先生所讲，地方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我们中央决定很快要在这里成立新政府。”迟子祥见此情景，便借故退席。据此，地委决定：既然视察团不承认公署，公署即不予接待。苏军当局将此意见以迟子祥的名义转告董彦平。董说：“我们宁可放弃这方面材料的搜集，也不去见他们。”地委对董彦平拒不承认地方政府的的态度，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即由关东公署向各单位下达指示：凡未经

公署批准，没有公署的介绍信，对视察团不予接待，拒绝参观。结果视察团到处碰壁，一再遭到冷遇。他们迫于无奈，便去与苏军联系。苏军称：“这是你们中国人自己的事，你们自己去协商。”视察团既不认输，也无法按计划进行视察。

视察团王竹亭等人参观铁道工厂，因无关东公署介绍信，被铁道工厂的门卫阻于门外，经多方联系，在总局局长周光同意后，方得进入工厂。王竹亭一进工厂便逢人拉手，装成一副关心工人疾苦的样子，到处打听军工生产消息。王竹亭问工人：“你们每天能生产多少火车头，有没有送到苏联和哈尔滨去？”工人答：“不清楚。”又问：“现在造炮弹吗？造得好不？”工人答：“我们工人没有生产炮弹。”

视察团虽遭冷遇，却不遗余力地抓住一切机会搜集情报。董彦平、王竹亭等人前往金县视察，因无关东公署的公文、介绍信，虽经再三交涉，仍被金县公安局南站派出所阻在金州车站，拒绝参观。

视察团去参观旅顺博物馆时，在路上看到交通警察李忠信，其中一名成员下车突然问道：“你们是哪里人？”答：“我是旅顺人。”问：“你们是警察，还是兵？”答：“我们是警察”。问：“有没有从山东来的‘八路’？”答：“我们没听说有‘八路’？”问：“你们教唱一些什么歌？”答：“教唱的是《人民警察歌》，你要愿听，我唱给你听听。”视察团一无所得地上车离去。视察团在“长治号”舰上的军官登陆后，到处寻觅妓院，购买鸦片、吗啡等；通过直观，广泛搜集社会情报。由于地方民主政府、公安机关早已实行“禁娼”、“禁毒”措施，所以娼妓、贩毒的行业，确已不复存在。由于视察团带来的大批没有贴印花的苏军货币，已经全部作废。加之他们不承认地方民主政府，得不到地方政府的资助，以致连吃饭、洗衣等各项费用都不好解决。视察团成员和舰上的官兵，到街上买花生吃，拿出没有贴印花的票子，商贩见票子上没有贴印

花，便说：“我不要这个钱，给你一点花生吃好了。”他们擦完皮鞋，没有钱给，气得擦皮鞋的小孩，往已擦亮的皮鞋上撒土。他们到戏院看戏，想用法币买票亦被拒绝。旅馆招待员向视察团收取洗衣费，他们拿不出分文，只好要求苏军当局协助解决经费问题。而苏方却推托：“你们这里有地方政府，还是向迟先生讲讲吧。”然而视察团仍不甘心承认地方政府，便派人到关东银行去兑换钞票。银行负责人答复：要兑换钞票，必须经关东公署许可，否则不予兑换。视察团走投无路，不得不派人去关东公署，要求兑换钞票。公署却以视察团没有正式公函，不予理睬。为此，视察团内部顿时响起了一片埋怨之声。迫于无奈，视察团派出王洽民等出面先后拜访了大连市政府、关东公署。会见中两级地方民主政府负责人据理驳斥了国民党对旅大地方政府和人民的污蔑，介绍了旅大建政以来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视察团在旅大期间，见社会平静，秩序正常，生活安定。在现实面前不得不承认地方政府管理城市的成绩。因此在临别之时，董彦平对迟子祥表示：“维持会一事，乃一时之误会，关于迟先生的功劳，政府是知道的。”以此既挽回面子，又试图拉拢迟子祥日后能为国民党效劳。

这场斗争，在形式上是苏联同国民政府的一次外事较量，实质上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为争夺旅大地区进行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在旅大地委的直接领导和苏军当局的大力配合下，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四、国民党接收旅大阴谋的破产

6月12日上午，国民政府旅大视察团乘“长治号”舰，由旅顺驶往葫芦岛，乘车经锦州返回沈阳。董彦平急急忙忙向行辕主任熊式辉报告视察旅大经过。报界记者向董彦平询问旅大之行观感时，董说：“过去传闻民食问题如何严重，事实上过去曾发生过严重恐慌，但迄目下已经比较好转”。当记者问及视察团曾否谈及有关接收问题时，董答：“本团任务仅作一般之视察，对是否进行

接收，当静候中央决定”。

国民政府派员视察旅大后，对争夺旅大的斗争并未停止。一方面大肆进行歪曲宣传，一方面求助于美国。企图引起国际舆论，达到接收旅大的目的。6月18日，视察团携带视察报告前往南京。蒋介石接见时，面呈旅大视察报告书一份。天津《民国日报》记者访问张剑非时，张拒作答复，其它团员亦极力避免谈话。但据“关系方面人士表示，该团视察经过，在报告书未获得最高当局研讨或在任何决定之前，将不公开向报界发表”。

20日，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在接见合众社记者时称：“旅顺及大连现被中共用作关内外军需之给养转运口岸，故苏拒绝允准中国军队开入该两地，实违反1945年8月之中苏条约之精神”。6月2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举行记者招待会，董（显光）局长就董彦平将军提交政府视察旅大报告能否公开发表一事说：“政府对于旅大视察团之报告，已加研讨，并据此报告拟就照会一件，已经提交苏联驻华大使馆代办”。

6月25日上午，“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刘师舜已将此照会交于苏驻华大使馆代办，其内容：促请苏方注意旅大当地反政府武装之存在，故强调须派出军队进入旅大。”

同日上午，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晤谈，将当天就旅大接收照会苏联一事通知司徒雷登，并告以旅大视察之印象。美国已在此之前发表声明，表示对中国接收旅大一事颇为关切。

国民政府外交部还就旅大接收问题的交涉经过发表公报说：“我政府乃一面与苏方继续交涉，一面派董彦平等赴旅大视察地方情形，以为恢复旅大行政权之准备。关于派员视察一事，我方曾于事先商得苏方之同意，苏方并表示对董彦平等之视察，愿予以充分之协助，使其能自由执行视察之任务，但董等抵旅顺后，因未能获得苏方预先承诺给予之协助，兼受当地所谓地方行政机构

之阻挠，其视察任务，遂未能达成，此一视察之结果，尤足证明如无足量之中国军警驻入旅大，中国行政人员将无法行使其职权”。

6月27日，王世杰在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上作外交报告，通过了参政员尹述贤等在会上提出的建议案，请政府对接收旅大及东北战事性质，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声明。同时国民政府宣传机构大造舆论，企图扩大影响，达到派出军队进入大连的目的。

6月28日，胡适就接收旅大一事发表谈话，要求“苏联领袖应了解中国国民党民族主义的立场”，为国民党接收旅大推波助澜。

国民党这一系列活动，表面上是打着恢复主权的旗号，急切接收旅大，实际上非常惧怕旅大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东北和华北两大战场的重要转运站和巩固的后方隐蔽基地。苏联政府基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存在，虽然同意国民政府派出行政人员进入旅大，建立行政机构，但坚持不准国民政府军队进入。1947年7月11日，苏联塔斯社就南京政府外交部公布《关于海军基地旅顺港与大连局势》，以及关于这些地方建立中国行政机关等问题发表声明，驳斥国民政府的恶意诬蔑：“中国政府声明准备派遣部队驻扎于旅顺海军基地与大连两港，显系违背上述条约。”迫使国民政府陷入进退维谷、十分尴尬的境地。若派员建立行政机构，将无济于事；若派军队进入，又未获苏联准许。正如国民政府东北接收机关要员对中央社记者所称：“我旅大接收机关，如无充分政府军警为之保护，势须准备为反抗政府者之俘虏或做他人之傀儡。”

国民党虽见接收旅大已成泡影，但又不甘心失败，便继续对旅大地区从陆地到海上实行更加严密的经济封锁。194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暂时停止开放大连，任何外轮驶往大连，必须先得中国政府之许可，任何外轮不得经营中国沿海贸易。”同

时仍不断派遣特务潜入旅大地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企图加剧旅大地区日趋严重的缺粮、缺煤等困难，造成人民生活更加艰难，引起群众骚乱不满，以扼杀旅大地区政府。然而在东北局和中共旅大地委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群众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加紧生产，战胜粮荒，支援前线，切实有效地把旅大地区建设成为一个巩固的后方基地，使国民党所谓接收旅大的计划成为幻想。

(大连市公安局 供稿)

中苏两国人民团结友好的桥梁

一、中苏友好协会的建立及其发展

1945年8月22日，遭日本帝国主义血腥统治达40年之久的旅大人民，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获得了翻身解放。望着一队队陌生的异国官兵，旅大人民惊喜若狂，纷纷奔向街头热烈欢迎。

此时，大连的地方政权被“大连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所把持。他们一方面暗地里勾结反动势力，准备迎接中央军前来接收；一方面则打着“协助苏军维持社会治安”的幌子，做一些表面工作，并得到苏军方面的许可。为此，9月27日，在“大连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召开的全市教育工作会议上，他们提议成立中苏友好组织，以便于工作。这一提议当即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并决定从市内现有的群众、艺术、宗教等团体，即大连市总工会、大连市学生联合会、辽东学友联合会、大连医师公会、台湾同乡会、中华基督教联合会、道德会、大连东艺剧团评剧研究社、新闻记者团、理道联合会、回教会、体育会、国剧社、国术社、市役所同仁会等组织中推出47名代表，选出9名常委，成立了“大连中苏友好委员会”。其中朱秀春被选为委员长，彼得罗夫、唐韵超、杨华亭为副委员长。

同年11月，中共大连市委、市政府、市公安局相继建立。随着维持会的解体，已成立的中苏友好委员会在中共大连市委的领导下，开始了充分发挥沟通两国人民友好感情的桥梁作用。当时，中共大连市委采取了不公开挂牌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放手开展工作，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不断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市委认为：苏联驻军旅大并实行军事管制，这一区别于其

他解放区的特殊情况，是旅大地区的客观实际。因此，同苏军搞好关系，对顺利开展工作、控制局面，至关重要。为加强该会工作，市委派刚到大连的原山东分局青联常委、《中国青年》（山东版）主编陆云峰去中苏友好委员会担任秘书长，派原在淮北区党委工作的许钟毅任中苏友好委员会总务部长兼宣传部长，还陆续从大连总工会举办的“工人训练班”中物色了一批干部充实到友好委员会各个部门。

1945年11月中旬，中苏友好委员会正式改名为“大连市中苏友好协会”。协会确定自己的办公宗旨是：1. 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出发点，由各方人士来协助巩固中苏人民的友谊；2. 由各方把苏联和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互相介绍给对方，以达到沟通、互为借鉴的目的；3. 以宣传巩固世界和平及远东和平为基础，动员一切力量巩固中苏两国永久和平及友好。

1945年12月1日，中共大连市委机关报《人民呼声》用整版篇幅介绍了中苏友好协会的活动情况，发表了中苏友好协会为征求会员告各界同胞书，号召人们踊跃入会。中苏友好协会还组织工作人员在市内5个大电影院里巡回演讲，苏军政治部也配合友协在市内主要交通干线向群众宣传，大造声势。到1945年底，市内会员数发展到3500余人。

1946年初，中共大连市委为加强中苏友好协会的领导工作，又派原鲁西南地区工委书记、时任大连铁路局党委书记陈瑞光到中苏友好协会任副会长兼党组书记，主持工作。陈到职后，按照市委的指示精神，带领中苏友好协会的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广泛开展了以文化工作、宣传工作以及中苏两国人民间的统一战线工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活动，使中苏友好协会这一群众组织，逐渐被大连人民所注视。6月30日，大连市中苏友好协会召开建会以来首届会员代表大会。与会代表与各届来宾畅谈建会以来友协所取得的工作成绩，选出二届执行委员23人，从而使中苏友好协

会的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市内会员已发展到 3 万余人。

1947 年 4 月 10 日，中共旅大地委做出《关于加强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的决定》。指出：促进中苏友好，是旅大党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党应将中苏友好协会工作，视为实现这一重要政治任务的主要方式之一。发展和普遍建立这个组织，对于巩固中苏友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地委要求各行各业都要广泛发展会员，普遍建立中苏友好协会分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旅大地区统一的中苏友好协会组织。4 月 25 日，旅大地区中苏友好协会的统一组织——“关东中苏友好协会”宣布成立。首届代表大会于辽东饭店（今大连饭店）召开。来自大连市、大连县、旅顺市、金县的友协会员代表 200 余人同苏军代表欢聚一堂，回顾总结了自旅大解放以来，中苏友好协会在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进行文化交流等方面所做的工作，讨论通过了《组织章程草案》，选举乔传珏为关东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彼得罗夫、王群为副会长。

从关东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期间，中苏友好协会积极贯彻中共旅大地委指示精神，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措施，广泛、深入地宣传中苏两国人民加强友好合作的重大意义，在各行各业中先后建立了 831 个分支会，1300 个中心小组，发展会员 22.4 万余人，占旅大地区人口的四分之一。友协会员遍及城乡各个角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旅大市中苏友好协会的活动达到了高潮期。协会紧密围绕各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结合本地经济建设实际，组织会员广泛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掀起轰轰烈烈的学习苏联、宣传苏联、推广苏联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的群众运动，为全市经济建设，为密切中苏同志间的友好合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55 年 5 月，苏联驻军根据苏联政府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发

的《联合公报》，撤离了旅大地区。苏军回国后，中苏友好协会鉴于实际情况，把组织机构由原来的执委会改为理事会，工作中心也由全面铺开转向以城市工作为重点。1956年9月，旅大中苏友好协会召开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乔传珏为会长，李东潮、李震、沈涛、尚叶荣、姜培禄、陈嘉震、张知远、荣敏芝、蒋永维、简仁南为副会长，还选出理事会理事43人。1959年11月7日，在中苏友好协会第三届代表大会上，胡明当选为会长，李东潮、吴亚南、张国权、张毅、姜培禄、许云、舒新环、蒋永维、钱令希为副会长，选举理事会理事52人。六十年代初期，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从内部分争转向公开恶化，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亦受到影响。1961年5月，旅大中苏友好协会这一独立机构被撤销，其工作交由大连市外事办公室兼管。此后，虽然中苏友好协会这一组织名称仍然保留，但实际上除了外事工作需要外，中苏友好协会已名存实亡了。1987年10月，中共大连市委决定重新调整中苏友好协会领导成员，任命杨惠民为会长，吕万山、刘子华、沈俊、徐大可为副会长。至此，中断了近30年的中苏友好协会工作，随着中苏两党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不断深入，又逐渐恢复了工作。

二、中苏友好协会的主要活动

（一）开展文化宣传

文化宣传工作，是大连中苏友好协会的一项重要工作。

解放初期，虽然中共大连党的组织、政权机关已经建立并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长达40余年的奴化教育以及国民党的大量反动宣传，相当一部分人对共产党仍缺乏了解，特别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一种对国民党盲目崇拜的所谓正统观念尤为浓厚。加之少数苏军士兵酗酒闹事、军纪不严等事件屡有发生，伤害了一部分中国人的感情，因而，使得不少人，包括上层人士，对社会主义苏联，对驻旅大苏军产生了怀疑、观望、甚至不友好的情绪。“走了小鼻子，来了大鼻子”，代

表了当时一部分人的心理状态。这种状况如不及时转变，将会给大连党组织开辟工作带来很大障碍。而要改变人们的认识，既要做大量的正面宣传工作，还要取得驻旅大苏军当局的全力支持。由于当时市委处于隐蔽状态，不便公开活动，于是，中苏友好协会便承担了这一重任。他们一方面深入群众，了解人民对苏联官兵的不同反映，及时向苏军政治部汇报，促其抓紧解决；另一方面，通过开展文化宣传工作，大力宣传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宣传社会主义在苏联所取得的成就，宣传苏联驻军旅大的重大意义，借以启发人们的思想，开拓人们的视野，达到团结群众、教育群众、扩大影响、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苏联的目的。

1946年5月，借纪念苏联红军战胜德国法西斯胜利一周年之际，中苏友好协会首次举办了为期半月的苏联红军军事艺术照片展览。成群结队的工人和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络绎不绝地来到中苏友协的展览大厅，当他们看到苏联红军空降大连、旅顺，迫使日军投降和大连人民涌向街头欢迎红军坦克部队的热烈场面等照片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立场有了转变。

在此基础上，是年夏，中苏友好协会又组织了中苏友好文化交流活动周。中苏双方均派出了自己由文化艺术界人士组成的友好代表团参加交流活动。苏联艺术家在“上友好”电影院（今艺术剧场）举行音乐会，表演了精彩的歌舞节目，他们还带来了许多件名贵的油画和各种艺术品，使大连人民从中进一步了解了苏联。代表大连参加交流活动的是“东北文工团”。他们演出的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大型歌剧《白毛女》、《血泪仇》，还有现代话剧《雷雨》、《日出》及流行于解放区的秧歌剧等，更是赢得了人心，吸引了广大进步青年。这次活动使旅大人民加深了对社会主义苏联的了解，对共产党和解放区也有了认识。同时，苏方人士也有感于这次“交流”的效果，建议地方成立固定的中苏友协俱乐部，以用来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1947年8月，为配合“8.15”、“8.22”、“9.3”等重大纪念活动，中共旅大地委发出了开展“回忆运动”的指示。要求通过回忆对比，肃清法西斯奴化教育余毒，加强阶级教育和民族教育，提高人民群众对苏联驻军和民主政府的认识。22日这天，旅大地区四分之一以上的人们直接参加了这次有组织的纪念活动。市政府广场上（今人民广场），一大早就被人们挤得水泄不通，无数群众和秧歌队，象一条条小溪，汇成了人的海洋。大连市中苏友好协会和民主青年联合会组织的文艺宣传队，演出了以汉奸隋云崧欺压百姓为原型的活报剧《大翻身》，把纪念活动推向高潮。

“回忆运动”激起了旅大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恶霸的无比仇恨，清醒地认识到民主政府和苏联红军才是他们过上和平安宁日子的救星和保障。

这一时期，中苏友好协会还通过放映电影、制做幻灯、图片展览，举办报告会、座谈会、星期讲座，办识字班、学习班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进行广泛宣传，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当时上友好、友谊、虹霓、进步等电影院上映的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影片，使大连观众目不暇接。据1949年9月统计，中苏友好协会成立4年来，共举办图片展览183次，参观人数34.4万人次；放映电影716部，观众208万人次；报告会2243次，听众115万人次；座谈会2950次，参观人数105万人次；识字班58期，参加学习2万余人。当年的《人民呼声》报、《新生时报》、《大连日报》、《关东日报》、《实话报》几乎天天都报道中苏友好协会开展活动的消息。

与此同时，苏军政治部也对苏军官兵加强了中苏友好的宣传教育，广大苏联官兵为人民做好事的模范事迹不断涌现，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等诸方面都给予地方巨大的帮助。当国民党对旅大地区进行海陆封锁、人民面临饥饿威胁的时候，苏军运来大批粮食，帮助旅大人民渡过难关；当生产原料紧缺、工

厂面临停工停产时，运来大量原材料，解决燃眉之急；当农业生产出现困难时，借战马耕地，免利贷给种子，派车派人帮助秋收。这些感人的事迹，通过中苏友好协会的宣传，极大地教育了旅大人民，使他们逐渐改变了对苏军的不良看法。

建国后，中苏友好协会紧密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总方针、总政策，结合本地客观实际，开展行之有效的宣传活动，继续发挥作用。

1955年上半年，中苏友好协会协助上级领导部门，全力开展欢送苏军回国的活动，他们通过报告会、展览会、编辑出版文字资料和制做挂图等途径，广泛在干部、工人、农民、战士、学生、街道居民以及各阶层群众中进行以中苏友好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主义教育，其规模之大、收效之好，达到建国后中苏友好宣传工作的最佳水平。1955年5月苏联红军回国前夕，一座高达39米的苏军烈士纪念塔，耸建在斯大林广场上。苏联红军那威武高大的形象，永远留在大连人民心中。

此外据统计，至1959年底，中苏友好协会编写和翻译出版的介绍苏联、宣传苏联的资料、挂图、宣传单等发行62万余份；举办图片展览1065次，受教育人数约达100余万。仅以中苏友好俱乐部和中苏友谊馆为例，1956年至1959年3年中，开展各类活动就达1200多次，参加活动人数达48.5万余人次。

（二）出版发行书刊

1946年4月，中苏友好协会出版了第一本月刊杂志《中苏知识》，它以交流中苏文化为宗旨，敦睦中苏友谊为目的，介绍苏联、宣传苏联，在广大群众中颇受欢迎。1947年4月，关东中苏友好协会机关刊物《友谊》半月刊，取代了《中苏知识》正式创刊，进一步打开了旅大人民眼界。这期间，中苏友好协会还出版了宣传本地建设成就和介绍苏联的画报——《友谊画报》，同时还出版了三套丛书。一是“友谊丛书”，其中有徐均编译苏联的《新社会的

新生活》和许勤编译的介绍东欧各国情况的书；二是“友谊文艺丛书”，其中有汪溪翻译的《金星英雄》和蔡信芳翻译的《高尔基短篇小说集》；三是“俄文学习丛书”，其中郭景天编著的《俄华大辞典》，是解放后出版最早的一部俄语工具书。

据不完全统计，这三套丛书共出版 86 种图书，发行 80.35 万册。还出版各种宣传小册子 9 种，12.4 万册。这些刊物，不仅在旅大地区发行，而且还运往其它解放区进行交流。

（三）协助接收敌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连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兵站和基地，不仅工业基础雄厚，并储有大量的物资。解放初期，各解放区为了解决前线的物资供应，曾相继来大连开设以民办“公司”、“商行”面貌出现的办事机构，拟通过接收敌产、办工厂等渠道来筹集物资支援前线。但在接收敌产方面，民营商行是无权涉入的。在中共党组织不便公开的情况下，中苏友好协会以其自身的优势，在协助有关部门接收敌产、支援前线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1946 年初，东北军区后勤部驻连机构“福泉号”经理牛牧野和副经理徐均为接受敌产事宜找到中苏友好协会。友协秘书长陆云峰和总务部长兼宣传部长许钟毅等人当即表示全力帮助。他们以开展工作缺少资金为由，找到苏联驻军政治部，要求接收部分敌产。在苏军少校李必新的支持下，以中苏友好协会的名义，先后接收了“大连纺织厂”、“鸟羽铁工厂”、“东亚印刷株式会社”、“关东实业振兴株式会社”、“关东工业土地株式会社”“辽东饭店”等敌产，然后转给“福泉号”和上级有关部门。仅 1946 年，他们就采取这种移花接木的方法，接收敌产和共同经营敌产 20 多家，为支援解放战争尽了应尽的义务。

但是，接收敌产的工作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例如在接收辽东饭店时，就遇到了中餐部经理和职工的联合抗拒。他们非法强

占了整个大楼，说是日本人已把企业让给中国劳资双方了，而日本人则站在一旁默不作声，使接收工作无法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中苏友好协会向法院提出了申诉。在法庭审理中，许钟毅站在原告席上，据理驳斥被告的违法行为，指出中苏友好协会是中国地方政府和苏联驻军司令部共同支持的政治性团体，根据市政府的法规，有权接收部分敌产，以利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的开展。因此，接收辽东饭店是必要的、正确的。法院据此判被告侵犯经营权，影响经营业务等，并处以罚款。因没有现款支付，被告不仅交出了“辽东饭店”，还把自营的“安明果园”作价赔偿给中苏友好协会。

（四）创办业余学校

旅大地区特殊的历史环境，在客观上对学习俄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时人民群众对学习俄语的要求极为普遍，尤其是在与苏军经常接触的服务性行业和中苏合营企业中，这种要求尤为迫切。为此，中苏友好协会从1945年12月15日开始，便利用业余时间开办了俄语专修学校，设立了学习期限不等的初级、中级、高级、会话、翻译班。除了中苏友好协会俄语翻译徐杜衡等任教外，还聘请部分原俄国侨民担任教授。同时还利用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俄语广播教学。此外，还在《友谊》杂志上开辟俄文讲座专栏，帮助人们学习俄语。到1953年底仅俄语专修学校就办了90多期，参加学习人数达4000余名。1954年后，为了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中苏友好协会除自己仍继续办校外，还协助大中厂矿开办俄语班，先后在大中厂矿中办起了60多个班，学员达2300余人。

俄语学校毕业的学员，特别是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们借助初步掌握的俄语知识，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大连造船厂毕业的300余名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许多人不仅能直接向苏联专家学习各种先进经验，而且也能直接阅读各种俄文资料。

中苏友好协会创办的俄语专修学校为全市各行各业中广泛开

展的学习苏联的活动，打下了基础。

中苏友好协会为培养当地的音乐舞蹈人才和工厂、学校、机关等群众文艺活动的骨干，于1948年又创办了“业余音乐舞蹈学校”。曾在上海新华艺专音乐系毕业、多年从事音乐工作的周静（友协的宣传部长兼组织部长）亲自担任校长，前南京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家、大提琴家马思琚任副校长。还聘请俄侨音乐家阿巴扎担任教务主任。这个师资力量可观的业余学校，开设了舞蹈班、钢琴班、大提琴和小提琴班、声乐班、作曲班。他们还利用寒暑假举办音乐讲座，讲授普通乐理、视唱、练耳、指挥等方面的知识。没有适宜的教材，他们就自己编写。苏联出版的《合唱指挥知识》就是由马思琚与阿巴扎合译的。这本书1985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又再版发行。

学校很重视学员们的演出实践。他们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群众兴趣，组织过多次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演出活动。抗美援朝期间，他们自编节目，多次去医院、疗养院慰问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受到伤病员的热烈欢迎。

这个学校从1948年建立到1951年间，共培养学生近千人。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后来走上了专业道路，有的现在已经成为文艺战线上的专家、教授。

三、中苏友好协会的历史作用

大连市中苏友好协会，是伴随着苏联红军驻军旅大并实行军事管制这一特殊历史条件而产生和发展的。它不同于其它地区的中苏友好协会，也不同于本地的其它群众团体。它从1945年9月建立到1961年5月因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而停止活动，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以其自身的优势，斡旋于中苏双方之间，在促进旅大地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团结，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经济建设时期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融洽中苏双方关系，沟通两国人民之间的思想感情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

献。

（一）丰富多彩的宣传工作，为中共旅大党组织顺利地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多年来，中苏友好协会在启发、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识旅大所处的战略地位，认识苏联驻军旅大的重大政治意义，向人民介绍苏联、宣传苏联，推动向苏联学习等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尤其是中共旅大党组织没有公开之前，中苏友好协会做为被市委宣传部直接领导、苏联驻军当局热情支持的群众组织，为引导人民群众拥护民主政府的领导，拥护苏军当局在旅大地区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积极主动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宣传工作，充分地发挥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自觉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挥各阶层人士作用

中苏友好协会从成立之日起，就自觉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组织发展中，注意发展各个阶层的人士，只要他们不是参加了反动组织活动的人，只要他们不是违反民主政府法令而被剥夺公民权的人，只要他们赞成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章程，自愿加入中苏友好协会，就吸收他们入会，团结他们一道工作。所以，会员中，有政府各部门的官员，有商人、企业家，有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有工人、农民，还有部分苏联侨民。是一个由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组织。据统计，会员中，地主、富农、大中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约有 2.5 万余人。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们，在拥护中苏友好、拥护民主政府的原则下，聚集在中苏友好协会之中，通过中苏友好协会的宣传教育，在各自的岗位上遵纪守法，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旅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刘 影 整理）

第四部分

文献、报刊资料

三大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

苏联、美利坚合众国及大不列颠三大国领导人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二至三个月后，苏联将参加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是：

1. 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2. 恢复 1904 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利，即

（甲）将库页岛南部及其全部毗连岛屿归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

（丙）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 千岛群岛交给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与铁路的协议尚需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建议，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大国政府首脑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应在战败日本后毫无条件地予以满足。

苏联方面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以期用武力帮助中国达到从日本枷锁下获得解放的目的。

约·斯大林

富兰克林·罗斯福

温斯顿·丘吉尔

1945 年 2 月 11 日

友好同盟条约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莫斯科。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愿以同盟及战后善邻合作，加强苏联与中国素有之友好关系；又决于此次世界大战抵抗联合国敌人侵略之斗争中彼此互助，及在共同对日作战中彼此合作，以迄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又为两国及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人民之利益，对于维持和平与安全之目的，表示其坚定不移之合作志愿；并根据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联合国共同宣言、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在莫斯科签字之四国宣言、及联合国国际组织宪章所宣布之原则，决定签订本条约，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特派外交部部长王世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外交人民委员部部长莫洛托夫；

两全权代表业经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约定条款如左：

第一条 缔约国担任协同其他联合国对日本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缔约国担任在此次战争中，彼此互给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他援助与支持。

第二条 缔约国担任不与日本单独谈判，非经彼此同意，不与现在日本政府或在日本成立而未明白放弃一切侵略企图之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

第三条 缔约和担任在对日本作战终止以后共同采取其力所能及之一切措施，使日本无再事侵略及破坏和平之可能。缔约国

一方如被日本攻击，不得已而与之发生战事时，缔约国他方应立即尽其能力，给予该作战之缔约国一切军事及其他之援助与支持。

本条一直有效，以迄联合国组织经缔约国双方之请求对日本之再事侵略担负防止责任时为止。

第四条 缔约国之一方担任不缔结反对对方之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之任何集团。

第五条 缔约国顾及彼此之安全及经济发展之利益，同意在和平重建以后，依照彼此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与不干涉对方内政之原则下，共同密切友好合作。

第六条 缔约国为便利及加速两国之复兴及对世界繁荣有所贡献起见，同意在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经济援助。

第七条 缔约国为联合国组织会员之权利及义务不得因本条约内所有各事项之解释而受影响。

第八条 本条约应于最短可能时间批准，批准书应尽速在重庆互换。

本条约于批准后，立即生效。有效期间为三十年。倘缔约国任何一方不于期满前一年通知愿予废止，则本条约无限期继续生效，缔约国任何一方得于一年前通知对方，终止本条约之效力。

为此，两国全权代表将本条约署名、盖章、以昭信守。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中文、俄文各缮两份，中文、俄文有同等效力。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全权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照 会 一

甲、来 文

部长阁下：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业于本日签订，本部长兹特申明两缔约国间之谅解如左：

一、依据上述条约之精神，并为实现其宗旨与目的起见，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二、关于大连与旅顺口海港及其同经营中国长春铁路，在会商过程中，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三、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关于上列各项所述之谅解，倘荷贵部长函复证实，本照会与贵部长复照，即成为上述友好同盟条约之一部分。

本部长顺向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此照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世杰
西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乙、去 文

部长阁下：接准贵部长本日照会，内开：“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业于本日签订，本部长兹特申明两缔约国间之谅解如左：

一、依据上述条约之精神，并为实现其宗旨与目的起见，苏

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二、关于大连与旅顺口海港及共同经营中国长春铁路，在会商过程中，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三、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关于上列各项所述之谅解，倘荷贵部长函复证实，本照会与贵部长复照，即成为上述友好同盟条约之一部分。”等由。本部长兹特声明上项谅解正确无误。

本部长顺向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此照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西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照 会 二

甲、去 文

部长阁下：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本部长顺向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此照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西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乙、来 文

部长阁下：接准阁下照会，内开：“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维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上项照会，业经奉悉，表示满意。兹并声明苏联政府将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本部长顺向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此照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世杰

西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莫斯科。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愿以充分尊重彼此之权益为基础，加强两国间之友好关系暨经济联系起见，议定各条如左：

第一条 日本军队驱出东三省以后，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满州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之干线合并成为一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应归中华民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

共同所有与共同经营，应以中东铁路在俄国及中苏共同管理时期与南满铁路在俄国管理时期所置之土地及所筑之铁路辅助线而为该两铁路之直接需要者，以及在上开时期所建置并直接供该两铁路之用之附属事业为限，一切其他铁路支线与附属事业及土地，应归中国政府完全所有。

上开铁路之共同经营，应在中国主权之下，由一单独机构办理，并为一纯粹商业性质之运输事业。

第二条 缔约国同意上开铁路之共同所有权，应平均属于两方，并不得以其全部或一部转让。

第三条 缔约国为共同经营上开铁路起见，同意组设中苏合办之中国长春铁路公司。公司设理事会，由理事十人组织之，其中五人由中国政府派任，五人由苏联政府派任，理事会设在长春。

第四条 中国政府应在华籍理事中指派一人为理事长、一人为助理理事长，苏联政府应在苏籍理事中指派一人为副理事长、一人为助理副理事长。理事会表决时，理事长所投之票作两票计算，

理事会之法定人数为七人。

理事会不能获得协议之各项重要问题，应提请两缔约国政府予以考虑，并以公平与友好之精神解决之。

第五条 公司设监事会，由监事六人组织之，其中三人由中国政府派任，三人由苏联政府派任，监事长应在苏籍监事中推选，副监事长应在华籍监事中推选。监事会表决时，监事长所投之票作两票计算，监事会之法定人数为五人。

第六条 为管理经常事务起见，理事会委派中国长春铁路局局长一人，由苏联人员中遴选，副局长一人，由华籍人员中遴选。

第七条 监事会应委派总稽核、副总稽核各一人，总稽核由华籍人员中遴选，副总稽核由苏籍人员中遴选。

第八条 上开铁路各处处长、副处长、科长及重要车站之站长，应由理事会委派，铁路局长有权推荐上项职位之人选，理事会各理事亦得于征得局长之同意时推荐上项人选。处长为华籍时，副处长应为苏籍，处长为苏籍时，副处长应为华籍。各处处长、副处长、科长、站长应依照中苏两国人员平均充任之原则任用。

第九条 中国政府担任上开铁路之保护。

中国政府应组织及监督铁路警察，以保护铁路之房屋、设备暨其他产业与货运，使免受毁坏损失与抢劫，该铁路警察并应维持铁路之正常秩序。关于铁路警察执行本条规定之职条，由中国政府咨商苏联政府决定之。

第十条 上开铁路仅得于对日本作战时期供运输苏联军队之用。苏联政府有权在上开铁路，用加封车辆运输过境之军需品，免除海关查验。该项军需品之保卫工作，由铁路警察担任，苏联不派武装护送人员。

第十一条 经上开铁路，由一苏联车站至另一苏联车站过境运输，以及由苏联领土至大连、旅顺二港口往返直运之货物，应免中国关税或其他任何捐税。此项货物在入中国领土时，应受中

国海关之查验。

第十二条 中国政府依照另订之协定，对上开铁路业务上所需燃煤之供应，担任充分之保证。

第十三条 上开铁路应与中国政府国营铁路，向中国政府同样缴纳税捐。

第十四条 缔约国同意供给中国长春铁路理事会以流动资金，其数额由铁路章程规定之。

经营上开铁路之盈亏，由双方平均分配之。

第十五条 缔约国应在本协定签字后，一个月内，各派代表三人，在重庆会同拟订共同经营上开铁路之章程。该项章程应于两上月拟订完毕，呈报两国政府核准。

第十六条 依照本协定第一条规定，应归中苏共同所有与共同经营之资产，应由两国政府各派代表三人，组织委员会议定之。该委员会应于本协定签字后一个月，在重庆组织成立，并于上开铁路开始共同经营后三个月内，完成其工作。该委员会之议定事项，应呈报两国政府核准。

第十七条 本协定期限定为三十年，期满之后，中国长春铁路连同该铁路之一切财产，均应无偿移转中华民国所有。

第十八条 本协定自批准之日生效。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中文、俄文各缮二份，中文、俄文有同等效力。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全权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关于大连之协定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莫斯科。

兹以中华民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既已签订友好同盟条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业已保证尊重中国管辖中国东三省全部之主权，视其为中国之一不可分离部分，为保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对大连为其货物进出口之利益获得保障起见，中华民国同意：

一、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

二、中国政府同意依照另订之协定，在该自由港指定码头及仓库租与苏联。

三、大连之行政权属于中国。

港口主任由中国长春铁路局局长在苏籍人员中遴选，于征得大连市长同意后充派之，港口副主任应照上开手续在华籍人员中遴选派充之。

四、大连在平时，不包括在基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旅顺协定所定之海军根据地章程效用范围之内，仅于对日作战时，受该区域所设定之军事统制。

五、由国外进入该自由港，经中国长春铁路直运苏联领土之货物，与由苏联领土经上开铁路运经该自由港出口之货物，或由苏联运入为该港港口设备所需之器材，均免除关税。以上货物均应用加封车辆运输。

由该自由港进入中国其他各地之货物，应缴纳中国进口税，由中国其他各地运出至该自由港之货物，在中国继续征收出口税期间，应缴纳出口税。

六、本协定期限定为三十年。

七、本协定自批准之日生效。

两全权代表将本协定签字、盖章，以昭信守。本协定中、俄文各缮二份，中文、俄文有同等效力。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订于莫斯科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全权代表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关于大连协定之议定书

一、中国政府为应苏方之提请，以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租期定为三十年，其余一半港口工事及设备，由中国留用。

港口之扩展或重建，应由中国与苏联同意为之。

二、兹同意中国长春铁路由大连通往沈阳，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区域以内各段，应不受该区域内所设定之任何军事监督或管制。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全权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关于旅顺口之协定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莫斯科。

兹为符合并补充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起见，缔约国双方议定各条如左：

第一条 为加强中苏两国之安全，以防制日本再事侵略起见，中华民国政府同意，两缔约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

第二条 前条所开海军根据地区域之正确界限，应依所附之说明及地图之规定（见附件）。

第三条 缔约国同意旅顺口作为纯粹海军根据地，仅由中苏两国军舰及商船使用。

关于上开海军根据地共同使用之事项，设立中苏军事委员会处理之。该委员会由华籍代表二人，苏籍代表三人组织之，委员长由苏方派任，副委员长由华方派任。

第四条 上开海军根据地之防护，中国政府委托苏联政府办理之。苏联政府得建置为防护上开海军根据地必要之设备，其费用由苏联政府自行承担。

第五条 该区域内之民事行政属于中国。中国政府对于主要民政人员之委派，将顾及苏联在该区域内之利益。

旅顺市主要民事行政人员之任免，由中国政府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之同意为之。

在该区域内之苏联军事指挥当局，为保障安全与防卫起见，向中国行政当局所作之建议，该行政当局当予以实行，如有争议，则此类事件，应提请中苏军事委员会审议决定之。

第六条 苏联政府在第二条所述之地区内有权驻扎陆海空

军，并决定其驻扎地点。

第七条 苏联政府并担任设置及维持为该区域航行安全所必需之灯塔、信号及其他设备。

第八条 本协定期满后，所有苏联在该区域内建置之一切设备及公产，应无偿归为中国政府所有。

第九条 本协定期限定为三十年，自批准之日生效。

两全权代表将本协定签字、盖章，以昭信守。本协定中文、俄文各缮二份，中文、俄文有同等效力。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订于莫斯科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全权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在莫斯科所 签订关于旅顺协定附件

关于旅顺港协定第二条所规定海军根据地区域之境界，自辽东半岛西岸猴山岛湾以南之地点起，向东方面经过石河站及邹家咀子至该半岛东岸，东西划为一线，此线以南为本地区陆路之界线，但大连市除外。

协定所规定辽东半岛区域西方水面，在下列横线以南各岛归入本地区，此横线系自北纬三十九度正，东经一百二十度四十九分之点起，至北纬三十九度二十分，东经一百二十一度三十一分之点止，将两点连为一线以后，转向东北普兰店方向，至其以南之陆路界线之起点。

辽东半岛地区东方水面，在下列曲线以南各岛归入本地区，此曲线系自陆上界线终点起，向东经过北纬三十九度二十分，东经一百二十三度零八分之点后，转向东南至北纬三十九度正，东经一百二十三度十六分之地点为止（附俄国五十万分之一地图）。

地区境界将由中苏混合委员会在当地划定并设置标识，必要时，在水面亦设标识，届时应绘就水陆地图，附具详细说明，所绘陆上地图为一比二五，○○○，所绘海上地图为一比三○○，○○○。

该混合委员会工作开始日期，由双方另定之。

上述委员会所拟定地区境界之说明及地图，应由两国政府核准之。

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 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 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莫斯科。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愿使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之关系符合两国间现存之友谊精神与同盟关系起见，议定各条如左：

一、苏联军队因军事行动之结果，进入中国东三省后，有关作战一切事务之最高权力与责任，在作战地带，于作战所需要之时间内，属于苏联军总司令。

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代表一人及助理人员若干人，在业已收复之领土，执行左列任务：

甲、在敌人业已肃清之区域，依照中国法律，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

乙、协助在已收复领土内树立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及非正规军，与苏联军队间之合作；

丙、保证中国行政机构与苏联军总司令之积极合作，并依据苏联军总司令之需要及愿望，特予地方当局指示，俾得有此效果。

三、为保证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间之联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中国军事代表团，驻于苏联军总司令部。

四、在苏联军总司令最高权力下之地带内，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收复区域之行政机构，应经由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与苏联军总司令保持联系。

五、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并经由其军事及民政机关，给予苏联军总司令一切协助及支持。

六、所有在中国领土内属于苏联军队之人员，均归苏联军总司令管辖，所有中国籍人民，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此项管辖权并包括在中国领土内之人民对苏联军队犯罪过之案件，此项案件如发生军事行动地带内时，则属例外，应归苏联军总司令管辖。遇有争执之案件，由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协议解决之。

七、关于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之财政事项应另定协定。

八、本协定于本日所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时，立即发生效力。

本协定用中、俄文各缮成二份，中、俄文有同等效力。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订于莫期科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全权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记 录

斯大林统帅与宋院长子文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一日第五次会议时，曾讨论苏联参加对日本作战后，其军队由中国领土撤退之问题。

斯大林统帅不愿在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之协定内加入在日本战败后，三个月内，将苏联军队撤退一节，但斯大林统帅声明，在日本投降以后，苏联军队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

宋院长询及撤退完毕需要若干时间，斯大林统帅谓彼意撤军

可于不超过两个月之期间内完竣。

宋院长继询是否确在三个月以内撤完，斯大林统帅谓最多三个月足为完成撤退之期。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西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具有决心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并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亲善邦交与友谊的巩固是与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的；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得列·杨努阿勒耶维赤·维辛斯基。

两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双方并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之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第六条 本条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互换。

本条约有效期间为 30 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将延长 5 年，并依此顺延之。

1950 年 2 月 14 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周恩来（签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

主席团全权代表

安·扬·维辛斯基（签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确认自 1945 年以来远东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即：帝国主义的日本遭受了失败，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已被推翻，中国成为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成立了新的人民政府，这新的人民政府统一了全中国，推行了与苏联友好合作的政策，并证明了自己能够坚持中国国家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民族的荣誉及人民的尊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这种新的情况提供了从新处理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诸问题的可能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决定缔结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本协定：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 1952 年末。

在移交前，中苏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现状不变。惟中苏双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如铁路局长、理事会主席等职），自本协定生效后改为按期轮换制。

关于实行移交的具体办法，将由缔约国双方政府协议定之。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

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上述设备前的时期，中苏两国政府派出同等数目的军事代表组织中苏联合的军事委员会，双方按期轮流担任主席，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其具体办法由中苏联合的军事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议定，并于双方政府批准后实施之。

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在苏军撤退前，旅顺口地区的苏军驻扎范围，照现存的界线不变。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

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

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为进行上述财产接收事宜，中苏两国政府各派代表3人组织联合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确定财产移交之具体办法，此项办法俟联合委员会建议经双方政府批准后于1950年内完成之。

第四条 本协定自批准之日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互换。

1950年2月14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周恩来（签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

主席团全权代表

安·扬·维辛斯基（签名）

巴申与杜平谈话纪要

(1947年9月17日上午8时于苏军司令部，杜曼作翻译)

今天要和你谈一个很重要、很原则的问题，几个月来你们党委领导有错误，这个错误是与苏军关系不好。

地方政权问题。苏军认为，关东政府必须是资本主义民主分子与共产党合作，党的领导必须使这个公署成为关东地区有权力的机关。你们的同志在公署内工作要去影响民主分子执行苏军的指示，但这个方针未能贯彻。实际情况是：民主分子没有好好干，你们的同志也没好好干。你们的同志在县、区政府中不服从公署，公署不能发挥它的作用。刘顺元（公署副主席）不执行不贯彻这个方针。刘不明白，这里是苏军监督，他认为不要监督，认为这里同解放区一样，由中共来领导，不同意苏军政策。刘认为，帮助满州（东北）、山东为这里主要任务。我们认为，要解决帮助问题，不能破坏私人财产。刘认为，把资本家、地主的钱拿出来帮助前方。我们认为，经济问题需有各界合作，如资本家、工人、老百姓。

在此地工作的同志搞错了，他们进行清算、没收地主（在金州清算的事情很多，干部开会斗地主）刘顺元是同意他们的。票子问题（指苏币盖印），今年5月我们要盖印，刘顺元不同意，令下面干部不执行，妨碍这个工作。

近几个月刘顺元在关东公署不干活，别的同志也不干，弄得公署无人领导。韩光走后一个月，刘顺元没到司令部来。刘顺元不明白此地政权是谁的，他认为关东公署是资本主义政权，说老

百姓不满意公署，说公署里有“大肚子”（资本家），这是错误的。“八·一五”我们民政局长告诉刘顺元要他去金州开会作报告，他不去。“八·二二”关东公署设宴庆祝苏联红军解放关东，刘没有出席。“九·三”开大会，刘没到会，其他同志也没作报告。他们不参加政治工作，不教育宣传群众，类似的事很多。我们的要求得不到同意，我们工作有困难，刘是领导者，不能有这种现象。

迟子祥利用你们同志同苏军的矛盾，并扩大这一矛盾。迟子祥告诉别人说，苏军只靠他一个人，其他人都不相信。迟的反动很不奇怪，但你们的同志说苏军支持资本家，说苏军不是老百姓的朋友，是资本家的朋友，我们对这种说法很不满意。

刘顺元表现自高自大，有些事情他错了，反说这是毛泽东的作风。因此，要求撤退他。这是我们总司令、副司令（指莫斯科）的意见，请你尽快把问题报告，要求很快解决。因刘顺元是大干部，我们不好解决，请你电告东北局。

今后意见：

今后一般问题、重要政策，我们不能同你们一个人一个人地谈，主要告诉韩光，因他是书记。

你们的同志同苏军接触时不要自高自大。请你们相信，只要你们同苏军司令部一致，一定能解决本地经济困难，你们的计划我们一定帮助。

对唐韵超的意见：

米里可夫元帅来时告诉唐韵超，中国工厂与苏军工厂的工资必须一致，如不一致，会说苏军压他们。唐韵超迎合部分落后思想，中国工厂不给（工人）钱是给粮，每月20公斤到30公斤，苏军工厂每月给粮16公斤。这样，中国工厂就高一些，老百姓就对（苏）不满，唐韵超不按元帅的意见做。

唐不教育工人，老百姓说苏联是帝国主义国家，工会的报纸不写苏军解放东北的文章。报纸说唐韵超好，称唐是伟大的领袖，

说唐帮助我们，解放了我们。自称领袖。

公安局有许多错误与刘顺元有关。公安局秘密发展生产，不告诉苏军司令部，捕人不通知，不执行指示。

对报纸（出版）的意见，此地有中苏条约，你们要照顾，不能反南京政府。

（杜平当时是东北民主联军总政秘书长，巴申为苏军上校，驻连苏军警备司令官。苏方以为杜平是来连检查地区工作的，故与杜平作正式谈话）

关于刘顺元、唐韵超 两同志撤退问题的报告

地委根据东北局及分局指示，讨论了某方（注：指苏军驻军司令部，下同）提出撤退刘、唐两同志的问题。

认为：

一、某方这一建议，是正式的建议，而且经过远方（注：指苏远东军区）的批准。他们这一建议的提出，并非偶然的，而是长期的积累。他们认为我们在某些政策上以及某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和他们意见不一致，对他们政策不够了解，或执行不力，甚至对抗，认为我们另有“中心指示”，在某些人事关系上，也和他们不够协调。因此，地委一致认为，某方此举实际上不仅是对两个同志的批评（或处分），应看成是对整个地委的。不过表现于两个负主要公开工作同志的身上。因而，地委应负主要责任。为了搞好今后工作，搞好和某方关系（这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地委决定接收其建议。虽然刘、唐两同志的离开，终会给工作以损失。

二年来地委对关东地区客观情况（主要是此地是苏军军事根据地）长期认识不够，方针、政策长期不明确，尤其是某方认为我们对于关东经济，长期缺乏建设思想与方针，不能很好掌握与运用关东公署这一工具，有违他们成立关东公署的意图。在工作中我们也发生许多缺点甚至错误。财政经济工作一直混乱未能加以整理。人民生活日渐困难，缺乏有效解决办法，工资标准存在两种对立形式。关于这些，虽然他们历次向我们提出，但我们缺乏虚心研究与坚决执行精神，他们让之再让，终不得不出此举，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二、地委一致认为和某方关系不好的关键是财经问题，过去我们认为这个地方有某方在，天塌不下来，我们则是尽可能支前，二年来我们解放区在此乱抓东西，早已引起某方很大不满，此种情况继续下去，会加深和某方矛盾。关于这一点我们认识不够，纠正的更不够，某方曾向杜平以及韩光等其他同志多次暗示：地委和各战略区合作隐瞒他们，将关东地区物资搬走，免税或减税出口，而不换回东西来。关东人民生活困苦，我们应负很大责任。因此，4月关东公署成立时，财政厅不准配备我党党员，财经问题多和迟子祥商量，迟比我们拿主意要多。8月同利公司一次运走物资六七万元之多，欠税四五千元，某方不满，一方面派军管亲自掌握海口，决定不经某方批准，任何货物不准出口。并且，某方亲自掌握税收，找各大公司商店开会（主要是对我各战略区商店）当面查询帐目与营业税，认为我们不愿整理税收。我们数次请求，书面请求某方批准辽南纺织机途经大连海港运往北满，某方最高负责人干脆拒绝。以至最近到辽南运粮的汽车出口，某方勉强批准后仍不信任，尚从旁探询是否我们藉口运粮将汽车汽油运走，某方在这一点上（财经）迄今对我们仍不完全信任，曾向韩光表示：“你们一定要在此地拿指甲盖样小的东西走，而看不见另外地方可以取得铅笔那样长的东西。”认为我们在此地搬东西是一种不智之举。

三、经过此次地委会议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和某方取得一致，搞好关系，同心协力搞好工作，为建设与巩固苏军海军军事根据地而斗争。工作搞好，某方关系也就会好。因为巩固这块苏军军事根据地，不仅是关东党的任务，而且是全党的任务。搞好工作的关键，是首先搞好财经工作，充分运用关东公署这一工具，发展生产，安定民生。对某方关系是关东地区普遍存在而又极端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其他问题也处理不好。因之，全体同志放下包袱，搞通思想，安心工作，虚心接受人家意

见。学习俄文，沟通语言，减少隔膜（在和某方人事关系搞不好这一点上，刘、唐同志应深刻检讨）。

四、刘、唐的问题，在群众中不公开宣布，因此地情况不同，以免引起误会与特务造谣。但在干部中应将这一问题讲通，进行讨论，引为经验教训。以补因两位负责同志的离开工作所受到的损失。

旅大地委会

1947年10月30日

关东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

(1947年韩光在地委10月会议上的总结)

第一，关于形势与特点

1. 关东主要是苏联海军军事根据地，且驻军卅年。

这是基本特点，一切其他特点都应服从这一基本特点。

依据这一特点：①关东党的任务，是按照苏海军根据地的要求进行工作，而不是建设解放区式的解放区。②军事根据地，主要应服从于军事需要。③存在军事管制，政权需满足军事当局的要求。④要估计国民党来插脚的最坏可能。但国民党来也不能超过苏军的控制。⑤要巩固军事基地，首先是人民生活的安定。⑥在同志中、群众中要大胆宣传拥护苏联，宣传拥苏政策。

2. 关东在远东国际关系上，是占有头等意义的地区。按“条约”规定：关东地区的行政权，隶属于中国政府。在苏之外交上存在“中央政府”。因此，在这里美蒋那一套无法实行，我解放区那一套也行不通；苏联在东欧、北朝鲜占领区那一套也不能机械搬用。

为此，①这里的社会生活，要求更有秩序，更需国际都市化。②这里的作法，在形式上完全不同于解放区。③在社会政策上，要更缓和些，土地改革，暂时不进行。④要重视政权，充分使用政权。

3. 关东可能成为我党的隐蔽后方。我党可以从关东取得物资、技术支援、人力、干部的补充，以及休养生息，交通联络等支援。

一切支援的方法、方式，越有计划、越巧妙、越隐蔽、越主

动地去作，其后方作用就会发挥得更好些，更多些。

4. 政权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关东政权是：在苏军指挥部领导与军事管制下，各阶层统一战线，中共负主要工作责任的民主政权。对这个政权：①要拥护它（过去有人怀疑它）；②要巩固它（过去有人削弱它）；③要掌握它（过去有人不管它）；④要重用它（过去用了，但未重用）。

要求于政权的，不仅在形式上不同于哈尔滨，而且在内容上也有区别，哈尔滨主要为自己战争服务，关东主要为苏军军事根据地服务。

目前关东政权是单一首长制，迟（子祥）为首长，我为助手。

5. 关东目前主要是和平环境。关东和平是在全国战争包围中的和平，所以和平是有限度的。内部情况（指战争）的变化，经常影响关东地区的生活；但起决定影响的仍属苏联对外关系的变化。

6. 中苏关系在“旅大问题”上尚未解决。对关东地区的行政权，国民党是可以来接收的。美、蒋对关东的重视早已垂涎是一致的。尤其是蒋。

7. 人民生活比过去下降了。群众的经济生活是痛苦的。做鞋是“以工代赈”，另一种形式维持老百姓不死罢了。按9月份统计，大连市、县共计有3.5万人经常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

西岗子今年1月统计，赤贫者450户，9月份已增至870户。寺儿沟两个坊9个间的统计，共有226户，能吃苞米面的仅有1户，大部吃野菜与豆粕。

由于生活下降：①群众对国共的态度也仍然处于观望、动摇，谁好、谁坏，群众尚在选择中。②群众主要要求是经济，是吃饭穿衣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群众就靠近我们。

8. 我们工作情况的主要特点是“穷”。群众穷，党穷。穷的特点不消减，一切工作都作不好。穷使各方面的关系都恶化。

穷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关东处于战争时期，处于中国全面

内战时期，处于国民党封锁时期。

但这不是主要原因。穷的主因是在于主观：①两年来我们对关东经济生活管理是无计划、无政府。我们没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发展经济的计划。②在支援前线上，长期采取了无计划的“杀鸡取蛋”的政策。③我们对粮食困难情况估计不足，既没有实行“寸土必争”的方针，又没有用大力去组织运粮。

因此，穷的责任在于我们主观，在于领导。

第二，关于党的任务

1. 关东党的基本任务：建设与巩固苏军关东海军军事根据地，并在服从这一条件下，建设与巩固我们党的隐蔽后方（有人提：是建设关东，支援前线，是有毛病的）。为此，全党要大力发展与组织基本群众，团结各阶层巩固与扩大民主联合阵线，为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政治经济利益而奋斗。

2. 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安定民生”。

发展生产是消灭“穷根”的唯一办法。安定民生，首先就是消灭“三万五”（即 3.5 万人贫困）。

安定民生的要求：①就业；②不失业；③保证定量的粮食供给；④稳定物价；⑤发展民需工业，逐渐满足群众的布、袜子、胶鞋、毛巾、豆油、火柴、香烟、牙刷、牙粉、肥皂、酱油等日用品的供给。

3. 发展生产的方向：对农业必须用更大力量，采取“寸土必争”的方针。

对工业要开工，这是解决工人就业问题。

4.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政权工作。在国民党尚未在旅大插脚之前，我们正处于与国民党争取群众的过程，而争取群众的首要工作，是群众的吃穿问题。

（本文刊登于 1948 年 2 月 10 日《斗争》第 1 期）

江华给韩光的信

寒光（韩光）同志：

据周谈，你处若干同志怀疑友方领导，我想有下列原因：

（一）没有远见，不从东方与中国革命基本来看；

（二）自己历史的工作狭隘性与狭隘的民族观点；

（三）对政治斗争尤其对国际政治斗争简直是文盲，就是说无经验。由于20年的斗争经验，我们只会武斗不会文斗，这点必须警惕，应虚心地向人家学习，学习，再学习！

你如果认为对的话，可在地委讨论此问题，对某些干部必须在思想上搞通，肯定人家是帮助中国革命的，对东方对中国革命是有好处的，绝不会妨碍的。如能打通思想后，才会一致的在总的方针下积极工作不埋怨。及对从友方中争取独立性不以人家为出发点，自己蛮横以自己经验来闹独立性是有害的。这里要说明，不是说工作不要独立性，在长远利益都是共同的前提下，我们应力争工作的主动性，积极负责完成任务，完成必要的设施，聪明的与各个目前应做的事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工作领导艺术。这点望你们特别注意考虑。

.....

江 华

1947年12月6日

洛甫（张闻天）在东北局组织部 召开的旅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48年7月，中共旅大地委六月会议之后，东北局组织部在北满召开旅大干部会议，洛甫主持会议并讲话。

一、方针问题（争论中有说对的，有说不对的）。

方针基本上是对的。十月会议前有缺点、错误，十月会议后也有缺点、错误。六月会议对十月会议中的一些缺点错误作了批评。六月会议总结，东北局认为基本上是对的。

旅大地区很复杂，尤其是城市环境，地委同志一下子把问题都弄清楚也是困难的。尤其是旅大解放区头绪很多，干部也多，一下子把工作都搞好是个困难。

当然，地委负责同志在思想上有些毛病，如阶级关系上，作风上都有毛病。地委过去领导也不强，上级也没有很好帮助，所以发生一些毛病与缺点。好在有苏联的帮助，路线上、基本政策上不出大乱子。苏联比我们高明。

东北局对旅大领导弱，是估计到的，所以后来派一些干部去，如李一氓，杨青（指欧阳钦）等。当然还要继续加强。东北局在政治上相信过去的地委，现在也相信。

现在的问题是东北局要加强领导，加强检查，把工作做得更好些。

二、关于一些争论的问题

1. 旅大的特点

旅大的特殊情况必须估计到，把特点强调一下有必要，否则会发生错误。苏军管制有好处，对我们，对东方都有好处。如无

苏军，旅大不可能是我们的，就象葫芦岛一样。

以苏为主是对的。苏在旅大所实行的方针与我在那里所执行的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工作方式上应有所不同。

旅大虽有特殊，但与解放区的共同性上是一致的——即新民主主义。但与解放区形式上有所不同。在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上应区别于解放区，不照顾到这一点，我们就要犯错误。十月会议前，我与苏关系不好，因我们把解放区那一套政策搬过去了，这是主要的。许多同志对此点不了解，甚至盲目的反苏情绪是不对的。应该反省（包括养病的同志）。十月会议后，由于这一方针的确定，中苏关系好了，这是很重要的进步。

旅大工作搞不好，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不利，要想很好的支援前线，必须把旅大搞好。

旅大实质是新民主主义，基本上是由共产党的领导（苏共、中共），至于某个时期采取什么政策，是根据形势的需要。苏驻军旅大30年条约很好，不是“福禄寿”30年。是对中国革命有很大利益的。旅大是苏海军根据地，我无海军，苏不在，我们就不能在旅大。

2. 旅大与解放区的关系问题

旅大有机器，解放区有粮、棉、煤，旅大对解放区最大的贡献就是把生产搞起来，生产是真正帮助解放区。十月会议前，各解放区乱抓一把是非常混乱的，这是不对的。各解放区乱抓，这不能说是真正的支援解放区。当时苏军严格管制是完全正确的，目的也是要把生产恢复发展起来。各解放区过去乱抓，抓下去就把生产搞垮了，我们受了损失，旅大就垮了，支援前线就不行了。

十月会议上“支援前线”字义怎么写，这不是关键，主要是看怎样作。当然旅大地委在这方面的努力还是不够的。旅大地委必须把旅大巩固起来，积极的方面就是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就要严格管制，坚决批判乱抓与无政府主义。

3. 旅大地委的阶级政策问题

1946年韩光总结，检讨了过去的乱，基本上停止了乱七八糟的清算（苏军反对这样搞），转入生产是正确的。不实行土改，采取减租减息，在城市保护工商业，停止没收，也是对的，在上层与迟子祥合作，依苏军意见摆个牌位，这在策略上来讲也很有必要。在城市搞生产，农村停止反奸清算转入生产，上层搞统一战线。这个方向是对的。如不这样那就是另外一个路线，就不对了。把生产搞起来，工人生活才有办法。十月会议指出“穷”，穷就是不能把生产搞起来，工人生活哪能好呢？

伍修权在东北局组织部召开的 旅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 方针问题：

①“以苏为主”这是对的。有的同志提出“以我为奴”这是不对的。

②“发展生产、安定民生”，大连没有战争，就应以发展生产来支援战争。有的同志提出：十月会议总结中为什么把支前写到最末一段？位置提得不当，但在实际工作中许多方面都证明是支前的。有的提出：为什么对解放区要提“贸易管制”？要发展生产，就要管制，乱抓是不行的。

2. 领导作风问题：

六月会议是检讨得相当严格的，如闹独立性问题，干部政策等。

3. 各种政策问题：

①税收政策。许多同志提出：税收起点、停止累进点都低了。但这不能证明税收政策错了。

②工资政策。有的同志提出：工人工资低，工人与职员悬殊太大。大连普遍失业，是实行低工资叫多数人扩大就业面，还是提高工资叫少数人就业？

③回忆运动。苏军一贯反对在城市开展清算斗争的，韩光停止这个回忆运动是正确的。

④土地政策。旅大不能搞土改。到处以减租减息变相搞土改，停止下来也是对的。

（本文是伍修权讲话的第二部分）

关于联共与中共同志在 完成巩固关东苏联海军军事根据地 共同任务中的工作关系问题的几点意见

致某某上将同志（苏驻旅顺远东军区司令官别洛博罗多夫）

中共关东地委

1948年3月15日

1947年10月，中共关东地委曾举行了一次全体执委会议，在详细地研究了目前关东地区各方面形势与特点之后，一致认为：关东主要是苏联海军军事根据地，且驻在30年。要建设与巩固这个海军军事根据地，不仅是苏联人民及联共党的光荣任务，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及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任务，在关东地区工作的中共党人，虽还同时负有建设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隐蔽后方，支援友邻地区的任务，但是应在服从建设巩固苏联海军军事根据地的条件下进行。根据以上认识，地委曾在对苏联关系问题上，着重地进行了自我检讨，以得与联共同志更密切的合作，肩负起共同的任

务。

在十月会议上，确定了“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总方针，以巩固军事根据地，并具体制定关东地区1948年经济建设计划，该计划现正在逐步进行，目前在关东地区内，工人、农民等广大群众中，已蓬勃地掀起了生产热潮；各种工作已逐渐走向了正规与有计划的发展；威胁着广大市民群众的“粮荒”也已消除，物价已趋稳定，失业者已大大减少，所有这些现象，都表示着关东地区经济生活有了显著的改进。

在此我们必须指出：这些成绩的获得，是与你们的正确指导分不开的，是与以格里果夫同志为首的民政局的积极协助分不开的，是与中苏同志的共同努力与双方关系逐渐协调分不开的。特别是在进行由北满运输粮食（7万吨）和煤（2万吨）的任务中，联共同志曾给予了我们最大的助力。应该承认，倘没有这些帮助，这一巨大任务是难于实现的，如在贸易税收等政策的推行中，联共同志也给予不少帮助，如苏联秋林公司、粮谷贸易社等企业机关，自今年一二月已正式按章纳税，这也给关东地方政府工作以很大方便。

1948年关东经济计划的实现，对于巩固海军军事根据地的总任务，显然有其密切的重要意义，因之，如何使联共党与中共党在完成共同任务和共同建设计划中取得更好的配合，在进行工作过程中，一方面高度地建立苏军在关东百万人民中的威信，同时也要建立与提高中共党人（以个人身份方面活动的）与关东公署（各种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在人民中的威信，使苏我双方力量更高度的集中发挥，已成为当前共同工作中的一个主要课题。我们现在想基于以上的原则，就去年10月以来的双方关系上，提出几个主要问题加以检讨，并提出今后改进的意见，以供你们参考。

第一部分：在经建计划的进行中，除了上述较好的配合方面外，但毕竟还存有若干不够协调之处，反映在如下的问题上：

（一）关于对外贸易与交易谈判问题

根据双方在执行贸易法规中的共同规定，除运往苏联本国的物资可以免税出口外，其他双方均应共同遵守，其后，格里果夫同志提出，只要有民政局德里摩夫同志的批准签字即可免税出口，而关东公署贸易局则无权过问……

在对外贸易与交易谈判问题上，曾发生如下主要事件：

①苏外商部往北鲜运盐问题

今年1月初，我方正与北鲜方面在连谈判以盐交换肥田粉问

题（当时比率为 1 吨肥田粉换 5 吨盐），此时，苏外商部事先未通知公署，即决定以 2500 吨盐（据海口报告是 6000 吨）运往朝鲜，这使公署与北鲜谈判立即受阻，盐与肥田粉交换合同不能成立，公署与苏外商部交涉无效后，乃命令工会在外商部手续办妥后再为装盐上船，经过双方谈判，格罗果夫同志意见是，盐仍要免税出口，我方以 3 万吨盐与外商部交换 6000 吨肥田粉，结果盐已允其出口，但自 1 月 9 日至今，双方交换合同迄未签字，因肥田粉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将使今年关东地区农业生产计划受到很大影响。

②关于花生统购问题

去年冬，在民政局意图下，关东公署贸易局宣布统购花生，与苏外商部粮谷贸易社开始谈判，以花生交换物资。10 月 31 日，双方同意以 2.5 吨高粱，比 1 吨花生米；以 1.37 吨汽油，比 1 吨花生米，嗣后长期搁置未决。最近，德里摩夫同志认为，公署所提出的价格过高，并说公署统制花生，是为了对苏抬价，几次要求允许其单独在市场收购。公署以统购令既出，不便破坏，乃提议重开谈判。此时，粮谷贸易社提出只可以豆粕、腊料子进行交换，并要 2 吨豆粕比 1 吨花生米（最后谈至 2.8 比 1，按照经建计划，目前为投入生产与增加外汇，公署所须要的是汽油、棉花、布匹等，而豆粕腊料，不仅无法输出，且在本区市场也极难销售，加以比率悬殊，故谈判未成。此后，德里摩夫同志竟强令公署商务所发给粮谷贸易购买花生特许证，公署在此情况下，被迫解除统购花生的禁令。

③本区与外地商人货物出入口问题

目前出入于大连港口的本地和外地的商人、船只、货物，均须经过关东公安总局转苏民政局最后批准，此对贸易之严格管理与杜绝流弊固属必须，但实际执行中，手续繁难，辗转积压，需时长至一月以上，使商民叫苦连天埋怨政府，埋怨苏军，视出入大连港为畏途，它大大地妨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直接违背经建

计划中发展工商业的原则。

（二）关于 1948 年经济建设的资金调度问题

公署根据经济建设计划而制定的一、二、三月份资金调度计划，原经格里果夫同志同意，但列入该计划项目中的苏方各贸易机关、企业工厂欠款三亿五千万万元，则不能按时调度，虽数度允许偿付，但始经未成事实，因之，使资金调度计划在一月份刚开始进行时，便受到很大的影响。

第二部分：双方工作关系问题

关东地区既然是苏联海军军事根据地，且在对日和约未签订之前，自然应该存在苏军军事当局的军事管制。中共党在关东进行工作，应充分了解和掌握这一特点，同时，中共所参加并居于领导成份的关东政权，也应服从于军事需要，满足军事当局的要求，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两三年来，中苏两方同志的关系是在不断的进步当中，特别是在地委十月会议后，中共同志经过了党内检讨与自我批评，是在积极的与联共同志向更好的合作方向努力。格里果夫同志任职以来，在双方工作关系上，也有许多明显的促进。

但是，在巩固关东苏联海军军事根据地这一共同的重大的任务下，我们认为，不仅要有联共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不仅要使苏军在关东百万人民中建立高度威信；中共和以中共所参加且居于领导成份的关东政权，在这一任务中的强有力的组织作用和其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完全必须的，因之，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我们还不能满足于现状，还不能回避存在于整个关系改进中的某些缺点。

①中共关东地委、关东公署党团和各市县党政部门，所常引为苦恼的事，即是与当地苏军当局的关系问题，他们事无大小，不分党内党外，上级下级，整体部门，都要过问，有时要直接出面干涉、命令。以关东一级来说，例如今年一月间公署成立水产局

时，格里果夫同志开始已同意该局属于公署工商业厅领导，但其后格里果夫同志又找到农林厅长，面允水产局为农林厅领导，先后反复，使公署内部发生意见，很难处理。再如今年“三八”妇女节放假事，关东妇联原拟放假一天，且早在前数日已在《实话报》上公布，当时苏民政局方面并未表示异议，临至节日，忽又强令公署，不许放假，争执往返，使关东妇联不得不急促改变原订工作计划，致使通过大会动员生产的目的未能很好贯彻，此事不仅影响关东妇联在妇女群众中的威信，也影响到关东公署和我们（中共同志）在群众中的威信。迟（子祥）、乔（传珏）以及其他党外人士，甚至在群众中议论：“这里的事，主席也好，副主席也好，县长也好，市长也好，没有司令官的同意，什么也办不通……”从这句话中我们应当得出如下教训：我们（包括苏共同志在内）在运用中国的行政机关与群众团体时，应当很好的注意策略问题，至于在公署的日常工作中，凡公开发表的文件，不分大小，轻重与否，都要经过苏军当局批准，在翻译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常常耽误时间，减弱工作效率，而且我们认为这种不分大小轻重一切审查的办法，也是不必要的。

其次，在各市县农村工作中，不可否认的存在着许多缺点、偏差，当地苏军当局对各该市县的工作确给了不少帮助。且在近时以来，双方关系也日渐协调。应当承认，各地区司令部的同志一般都很积极负责的，但他们在纠正某些缺点偏差，常常是操之过急，不能适当的照顾到当时的工作情况和干部情况，不按照正当的组织手续提出意见和批评以求改正，往往直接出面干涉，制止工作，有时甚至片面听取地主富农的意见，以为中共干部工作过左，“压迫”中共干部，实际是打击了其在群众中的威信。同时在态度上也常指手划脚威胁斥骂，使下层干部很难容忍，例如金县县委几个同志，都曾被当地苏军当局责骂过，大连县、旅顺市区村中亦常有此种情况发生。这除了使当地工作增加困难外，在一

般干部工作情绪上，也引起颇大的波动不安。

②我们感到在苏方工作同志的作风上，存有形式主义的缺点，其典型表现在向各地区、各部门搜集材料工作上，往往事先不通知准备，突然找到某个群众团体或某县区领导机关，索取异常庞大的繁杂的各种统计数字，期限紧迫，不办不行，因之，迫使某些干部只求应付过去，免得受到斥责，便仓促的提供不正确材料，而且索取材料数字的苏方干部，来处不一，头绪很多，往往前人要过，后人又来，同一材料被要过好多次，甚至你争我夺，以取得材料为满足，我们认为用这种方法收集材料不仅与实际工作无益，而且有害。

③在关东公署与民政局的关系上，除上述以外，在政令推行上也还有应当提出的问题。公署发布任何重要文告决定，都经过民政局的同意或批准，这是对的，但下达至市县政府后，还须经过当地苏军当局的批准才可执行，这就诸多不便，往往因这时间转折，公署政令便不能顺利推行，有时民政局通知公署要作某项工作，命令一下，就要立即实行，来不及考虑讨论，常使中共工作同志思想上打不通。

第三部分：今后双方关系改进的意见

（一）在实现关东地区 1948 年经建计划中，我们明白的承认，苏联军事当局在本区经济上应占首要地位，因为为了供给保卫关东战略基地的大量驻军的需要，除主要依靠苏联国内供给外，还须尽力发挥驻在地区的经济力量，以补不足，这是完全必要的，合理的，但在不妨碍这一原则下，在关东地区的中共也须有其一定的经济利益，以负起其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支援战争任务。其次，关东地区百万人民的经济利益也须予以一定的照顾。这两点也希望联共方面能够了解，并且给以照顾。

如何使联共与中共在关东地区的经济利益一致起来，求得合理的解决，是当前双方关系中一个重要问题。在此我们希望你们

给予明确的意见与指示——特别是各方要照顾到何种程度，在方针上的意见。

我们的意见是，在中共方面，首先在关东政权中建立国家性的统一贸易机关（以关东贸易充任），并使同利公司成为对外贸易的有力补助机关。而各解放区在连的贸易单位，其任务只限于采购必须的器材物资，不向商业发展。至于苏方贸易统一问题，前时格里果夫同志曾表示也要解决，究竟如何处理，希望明确告知。

对于各解放区战争需要的支援，为能更有力量与更有计划，我们意见是要尽力作到不使他们到市场单独购办，以减少商人从中剥削与市场混乱现象，为此，希望在一些重要物资的交换上（如汽油、布匹等）能用统一形式解决，相信联共方面，能以兄弟党友谊，采用适当的秘密的方式来解决。

（二）在政策问题上，必须承认，在关东地区，联共党处于领导地位，因之，其政策原则是决定性的，中共应全力保证其实现。但至今由于在决定与执行政策的开始，联共方面说明解决得不够，加以中共同志对此特殊地区及大城市工作缺乏经验，常常执行中发生意见分歧，把握不大等情形。特别是由于关东地区形势特殊，其现行的各种政策，与全国各解放区有很大的不同，在南北各解放区的影响下，本区干部思想常有不通之处，如联共方面说明解释不够，就使我们很难进行说服及统一党员干部的思想分歧，因此，建议今后苏与我双方领导机关，可定期召集联席会议，双方指定一定负责干部参加，交换工作意见，研究某些重要政策的执行情况及其所发生的问题。同时，更希望联共与苏军当局在决定发布某一重大政策决定时，事先必须通过中共关东地委与公署党团，说明其目的、要求，作必要的思想准备工作，如此，才能保证一些政策决定的顺利施行。

（三）在日常工作关系上，我们希望联共同志特别是各地苏军军事当局，能在作风上、态度上有些改进，双方应互相尊重、民

主合作，遇事共同商量，建立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与互相批评。过去某些苏联同志对中国同志的责骂威逼行为，必须纠正，双方都应当按照组织原则办事。中共方面有按时向联共同志与各区苏军军事当局提供工作报告、材料数字的义务，但此工作应该是有组织的进行，过去混乱的、草率的现象必须克服。

（四）在军事管制问题上，我们希望苏军当局今后能在原则上政策上多加注意，并通过中共地委、公署党团和各市县区中共党委提出意见，解决问题。而逐渐改进上述分散的、零碎的、事无分巨细的遇事即直接干涉的作法。

总之，我们希望双方同志能开诚布公、亲密无间在为巩固关东苏军军事根据地这一共同的光荣的事业中，携手前进。我们坚决相信，在今天以双方关系上所存在的缺点，在双方同志齐心协力下，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虽然我们在民族语言文字上存在着差别，但由于我们具有共同的政治信仰——共产主义与布尔什维克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差别已不成为合作中的障碍，预祝我们在共同事业中更好的合作，预祝我们共同事业的胜利。

中共关东地委

1948年3月15日

韩光、袁牧化与巴申同志、 安特罗波夫同志谈话记录 摘 要

1948年3月16日

巴申：

一、关于大企业中的生产与锄保问题

蒋美在此虽然不能公开发动武装斗争政治斗争来破坏我们，但他们会暗中长期埋伏，特别是埋伏在工厂与企业中，去用尽各种方式来破坏我们的生产与建设。因此，我们要特别提高政治警惕性，防止他们的破坏。例如，在生产、创模、竞赛、恢复……中的种种破坏，我们是否有专门研究与对付的办法，尤其在大企业中。因为政治优势在我方，他们更会长期深入埋伏来进行破坏，例如，割断电线、拆掉螺丝钉，或关闭汽门等，甚或偷去一件什么东西，我们决不能认为系工人中的教育差或政治上的落后，前年或者可以这样（看），但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决不能这样说了。对上述行为应提到政治原则高度，应认为是蒋美有计划的破坏，以阻碍我48年运动的进行。

公安局的工作过去是有成绩的，但只靠公安局或社会部门来进行锄保工作，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今天大生产中，应将锄保工作变为群众性的工作，大家来干这一工作，才更有劲，当然公开的公安工作亦应加强。

自去年以来，各工厂中（农村中亦然）的创模运动，苏联同志是非常重视的，因为它是一个含有伟大政治意义的运动，经过

创模，可以提高工人的阶级与政治觉悟，改变旧的劳动观念，提高生产率，提高质量与减低成本等等。正因为如此，所以蒋美更要破坏我们的创模，凡是在创模中的各种落后行为与破坏的表现，我们都应特别注意，此种情形在苏联也有过，比如苏联在进行斯达哈诺夫运动的时期，在矿井、化学工厂、在各企业部门都发生了破坏与暗害行为。

因此，提议在职工会系统中应有专人来搞锄保工作（当时我们已告诉他们，孙乐宣同志已专门搞此工作，并且各大工厂中亦有专人在搞），并随时反映搜集材料向民政局反映，不仅在发生问题后，主要还是在发生问题前，我们就应掌握详细材料，来共同研究决定如何破获他们。关于提高警惕性问题，不仅是少数人少数厂，而是在一切共产党员与一切工厂中都应提高警惕性，防止敌人的破坏，这是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表现之一，希望以后特别加强此种教育。尤其是大企业部门中，特别加强其党的组织和领导，不仅每个厂中要有支部，要有骨干，而且每个支厂每个车间都应有支部，应有骨干，才能将全厂全体工人领导得起来。

至于关于中苏合办的这些大企业中，中国同志如何进行工作，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等等问题，希望地委召集会议，汇报与讨论决定他们的工作后，民政局一定要保证执行。

二、工作关系问题

过去双方关系不够密切，尤其是苏联同志未经常主动的找中国同志、找地委许多同志交换意见、讨论工作，比如我巴申除了与韩光同志联系较多以外，与袁同志偶尔有些联系，与苏同志就根本没有谈过一次。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实行自我批评，同时更多的听取地委同志对我们的批评，向我们提意见，我们保证诚恳的接受。同时今后应将我们相互间的联系加强起来，不仅和地方工作科安特罗波夫等同志联系，和韩光同志联系，要和我和地委其他同志联系；不仅上层的同志联系，要将这种精神贯彻到中

下层去，因为下面问题发生得最多，具体事件不少，例如中苏合办的工厂中，苏联同志有时不多提意见，恐怕是为了情况不熟悉与外交问题。中国同志亦是一样，恐怕是多提意见以后，闹坏了关系，因此，问题就会越积越多，越不解决，越妨害生产工作的进行，亦弄坏了彼此间的关系。因此，坚决反对只是在过节或在大会上联系，而应加强平常工作上的联系，上下同时并进。

因此，具体提出：

1. 每月20日至25日，召开一次会议，由马、安二同志或我亲自参加，双方及时反映下面的意见和讨论工作，共同解决问题，然后中苏双方共同给下级指示和改进工作办法，中苏双方保证实行。

2. 中国同志应及时提出对苏联同志的意见，反映情况，不要拖延。今后及时、迅速与不拖延的解决问题。

3. 为了大生产任务的完成，大企业中尤其是中苏合办的大企业中，最好专门召集会讨论与决定他们的工作。

4. 关于搜集材料问题，主要想了解中国情况，苏联司令部无什么一定的制度，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今后可由双方共同研究并提出意见制定一定的表格，由地委来统一发下去，要下级定期的交上来，再统一交给苏联民政局（此地巴申同志举了许多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精确与迅速统计的例子来说明没有正确的数目字的统计，是不能证明我们的成绩的，亦不能决定下一次的任务，数目字中包含有伟大的政治意义）。

5. 要求地委，要命令下级执行中苏双方决定的指示，苏方今后一定保证执行，并一定改变工作方法。

6. 要求中国同志借此机会向苏联同志学习管理国家、工厂、企业、经营贸易、锄奸保卫、宣传教育等等工作经验，尤其是生产建设，苏联十月革命后即搞到现在，无论如何是比中国同志强一些的，这是很不客气的说法。

最后我们补上一点，希望苏联同志亦向中国同志学习了解中国情况，中国党一些工作方式方法，因为这一方面中国同志亦知道多一些。

三、关于政策问题

今后希望有中国同志专门给苏联同志讲解中国党的方针、政策、策略，以便了解它们，并使它们如何与联共党的方针、政策、策略吻合起来，并在旅大如何具体实行，而不妨害苏联的外交政策（巴申同志举例子说：蒋介石和苏联订了中苏条约，结果对他竟无利益，对中共对世界与远东和平民主事业反而大大有利；只要外交上说得去，对敌人无利，对革命有利，我们为什么不做什么呢？比如军工生产、织布、做鞋等等，我们当然要加强；北满在严重的战争情况下，还在节衣缩食帮助我们粮食、棉花，难道我们在此和平环境下，还不积极设法帮助他们吗？）。当着国际国内形势再起剧大变化的时候，苏联外交政策当然要变的，但在今天仍然不变，土改暂不能实行（我们在此说：苏联与国民党订了中苏条约，是与国民党有外交关系，与共产党无外交关系，只要共产党消灭了蒋介石，苏联就不会和它有外交关系了。巴申同志同意这种意见）。

今后希望双方更注意研究旅大政策，并不应分彼此，因为中苏利益是一致的，关东亦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在就在开始建设新关东。过去有人说关东是苏联的，只有石河以北普兰店那些地方才是中国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政策是不能错的，错了会造成工作上大大的损失，地委在十月会议以前政策上出了不少偏差；但在十月会议以后，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党委负责同志是掌握了这些政策的，苏联同志亦承认了这一点，只要坚决贯彻下去，关东是会改变样子的。但这并不是说十月会议以后，中国党所有的同志都全部了解了与转变了，还有一些同志了解与转变不深刻的，今后希望继续加强学习教育，将十月会议精神贯彻到各部门中去。

苏联在关东执行政策是很审慎的，好久以前美国想派记者来访问关东，但苏方说此系军事管制时期，无访问之必要。因为这些家伙来满天飞，是专门来找岔子，挑毛病，在外交上造成惹是生非，于我们是不利的。但民主进步的记者是可以允许他们来的。

如果美蒋有什么正式官员来此，他们会事前通知我们，我们就有准备的对付他们，他们搞不到我们什么东西，比如去年国民党反动派的视察团。如果记者来，我们就很难应付。

例如中共党还是公开或秘密？当然按道理说公开出去好，将牌子挂在大楼上，人人都知道关东中共地委会在什么地方，对工作很方便，对群众亦更有利。但在外交上刚好给联共增加了极大困难，不公开是策略问题，有些地方虽然表面上看对大肚子让步了，例如一直到现在联共在此还不能允许实行土改与斗倒大肚子，还要同大肚子和平共居（当然大肚子的官吏如果有错误，应适当批评）；但如果从无产阶级长远利益看问题，这样反而对我们有利。

因此，关东地区一般说是执行资产阶级民主政策的，如政权中有各阶层，有大肚子，对地主资产阶级尽量在策略中采取麻痹与不侵犯的手段，不过分刺激他们，暂时和他们合作，使美蒋看起来这个地方政权与所实施的各种政策是带中立性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在政策上出了偏差，美蒋在外交上是会发动攻势的。今天他们虽然明明知道此地有中共党进行地下工作，虽然蒋介石曾经说：“苏联和国民党订立了中苏条约，但苏联不替国民党干事，反而专门替中共干事，中苏条约于国民党有什么利益呢。”但他们在什么地方拿着我们证据呢？所以我们不怕他们，但要与革命与中国民主有利，像这种不能泄露秘密的事，我们当然越作得多越好。

四、关于出版宣传与审查问题

关于审查制度要继续执行，因为这是表现出去的东西，偶一不慎，就要给敌人抓住弱点打击我们。因此，凡是一切有碍外交

政策与过分刺激地主资产阶级的文字上的东西，都应尽量避免在报纸杂志上出现。

有一次迟子祥演讲稿上有：“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这是不行的，如果给敌人知道了，以为迟被我们收买了，实际上迟是一个反动家伙，是反人民的。因此，此种口号是要被删去的。

此种检查在军事管制期间必然是有的，就是美蒋亦是承认的。同时此种检查对我们是有利的，万一美蒋在此有可能公开活动，他们要办什么报纸杂志，如果有反苏反共反人民的言论，当然会被我们删去的，甚至会封闭他们。

因此，在文字宣传上我们要非常审慎；但在口头上就是说左一点、红一点，甚至说多一点也不在乎，今后可多多进行口头上的宣传教育。

比如挂像来说，在公开场合多挂几个好，在大的节日活动，以挂斯、孙像为宜；如果在人看不见的地方，挂上毛主席、朱总司令像有什么关系呢？美蒋是疯狗，我们尽量少刺激他们，就少咬我们一口。

关东此种现状，在和约未签订前，军事管制会继续下去，因此宣传政策与审查制度要继续下去，审慎从事。

五、关于培养技术工人与干部问题

这一问题很重要，使工厂工人逐渐的普遍掌握技术，提高熟练程度，加强生产与合理化。将来长春、奉天等地都是我们的，甚至全中国都是我们的，我们要往外输送大批技术干部，以帮助他们解决技术上的困难，但在输送中亦要照顾这里的生产工作，不要把种子都摘光了，影响此地生产。因此培养技术工人与干部的方针是：养鸡生蛋，不是杀鸡取蛋，不是坐在树枝上砍树干，树倒了人亦倒了，而是坐在地上砍树干，倒树不倒人。并可采取训练班与带徒弟等方式同时进行。

3月16日因为了“五一”工作去司令部，安特罗波夫同志除了全部同意我们“五一”工作计划外，关于生产问题，他又具体的提了下面的意见：

1. 关于中苏合办的各大企业，要好好调查研究他们的组织、宣传、创模、生产以及党与工会工作等是如何进行的。可由地委召集会议，来汇报与研究他们的工作，并作出决议来，以便今后加强他们的工作，如开会可通知他们来参加。

2. 地委还可以准备或考虑召集如下一些会议：

①职工系统的会议，讨论与决定他们的生产、创模等工作，以便加强他们的工作。

②农、青、妇、友协群众团体的会议，讨论与决议如何加强农村生产，如何参加生产，进行义务劳动。

③在五月份最好召开小型的模范代表大会，总结4个月的生产成绩，并讨论与决议5月以后生产创模等工作。

以上这些会议希地委考虑，如认为可行的话，就协同有关方面商讨实行，最好有些会议在3月底以前即召开。

（整理者注：谈话时间：1948年3月15日夜7时—12时半。次日上午10时—下午1时。因为是经过翻译再记下来的，难免有译漏与记错之处，所以只根据大意整理而成，如有错误之处，由整理者负责。袁牧化整理，1948年3月17日上午）

中共旅大区党委关于 三年来中苏关系的总结报告（摘要）

1949年5月20日

根据“条约”规定，旅大系苏军驻在30年的海军根据地。三年来，旅大地区处于苏军军事管制时期。这是旅大政治环境中最突出的特点。我旅大党三年来一切政策的决定，工作的布置都是与这个特点分不开的。于是，中共同志与联共同志在制定政策时如何能达到一致见解，在工作布置上如何采取一致步骤，在日常工作中如何建立亲密、团结、互敬、互助的友谊关系，便成为我们政治生活中最普遍存在的问题。

三年来，旅大地区中苏关系的发展经过如下几个过程：

（一）解放以后至1947年“十月会议”，为时两年余。

地委领导同志，在与联共共同工作中，能虚心接受联共领导同志的意见，保持遇事同联共领导请示商量的密切关系，能够在实际工作中保证执行联共领导同志所提出的方针与办法。

但我们大部同志未能充分认识旅大地区的形势与特点，所以，在许多工作部门中，在许多干部党员中，在对苏关系问题上，存在模糊的认识和误解，甚至有不满意情绪。于是在具体工作中，我们与联共同志的关系是不够正常的，不够协调的，互相间不够信任的。

如旅大地区的政策与措施，应无条件的服从于苏军指挥部的要求，应服从于苏联外交政策的要求。但我们有些同志对此没能有足够的认识。表现在对“土改”问题上，当时不实行“土改”，

被看成这是苏联“干涉”中国内政。

又如，1947年3月成立旅大关东公署时，按苏意见，吸收了中上层代表人物、大商人、大地主成分的非党人士参与政权工作。在公署机构中，除民政厅长与公安局长是我党干部任正职外，其余各厅均由非党人士任正职。而我们的同志仅从人数与形式上去分析我党在政权中的地位与作用，因而怀疑起旅大政权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怀疑起我党在政权中的领导作用。于是就发生不重视政权，不运用政权，不加强党对政权领导的倾向。

又如，1947年5月，旅大地区实行了苏军军币盖印的重大措施。当时军用币盖印的直接目的是杜绝国统区已停止流通的苏军军用币流于旅大地区，制止本区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安定民生。由于事出紧急，苏方提出方案要我们实行。而我们许多同志由于对苏有不信任情绪，初则对苏币盖印表示异疑，后由于苏军指挥部强制下，才勉强接受执行。

又如，解放初期，苏军曾搬走个别工厂的装备，于是有的同志就认为“苏军对旅大有经济目的”。殊不知我们当时还没站住脚，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使机器不致于落在美蒋之手，同时这些设备运到苏联能马上发挥其效能，增加苏之威力，这是直接有利于中国革命事业的。

又如，解放初期，苏个别军人曾发生过破坏群众纪律的事件。这究竟是个别人员发生的个别事件。而我们一些同志则抹煞苏军是国际无产阶级兄弟军队，是人民军队的本质。

1947年7、8月间，在对苏关系上曾发生严重问题。如在纪念“八·一五”的宣传工作中，苏方认为有严重影响苏外交的事实。会后苏民政局长格列克夫上校特召集我们各系统负责同志，进行了严格批评。同时又个别与刘顺元同志（地委副书记）进行谈话，提出警告，并指出唐韵超、陈瑞光、白学光、柳运光等同志不尊重苏方意见，不照顾政策。并暗示，如必要时苏方会向上级党委

(指东北局或中央，提出把他们自旅大地区撤退的意见。又如，当时金县又在以减租减息名义下，实行“变相土改”，引起当地苏军司令部强烈不满，强令区长、区委书记退换地主的土地。又如，当时苏方特别怀疑地委与各解放区财经单位不照顾苏方外交，不实行建设旅大支援前线的方针，即在旅大乱抓一把，而地委则隐瞒苏方无限制批准物资免税出口。于是，苏方直接派军官监督海口与税收工作。至9月中旬，苏军指挥部以刘顺元于公署工作期间不执行苏方政策，工作不力；唐韵超拒绝执行苏方所提出的工资政策等理由，正式向我党提出（与杜平谈话），要求撤退刘、唐两同志。及陈瑞光同志（陈是公署秘书长，因为骄傲自大及生活意识上的问题）。这可以说是3年来对苏关系最坏的时期。

(二) 1947年十月会议后至1948年六月会议前，历时8个月这个时期，从整个方面来说，中苏关系是逐渐的在改善，比过去是进了一步。这是因为：十月会议对旅大地区当时形势与特点，作了较深刻的研究，从而确定了“巩固旅大海军基地，建设我党隐蔽后方，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正确方针。同时，在对苏关系上，十月会议也着重地进行了自我检讨。

但是，由于对苏关系中的主要问题缺乏高度的原则认识，会后在干部中又未能作说服解释工作，加之当时在执行经建计划的配合工作中，在贸易方面等都存在若干不够协调的问题，而联共同志对我们事事严格，处处认真，要求克服缺点之心切，有的采取直接干涉，当面指责的态度，所以，在双方关系中又形成了不够正常的现象。

如1948年春季，在对外贸易及关于批准物资免税出口的程序问题上，公署商务厅与苏民政局及其商业科同志，曾发生多次争执。再如在解决食盐交换肥田粉、统购花生、管理海外商人出入大连港等问题上，也曾发生过意见抵触，工作关系不融洽的情形。

直到六月会议上，还有不少同志怀疑“以苏为主”的提法。有

的同志提出，“以苏为主”就是“以我为奴”的错误观点。有的同志将地委领导接收联共同志的意见，遇事同联共商量请示，看作是和苏方“一鼻孔出气”。有的同志提出，在与苏关系上应“有团结、有斗争”，把我们与联共的关系看成是我党在统一战线中与其他阶级的关系。这些思想在六月会议上未受到应有的批评。

（三）自 1948 年 8 月到现在，是中苏关系迅速改善，走入正常发展的阶段

如 1948 年 11 月货币改革的实施；1948 年农业所得税基本税利的确定；1949 年至 1950 年旅大经建计划的制订和颁布；1949 年 3、4 月间我党各级组织之公开和 4 月 1 日旅大区党委活动分子大会的召开；1949 年 4 月末关东公署的改组等，区党委与苏方民政局间，未曾在任何原则问题上发生过意见分歧。

总之，3 年来，中苏关系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

就苏方来说，联共领导同志工作作风不够民主，命令多于说服，强制多于劝告。一般则表现不够虚心听取中国同志的意见，有些问题处理欠妥时则推卸自己的责任，自我批评精神差。

3 年来的体验，所谓中苏关系就是中苏干部关系。而在中苏关系中发生的不正常，不协调现象，主要应由我们中国干部负责。

巩固的友谊,无敌的力量

——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
条约签订一周年

《东北日报》社论

在毛主席与斯大林大元帅的亲自指导之下,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国的协定》。这些具有伟大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到今天已经整整一周年了。一年来,在这些条约和协定的基础上,占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与巩固,已经成为举世无敌的力量,从而使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也空前增长和壮大了。

中苏两国友谊的增长,首先表现在一年来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双方的亲密合作,以及苏联在各方面给予我们的忠诚援助。为了中国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为了世界爱好和平民主人民的利益,苏联代表在联合国会议上坚持不屈不挠的正义斗争:坚决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人民唯一的合法政府,必须获得常任理事国资格,并出席安理会及其它一切国际组织;全力维护联合国宪章,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控告美帝侵占我国台湾。最近,苏联代表又以不倦的努力,反对美帝及其仆从国家诬蔑我国的非法提案。这一系列的事实,充分说明中苏人民的友谊是如何坚强,如何在不断的增长。

中苏两国友谊的增长,也表现在一年来两国在经济关系方面

的合作,特别是苏联对我国的巨大帮助,大大有助于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过去的一年,继《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国的协定》之后,两国政府又相继签订了贸易协定及换货协定、专家协定,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创办有色金属公司协定,以及中苏民用航空公司协定。根据这些协定,苏联不仅贷给款项,供给机器和技术,帮助我们恢复原有而遭受了破坏的工业,建立过去中国所没有的而又为今天所必需的重要工业,还派遣了大批专家来到中国,将苏联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经验贡献给中国人民经济建设事业,使中国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改造工作得到迅速进展。

中苏两国友谊的增长,还表现在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日益亲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苏联先后派遣了文化科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团、青年代表团、职工及妇女工作者、体育代表团、著名的学者和讲师来中国访问、讲学和表演。苏联电影工作者,经过长时的努力,更帮助我们拍制了“解放了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两部有历史意义的彩色巨片。而中国的各种代表团,去年来也不断到苏联参观、学习。过去一年来,中国译出了苏联文艺著作300多种,放映了几乎苏联全部的有名的影片,举办了多次深受群众欢迎的苏联照片展览。中国中苏友好协会会员,迄至去年11月份止,已拥有会员331万人,苏联的各代表团以及苏联文化科学艺术界的朋友和学者在我国各地均受到了各界人民热烈无比的欢迎,高度表现了中国对苏联的崇敬与爱戴。

根据中苏两国政府关于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占有者手中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的协定,1950年内两国政府亦已完成了这项工作。苏联移交给我国的财产,共计302处。在移交过程中,苏联代表及其工作人员诚恳负责大公无私的精神,保证了移交工作的顺利完成。这是苏联政府对我东北和全国人民又一次伟大友谊的具体表现。

一年来的无数事实,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企图挑拨中苏两国

友好关系的阴谋诡计，证明了中苏两国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今天，不仅中苏两国人民，而且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也都以极大的兴奋来赞颂中苏两国友谊的日益增进。

中苏两国的忠诚合作，不仅是代表着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关系着中苏两国的命运。同时它也代表了东方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的人民的利益，关系着全人类的命运。因为中苏两大国家人口将近七万万，约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两国中一个是世界上最强盛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是具有坚强战斗意志，在胜利中生长与壮大了的新兴的人民民主国家，这两个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和平与各国安全而奋斗的政策，又是如此坚定与一致。因此，这两个最大国家的友好合作，使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力量，大大超过了帝国主义集团的力量。正如莫洛托夫所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中苏友谊在巩固全世界和平的事业上，变成为伟大而强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在人类历史上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可以和它比拟的”。

中苏合作的无敌力量，在过去一年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胜利斗争中，完全得到了证实。美帝国主义在二次大战后遭到一连串危机而无法解救，乃阴谋用新的战争来挽救其厄运。去年6月，首先在朝鲜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并随即将战争的火焰烧向解放了的的中国，侵略了我国领土台湾，侵朝美军大举向中朝边境进攻，轰炸与扫射我安东吉林等地和平居民，妄想侵占朝鲜之后即侵占我国东北。但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赌注完全押错了，英勇的朝鲜人民，为自己祖国的独立与统一，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上，写下了光芒万丈的诗篇。特别是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为了保卫祖国与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坚决组成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接连获得三次伟大胜利，打得美国侵略者从鸭绿江边一直败退到三八线以南，根本扭转了朝鲜战局，使和平民主阵营取得了又一次的历史性的胜利，使帝

国主义集团遭受了世界性的失败。中朝人民赢得伟大胜利的原因，就是因为中朝人民有着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和平民主阵营的正义的援助。

可是美帝国主义过去一年来侵略政策的失败特别是在朝鲜战场上的武装侵略遭到惨败以后，并没有得到任何教训，现在它除横暴地拒绝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继续坚持侵朝战争外，又正在重新武装日本，企图驱使日本人民给他充当炮灰，继续侵略中国和亚洲，破坏远东与世界和平。然而美帝国主义的这一阴谋也是注定了要失败的，因为今天的任何日本问题，如果没有中国、苏联和日本人民的同意，是根本不能得到解决的，武装日本进行任何侵略和掠夺的意图，都是与中苏两国和亚洲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不相容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基本任务，就是制止日本或其它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侵略行动，在这个条约的第一条上就写道：“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它直接或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略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它援助”。过去一年来既已经显示了中苏两国牢不可破的友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中苏两国的亲密合作，既然极大的加强了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沉重的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那么在今后反对美帝侵略，反对美帝武装日本、保卫远东和平的斗争中，我们也更有信心和有力给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以更加严重的打击。胜利是属于中国人民的，是属于远东和世界人民的。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万岁！

中苏两国坚固的友谊和无敌的力量万岁！

中国人民伟大英明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导师斯大林大元帅万岁！
（本文刊登于 1951 年 2 月 14 日《旅大人民日报》）

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 条约签订一周年

欧阳钦

去年今日，在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这些条约和协定，辉煌地体现了世界人民领袖、中国人民挚友斯大林同志的伟大和平政策和他一贯关心援助中国人民的伟大精神；同时也辉煌地体现了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一边倒”、“团结国际友人”的伟大政策。这些条约和协定把自十月革命以来就存在和发展于中苏两大国人民之间的深厚真诚的友谊，用条约的形式确定与巩固起来，因而使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好关系开始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永久的不可破坏和没有人能够分离。这些条约和协定，不仅反映了1945年以来远东政治形势的根本变化，对中长铁路旅顺大连问题做了适合新形势的解决；而且经过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我国获得了伟大的盟邦无私的援助，从而可以放手地进行祖国的国防、经济与文化事业的建设。而尤其重要的是中苏两大国七亿人民的同盟，以自己的无敌和正义，就完全足以保证远东与世界和平民主的胜利。

因此，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曾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亚洲人民以及全世界的正义人类，获得了一致的欢呼和感谢。特别是我旅大人民，感念几年来身受苏联同志热情友谊的帮助，对于中苏新约的缔结，更加欢欣鼓舞。

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的过去一年中，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在盟邦苏联的帮助之下，已获得辉煌的成就：我们解放了除台湾西藏之外的全部国土；恢复和重点发展了经济文化事业；整顿了财经，稳定了物价，平衡了收支，使经济情况获得初步的好转；在广大人口的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特别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开始以后，全国人民卷入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反帝的新高潮，其影响之深，规模之广，动员力量之雄厚，更为历史上所仅见。在这一全国人民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高潮的基础之上，我英勇无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助朝鲜人民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了有世界与历史意义的胜利，使穷凶极恶而又外强中干的美帝国主义遭受了世界性的无可挽救的败北。我国的国际地位已空前提高，人们已经无可怀疑地认识到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与思想力量之一。这一切，都用事实证明了，在有了苏联盟邦的援助之后，我们伟大祖国的发展和壮大是何等迅速；中苏紧密团结“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一条）是何等必要，何等重要；中苏两大民族的友好合作给予世界形势、两大阵营力量对比以何等深刻的影响。证明了中苏两大国 7 亿人民的同盟是历史上仅有的真正无敌的同盟；证明了两位伟大领袖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的远见和英明；证明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伟大意义——这一伟大意义并将历久而弥彰。

今天，美帝国主义在它遭受了惨败之后，又加紧阴谋对日片面媾和积极武装日本，企图扶植日本侵略势力东山再起，作它侵略中国、亚洲和苏联的帮凶。这一阴谋行动，是与中国人民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战争中的惨重牺牲和重大作用完全不能相容；与苏联盟邦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事业上的决定性的贡献完全不能相容；与

国际间历次的庄严协议完全不能相容；是侵略中国，毁灭日本及日本人民与危害整个东方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制止日本重新侵略，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主要内容之一，我旅大人民曾于40余年间身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统治，创痛钜深记忆犹新，因此，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我们要和全国人民，全亚洲人民，苏联人民，全世界人民一道，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一罪恶阴谋，争取公正的全面的对日和约，从而促进日本的非军国主义化与民主化。同时并要坚决反对美国蓄意扩大战争操纵联合国通过的诬蔑我国的反动无聊的非法决议；加深和扩大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以使美帝国主义的罪恶阴谋与侵略计划遭受彻底的完全的最后的破产。

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特别不能不使我们再次回忆起五年多来苏联同志在旅大给我们的兄弟般的帮助。旅大人民，40余年来，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统治，只是由于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英勇苏军最后击溃了日本帝国主义，才获得了解放。解放初期，在复杂和紊乱的情况中，苏联同志帮助我们顺利地进行了工业的接收、看管和整理工作，并在主要的一部分企业中，以临时代管和租用以及中苏合营的方式替我们管理和恢复生产。在工业开始恢复之时，由于美蒋匪帮的罪恶封锁，原料燃料和销路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工业几乎处于瘫痪的境地，而人民亦过着极端困苦的生活。苏联同志，多方设法，替我们解决原料燃料销路和粮食问题，因而给旅大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前提，并使旅大人民得以自己的勇敢勤劳克服当时严重的障碍，渡过难关。在工业开始走上发展的道路以后，我们最感困难的是干部、技术和经营管理问题，对此，苏联同志亦给了我们具有决定意义的帮助。他们的最好的教师和朋友的精神，谆谆教导，诲人不倦，给我们源源不断的培养了各种干部，并耐心地教导我们的工厂企业干部以经营管理的先进经验；使我们逐渐地懂得了一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知识；使

旅大工业获得了可观的发展,对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和国家经济建设事业尽了应有的贡献。五年多来,苏联同志,远离祖国,为中国人民的事业,为国际主义的事业,在这里,不辞一切劳苦,克服各种困难,认真负责,积极努力,与旅大人民亲如兄弟,团结得像一个和睦家庭一样的热诚相助。他们的崇高国际主义精神,对各个阶层,在各个角落,都已留下深刻的不可磨灭的记忆。如苏军以战马帮助我们农民春耕,战士帮助我农民秋收,中苏医院列宾大夫给中国学生纪素颜输血,中长铁路大连机务段李索夫同志把普通的女工田桂英等同志培养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女火车司机等,皆已在旅大人民中脍炙人口,家喻户晓。而这不过是苏联同志以国际主义精神帮助我们的千万动人事迹中的个别范例。正是由于这种崇高的忘我的国际主义的帮助,才使我们不仅在经济建设上得到顺利发展,而且其他一切文化社会等建设事业也在日新月异地前进。去年苏联政府、苏联同志更最准确地履行条约,把历年来临时代管和租用与合营的工厂企业,全部完整的,修整得焕然一新的,无偿的交还我国政府。接交过程中,在工厂企业中工作的苏联同志有的竟至废寝忘食地紧张工作,终使接交工作美满完成。5年来,在与苏联同志相处的过程中,我们深切体会了苏维埃人民高尚的道德风貌,体会了斯大林同志和苏联政府与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兄弟般的热情和友谊,体会了中苏友好合作的伟大意义,体会了向苏联学习的伟大意义。5年的友好相处,已使旅大人民对苏联同志产生了深厚的热爱和说不尽的由衷的感谢。他们的伟大友谊与国际主义精神将使我们永不忘怀。

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我们应该深刻记取并十分珍贵5年多来苏联同志给我们的各种友谊的帮助,让我们继续和加速学习苏联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经验,提高自己,管好企业,办好建设,以达成我们“巩固国防,发展生产,培养干部,普及文化”的光荣任务。

最后让我们欢呼：

中苏永久友好与永久合作万岁！

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世界人民领袖，中国人民的挚友斯大林同志万岁！

（本文刊登于 1951 年 2 月 14 日《旅大人民日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与苏联政府的谈判的中苏公报

(1952年9月15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维·斯大林、苏联外交部部长安·扬·维辛斯基、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巴·尼·库米金一方，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率领并包括政务院副总理陈云、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张闻天、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粟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一方之间，最近在莫斯科举行了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讨论了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两国关系的重要政治与经济问题。谈判是在友好的互相谅解和诚恳之气氛中进行的，这次谈判证明了双方都决心努力使两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同时用一切办法维护和巩固和平与国际安全。

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同意着手进行各种措施，以便苏联政府在1955年底以前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铁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归其所有。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和苏联外交部部长安·扬·维辛斯基已就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问题互换照会。

关于大力开展中苏友好 月工作的指示

——旅大委字第八号

1952年10月30日

中央决定从11月7日至12月6日在全国举行“中苏友好月”，这对进一步发展与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创造国际和平条件、保证远东与世界和平及保证与加速我国建设，均有重大的意义。而通过“中苏友好月”的活动，在旅大市广大干部与群众中，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思想教育；提高干部、群众对加强中苏友好团结，对巩固国防、保卫旅顺海军基地与全面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和增产节约计划，则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因此，必须：

一、各级党委应切实按市委宣传部“关于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5周年及开展（中苏友好月）宣传教育工作计划”内容，首先各级负责干部给本单位作报告，并将机关的负责干部，党的报告员、宣传员分配到工厂企业、学校、农村及街道，根据群众的具体思想情况与生产、工作和学习情况，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形式、方法，进行生动活泼、深入人心的宣传教育工作，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务使每人均受到关于中苏友好的教育，关于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精神的教育，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以便把干部和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一步。

二、通过“中苏友好月”的政治宣传，进一步教育广大干部与群众，以高度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全力协助苏军共同保证旅

顺海军基地,深刻检查和彻底改变某些对中苏友好认识不够的缺点,并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彻底解决本单位在目前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的主要关键问题,加强向苏学习,坚决保证全面完成国家生产计划与增产节约计划。

三、关于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35 周年及“中苏友好月”的活动,统按市委宣传部的计划执行。

中共旅大市委员会

庆祝苏联建军三十五周年

《人民日报》社论

今天——2月23日是苏联军队35周年建军节，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的进步人民都在热烈地衷心地祝贺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节日。35年来，苏联军队经历了光荣的战斗道路。当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冲破了资本主义的战线，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苏联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就极力想以武力的进攻来推翻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政权；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新型的红军，克服了巨大的困难，以无比的英勇，粉碎了国内反动势力的叛乱和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铺平了苏联人民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横行西欧各国的德国法西斯，挟其精锐主力及其欧洲附庸国的军队，背信弃义地突然向苏联进攻，侵占了苏联许多国土，并一直逼近了莫斯科。当时，世界各国的人民都曾十分关注这种严重形势，而那些对苏联抱有敌意的帝国主义者却欣然以为苏联的末日到了；但战争的结局却以帝国主义者幻想的彻底破灭而告终了。苏联军队在伟大的天才统帅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歼灭了法西斯德国及其附庸国军队1000万人，收复了全部被侵略的国土，并解放了法西斯奴役下的欧洲人民。苏联军队在彻底击败了法西斯德国以后，又挥戈东向，消灭了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精锐——关东军，帮助我国人民解放了东北地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帮助朝鲜的人民解放了朝鲜北部领土，使朝鲜人民走上独立解放的道路，并从而迫使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经历了最

大的困难,对世界人类作了极其光辉的贡献。

苏联军队是苏联人民幸福生活的保卫者,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和平生活的维护者;所以苏联军队受到了苏联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竭诚的爱戴和拥护。全世界先进人类都认识到:苏联军队的强大不但是苏联的利益,而且是全人类的利益。斯大林同志在庆祝苏联军队诞生 10 周年的时候,曾经指出:“我们红军的第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在于它是已经获得解放的工农群众的军队,是十月革命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军队。”“我们红军的第二个特点,就在于它是巩固我国各民族彼此间是兄弟友谊关系的军队,是解放我国先前各被压迫民族的军队,是保卫我国各民族自由独立的军队。”“最后,就要说到红军的第三个特点。这个特点就在于我们军队中培养和巩固着的是国际主义精神,我们全部红军都浸透着国际主义精神。”这就是苏联军队战无不胜的根本原因。

苏联军队是以先进的军事科学武装起来的。斯大林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和军队的学说,并吸取了历史上军事艺术中一切优秀的成分,以不可超越的科学的深刻性,对现代战争取得胜利的一切问题,都给了科学的完满的解决。它是最先进的军事科学,是胜利的军事科学,任何资产阶级的军事科学都无法和它相比拟。曾使西欧许多国家的军队望风披靡的法西斯军队,却被苏联军队彻底粉碎了,这就是无可辩驳的铁证,击败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就是苏联军事科学的胜利。

苏联军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榜样和亲密战友。在解放了中国的东北地区以后,苏联军队又根据 1950 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 1952 年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驻防旅顺口,和我国人民解放军共同保卫远东战略要地的安全,共同为防止日本或其他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的重新侵略而努力。毛泽东同志在 1952 年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7 周年致斯大林同志

的贺电中说：“现在，当着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日本侵略势力又重新抬头的时候，中国与苏联的牢不可破的友好同盟是共同制止日本和其他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保卫东方与世界和平的有力保证。”斯大林同志在致毛泽东同志的贺电中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伟大友谊是反对新侵略威胁的可靠保证，是远东及全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苏联军队的驻防旅顺口，正是中苏两国伟大同盟的集中的表现。全中国人民对于远离祖国来到中国担任防务的苏联军队都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与强大无敌的苏联军队并肩立于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最前列而感到无比的骄傲。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以高度的热情学习苏联军队的优良的政治品质、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学习他们的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军事指挥艺术以及各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学习他们的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以及各种先进的制度和作风，以加速达到现代化的水平。保证这个学习的成功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前最重大的任务。

（本文刊登于 1953 年 2 月 23 日《旅大人民日报》）

周总理率领慰问苏军代表团到达旅大 举行庆祝苏联建军节慰问苏军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代表团团长、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在苏联建军节35周年前夕——2月22日乘飞机到达旅大市。同来的有代表团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

同机抵达旅大市的有苏联驻我国特命全权大使潘友新。

到机场欢迎的有苏军驻旅顺口部队的高级将领。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旅大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国共产党旅大市委员会书记欧阳钦，中国共产党旅大市委员会第二书记陈伯村，旅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林、乔传珏，旅大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孔辉林等。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苏联驻旅大市总领事莫罗佐夫。

周总理抵达旅大时，受到驻旅顺口地区苏军的热烈欢迎。机场上悬挂了苏中两国国旗和斯大林、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周总理下机后，乐队高奏中苏两国国歌。周总理检阅了苏军仪仗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代表团随带有5个文艺工作团。这些文艺工作团从22日起，就分别在旅顺口地区苏军防地作慰问演出。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代表团22日下午在旅大市隆重举行庆祝苏联建军35周年慰问驻旅顺口

地区苏军部队大会。

大会主席台上庄严地悬挂着斯大林主席、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和中苏两国国旗。会场建筑物四周挂着说明中苏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大幅红布标语。

大会主席团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代表团团长、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代表团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苏联驻我国大使潘友新，苏联驻旅顺口地区部队高级将领，旅大市人民政府市长，以及旅大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苏联驻旅大市总领事等。

出席大会的苏联方面人士，有苏军驻旅顺口地区部队各级军官和战士代表；中国方面，有旅大市各机关、部队的干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代表，模范劳动者，文化界人士等；共 1500 多人。

大会在乐队高奏苏中两国国歌声中开始。

当主席团就位时，全体到会者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并一致起立致敬。

大会由肖华副主任主持并致开会词。

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首先讲话（讲词全文另发）。

潘友新大使和驻旅顺口地区苏军指挥官也在会上相继讲了话。

这些充分显示中苏两大强国的永久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共同保卫远东与世界和平决心的讲话，都一再受到到会者的欢呼和热烈的掌声。

代表团在庆祝大会上向苏军部队献礼。并举行授旗与授纪念章的仪式。周恩来总理在乐声中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将锦旗授给驻旅顺口地区的苏军指挥官，并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将中苏友谊纪念章授给苏军将士。

毛泽东主席署名的锦旗上缀着：“伟大的苏中两国人民及其武装力量的亲密团结是远东及世界和平的可靠保障”。

大会一直在极为热烈友好的空气中进行，全体到会者在大会进行时间内，曾不断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毛泽东！”

大会最后由 20 个年青的中国女文艺工作者向苏军将士献花。

大会后，周恩来总理在下午 6 时，接着举行盛大的招待会，招待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高级将领，和苏军部队各级军官以及战士代表。潘友新大使和苏联驻旅大市总领事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招待会上作陪的有：旅大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国共产党旅大市委员会书记欧阳钦，中国共产党旅大市委员会第二书记陈伯村，旅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旅大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乔传珏以及各界人士等。

与招待会同时，驻旅顺口地区的苏军部队，分别在 4 处举行庆祝大会，庆祝苏联建军 35 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代表团代表肖劲光、刘亚楼、肖华、伍修权曾分别参加了这 4 个庆祝会，进行慰问。

晚间，我中央人民政府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代表团所带领的 5 个文艺工作团，分别在 5 处举行戏剧、音乐、舞蹈表演会，慰问苏军部队。

（本文摘自 1953 年 2 月 22 日《旅大人民日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代表团团长、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在庆祝苏联建军三十五周年、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大会上的讲话

大使同志、战士和士官同志们！军官和将军同志们！

在伟大的苏联建军 35 周年纪念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向英勇无敌的苏联军队致以热烈的祝贺，向苏联军队的缔造者——伟大的斯大林大元帅表示深切的敬意。

中国人民曾经以十分关切的心情注视着苏联军队所走过的艰辛的、英勇的、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道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英勇的苏联军队在天才的统帅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经过 4 年的血战，终于消灭了资本主义世界中最精锐的纳粹军队及其附庸国的军队，解放了在希特勒匪帮蹂躏下的东南欧国家和人民，从而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曾经大大地鼓舞了当时艰苦斗争中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苏联军队在粉碎了法西斯德国的军事力量后，紧接着又以雷霆万钧之势，挥戈东向，在中国的东北境内，一举歼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精锐——关东军，这样就促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也就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彻底胜利。苏联军队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中国人

民将永志不忘。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使中苏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1950年2月，在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倡议和主持之下，伟大的中苏两国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他有关协定。自此以后，苏联军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在“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的任务中，联结在一起了。同志们！3年来，你们远离祖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起，捍卫着中国和远东的和平与安全，中国人民深深地感谢你们这种大公无私、见义勇为的伟大合作和援助。为此，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特派我们组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前来旅顺口地区，向你们——英勇的苏联军队同志们，表示真诚的感谢和亲切的慰问。

现在美国侵略者正在企图延长和扩大朝鲜战争。侵朝的美国空军还在继续不断地袭扰中国的东北，派遣特务飞机侵入中国东北领空进行战略侦察，并向中朝人民继续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争。美国侵略军还继续侵占着台湾，并正在指使和协助蒋介石残余匪帮企图对中国进行扰乱。因此，毛泽东同志指出：“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加强。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在美国侵略者的操纵下，日本吉田政府一直拒绝缔结全面和约并与美国以及其他若干国家缔结了片面和约；美国侵略者利用这一片面和约及随后与日本吉田政府所签订的各项有关协定，正在加紧复活日本的军国主义，要使日本完全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殖民地。美国政府这种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严重地威胁着中国和远东的和平与安全。有鉴于这一新的形势的发生，1952年9

月 15 日，中苏两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提议，就决定将中苏关于旅顺口协定第二条中规定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的期限予以延长，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和苏联与日本之间的和约获致缔结时为止。

大家都知道，旅顺口地区在历史上是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东北的桥头堡，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在目前的形势下，苏联军队驻在旅顺口地区，对于制止和打击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略阴谋，就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英勇的苏联军队同志们！你们是伟大的苏联人民的优秀的子弟，你们是伟大的斯大林同志教养出来的战士，你们勇敢地担负了、今后仍将勇敢地担负起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的重大责任。中国人民钦佩和感谢你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都钦佩和感谢你们。

斯大林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周年纪念日致毛泽东同志的电文中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伟大友谊是反对新侵略威胁的可靠保证，是远东及全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这个真理，对于苏联军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特殊现实的意义。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与苏联军队并肩携手，光荣地担负起我们共同的历史使命。我们深信，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和军队，一定能够在这个共同斗争中胜利地完成任务。

正如苏联军队一样，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是浸透着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来就是以向苏联军队学习为荣的。苏联建军的各项宝贵经验，就是中国建军的重要的榜样。由于学习苏联的结果，中国人民解放军最近 3 年以来，在编制、装备、技术、训练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苏联的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注意。斯大林同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经济著作，和在苏联共产党第 19 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全军都在热烈地学习着。

从今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进入大规模的计划建设的时期。为了把国家建设工作做好，中国人民认为，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把虚心学习和运用苏联的先进经验看作是推进我们国家建设工作的首要工作之一。在毛泽东同志这个英明的号召之下，配合着国家大规模建设的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最近已经掀起了一个认真学习苏联的热潮。全军都下了最大决心，要更加努力学习苏联军队学习，加强国防建设，充实现代装备，改进编制制度，提高各种训练，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我相信，在苏联援助和苏联先进经验的照耀下，中国的国防建设将随着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一天一天的走向成功。

英勇的苏联军队万岁！

伟大的中苏两国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中国人民最敬爱的朋友、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和导师、全世界和平的旗手、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万岁！

（本文摘自 1953 年 2 月 22 日《旅大人民日报》）

巩固中苏友好合作关系，全力协同 苏军巩固旅顺口海军根据地

——旅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李林

当苏联建军 35 周年的时候，我们向解放我们、并在解放后保卫我们、积极地帮助我们在各方面建设上都获得伟大成就的苏军致敬。向苏军的伟大的领导者、世界人民的革命导师、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斯大林大元帅致以衷心的感谢和敬意。苏联军队是一支工农的军队，是具有高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军队。因此，它能够在苏联国内战争和外国军事干涉时期的艰难岁月里，彻底粉碎了装备和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英、法、日、美等 14 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干涉军队和他们所支持的邓尼金、高尔察克、克拉斯诺夫等匪徒；它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在西方彻底消灭了资本主义世界中最精锐的纳粹军队及其附庸军 1000 万人，解放了东南欧各国人民，在东方一举歼灭日本帝国主义的精锐关东军，解放了我国的东北，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军这些卓绝的功勋和对于全世界人民最伟大的贡献，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歌颂。特别我们中国人民，对此将永志不忘！

近 7 万万人口的中苏两国的兄弟同盟是不断发展和牢不可破的。1952 年 9 月 15 日，我国政府鉴于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对于中国和远东的和平与安全所造成的严重威胁，向苏联政府提议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并得到苏联政府的同意，证明了苏联对于一切有利于东方与世界和平的责任都是勇于担负的。中国与苏联这种牢不可破的友好同盟“是共同制止日本和其

他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保卫东方与世界和平的有力保证”（见1952年9月3日毛泽东主席为庆贺抗日战争胜利7周年致斯大林大元帅贺电）。它不但有利于中苏两国的安全，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中苏两国间无私的友谊和日益强大的力量，一定要使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一切冒险计划都被打碎。

我们旅大在保卫祖国安全、保卫远东与世界和平的事业上，居于极端重要的地位。因此，巩固中苏友好合作关系，全力协同苏军巩固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在旅大工作中有头等重要的政治意义。毛主席在2月7日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指示：“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确立中苏永久合作的观念，在各个方面都用心学习苏联经验，加强结合实际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进一步密切中苏友好合作关系，主动地以全力协同苏军巩固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以牢固地保卫东方和世界的和平。

向驻在旅顺口地区的苏军部队将士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世界和平的有力保证、中苏两大国牢不可破的友好同盟万岁！

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万岁！

中国人民最敬爱的朋友、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万岁！

（本文发表于1953年2月23日《旅大人民日报》）

中苏关于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 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 该根据地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 全支配的联合公报

(1954年10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联政府鉴于朝鲜战争停止和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以来远东国际形势所起的变化，并且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力量的巩固和根据两国间已经建立的日趋巩固的友好合作关系，现议定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有关苏联军队撤退并将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措施的进行，双方议定交由根据1950年2月14日的协定而组成的旅顺口中苏联合委员会负责。

苏联军队的撤退和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地区的设备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

苏方：尼·谢·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尼·亚·布尔加宁（苏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伊·米高扬（苏部长会议副主席）尼·米·什维尔尼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费·亚历山德罗夫（苏文化部长）德·特·谢皮洛夫（苏《真理报》总编辑）

中方：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毛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参加了会谈。

在旅大市各界人民欢送驻旅顺口地区 苏军回国大会上郭述申同志的讲话

亲爱的苏军将士同志们，各界同胞们：

今天，我们旅大市各界人民，怀着无限感激和惜别的心情，在这里集会欢送驻旅顺口地区苏军撤退回国。我谨代表旅大全体人民，向苏军部队全体将士——我们旅大人民的解放者和亲密的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苏联军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军队，也是世界上第一支劳动人民的军队。它以自己的光荣战争经历向全世界证明：强大的和久经考验的苏联军队，不仅是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坚强保卫者，而且是捍卫世界和平和人类正义事业不可战胜的力量。

10年前，我们旅大人民以空前未有的狂欢，迎接了自己的解放者。英勇的苏军在击溃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之后，又转向东方，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的精锐——关东军，解放了我国东北，使得深爱日本帝国主义40年奴役和压迫的旅大人民，获得了自由和解放。苏联军队为保卫世界和平、维护人类自由的神圣事业，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从而在人类历史上树立了不朽的功绩。

旅大解放后，英勇的苏军驻防旅顺口地区，对保卫我国安全、保卫远东与世界和平作了伟大的贡献。同时，对于我们旅大人民也给予了始终如一的热诚的关怀与援助。旅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曾同苏军患难相共，度过了艰苦的岁月。全国解放后，旅大人民又得到苏军兄弟般的热情的帮助，恢复和发展了经济建

设事业，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10年来的任何时候，苏军都向我们伸出友谊援助之手；在旅大无论是城市或农村、工厂或学校，到处都传颂着中苏友谊的事迹。苏联军队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充分地体现了苏联人民对我国人民的真挚感情和深厚友谊，它使我们曾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殖民地统治的旅大人民，受到了极其深刻和实际的国际主义教育。我们旅大人民怀着对苏军的深厚友情和感激，也像热爱自己的子弟兵一样热爱苏军，竭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帮助和支援苏军。我们一直把苏军看作是苏联人民伟大友谊的使者，看作是保卫自己和平劳动的忠诚的朋友。英勇的苏军为解放东北和驻防旅顺口10年中所给予旅大人民的伟大的友谊援助，我们将永志不忘。

我们中国人民都以有苏联人民这种忠诚的朋友而感到自豪。旅大人民又能与苏军10年朝夕相处，这使我们更加感到难能可贵。现在，当着你们完成了自己的光荣使命就要离开我们国家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难以言语形容的留恋之情。亲爱的同志们，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着你们。虽然你们离开了我们国家，但我的心将永远联结在一起；中苏两国人民在为共同事业的斗争中所结成的深厚友谊，将世代相传，万古长青。

旅大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像爱护自己眼珠般地珍贵我们同苏联人民的友谊。我们每一个人都深切地认识：当前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沿着苏联人民所走过的光荣道路，向着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努力迈进的时候，尤其是当着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积极准备发动新战争的时候，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和密切合作，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为了保卫祖国的安全与远东的和平，我们旅大人民在英勇的苏军撤退回国以后，一定要百倍地提高警惕，加强国防观念，努力向苏联学习，积极参加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建设。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千锤百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继续承担起你们所担负的光荣事业。我们旅大人民决心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团结一致，以全力来巩固旅顺口海军根据地。

我国人民时刻警惕着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并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和决心完成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任务。中国人民为反抗侵略、保卫和平的斗争得到了苏联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略阴谋注定要遭到彻底失败。正如我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所说的：“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中苏两国的伟大合作下，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没有不能被粉碎的。它们一定要被彻底粉碎。只要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和全世界人民就一定要将它们从地球上消灭干净！”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两国人民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和斗争目标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在一起的。我们的团结和友谊是任何人都拆不散的，我们的力量是任何人都攻不破的。为了我们两国繁荣幸福，为了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我们两国人民将永远并肩前进！

亲爱的同志们，当我们即将分别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你们回国以后，把中国人民最崇高的敬意转达给伟大的苏联人民，愿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成就！

光荣归于世界和平的坚强保卫者——英雄的苏联军队！

中苏两国人民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1955年5月8日

在旅大市各界人民欢送驻旅顺口地区苏军回国大会上苏军代表的讲话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请允许我代表苏军士兵、士官、军官和军人家属由衷地感谢你们，并通过你们感谢全中国人民对我们的热情的鼓励和极良好的期望。

同志们！

根据我们两国政府去年10月所通过的决议，苏军将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回国。这个地区的一切设备将无偿地全部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亲爱的朋友们，不久，我们就要离开好客的中国土地，和你们分别了。

苏军驻守旅顺口地区，保卫着我们两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已经快10年了。我们每一个士兵与军官都以能够来完成这一光荣的崇高的任务，感到十分光荣和自豪。这些年来，我们时时刻刻都感到你们对我们的爱戴、尊敬与温暖和全中国人民对我们的父母般的关怀。

今天，在和你们告别的时候，我们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对我们苏联军人无微不至的关怀。

我们每一个苏联人都深深地尊敬与爱戴热爱劳动的、天才的中国人民。苏联人民非常愉快地看到，在短短的期间内，中国人民沿着建设新社会的道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们认为帮助我们的朋友与弟兄——英雄的中国人民，是自己的神圣的义务和兄

弟之间的责任。

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已经5年多了，在这5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同盟已经变成一支史无前例的强大力量。

我们的友谊之所以强大，是因为这个友谊团结着两个富有伟大生命力的兄弟人民。我们的友谊被中苏两国战士在反对帝国主义日本的战场上所流的鲜血凝结了起来。

现在，当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正在疯狂地准备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这种友谊就更加具有无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美帝国主义不顾人民生活中的历史变化，恬不知耻地干涉着他国内政，进行各种挑衅，对爱好和平的国家进行直接的侵略行动，使国际局势尖锐化。

由于西方列强的国会批准了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巴黎协定，从而加剧了新战争的威胁。

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都奉行着爱好和平的政策。我们不威胁任何人，也不准备进攻任何人。我们认为两个体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能够长期和平共处，而不作战。我们所特别关怀的与希望的是世界人民和平友好相处。我们为和平、为国际安全而进行的正义的斗争，得到了世界上一切纯朴的人们热烈的支持。在这一斗争中亚洲人民显示了自己的强大力量。4月间，在德里召开的亚洲国家会议和在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会议，都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亚洲国家人民对保卫和平与争取民族独立的坚强决心。

今天，我们可以满怀信心的说，在英雄的中国人民争取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的任何黑暗势力，都不能阻挡亚洲人民所掀起的复兴运动的伟大进程。

然而，帝国主义者不顾亚洲人民生活中的这些变化，他们继续公开地反对亚洲的民主国家，妄图把它们的发展推向后去。

早在1950年，美国帝国主义者就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在这些岛屿上豢养着从中国大陆上被赶走的蒋介石卖国集团，并不断向中国人民进行挑衅活动。

美帝国主义用氢武器和原子战争来威胁和平，用“世界文明的毁灭”来恫吓爱好和平的人民。

看来，帝国主义者真的认为越威胁我们，也就越能把我们吓倒。

他们大错而特错了。我们有着健康的神经、钢铁的意志和大力士般的雄厚力量。不久前的历史教训——希特勒侵略者的下场与美国干涉者在朝鲜的命运——是这一事实的有力证明。很明显，战争贩子们的新的阴谋必然遭到失败。

我们两国人民现在和将来都将竭尽全力制止新战争。但是战争贩子们必须知道，如果他们竟敢把新战争强加于人类的头上，那么，他们的下场将是极其悲惨的。

以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比反动与战争阵营的力量无比强大。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也相信我们选择的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正确道路。

目前，国际舞台上形成的力量的对比关系是这样的：如果帝国主义者得以挑起新的世界战争，那么，这次战争中的胜利者必定是人民。在战争中灭亡的不是“世界文明”，而是腐朽透顶的、衰亡的资本主义体系。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伟大列宁的指示：资本主义在自己灭亡的时候，还会给人民带来意料不到的灾难，资本主义随时都能造下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来延缓自己的灭亡。我们不能不估计到这一点，不能不采取措施，来保证我们国家的安全。

不断巩固我们两国的国防，加强我们边疆安全的可靠保证、远东及世界和平的强大支柱——我们两国的武装力量是我们的神圣的义务。

亲爱的同志们：

在把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防务交给我们的战友，人民解放军战士的时候，苏联军人完全相信，你们能够警惕地保卫自己祖国的和平与安全，不使任何敌人破坏你们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的劳动。

我们从心里祝福你们在这一崇高的事业中，获得光辉的成就。

今天，要和你们分别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郑重地声明，伟大的中国人民完全可以信任我们。我们的友谊永远把我们连结在一起，中国人民永远会得到我们苏联人民的兄弟般的无私的援助。

离开你们美好国家之后，我们将永远怀念你们。我们将怀着深厚的敬意与温暖的心情，回忆我们在中国土地上驻军的岁月，回忆中国人民对我们苏联军人的友好与爱戴。我们将把所有这些事例一一转告我们全体苏联人民。

请让我们再一次从俄罗斯人的心坎里来感谢你们，并通过你们感谢 6 万万中国人民对我们苏联人民，对英勇的苏联军人的深切的关怀和手足之情。

我们从心里希望你们，亲爱的朋友们，在变自己的祖国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伟大事业中，获得新的成就。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使中国人民离开自己已经选定的道路。

苏中两国人民及其强大的军队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1955 年 5 月 8 日

中苏关于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 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 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联合公报

(1955年5月25日)

根据1950年2月14日中苏关于旅顺口的协定，并根据1954年10月12日中苏关于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已将它的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已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完全接管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和该地区的设备。

根据1950年2月14日的协定组成的旅顺口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已于1955年5月24日，就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宜，签署了最后议定书。

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实现有关苏联军队撤退并将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各种措施的工作，是在彼此完全谅解和友好合作的空气中进行的。

中共旅大市委关于欢送苏军回国 活动的报告（摘要）

一、为增进中苏友谊，在2月间（1955年），苏联驻军组织了8个报告团，分别向我市人民作报告。

2月中旬，组织全市教师听取苏军关于“国民教育工作的报告”。

2月中旬，组织全市医生听取苏军关于“苏联的先进医疗经验的报告”。

2月20日，组织全市青年团干部听取苏军关于“苏联共青团工作的报告”。

2月下旬，组织全市工农商教学兵听取“苏军是人类解放者的军队报告”。

与此同时，组织全市人民观看苏联影片、举行中苏联欢会、组织群众参加庆祝苏军建军等活动。

二、3、4月间，对口组织中苏联欢活动。在纪念“三·八”节时，市妇联组织中苏妇女联欢会。教育局举行中苏教师、学生联欢会。团市委组织中苏少先队员、辅导员联欢会。卫生局组织中苏医务工作者联欢会。文化局组织中苏文化工作者联欢会。

三、为庆祝苏军建军××周年，中央派出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慰问团，于1955年2月21日抵连。为欢迎代表团，全市张灯结彩、挂旗。参加欢迎的有：辽宁省长杜者衡，旅大市委书记郭述申，市长宋黎，中苏联合委员会委员肖劲光、邓华、曾绍山。空军军长刘丰，政委粟在山。还有苏军将领。22日下午，在市人民文化俱乐部举行慰问苏军大会。23日下午在旅顺举行中苏友谊

塔奠基典礼。

四、从3月8日开始，苏军分别从旅顺口、金县等地撤退回国。3月23日至4月6日，国务院派遣了35名报告员（包括干部、劳模、战斗英雄），其中有：全国闻名的山西劳模李顺达、鞍钢劳模王崇伦、空军英雄王海、志愿军英雄赵仁虎等来大连，向驻旅顺口地区苏军士兵、军官、家属进行有关我国各方面建设及英雄事迹的报告。共进行了157场报告，听众约4.7万人。每场报告均受到苏军的欢迎。特别是战斗英雄的报告颇受欢迎，报告完后，全体官兵起立长时间的高呼“乌拉！乌拉！乌拉！”

五、5月7日下午，在斯大林广场举行苏军烈士纪念塔落成典礼，市党政群机关和三兵团指战员及苏军官兵，共计1万人参加。旅大市市长宋黎、三兵团司令员曾绍山，驻旅顺口地区苏军代表谢苗诺夫、苏联驻大连总领事别良诺夫在会上讲了话。

六、5月8日上午，在斯大林广场召开10万人的群众大会，欢送苏军回国。中共旅大市委书记郭述申致欢送词。驻旅大部队代表曾绍山讲话。驻旅顺口地区苏军代表史维卓夫致告别词。中苏双方赠旗。

苏军阻挠国军登陆

摆在面前的三个问题 摆在我们面前的三个问题：一、我们是否可能从大连登陆；二、海运陆运的部队能否在不受袭击拦截的状态下进军；三、空运部队是否能在苏军撤退之前，到达足够维持各大城市治安的数量。

我和我的交涉对手巴佛洛夫斯基中将经过三度会谈，往复磋商，但这些问题仍然摆在我们面前。

大连不能登陆 （1945年）十月二十日，我提出大连登陆和设立航空站的问题，并提出派大连市接收委员王洽民赴当地视察；十月二十一日，他否决了我。他说：“中国军队在大连登陆，苏方不能同意，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大连是商港，如允许军队登陆，就是违反条约。前次阁下提议在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设立航空站，大连因是商港，我方不能同意，其他三处可以在苏联军队撤退前二三日设站。中国方面要派遣代表到大连视察，因为大连属于旅顺军港范围，我们也不能同意。”

大连登陆问题声明保留 我对于大连不能登陆和设立航空站的观点，声明保留；关于派遣代表到大连视察问题，我说：“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大连为自由港，旅顺是中苏两国共同使用的军港，行政权属于中国，并且有中苏两国合组军事委员会的规定，本行营当然有权派员去视察，王洽民是大连市接收委员，属于行政官吏，更没有不能去大连的理由。”

绝缘政策 我想，巴佛洛夫斯基中将认为中国须从各方面与大连绝缘的理由，连他自己也一定感觉非常勉强的。当时根据各方报告，我认为苏俄所以采取“绝缘政策”的原因，不外下列二

点：一、“南满”和大连本身的工业设备，正通过大连港运往海参崴，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二、山东沿海的匪共部队，正源源在大连登陆。这判断是对的，但不是基本的原因。后来，三十六年（1947年）六月，我奉命率视察团到旅大视察，竟遭到无礼的峻拒，未能完成任务，我才憬然于近百年以来，俄人所梦寐以求的东方不冻港——旅顺、大连，这次再度鲸吞到口，早已视为禁脔，绝不允许任何方面染指。所谓开放大连为自由港，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云云，不过是美好的谎言而已。

诱我去安东登陆 巴佛洛夫斯基中将告诉我，葫芦岛、营口可以登陆，稍迟在安东登陆亦可。我问他：“迟到什么时候，安东可以登陆。”渠称：“这一点，元帅并无指示，我个人的意思，大约在十一月上半月，可以登陆。为使贵军进驻方便，安东登陆，可以例外在苏军未撤退以前开始。”

苏军的意图引导我们在安东登陆，这样就最符合苏方的希望。因为非法武装在安东的力量比较集中，可以对国军作有效阻击，并且从安东到沈阳的交通也比较困难，万一非法武装被击败北，也可以很顺利的退到朝鲜北部苏俄占领区。这个观点，在会谈当时，是不能被了解的。

对大连问题郑重声明 对于大连问题，我不能保持缄默，在会谈后第二天，我给巴佛洛夫斯基中将一个书面照函，其中郑重声明两点：

一、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附关于大连港之协定，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苏联保证尊重中国在东三省之全部主权，视为中国之一不可分离之部分。因之，中国军队自有权在大连港登陆。关于此事正由中苏两国政府协商中。

二、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附关于大连港之协定中，指明大连在平时并不包括在基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旅顺协定之海军根据地章程效用范围之内，仅限于对日作战时，受该区域所设定

之军事统制。关于此点，本人应声明如下：日本已于九月二日投降，对日之军事行动，现已完全停止，且大连港之主权系属于中国者，故本行营认为可以派遣其代表至大连港视察，并在大连市建立中央政府之行政机构。

熊主任于十月二十一日飞往重庆请示，主要也是为大连登陆的问题。二十六日，又飞返长春。重庆外交部和苏俄大使谈大连问题，一直也谈不出结果，苏俄坚持大连的“绝缘政策”，不是任何方式的外交途径所能改变的。

我们不能消耗时间于辩论大连问题，而使东北全盘接收陷于停顿。从熊主任飞返长春之后，我们决定改变方向，先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

十月二十六日晚上，我在主任官邸邀晤巴佛洛夫斯基中将，告诉他中国军队在中苏两国政府没有商妥之前，暂时不在大连登陆，而先在营口、葫芦岛两处登陆，并且为预先明了两港的设备状况，决定在十月二十七日起，开始空中侦察，海运部队可能同时登陆。又侦察机和运输舰都是从美国方面借用的。这些决定已经由中国外交部通知苏联大使。他只表示，把这个通告，立即转报元帅。营口登陆问题，元帅如有指示，立即通知我。

（本文系董彦平 1965 年写于台湾的《苏俄据东北》一书第一编中的一部分）

国民党大连市党部的报告书

一、公开活动时期

大连市党部在日寇时代受极端之压迫始终未达成半公开阶段。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内阁虽然发表全面投降，而在连之日本宪警仍不弃甲卸兵投降，且限制我国人揭扬青天白日旗，捕拿思想犯等。自八月二十二日苏军空降部队三四百人降陆后，日人始被缴械。同时亦放弃治安警察权，然而有一部分人因自卫关系尚持有武器。当时忽有胶东八路军之帽章标示之武装团体出现，市党部受此客观条件之约束，未能正式公开。而以半公开方式调查市面情形，未几判明，所谓胶东八路军者皆系市内之劳工层之积极分子。于是党部经苏军之谅解于九月十日始行公开。公开当时之组织机构、人事及工作概况：

执行委员会（5人）。下设：总务科、组织科、宣传科、调查科、社会科。

书记长汪渔洋，男，45岁。民国二十八年奉天农业大学毕业。民国二十九年赴日本东京××研究所留学，归国后任西安中学教员。民国二十七年加入大连抗日青年会，失败。民国三十四年五月辽宁省党部派遣在大连地下工作。民国三十四年被捕入狱，民国三十五年一月释放。

二、工作概况

党部半公开当时，大连全面仍呈现混乱状态，交通、通信阻绝，街头弥漫着苏军之奸淫掠夺行为，市民携带之手表、自来水笔、自行车均属被夺去之物品，加之劳工所组织之八路横行市街，姿意鸣枪，凡山东人之私人团体皆属有荷大枪，名曰：自卫。有

掠夺者，其杀人行为无人敢问，市民于此种恐怖之下只有紧闭大门，颇愿国军早日光临。于同时有亲苏派者，乘机宣传，引青年倾向左翼，投机者积极研究马克思之学说及社会主义。

本党部有感于社会日危，急需导入正轨，是以书记长汪渔洋毅然挺见苏军警备司令官高字洛夫中将，协商维持市面及公布中苏友好条约关系，以启发民众之愚昧心理。于是得苏军之诺允，遂于报纸宣明了旅大协定及中苏友好之条约，一般知识青年一时失望多憾于国府未能将已失去之旅大主权完整收回。

市党部本身负领导市民之责任，告知旅大行政权尚属政府等等。于此情形下，经同意决于九月十日正式公开党部。

三、苏军摧残党部之经过

党部在公开活动时，对奸党方面之工作予以莫大影响。奸党由山东方面渐渐集中而欲破坏我党部，捏造玄虚，诬党部有调查苏军行动之事实，并向重庆拍电报等。同时苏军亦在拆解各工厂机械，民众请愿保护机械。书记长与邵维持会慎亭，向苏军驻连司令官中将提出要求保护机械之事，当场表面诺诺，实际对党部骤加戒心。加之奸党诬告党部，促其怀疑，意于十月十五日午后七点以召宴为名，邀党部干部人员 6 名，书记长汪渔洋、执委戚作臣、总务科长刘志霜、干事潘宝泰、文积玉、王风桐，同到苏军司令部大和旅馆办公室内。当时有高字洛夫，陪坐有苏军宪兵副官 3 名，以审问犯人态度令汪书记谈出：1. 在连做过什么工作？2. 向重庆打过几次密电？3. 有多少秘密武装兵力？4. 开过几次秘密会议？汪拒绝回答。高字洛夫令宪兵 3 名将汪等 6 人拘禁。党部亦遭其解散，汪等 12 月末获得自由。其他工作人员亦皆转入地下，由各区党部书记另行组织工作。受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营之委，组织地下军，至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中旬，其人数已达 1500 名。同时北平电台播送大连市长最近乘车赴大连接收市政，匪军听即便严加监视市民动向。我方地下工作人员也积极加强工作，不幸于

一月二十六日于大连市富久町 141 号白楼上工作中被匪掳去代理执委刘世德、汪逢玺，干事任端辰、谷世乡 4 名，并搜去许多文件及枪支。

四、现在党部活动情况

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第二次党部失败后，大连市内更进一步紧张，先后被捕同志已达四五十名，一般与党方有关系者，不与匪方合作之知识分子亦有被拘押。

苏联阻碍接收旅大 漠视中苏条约义务

外交部发表公报促苏方注意

〔本报南京 25 日电〕关于旅大接收问题之交涉经过，外交部兹于本月 25 日发表公报如下：

（一）中国政府自日本投降后，于 1945 年 10 月，着手接收东北之际，即决定派遣若干军队在大连登陆，首先接收旅大行政，据苏联政府藉口大连为一自由商港，坚决反对中国政府在大连登陆，因此，中国政府依约接收旅大行政之第一步，即遭受阻碍。查 1945 年 8 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大连为一自由商港，其意义系指过境货物得免除过境税，与中国军队之入驻大连无关，大连主权及行政之属于中国，曾经该约明白规定，中国行政权除经条约明定者外，自不受任何其他限制，该约并无限制中国军队入驻大连之任何明文，故中国政府派兵由大连登陆，决不违反中苏条约，外交部当时曾根据上项理由，对苏方之见解予以严正之驳复。

（二）当时因苏方之阻挠，中国军队未能入驻大连，旅大行政之接收遂无法进行，因当时旅大尚均在苏军占领中。自苏方拒绝中国政府军队由大连登陆后，中国共产党之武力在旅大附近迅速发展，此种武力之存在与发展，使得中国政府自陆地上接收旅大亦受重大阻碍。

（三）本年 3 月苏联曾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在旅大建立其行政政权，中国政府当经剖切声明，谓中国政府所以未能接收旅大，其

原因为以上所求之阻碍。

(四) 最近 3 个月来，外交部关于接收旅大事，曾与苏方多次交涉，苏方声明在大连及旅顺海军根据地全部区域内，无任何反中国政府之武力存在，苏方保证中国政府派往旅大行政人员之安全，并使其能自由行使职责，中国政府派往旅顺之武装警察数目及其驻扎地点由双方就地商定，至于中国政府决定派遣军队进驻旅顺海军根据地事，因依照中苏条约，该海军根据地之防护，已由中国政府委托苏联政府办理，故苏联政府表示不能同意。又关于中国之军队进驻大连事，苏方藉口以现时对日战争状态尚未结束，依照中苏条约，大连仍邀受旅顺海军根据地之军事管制，因此苏联政府认为中国军队现在不能进入大连，中国只可派警察赴旅顺大连，且须由中苏双方协定其数量与驻其地点，外交部以依照中苏条约中关于旅顺口之协定，旅顺海军根据地全部区域均为中苏“共同使用”之地区，认为中国当然有权派军队入驻旅顺军区，故对苏方认为中国军队不能驻旅顺之解释，表示不能同意。至于中国军队进驻大连事，依照中苏条约在“对日作战时”大连同受旅顺军区之管制，但日本投降已一年有余，所谓“对日作战”之事实，实际上已不存在，且即在“对日作战”时，中苏条约上亦无限制中国军队进入大连之条文，旅顺军区对大连之管制在“对日作战”时，亦仅仅以适逢中苏共同对日作战之需要为限，我国军队警察进驻大连以维护其行政之安全，即在“对日作战”时，当亦不能视为与共同对日作战之需要有何妨碍，故外交部对于苏方之见解，曾迭次以书面严正表示不能同意，并要求苏方对于中国派遣军队入驻旅大之决定，能充分谅解。盖在现时情况之下，旅大区域随时可反抗政府之武力威胁或袭击，中国政府为确保其行政人员之安全与自由，在条约上固有派遣军队之权，在实际上亦有此需要也。但苏方仍不表示同意。

(五) 我政府乃一面与苏方继续交涉，一面派遣彦平等赴旅大

视察地方情形，以为恢复旅大行政权之准备，关于派员视察一事，我方曾于事先商得苏方之同意，苏方并表示对董彦平等视察，愿予以充分之协助，使其能自由执行视察之任务，但董等抵旅顺后，因没能获得苏方予允给予之协助，并受到当地所谓地方行政机构之阻挠，其视察任务，遂未能达成，此一视察之结果，尤足证明如无足量之中国军警入驻旅大，中国行政人员将无法行使其职权。

(六) 总之旅大行政至今未能由中国政府接收，一，由于苏联政府一再拒绝中国政府军队入驻旅大；二、由于自苏方拒绝中国政府军队由大连登陆后，中国共产党在旅大附近成立甚大之武力，以阻挠中国政府之接收，中国政府于此不能不郑重唤起苏联政府对于中苏条约内次列两项条文所规定之基本义务，特予注意：①“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②“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中国政府深望苏联政府应念其上述之义务，对于条约中无明白规定之事，不曲加辩解，以破坏中国主权与行政之完整，阻挠旅大行政之接收，中国政府愿本友好精神，继续交涉，以求取彼此见解之一致。同时，中国政府愿郑重声明：中国政府派遣军警接收旅大行政之权，既无条约限制，中国政府自得随时决定行使权利。

(本文刊登于 1947 年 6 月 26 日《新闻报》)

第五部分

大 事 记

苏军进驻旅大十年大事记

(1945.8—1955.5)

1945年

2月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签订《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

4月15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向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宣布：1941年4月13日签订的《苏日和平条约》无效。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联合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8月8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宣布从8月9日起，苏联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8月9日△苏联以三个方面军上百万的兵力，越过中苏边界进入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总攻击。在中国人民的配合下，苏军仅用一周时间，便击溃日本赖以抵抗的主要力量关东军。

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还签订关于中国大连、旅顺口和长春铁路等协定及外蒙古问题的换文。

△日本政府宣布：日本天皇下诏，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天皇同意保证他的政府和天皇对参谋本部签署实现波茨坦公告的条件。

△中共胶东大连支部召开支委会，决定组织工人武装，配合苏联红军解放旅大。

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宣告无条

件投降。

△大连伪商会会长张本政等召集伪商会和伪区长开会，成立“地方自卫委员会。”苏军进驻大连后，先后改名为“中国人会”和“大连地方治安维持会”。11月，大连市政府成立后，解散了维持会。

△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派汪渔洋到大连任大连国民党市党部书记。

8月16日△中共胶东区党委派来大连作地下工作的左友文和胶东抗盟会派来大连作地下工作的张世兰、张寿山组成两支各300人的武装队伍，对外称“八路军”。苏军进连后他们多次与驻连苏军联系，希望得到苏军的支持。苏军以“大连地区不准任何党派的军队来”为由不予承认。

8月18日△苏联红军空降部队在哈尔滨机场着陆。

8月19日△苏联红军空降部队在沈阳着陆。

8月22日△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副司令伊凡诺夫中将率250名空降兵在旅顺口土城子机场着陆，并就任旅顺警备区第一任司令官。

△苏联红军雅曼诺夫少将率250名空降兵在大连周水子机场着陆，并就任大连警备区首任司令官。

△一批苏联红军乘火车抵达石河驿。下午，苏军坦克兵开进金州城，接收日伪金州警察署、民政署及其它重要部门，并在金州城内设立苏军陆军总司令部。

8月23日△日本国旗在日军驻旅顺海军司令部降落，代之升起苏联国旗。

△苏联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的坦克旅开进旅顺口。

8月24日△旅顺伪商会会长刘德智等，召集旅顺头面人物磋商，成立“旅顺地方治安维持会”。旅顺市政府成立后，解散了该维持会。

△由苏联太平洋舰队水兵组成的空降兵部队，在普列奥勃任斯基中将率领下，在旅顺降落。

8月25日△旅顺口升起苏联海军军旗。苏联水兵开始整修港口，迎接苏联海军舰队的到来。

8月26日△金州伪商会会长曹世科等成立“金州民众临时维持会”。金县县政府成立后，解散了该维持会。

△苏军驻大连警备司令官雅曼诺夫少将调离，后由高字洛夫中将接任司令官。

△苏联红军进驻旅大后，接管了各工厂，并拆走部分工厂里的重要机械设备。

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书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签字。

△唐韵超、张洛书等人筹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大连市职工总会。唐韵超被选为职工总会委员长。

9月4日△国民政府任命沈怡为大连市市长。沈怡在重庆、上海设大连市政府办事处，筹划接收大连事宜。

9月6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远东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麦列茨科夫元帅、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空军主帅诺维科夫、空军元帅胡佳科夫、炮兵元帅契斯佳科夫，以及其他将领和军官到达旅顺口。下午，苏军将领凭吊了1904年日俄战争中死去的俄国士兵墓地，并献了花圈。

9月10日△国民党大连市党部征得苏军当局同意，公开挂出牌子。此后，在全市先后建立11个国民党区分部，并委任了区分部书记。

9月24日△驻大连苏军误信维持会提供的假情报，将大连抗盟会组织的武装队伍包围在沙河口王家沟，张世兰被当场打死，队伍被解散。左友文组织的武装队伍在大连站不住脚，经貔子窝转庄河，加入东北人民自卫军辽南大队。

9月△经大连地方治安维持会提议，大连中苏友好委员会成立。中共大连市委、市政府成立后，中苏友好委员会改名为大连中苏友好协会，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组织。

10月12日△国民政府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向苏军司令部提出，国民党拟在大连设立航空站，并派接收员赴大连视察，被苏军以大连是商港为由拒绝。

10月13日△国民政府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等求见苏军总司令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提出国民党海上船运军队到东北接防，拟在大连港登陆，要求苏军提供港口情况。马利诺夫斯基答复：大连为自由港，中国军队不能由大连港登陆。

10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韩光到大连与苏军警备司令部接洽，通过会谈，苏军希望中共速派干部来连组建党政领导机构。

10月12日△韩光回沈阳向东北局汇报大连之行情况。东北局书记彭真指示，要利用苏军军管旅大的有利形势，把大连市党政警群机构的架子尽快搭起来，迅速开展工作。韩光即重返大连，着手组建大连市委。最初因干部不够，市委以“工委”名义开展工作。11月改为市委，韩光任书记。驻连苏军当局建议中共大连市委公开挂牌，市委未同意。

10月15日△苏联红军驻大连警备司令官高字洛夫面见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书记长汪渔洋等6人，宣布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为非法组织，并将汪等6人逮捕。此后，国民党在旅大地区的组织转入地下活动，组织地下武装，直至被中共取缔。

10月25日△中共大连市工委派沈涛等，以市职工总会名义开办工人训练班，培训地方干部。

10月27日△大连市各团体代表举行会议，一致同意成立大连自治政府。根据苏军当局提名，推选迟子祥为大连市市长。中共党员陈云涛以职工总会名义被提名为副市长。

10月28日△苏军驻大连警备司令官发布命令，任迟子祥为

大连市长，陈云涛为副市长。

10月30日△大连市政府机关报《新生时报》出版。

11月1日△以大连职工总会名义创办的中共大连党的机关报《人民呼声》创刊。

11月7日△大连市公安局成立，苏军驻大连警备司令官任命赵东斌为公安局局长。

11月8日△大连市政府正式成立。迟子祥、陈云涛分别任正副市长。

11月24日△中共大连市委发出《关于对待日人政策的决定》。12月1日，市政府根据市委决定，发布《对日本侨民施政细则》。

11月30日△马利诺夫斯基元帅通知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依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苏军将于12月3日撤离满州。苏军最后撤离时间是1946年4月底。

12月15日△大连中苏友好协会利用业余时间开办俄语专修学校。学校设立学习期限不等的初级、中级、高级、会话和翻译班。

1946年

1月4日△中共大连市委召开发动群众斗争会议，决定开展反奸清算斗争。这一运动至年底结束。

1月6日△市政府广场（后改称斯大林广场，现人民广场）苏联红军胜利塔建成并举行落成典礼。

1月30日△首届大连临时参议会召开会议，通过施政纲领，选举唐韵超为参议会会议长，韩光为副议长。

2月14日△苏联《消息报》发表《恢复苏联在远东的历史权利》的文章。其中说：“克里米亚会议上，签订关于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协定，规定在德国投降以后，苏联对日作战，以及保证苏

联恢复 1904 年（即日俄战争以前俄国在库页岛南部、大连、旅顺、长春铁路以及千页群岛）的权利。”

2 月 23 日△韩光、赵东斌等在《人民呼声》报上撰文，庆祝苏联建军节，赞颂苏联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伟大贡献。

3 月 8 日△大连市民主妇女建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周炎琳任主任。

4 月△大连中苏友好协会出版月刊杂志《中苏知识》，交流中苏文化，敦睦中苏友谊。

5 月△大连中苏友好协会举办为期半月的苏联红军军事艺术照片展览，纪念苏联红军战胜德国法西斯 1 周年。

6 月 1 日△《人民呼声》报改称《大连日报》。

6 月 18 日△韩光在市政府礼堂作形势报告，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内战的行径。

6 月 23 日△中共大连市委划归中共辽东省委领导。7 月，中共大连市改称中共旅大地委。

6 月 26 日△中共大连市委发出《关于扩军工作的指示》，决定从工农及学生和公安干警中选派 2000 人参军，支援前线。

7 月△苏军驻大连警备司令官高字洛夫中将调离，克章诺夫少将接任司令官。1949 年，格里果夫少将接任司令官。

8 月 14 日△驻大连苏军当局创办中文报纸《实话报》，介绍苏联各方面情况，反映旅大地区的民主建设，宣传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

9 月 3 日△斯大林发布 41 号命令：“为表示庆祝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节日，我命令今日在我祖国京城莫斯科和加盟共和国京城，以及伯力、海参崴、旅顺等地齐放礼炮 24 响，为祖国的光荣及胜利而斗争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9 月 29 日△旅顺、大连、金县各机关团体代表在大连举行会议，成立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并选举了行政委员。10 月 3 日，行

政联合办事处举行首次会议，选举迟子祥、刘辛垣（刘顺元）为办事处正副主任。

9月△东北军区后勤司令肖劲光来大连筹建兵工厂，并向中共中央作了大连情况的报告。11月，中共中央向各战略区发出指示，要求尽快抽调干部到大连采购转运军需物资和组织军工生产。之后，华东的曹鲁、晋察冀的江泽民、华北的李竹平、胶东的刘振、东北的张珍等先后来连。

△中共辽东省委指示旅大地委：不要强调特殊，要经过适当的方式，实现“五四”土地改革的指示。这一指示后被中共辽东省委书记肖华制止。

10月19日△国民党驻东北军队集中9个师约10万兵力，分3路向南满进犯，并对大连实行海陆封锁。旅大人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期间，驻旅大苏军当局从符拉迪沃斯托克通过海路，经过朝鲜向大连运送大批粮食，并帮助中共旅大地委从北满运输粮食、燃料等。

10月3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撤销辽东省委，成立东北局南满分局，辖辽宁、安东（丹东）、辽南省委和旅大地委。

11月1日△陈云任南满分局书记，肖华为副书记，江华等为分局委员。

1947年

1月11日△国民政府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抵京向蒋介石请示大连问题。

2月25日△中共旅大地委发出《关于扩军扩警工作指示》，指出为有力地支援前线，打垮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扩军扩警已成为全党的紧急任务。

4月3日△国民党军队攻占普兰店时，由国民政府任命为大连市长的沈怡也随军达普兰店，试图接收旅大。苏军为防止国民

党插手旅大，向中共旅大地委提出要抓紧成立全旅大地区的政权机构。为此，在旅顺召开了旅大地区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成立关东公署的决议，（之后，中共旅大地委一度也称中共关东地委）。选举迟子祥为关东公署主席，刘顺元、乔传珏为副主席。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随之撤销。

4月10日△中共旅大地委作出《关于加强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的决定》。

△韩光在地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作《目前大连形势与我党的政策》报告，指出地委的工作要以苏方外交政策为主，积极争取好的可能，保卫胜利成果，并准备在坏的形势下作秘密、隐蔽的斗争。

4月1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通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拟派员赴旅顺、大连视察。

4月25日△大连首届中苏友好协会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关东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乔传珏为会长，彼得罗夫、王群为副会长。

4月△中共旅大地委接收被苏军接管的满州化学厂、大华钢铁厂、进和铁厂、曹达工厂、大连制罐厂等，组织军工生产。

△中共旅大地委同苏军当局达成协议，将大连造船公司、远东中苏电业、中苏渔业、中苏石油公司等企业变为中苏合营企业。

△中共各战略区在连财经单位，工作中未能注意照顾苏方外交政策，引起苏方不满。驻连苏军当局认为，中共旅大地委同各战略区合作，瞒着苏方将关东地区物资搬走。因此，在组建关东公署财政厅时，苏军提出不准中共党员参加。

△关东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创办出版《友谊》半月刊杂志，取代《中苏知识》杂志。

5月1日△旅大工人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关东公署主席迟子祥、驻连苏军警备司令官吉章诺夫和旅大职工总会委员

长唐韵超等出席大会。

5月5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答复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同意国民党先派代表前往旅顺、大连视察。

5月19日△为对付国民党的破坏，保障旅大地区经济稳定和人民生活安定，中共旅大地委根据苏军当局通知要求发出通知，规定自5月23日至27日，对苏军军用币限期限额加贴印花。

6月3日△国民党为接收旅大，派出以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为团长的12人视察团乘军舰抵达旅顺港。4日至11日，视察团参观了旅顺博物馆、大连海港等地。中共旅大地委和苏军当局协调行动，妥当安排，使视察团的接收计划落空，于12月返回沈阳。

6月1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貔子窝、城子疃、瓦房店，解除了国民党军队对关东的陆上封锁。

6月21日△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发表谈话，谴责苏联支持东北中共军队及拒绝国民党军队开入旅顺、大连，违反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6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公报，综述向苏联交涉接收旅顺、大连遭阻之经过，提醒苏联注意条约义务。

6月28日△胡适就接收旅大一事发表谈话，要求苏联领袖应了解国民党民族主义的立场，让国民政府接收旅大。

7月11日△苏联针对国民党政府关于苏联阻止接收旅大的说法，发表声明说旅顺、大连地区并无中共部队。

7月20日△中共旅大地委发出《纪念“八·一五”发动回忆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城市开展“回忆运动”（反奸清算），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苏军当局甚为不满，认为此举严重影响苏联外交。驻大连苏军民政局局长格列克夫上校召集大连各系统负责人会议，予以严厉批评。驻金县苏军司令部还强令区干部退回被分的地主土地。

8月14日△《实话报》发表社论纪念《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2周年。社论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掀起反苏反共浪潮，是企图转移人民对国内形势的注意，并想把内战扩大到旅大地区，破坏旅大地区人民的和平生活。

8月19日△驻连苏军当局禁止美国船只进入大连港。

8月22日△美国政府抗议苏联延宕开放大连。

8月27日△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叶公超告诉记者说：大连在国军接收后才能确定开放日期。

8月28日△苏联塔斯社声明：苏联船只有权进入大连港。次日又声明：大连港辖于旅顺行政机构之下，直至对日和约成立为止。

8月△苏军驻连警备司令官格里果夫少将离连，巴申上校接任司令官。

9月17日△驻连苏军警备司令官巴申上校在接见东北民主联军总政秘书长杜平时，说中共旅大地委领导有错误，与苏军关系不好，不明白旅大是苏军监督。并指名要求旅大地委副书记刘顺元，地委执委、市职工总会委员长唐韵超撤退。

9月25日△中共旅大地委召开执委会议，确定旅大地区工作总方针为“发展生产，安定民生，巩固旅大战略要地，建设我党隐蔽后方。”在对苏关系上，地委作了自我批评。苏军驻连警备司令部也派人参加了会议。

10月30日△中共旅大地委召开会议，决定接收苏方关于刘顺元、唐韵超撤退的意见。11月，刘顺元以因病辞职名义调离旅大，唐韵超调哈尔滨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劳动部长。

△为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大连中山公园改称列宁公园，市政府广场改称斯大林广场。

12月6日△中共南满分局委员江华写信给韩光，指出与苏军搞不好关系的原因，是没有从东方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来考虑，

政治上没有远见。

1948年

2月25日△中共旅大地委发出《关于扩军扩警工作的指示》，要求完成征集6600名新兵任务，支援前线。

3月15日△中共旅大地委写信给驻旅顺苏军远东司令官别洛博罗多夫上将，就中苏在完成巩固关东苏联海军军事根据地共同任务中的工作关系问题，对苏军当局某些作法提出批评意见。

3月16日△中共旅大地委书记韩光、地委委员袁牧化与驻连苏军警备司令官巴申及安特罗波夫就如何改善双方关系问题进行会谈。

3月17日△中共旅大地委召开财政会议，决定将现行的临时苏军用币改为关东币，由关东公署负责币改准备工作。

4月27日△中共旅大地委召开会议，研究遣送日侨问题。

5月1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派李一氓任中共旅大地委副书记。

5月29日△中共旅大地委召开民主整风会议，着重研究对苏关系、领导与作风等问题。来连检查军工生产的东北军工部部长和政委何长工、伍修权参加了会议。伍修权在会上讲话，强调旅大的特点是苏军军管，批评一些人怀疑“以苏为主”等观点。

7月△洛甫（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召开的旅大干部会议。洛甫指出，在旅大“以苏为主”的方针是对的。如无苏联驻军，旅大不可能是中共的。

7月12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任命欧阳钦为旅大地委书记，韩光为第一副书记，李一氓为第二副书记。

7月30日△中共旅大地委书记欧阳钦在地委会议上传达东北局常委会《关于旅大任务的工作指示》。《指示》说，旅大地区是苏军控制下的解放区，与一般解放区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因

此，旅大的一切大政方针要由苏联决定。

8月7日△中共旅大地委发出《纪念“八·一五”、“八·二二”、“九·三”的通知》，要求在党内进行国际主义教育，批判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在党外进行拥苏宣传，加强中苏友好。

9月3日△大连市12万人集会纪念“九·三”胜利3周年，各界代表向驻连苏军献旗。

9月4日△中共旅大地委书记欧阳钦在全市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国际主义问题的报告》，指出旅大是苏军控制下的共产党当权的地区。过去不能正确处理好中苏关系的主要原因是党内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存在一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

10月20日△中共旅大地委作出《关于组织领导上的几个问题的决定》，指出党在大连的政策必须与苏军当局的政策完全一致，在各项具体工作上互相配合，互相支援。

11月13日△中共旅大地委发出《关于实行关东地方货币改革的紧急指示》，关东银行将发行地方性的统一货币代替苏军军用币。此举得到苏方的赞同和支持。

12月30日△中长铁路大连铁路局局长拉基奥诺夫，通令各处苏联处长及所辖各独立单位苏联行政负责人，自1949年1月1日起，每周须同中国方面的各级负责人和技术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技术学习，以提高管理铁路的工作能力。

1949年

1月16日△大连市中苏友好协会举行报告会，请苏军有关人员作《列宁的道路》报告。

1月△苏联太平洋海军歌舞团来大连演出。

2月2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中共旅大地委改称旅大区党委。欧阳钦为书记，韩光、李一氓为副书记。

2月28日△中共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副书记韩光与驻连

苏军代表奥新、辽曼什金等就中共旅大党组织公开、土地改革及政权改组等问题举行会谈。奥新表示：以迟子祥为首诸人物，已为苏目前政策所不需要。其它问题将向上级反映。3月，苏军远东军区司令部表示同意中共旅大党组织公开等事宜。

3月30日△关东中苏友协决定募捐7亿元（关东币），重修斯大林广场及苏军烈士纪念塔（其前身为苏军胜利塔）。

3月△驻连苏军廉价拨给关东公署120匹马，分配给农民备耕生产。

4月1日△中共旅大区活动分子大会召开。中共旅大党组织向全区人民公开。苏军驻大连警备司令部及远东军区司令部派人列席会议。

4月27日△旅大地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决定将关东公署改为旅大行政公署，批准迟子祥辞职的请求，选举韩光为行政公署主席，李一氓为第一副主席，乔传珏为第二副主席。

5月20日△中共旅大区党委召开会议，研究反动党团登记问题。

6月4日△中共旅大区党委改组财经委员会，欧阳钦兼书记，韩光、衣钦堂分别为第一副书记和第二副书记。

6月15日△旅大行政公署颁布《关于登记反人民反民主组织及其人员的布告》，在全区范围内开始了对反动党团及特务分子的登记工作，至7月末基本结束。

7月26日△旅大地区遭受台风袭击。全区伤亡175人，损失达36亿元（关东币）左右。

8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整顿高等教育的决定》。其中在旅大地区设立的高等院校有大连大学工学院、大连大学医学院、大连大学俄文专修科等。

8月2日△中共旅大区党委召开会议，研究土地改革问题。

8月18日△中共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在给中共中央东北

局高岗的信中指出：旅大地区在本质上与东北其它解放区没有两样，但在形式上，过去为照顾苏联的国际外交关系，曾有某些特殊的表现。这种特殊的表现，现在则因形势的发展一天天地减少或没有了。

8月23日△高岗、李富春写信批评旅大有若干干部骄傲自满，贪污腐化，在向苏联学习方面停留在口头上。为此，中共旅大区党委召开会议作了检查，并决定成立检查委员会。

8月26日△中共旅大区党委作出《关于实行土地改革的决定》。

9月19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派东北局宣传部第二副部长郭述申任中共旅大区党委副书记。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次日，旅大20万人民在斯大林广场集会庆祝。

10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访问。

12月△中苏两国建交后，驻旅大苏军设立的民政局随之撤销，苏军对旅大的军事管制宣告结束。

1950年

1月17日△旅大行政公署主席韩光、副主席乔传珏签发旅大地区实施土地调剂布告。之后，历经一个半月，全地区完成土地调剂任务。1949年8月，中共旅大区党委曾作出土地改革的决定，后来听取驻连苏军的建议而采取土地调剂的形式。

1月20日△周恩来总理奉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到达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国的会商。随同总理去苏联的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和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等。

2月14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

2月23日△旅大党政群机关干部集合斯大林广场，庆祝苏联红军建军32周年，并向苏军烈士纪念塔献花。

2月25日△旅大各界代表集会，庆祝中苏新约的签订。旅大行政公署主席韩光、苏军指挥部代表出席会议并讲话。

3月8日△大连“三八”号机车包车组成立。组长田桂英是经中长铁路大连机务段苏联专家李索夫亲手培养起来的中国第一位火车女司机。

3月21日△中共旅大区党委召开干部会议，区党委书记欧阳钦传达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由莫斯科返京经过沈阳时所作的关于加强中苏两国团结合作，全力搞好工业建设的指示。

4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共旅大区党委改称中共旅大区委。

5月13日△青年团中央书记冯文彬、青年团东北区工委书记韩天石，陪同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米哈伊洛夫为首的苏联青年代表团和青年文艺工作团来大连访问。他们先后为大

连青年作了6场专题报告和多场文艺演出。

9月8日△由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团抵连。代表团参观了大连机械车辆厂、大连造船厂等单位。

10月8日△毛泽东主席致电斯大林，就中国海军建设问题，请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方面的援助，并提供2艘作战训练用的小型潜艇等。1951年2月7日，苏联同意于1951年至1953年间，在旅顺口为中国培训4艘潜艇水兵。

10月15日△旅大行政公署与大连市政府合并为旅大市人民政府，韩光为市长，乔传珏、周光为副市长。

10月17日△中共旅大区委改为中共旅大市委，欧阳钦为书记，韩光、郭述申为副书记。

11月10日△中共旅大市委发出《关于全力动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工作指示》。

11月26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旅大分会成立并召开成立大会，郭述申为分会主席。

11月29日△旅大市防空委员会成立，下设指挥部和疏散委员会。

1951年

1月△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规定，由苏联代管或租用的财产（除中长铁路、造船公司外）移交给中国。其中工厂25个、发电厂2个、水电站8个及大连港、渔业公司和影剧院等。

2月14日△中共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在《旅大日报》撰文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周年，赞颂苏军在旅大5年多来的功绩。

3月24日△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大连召开。苏联军事代表团主席为别洛博罗多夫上将，中国军事代表团主席为肖劲光，副主席贺晋年。苏联军事代表团随

员斯维尼英中校、阿布拉莫夫少校，中共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市长韩光应邀参加了会议。

4月12日△出席旅大市第一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参加了斯大林广场的苏军烈士纪念塔奠基典礼。

5月13日△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来旅大休养。周总理在连期间，先后视察了大连港、旅顺口海军基地等地，并就工厂和军队建设等作了指示。

5月14日△旅顺口中国海军潜水艇学习队正式开训。苏军指派10名教官和2艘潜艇的士兵，负责学习队的教育和训练工作。

8月△苏军在连办的《实话报》停刊。

10月30日△旅大市各界人民组成庆祝俄国十月革命34周年筹备委员会。11月7日，举行了全市性庆祝活动。

1952年

8月17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

9月16日△中苏双方发表会谈公报，公布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报》和中苏两国外交部长《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

10月27日△旅大市中苏友好月筹委会组成，市委书记欧阳钦为主任。筹委会首次会议决定，11月7日至12月6日为“中苏友好月”。

10月30日△中共旅大市委发出《关于大力开展中苏友好月工作的指示》。

11月7日△旅大各界人民集会庆祝俄国十月革命35周年。市委书记欧阳钦在讲话中强调，要完成大规模经济文化建设，必须进一步学习马列主义。

11月△中共旅大市委副书记、市长韩光调离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兼任市长。

12月31日△中苏两国政府发表关于苏联政府将中国长春铁路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告。公告签署仪式在哈尔滨举行。根据移交中长铁路的协定，大连铁路局和大连铁路工厂也同时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亚历山达罗夫为团长的苏联红旗歌舞团一行259人，在中苏友好总会代表虞棘、冯征、张震等陪同下来连演出。

1953年

2月22日△为纪念苏联建军35周年，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央人民政府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代表团抵达大连，随带5个文艺工作团。周总理在下午举行的慰问大会上讲话，强调了在目前形势下，苏军驻扎旅顺口地区的重要意义。

2月23日△周恩来总理率代表团向斯大林广场苏军烈士纪念塔敬献花圈。24日，慰问团设宴招待苏军高级将领。25日，慰问团离开旅大。

3月5日△斯大林逝世。

3月9日△旅大市各界20万群众分7个会场集会，追悼斯大林。市委书记欧阳钦致悼词，苏军驻旅大总领事和苏联驻旅顺口地区部队指挥部代表，以及在旅大工作的苏联专家代表出席了大会。

4月14日△斯大林广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修建工程开工。

7月26日△中共旅大市委成立学习《联共（布）党史》中级组教学研究组，市委书记欧阳钦任组长。

9月△朱德总司令及夫人康克清来旅大视察工作。在连期间，朱总司令先后视察了大连港、大连造船厂及旅大驻军设防情况。归途中，朱总司令又视察了金县友谊果园集体农庄，并同部分庄员交谈、合影。

1954 年

1 月 22 日△中共旅大市委举行纪念列宁逝世 30 周年大会。市委书记欧阳钦到会作报告，阐述列宁对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贡献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

2 月 13 日△中共旅大市委举行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4 周年庆祝大会，并印发《关于开展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4 周年等活动，加强中苏友好的国际主义思想教育工作的通知》。

7 月 27 日△中共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调离旅大。郭述申任市委书记，宋黎任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胡忠海任市委副书记。

10 月 12 日△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发表《关于中苏举行会谈的公报》。公报宣布了双方签订的联合宣言和联合公报，其中有中苏关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问题的联合公报、关于现有的中苏合办股份公司问题的联合公报等。联合公报规定：苏联军队将于 1955 年 5 月 31 日前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给中国政府；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将于 1955 年 1 月 1 前出售给中国。

10 月 15 日△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会议根据中苏两国的协定决定，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后，中苏石油公司、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中苏造船公司和中苏民用航空公司分别改名为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国营大连造船厂和中国民用航空局。

11 月 6 日△国家文化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组成的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艺术团，分别在旅顺、大连和金县等地举行开幕式。

12 月 31 日△中苏合营大连造船公司中的苏方股份移交给中

国并举行交接仪式。

1955 年

1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带领先遣队抵连，筹备接收苏军防务和驻守旅大事宜。至1月17日，三兵团分两个梯队先后到达大连。经同驻旅顺口海军基地的苏联三十九集团军会议协商，成立了中苏联合交接委员会。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东北军区代司令员邓华分别任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

2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组成接收旅大防卫区委员会，肖劲光为主任，邓华、甘泗淇、刘亚楼、曾绍山、郭述申为副主任。

2月15日△驻旅顺口地区的苏联红军组织8个报告团，向旅大人民作“关于苏联国民教育工作”、“苏联军队是人类的解放者”等报告。

2月16日△中苏联合交接委员会举行会谈，通过了《苏联自辽东半岛撤离与中国军队进驻的计划》、《防务移交与中苏军队同驻期间保持备战实施的计划》和《技术装备交接计划》等。为应付交接过程中的突发事件，中苏两国军队还拟定了《共同作战方案》。

2月22日△中苏双方开始进行交接防务工作，至4月15日，交接防务工作基本结束并举行交接签字仪式。中方代表签字的是三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海军旅顺口基地司令员罗华生、空军三军军长刘丰；苏方代表签字的是三十九集团军司令代维佐夫、海军基地司令古德利切夫、空军五十五军参谋长切德利克。4月16日零时后，一切防务交由中方负责。

△以彭德怀为团长、宋庆龄、贺龙、郭沫若、聂荣臻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代表团抵连。彭德怀团长在当日下午举行的慰问大会上，为苏军代表佩戴“中苏友谊章”。

2月23日△彭德怀、宋庆龄、贺龙、郭沫若、聂荣臻及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驻大连总领事别良诺夫等参加在旅顺口举行的中苏友谊塔奠基典礼。

3月1日△驻旅大地区的苏军从即日起分别从旅顺、大连、金县等地陆续撤离回国。苏军每撤走一批，都由中方接防的指挥官送行。

3月7日△中苏双方交接军事设施与装备，至5月16日全部完成。

3月23日△国务院派遣李顺达、王崇伦、王海、赵仁虎等35名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来旅大，向驻旅顺口地区的苏军官兵作英模事迹报告。

3月27日△驻旅顺口苏军与旅顺人民在白玉山共同营造“中苏友谊林”。

5月7日△经重新修建的高39米的苏军烈士纪念塔完工。旅大各界人民于斯大林广场举行落成典礼，市委第二书记、市长宋黎在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为解放东北，解放旅大而光荣牺牲的苏军将士。

5月8日△10万多旅大人民在斯大林广场举行欢送苏军回国大会。旅大市党政领导和苏军代表分别在大会上讲话。市委书记郭述申、市长宋黎和驻旅顺口部队代表向苏军赠送锦旗。

5月24日△中苏联合交接委员会在旅顺苏军司令部举行会议，签署了“交接证书”，中苏双方交接防务工作全部结束。

△旅顺口苏军烈士纪念塔竣工并举行落成典礼。

△驻旅顺口地区苏军指挥部举行告别招待会。

5月26日△驻旅顺口地区苏军指挥部的高级将领和指挥部全体人员，从旅顺启程回国。旅大各界代表2万多人在大连火车站广场举行欢送大会。市委书记郭述申和苏军什维诺夫上将分别在会上讲话。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陪送苏军最

后一批人员到石河驿车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旅大市副市长于谷莺陪送苏军到中苏边境。

9月3日△旅顺口苏军胜利塔建成并举行落成典礼。国防部副部长肖劲光、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刘靖宇、旅大市市长宋黎等参加了典礼活动。

(孙宝运 关恒喜 整理)

第六部分

附 录

附一：

苏联移交中国的企业 财产清单（摘录）

〔新华社北京 10 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间于 1950 年 2 月 14 日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及 1950 年 2 月 14 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换文，曾规定将大连市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

苏联已向中国移交的企业和其他财产的清单并列如下：

在大连者：

工厂 16 处：计大连造船修船工厂、石油加工厂、机械工厂、电气机械工厂、洋灰工厂、灯泡工厂、玻璃工厂 2 处、油漆颜料工厂、罐头工厂、压油厂、水力压油厂、化学制造厂 2 处、耐火砖及绝缘器工厂、碎石工厂；

制造厂 3 处：计网索工厂、铁罐工厂、制袋工厂；

大连港港湾设备与装备；木船制造厂；盐田 6 处；

渔产联合工厂；冷藏室 4 处；

小型工厂 4 处：计基本建设部之机械修理所及本工厂 2 处，修船工厂、被服工厂；

汽车工厂、车库及修理所；

发电厂 2 处；

水电站包括中央电机试验所共 8 处；

文化教育机关 9 处；计技术学院，电影院 3 处，剧院建筑物

2 处，苏联海员俱乐部、工人疗养院、俱乐部；

住宅 206 处；仓库、堆栈 22 处；机关办公用建筑物 5 处；百货公司；25 公顷地产的果园 1 处。

（摘自 1951 年 2 月 11 日《旅大人民日报》）

附二：

纪念塔简介

1945年大连解放后，大连人民与苏军相处10年。为纪念苏军解放旅大及中苏两国的友谊，旅大地区先后修建了4座纪念塔。

简介如下：

大连苏军烈士纪念塔

1949年3月，关东中苏友协决定募捐7亿元（关东币），重修斯大林广场及苏军烈士纪念塔（其前身为苏军胜利塔）。1953年4月14日纪念塔修建工程动工，1955年5月7日举行落成典礼。塔高39.9米，建筑面积为1028.31平方米。全塔系用花岗石筑砌而成，塔基东、西两面有台阶，可直登塔基台面。塔身呈六角形。1955年4月29日，在塔身正前增设一尊身高5米手执钢枪，头戴钢盔的苏联红军战士铜像。塔基正中镶嵌着一块用中苏两国文字镌刻着“永恒的光荣”的碑文。

旅顺苏军烈士塔

1955年苏军撤离旅顺前，根据苏联政府的决定，为1945年保卫中苏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光荣牺牲的苏联红军烈士建立纪念塔，该塔建在旅顺口的三里桥村与寺儿沟村中间的小山东坡处。

1955年3月23日该塔动工，5月24日竣工。塔基系方形，用花岗石砌成。塔高15米，塔尖饰有金色五角星一颗，周围以鎏金麦穗所点缀。塔身正面底层用中苏两国文字镌刻着“为苏中两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的碑文。

旅顺苏军胜利塔

胜利塔矗立在旅顺口区斯大林路广场中，占地面积为 15546 平方米。该塔系为纪念苏军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中苏友谊而兴建。

该塔于 1955 年 3 月下旬动工，8 月 28 日竣工，9 月 3 日举行落成典礼。该塔高 45 米，塔身系花岗石磨光砌成。塔基呈五角形，五边均有二层台阶，在第二层台阶上立有 5 根六角柱和 10 根八角柱组成的基柱。塔身为空心，内有 178 级盘旋石阶。

塔身外部上端，系用铜制镀金装饰，塔尖装有一颗五角红星，周围用镀金麦穗缀饰。塔身底部正面用中苏两国文字镌刻着的碑匾。塔身南侧镌刻着“苏中两国人民伟大友谊万岁”的碑文。塔身北侧镌刻着“光荣归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捍卫了远东和平的苏联人民及其武装力量”等 22 条标语。

旅顺中苏友谊塔

为感谢苏军驻旅顺口期间对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贡献，纪念苏军驻军与旅顺口地区居民之间的深厚友谊，经国务院决定在旅顺口修建“中苏友谊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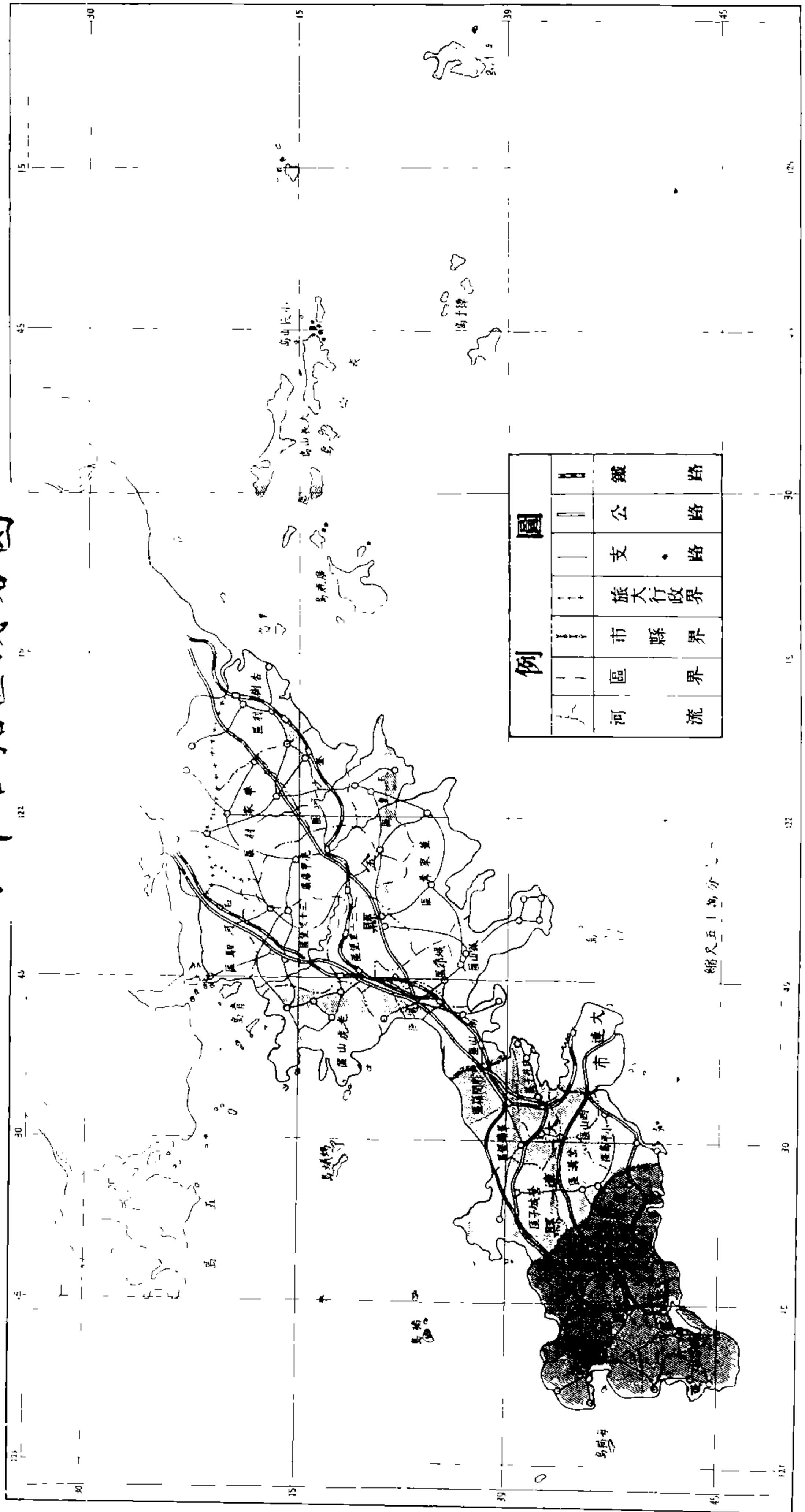
该塔位于旅顺博物馆广场。1955 年 2 月 23 日举行奠基典礼，10 月 29 日动工，1957 年 2 月 14 日完工。

该塔高 22.2 米，塔尖设有中苏永恒友谊徽一枚。塔身呈十二角形，系用雪花石为材料砌成，塔身上部雕有花朵群，象征着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如永远盛开的鲜花。塔身下端雕有中苏两国人民的群象。塔座四周嵌饰中苏友谊的浮雕，浮雕两旁用浅红色花岗石雕成胜利旗帜，表示着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坚如磐石。塔的铭石装饰在第二层塔座雕杆的中央部位，其两侧饰以和平鸽的石雕。

(陈士聪 关恒喜整理)

附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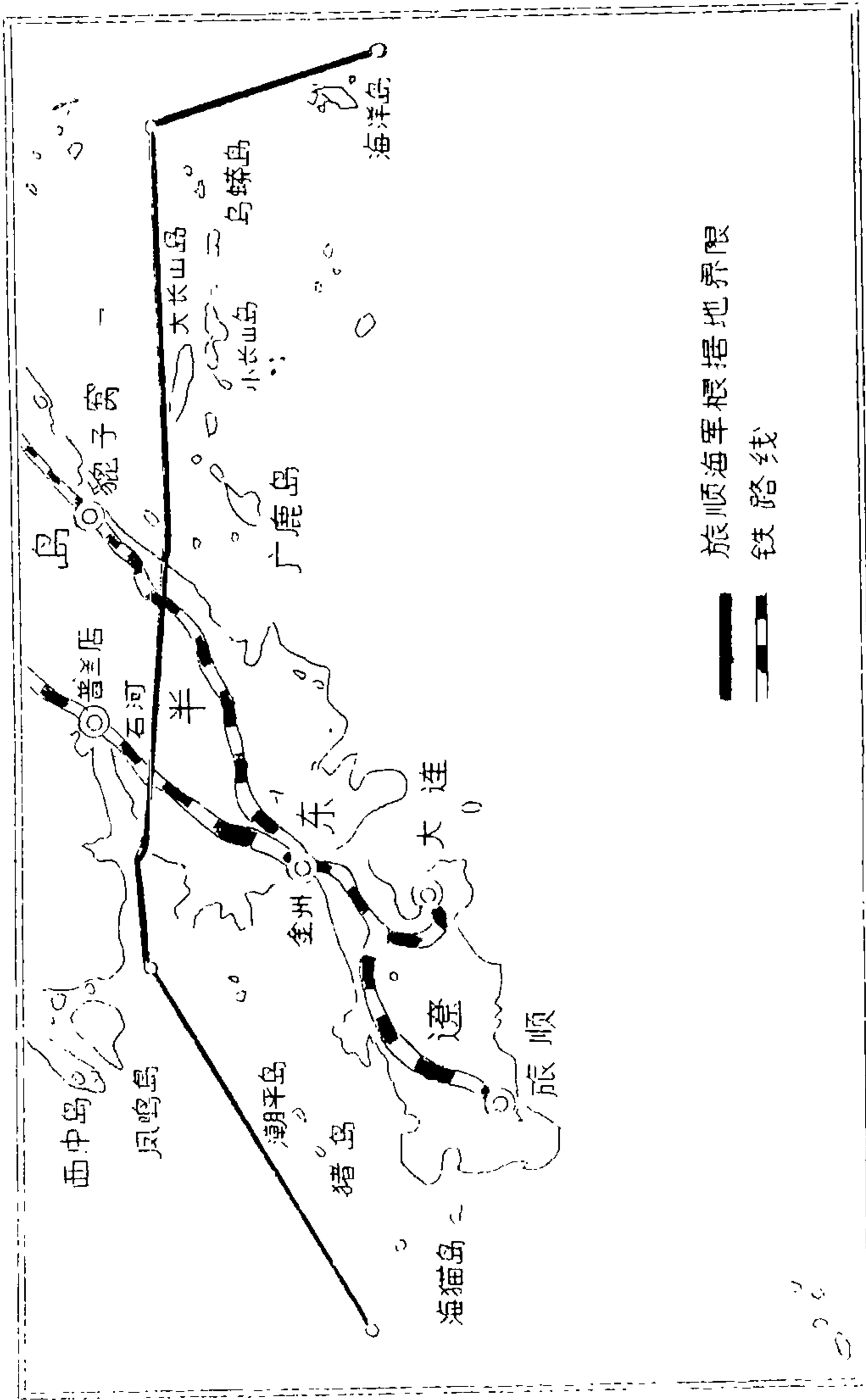
苏军管辖区略图



例		圖	
—	區界	—	支路
—	市縣界	—	公路
—	旅大行政界	—	鐵路
—	河流		

縮尺五十分之一

旅顺海军根据地范围示意图



后 记

《苏联红军在旅大》一书的出版，是原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多年来征集、研究的结集。本书的主要资料出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资料室，关恒喜、孙宝运搜集了其余部分资料，周月虹参与征集有关报纸资料，杜宏整理了照片资料。曾经亲历过这一段历史的老同志也给予了热情支持，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

编者

1995年1月